

编者按：“文学豫军”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多年来，本刊持续关注河南作家的创作，精心策划并推出关于河南作家的系列专题研究。新年伊始，本刊特约资深出版人、学者型编审李勇军，撰写关于河南作家作品的版本、改编与传播史研究文章，开设专栏。李勇军先生多年来收集的大量史料，以及在网上海价购回的珍稀版本，为研究提供了丰富且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其文学史、传播史的视野，严谨细致的考证，均以娓娓道来的方式呈现，使学术性与叙事性融为一体，具有难得的可读性。对作家作品由“小众”到“大众”接受史的梳理，也深刻展现了中国当代文学、文化及社会的变迁，可谓开启了一扇研究“文学豫军”及中国当代文学的新窗口。

周大新《香魂女》的改编与传播

李勇军

(郑州大学出版社,河南 郑州 450001)

摘要:周大新是“文学豫军”的代表性作家之一,《香魂女》是他的代表性作品。1990年,这部原题为《香魂塘畔的香油坊》的中篇小说首次发表时,主流文学选刊也未予以关注。三年后,根据该小说改编的电影《香魂女》获得第43届柏林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熊奖”,使得小说原作名声大振;十年后,据此改编的豫剧《香魂女》又获第六届“中国艺术节大奖”,这次“窑变”式的改编又使其焕发出新的艺术光彩。电影、豫剧的两次成功改编,使该作品从“小众化”阅读走向“大众化”阅读。受改编的正向影响,小说文本也在一次次“改编”:题目从《香魂塘畔的香油坊》到《香魂塘畔香魂女》再到《香魂女》,从而在读者中达到“同频共振”的传播效果。

关键词:周大新;《香魂女》;改编;传播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5.01.001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5)01-0001-06

周大新的中篇小说《香魂塘畔的香油坊》在河北的大型文学刊物《长城》发表后,经历了从“冷遇”到“热捧”这一不同寻常的过程,特别是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电影《香魂女》于1993年2月获第43届柏林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熊奖”数年之后,2000年豫剧《香魂女》又获第六届“中国艺术节大奖”。而这部小说的文本也不断“被改编”,例如:1993年7月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收有该作品的周大新小说集,便改名为《香魂塘畔香魂女》并用作书名。在此之前,由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周大新小说选将该作品改名为《香魂女》并用作书名;后来,该小说还

被收入孟繁华主编的《百年百部中篇经典》(春风文艺出版社,2018)、白烨主编的《中国当代乡土小说大系》(农村读物出版社,2010)以及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先后出版的两种“周大新文集”等多种选本,均题名为《香魂女》。

考察从小说《香魂塘畔的香油坊》到电影《香魂女》再到豫剧《香魂女》的改编过程,既是对当代文学“跨文体传播”的个案研究,也是从一个特定的视角对周大新文学创作进行全新解读。

一、小说《香魂塘畔的香油坊》

据《周大新年谱》:

收稿日期:2024-12-06

作者简介:李勇军(1970—),男,河南兰考人,郑州大学出版社人文分社社长、编审,研究方向:新时期文学版本研究、期刊史研究等。

1989年9月23日至10月11日,(周大新)回南阳探亲,某日在街上溜达时闻到家乡小磨油的奇香,尘封的记忆扑面而来,灵感闪现,几天后一气呵成写出《香魂塘畔的香油坊》。^{[1]85}

事实上,除了小说中的“香油坊”,“香魂塘”也有其创作原型。周大新写过一篇散文《村边水塘》^[2],文中写到,他们村周围有许多天然的水塘,岸上植有柳树、杨树,塘里有苇有荷有菱角,还有鲢鱼、鲤鱼等,鸭子在塘里游泳,牛羊在这里饮水,村里的女人在这里洗衣,孩子们在水里嬉戏……这些塘都不大,“大的,水面面积有1000余平方米;小的,只有几丈见方”。至于电影《香魂女》中,可以开船打鱼、行驶航班的,已不是“塘”而是经过二度创作的“香魂淀”了。

小说完稿后,周大新将它寄给恰好约稿的《长城》杂志。很快,责编赵玉彬来信称,将在该刊1990年第2期发表。

小说的主线是郃二嫂(后来电影中的“香二嫂”、豫剧中的“香香”)与环环两代农村女性的爱情与婚姻。郃二嫂的大名叫银娥,但这个名字几乎不曾被人提及,连她的合伙人、日本女商人新洋贞子也称她“二嫂”。她已记不得是在几岁(“是一个春荒的头晌”)被卖到郃家当童养媳的,但她记得十三岁时被迫与二十岁的独腿二东“圆房”。斗转星移,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来,她的聪明能干被派上了用场,她开的香魂油坊声名远播,产品不仅销往京、津、沪等大城市,还出口日、美等国。日本女商人新洋贞子亲自带人考察后,主动要求投资,自此“油坊”成了一家中外合资企业。

再说郃家。他们家有一种“遗传病”,每辈都有一个得怪病的人:祖父辈的三爷生下来两耳无耳廓,他大伯生下来右胳膊只有半截,郃二东生下来左腿先天残疾,只能单腿走路;郃二东的儿子墩子则是癫痫、智障,女儿芝儿倒是聪明伶俐,但她的生父却是本村的任实忠——当然这是郃二嫂他俩密不告人的隐私。

墩子已经二十二岁,郃二嫂动了给儿子娶亲的念头。媒人先后介绍了两个姑娘,她都没有看上,她看上的是油坊的环环姑娘,想不到却遭婉拒。“自从二嫂办起香魂油坊,尤其是新洋贞子投资以来,她办事已很少遭人拒绝。”于是她不动声色地以高出许多的工资,把环环的恋人金海安排在城里的香魂油坊的零售店,条件是“两年内不能谈对象结婚”(理由是:生意上的事讲究经验,不想三天两头换人);接着,她又指使侯信贷员上门催要环环父亲因

种烟欠下的六千元贷款。最终,郃家以一万二千五百元的彩礼,将环环娶进家门。谁想平静的日子没过多久,墩子犯病,环环回娘家,矛盾即将激化,但迫于婆婆的压力只得忍气吞声。郃二嫂与任实忠偷情被环环撞见,出乎郃二嫂意料,环环竟以德报怨。两代女性面对面,环环道出心声,“你这辈子心里也苦”。郃二嫂如大梦初醒,主动提出让环环与墩子离婚。她意味深长地说,“一辈子太长了”“娘给你准备嫁妆”,水中的月亮望着“水边抱在一起的两个女人”……

这部中篇小说无论是题材选择、思想内蕴还是人物形象塑造,都值得认真解读。首先,从作品的副题(似乎一直被研究者忽略)“古都凡人之二”可知,这是周大新当时创作的该系列作品中的一篇。此前,评论家冯牧注意到周大新的作品“大都标以《豫西南有个小盆地》这样的副标题”^[3]。换句话说,周大新是在一个特定的区域(南阳盆地)内选取题材,由此塑造这一区域内的人物。其次,小说既反映了改革开放的农村经济发展现实(民间作坊开始“中外合资”、走出国门),也揭示了伴随着经济发展,农村人(特别是女性)精神世界的变化与觉醒。再次,作品写出了浓郁的地方文化色彩与历史的纵深感,如:据说发现这里的塘水可做香油是在宋朝——就像现代企业做啤酒离不开好水一样,“香魂塘”之名源于乾隆年间;当然也包括“香油坊”本身,以及郃二东在村中的祥凤酒馆里泡着“听坠子书”等。

笔者注意到,1980年代,“青年作家”周大新与河北的大型文学刊物《长城》有着较为紧密的联系:1984年7月,他的短篇小说《街路一里长》发表在该刊1984年第4期,后被《小说选刊》1984年第9期转载;1985年1月,中篇小说《军界谋士》发表在该刊1985年第1期,并获“《长城》优秀作品奖”;1985年11月,中篇小说《人间》发表在该刊1985年第6期;1987年5月,中篇小说《滨河地》发表在该刊1987年第3期。《香魂塘畔的香油坊》(1990年第2期),也是该刊编辑“恰好约稿”。

但是《香魂塘畔的香油坊》发表后,并未引起太大反响。一方面,其时恰逢全国文化艺术工作会议开始强调文学艺术意识形态“把关”的重要性,在此大背景下,当期刊物的头题是《新时期社会主义文艺建设的理论导向》的文章,二题是河北当地作家何申的中篇小说《燕河之秋》,原拟作为该期头题发表的周大新的这篇作品只能“屈居”三题。另一方面,当时颇具盛名的“选刊”,包括《小说月报》《小说选刊》《新华文摘》《中篇小说选刊》等,均未关注到

它,这也直接关涉着这篇作品未能在全国更大范围内传播。

正如人的命运一样,每一篇文学作品也都有自己的“命运”。由该作品改编的电影《香魂女》大获成功,不但获得“金熊奖”,而且获得广电部1992年度故事片“特别荣誉奖”、中国香港电影金像奖“十大华语优秀影片奖”、美国第29届芝加哥国际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等。电影的极度“高光”反过来带动小说作品的高关注度。如前文所述,1993年5月由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周大新小说选直接取名《香魂女》,并在封面上标注“获43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影片原著”字样。《周大新年谱》这样描述:

《香魂塘畔的香油坊》随着电影改编、豫剧改编的获奖,在国内引起热烈的反响,仅在1993年,就有六十多篇来自多家新闻媒体及刊物发表的有关小说原作和电影改编、豫剧改编方面的作家专访、影视剧改编评论等,例如:《电影评介》《大众电影》《电影文学》《电影世界》《中国广播影视》《中国新闻》《文艺通讯》《文学与人生》《中国妇女》《文艺研究》《现代妇女》《电影》《文汇电影时报》《人生与伴侣》等媒体,都发表了与作者、作品相关的文章,有人戏称之为“周大新年”。^{[1]89-90}

二、电影《香魂女》

由谢飞改编的电影文学剧本《香魂女》发表在《电影文学》1992年第3期。当然,虽然由他本人担任导演,最终拍竣的影片与剧作之间还是存在明显的差异。下面我们对这部电影的解读,是以最终的电影“成片”为准。

据《周大新年谱》:

长春电影制片厂文学部编辑尹江春翻阅到周大新的《香魂塘畔的香油坊》,向文学部主任推荐该作品,他们一致认为这是“改编剧本的好蓝本”,以一千元向《长城》杂志和作者周大新购得改编电影的版权。^{[1]88}

由此可知,与文学圈内的“冷遇”不同,《香魂塘畔的香油坊》发表后,其改编权很快被长影买下。但是,由于当时资金、发行市场等诸多方面的原因,从改编到拍摄,进展并不顺利。由该厂与天津电影制片厂联合摄制这部影片,直到夺得“金熊奖”时,尚未在国内较大范围内上映。

后来的评论家、研究者谈论电影《香魂女》时,观点往往集中在“表现人性的扭曲与复归”“世界性的悲剧意蕴”“国际化的视野”等话题,但笔者认为

这主要得之于编剧兼导演谢飞对“电影”这一艺术表现形式谙熟于心。他在《香魂女(导演工作脚本)》中这样阐释:“塑造出一个真实、复杂、独特的中国当代农村妇女的形象。”“独特的身世造就了二嫂泼辣、极有心计的个性;传统中国妇女的地位又使其有着懦弱、逆来顺受的一面。善良与狠毒、精明与愚昧、美好与粗俗等矛盾的东西都有机地杂存在她的身上。”^[4]

对于郜二嫂(“香二嫂”)这一形象,无论是小说还是电影,都是把人物放在时代的大背景下加以刻画。她身上有《呼兰河传》等作品中“小团圆媳妇”的影子,但与她们又是截然不同的两代女性。她因为赶上改革开放这么一个“前无古人”的时代变革而实现“翻身”,虽然没有完全改变自己的人生命运。小说中还写到她此前的一次命运改变:新中国成立后,夫家被划为富农,这样一来她的地位骤然上升,郜家怕再对她打骂,她会像其他童养媳一样跑回娘家——尽管已经“圆过房”。同时,电影中“香二嫂”这一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很大程度上得之于新洋贞子和任忠实(小说中的“任实忠”)两个人物的重塑。

在小说原作中,第一次写到新洋贞子并不是真正意义的出场。“两年前日本经营粮油的女商人新洋贞子来油坊参观后,自愿提出投资扩建。”接下来通过“补叙”,我们才略略知道那次考察的经过:那天她仔细品尝了香魂小磨油之后,特意舀了一勺塘水尝尝,又让随行人员带了一壶回去化验,“化验后立即拍来电报,愿投资四十万美元扩建香魂油坊”。后面还有几处,也仅仅“叙及”其人而已——

“上次连新洋贞子摸着墩子的头叹了一口气,二嫂就一天对她待理不理!”她对儿子的病讳莫如深。“自从二嫂办起香魂油坊,尤其是新洋贞子投资以来,她办事已很少遭人拒绝。”在儿子的婚礼上,二嫂“让人把新洋贞子带来的两辆轿车都开上,绕村一周把环环娶进了屋”。

但在电影中,改编者对贞子这一形象做了焕然一新的“重塑”,使其不仅丰满生动,竟至于大放光彩。影片简单的“序幕”之后,贞子正式登场。要知道,1990年代初,对于河南农村而言,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初级阶段”,小乡镇来了个“东洋人”,而且还是个打扮洋气、带着翻译的“东洋”女人,其在当地产生的“轰动效应”(应该说是观众的视觉冲击力)可想而知。她与小镇人物的强烈反差颇具戏剧效果:当香二嫂向她介绍自己的丈夫这是“俺外头人”,贞子施礼,瘸二叔慌忙后躲差点摔倒,于是“众人哄笑”。当香二嫂介绍说,乾隆年间镇上大财主

的千金和穷铁匠的女儿双双投水自尽，贞子惊问：她们的尸体一直在水里？（就像带回水样化验一样，展现出的是一种科学精神）而香二嫂的回答透着这位乡村女性的机智：不！有人看见她们化成两只漂亮的鸟儿，从水里飞上云天去了！

此次贞子前来参观，是经城里一位任先生介绍，即常来镇上的运输专业户任忠实（小说中叫“任忠实”）。这样的情节安排不但比小说更趋合理，而且三人的命运也开始真正交织在一起。

按照导演的阐释：以上这些，表面上看是外国商人的到来，暗中却道出二嫂的心病——傻儿子的婚事。接下来一场便是“相亲”。遇到儿子找对象这样的大事，她只能找身边最重要的人物商量，一个是她的丈夫，另一个就是任忠实，他俩的关系以“幽会”的形式含蓄而又真切地展现在观众面前。

第三场“逼亲”是在暗中推进，一切在不动声色中却又包藏心机。信贷所王所长转来一封电报，同时“老任也来了电话”，催促香二嫂马上动身。陪同香二嫂去省城商谈投资事宜的是小伙子金海——环环姑娘此前的恋人，现已成为香二嫂忠诚的下属（只有这样才能拆散他俩）。此次香二嫂大开眼界，展现在她面前的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参观现代化的炼油厂，吃日本料理，住高级宾馆，而真正的“高潮”是在客房里只剩下两位身份迥异、语言几乎不通的女性面对面的时候。贞子将几件包装考究的礼物（女性内衣、丝袜、头巾等）送给香二嫂，香二嫂试戴头巾后喜极而泣，“这辈子还没人送俺这样好的东西”，接着她以“自白”的形式诉说自己悲苦难言的身世……让人恍然生出“天上人间”的命运落差。这时翻译进来，说贞子有一个紧急约会。那位叫山口的合作者，也是她的情人——原来贞子为了事业始终没有成家。香二嫂若有所失，不由自主打电话给车队值班夜班的任忠实，却得知他回家给儿子过生日了。

在小说原作中，“二嫂”对“忠实”是“俯视”，在电影中则一变而为“仰视”——于她而言，他是神通广大的城里人，她则始终是个乡下人（即便事业取得成功，受到当地人的尊重）；他在城里有自己的事业，有个幸福的家庭；两人的关系也是他占主导，包括为她引来外商投资，后来分手也是他主动提出的——“都不年轻了”“都有家”。

笔者认为，电影《香魂女》的改编，还有两点值得一提。一是将“香魂塘”改为“香魂淀”。就视觉冲击力而言，这是读者（观众）阅读小说与观看电影所感受到的最大不同。相比较而言，“淀”比“塘”要广阔得多、“内蕴”丰厚得多。塘，可以用来洗涮，可

以种荷、种芦苇；淀，可以开船打鱼，甚至于通航（香二嫂带着金海去省城，坐渡船出发），它直接通向给人无穷想象的外面的世界。环环、金海、墩子三人“同框”起渔网，看到孩子们玩娶新娘的游戏，墩子傻笑，环环指给金海看，她绝没有想到结局是“无情人却成眷属”，让人感到命运的安排会如此无常。而他们的婚礼，也是在船上举行的——包括香二嫂与任忠实在这样的环境中幽会，也变得更加隐秘、更难以被人发觉。二是电影开放式的结局。影片的最后，环环迈向新的人生，美好的未来在召唤着她，同时也让人担心她能不能重新找回本应属于自己的幸福。

三、豫剧《香魂女》

剧作家姚金成起意改编《香魂塘畔的香油坊》应是在1998年底。此前，因为办刊物的关系（主持《东方艺术》），他与作家周大新一直是“未见面的朋友”。1999年国庆节期间，初稿完成；2000年3月，豫剧《香魂塘畔的女人》由河南省豫剧三团首演。2000年8月，《香魂塘畔的女人》（大型现代豫剧，作者：姚金成）发表在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办的《剧本》杂志第8期。2000年9月，该剧参加在南京举行的第六届中国艺术节，并一举获得“中国艺术节大奖”，此时剧名已改为《香魂女》。

笔者还注意到，由该剧拍成的戏曲电影名为《香魂塘畔的香魂女》。为叙述方便，以下统称为《香魂女》。

《香魂女》获得“中国艺术节大奖”，在河南省内外产生的轰动效应有两个方面：一方面，第六届中国艺术节举办的时间节点在于它“是在人类社会跨入新千年、迈向新世纪这一历史时刻举行的一次中国艺术盛典”。另一方面，此前河南戏剧界在全国赛事中还未拿过最高奖项，因此被视为“零的突破”^[5]。

对于原小说的改编，豫剧《香魂女》编剧姚金成用了“改造”一词。这种“改造”包括故事背景、人物身份（包括姓名）以及主要情节和矛盾冲突。改编之后，小说中的“香魂油坊”变成了“沈家钧窑”，女主人公也从一个开香油坊的农村妇女变成了靠烧制瓷器发家致富并受到政府表彰的“领头人”。这是此次改编的重大突破，也是展现作者艺术灵感和创造力的“二度创作”。

学者刘成纪曾讲，瓷器“弥漫着神秘而温润的气息，似乎和东方女性的纯洁温柔、细腻内敛有着隐秘的联系”，“瓷器质脆、宁静，具有一种脱俗的气质，这不禁又使人想到需要时时精心呵护的爱情”。从形式意义上讲，《香魂女》“叙述的正是这种由瓷器和爱情组成的两代农村女性的情感故事”^[6]。

由此想到剧作中反复使用的一个极富象征意味和审美想象空间的情节——“窑变”。作者说：

其实我们的时代也在经历着一个复杂而伟大的“窑变”过程，我们每一个人的命运和心灵也都处在这个“窑变”中。在多年的创作中，我最感兴趣的就是我们这个变革中的时代和“转型”中的人物——尤其是农村妇女的形象。她们的悲欢歌哭往往在最普通的乡村生活场景中演绎着我们民族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心灵史。^[7]

不言而喻，这种故事场景和人物职业及身份的转换也更加有利于舞台艺术形式的表现，钧瓷“神窑”相较于香油作坊也更有戏剧的韵味和魅力：一开场，香魂塘畔“钧窑火光中，象征钧窑的舞女从钧窑中鱼贯跃出”“伴唱声中，钧瓷精灵化成了如梦如幻的仙女翩翩起舞”。

小说中的郜二嫂（大名“银娥”），在豫剧中“改名”为“香香”（大名“刘香香”），她七岁那年随父母逃荒，被以一斗麦的价格卖到沈家营，十六岁那年被逼与身有残疾的沈二东圆房（上述情节与小说原作不尽相同），“现如今改革开放过上了好光景”。丈夫喝酒赌钱不务正业，“夫权”思想严重，多年来他对她加以“统治”，除了传统的“夫权”思想之外，还有那先天的“资源优势”——沈家钧窑是其祖传家业，“神窑挂我沈家牌，没有我，你这老板从哪里来！”而她迫于这样的家庭现实和世俗压力，只能委曲求全极力在外面维护着贤妻良母的形象。她真正的心上人任实忠（同小说中的名字）——小说中“正是由于和任实忠的这份恋情，才使她对生活还怀着希望，才使她有了去开油坊挣钱的兴趣”；而在戏剧中，任实忠由个体运输户“变身”为钧窑最重要的工匠，对香香而言，无论在情感方面还是事业方面，其分量都更显得举足轻重。设身处地，香香作为土生土长的农村女性，她根本没有勇气打破现存的婚姻和家庭，尽管她和任实忠有了共同的女儿灵芝（小说里的“芝儿”），只能在隐忍中与任实忠保持“地下情”；而在她“出名”之后，出于维护其“公众形象”的内心隐忧，任实忠毅然南下打工，接着就出现了“败窑”——显然他早已不是当初的“小窑匠”，而是这座“神窑”最重要的支撑，这种“支撑”既是技术层面的，又是销售层面的（他第一次出场，就是参加完“广交会”满载而归），当然同时也是香香的情感和精神支撑。

与小说相比，豫剧《香魂女》中二东的“戏分”明显增加，他与妻子香香的同床异梦、没有爱情的婚

姻，通过第二场的唱、念以及生动形象的表演（要不到钱喝酒、赌博就倒地装死等），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观众面前。

另外，剧作者还对其他人物进行了取舍：加进了刘婶、疯婆（“半人半魂”）、轿夫等，删去了“一辈子在媒场上混”的五叔、日本女商人新洋贞子等人物。小说中，环环的恋人叫金海（“村西头老周家的二儿子”），豫剧中，这一人物只有其姓、不见其人，他从深圳寄给环环的回信，被二东、香香夫妇扣压。

四、《香魂女》的跨文体传播

小说《香魂塘畔的香油坊》的发表和电影《香魂女》的上映，前后相距大约三年；再到改编为豫剧《香魂女》，前后相距则大约十年，这一改编与传播的过程给我们带来多方面的启示。

（一）从“小众化”阅读走向“大众化”阅读

从《香魂塘畔的香油坊》到《香魂女》，电影、豫剧的成功改编，不但不会影响、反而会更加凸显小说原作的阅读价值——使得它从“小众化”阅读走向“大众化”阅读，从浅层次阅读过渡到“深度阅读”。而且，改编后的电影文学剧本《香魂女》、豫剧现代戏剧本《香魂塘畔的女人》，本身就是独立存在于电影或豫剧之外的、具有阅读价值的文学作品。

作家周大新说过，他写剧本的兴趣，最初就是来自对电影文学剧本的阅读：

我是在东去青岛的火车上读到那个名叫《此恨绵绵》的电影文学剧本的，那个剧本优美的语言和它讲述的凄婉故事是那样深深地打动了，以至于我在那列奔驰在胶东大地上的火车厢里发誓，我一定要学会写电影剧本。^[8]

他说，在剧本的可读性方面，中国的关汉卿和英国的莎士比亚给我们做出了最好的榜样，“即使看过舞台上的《窦娥冤》和《仲夏夜之梦》的人，在读剧本的时候，仍然会兴味无穷”。同时，影视或舞台表演的局限性也显而易见，“因为再好的导演、演员和摄影师，都不可能把剧本中含蕴丰富的汉字所要传达的东西全部在银幕和屏幕上表现出来”^[8]。

（二）多种改编形式的交互影响与彼此超越

一般而言，如果改编于同一个时期，多种改编形式会有“交互”影响，比如张一弓的《流泪的红蜡烛》；而如果是先后关系，则往往是“先”影响“后”。如前所述，豫剧《香魂女》最引人注目的“改造”，是将小说中的“香魂油坊”变成了“沈家钧窑”，但是这里面难道没有电影中改编为“香魂淀”的启发？再如：电影中香二嫂卧床不起，其主要原因不只是与情

人任忠实幽会的秘密被儿媳撞见,还因为这次幽会,任忠实向她提出分手,要留下一笔钱,远走他乡——电影中“提出分手、(给她和女儿)留下一笔钱”这一细节,也被改编成豫剧时所采用;甚至于剧名也由最初的《香魂塘畔的女人》改为《香魂女》。

(三) 改编也是一个精益求精的过程

一般来说,每一次改编都是一个精益求精的过程。比如从剧本到演出,会有较大修改;在演出过程中,也还会不断加工。豫剧《香魂女》从首演到参加第六届中国艺术节,其间经过了较大修改;而最初发表在《剧本》杂志上的该剧本,后来收进《悲欣交集》时,作者姚金成又做过较大修改。以开头为例,原为:“梦幻音乐,彩雾中象征钧瓷的舞女组成盛开的荷花。香香兴奋奔上,实忠从钧瓷中走出。一条几乎横贯舞台的红绸从空中落下,实忠与香香各接红绸一端起舞。二人渐舞渐近,实忠忽然变成了嬉笑的二东。香香惊愕欲逃,二东紧紧拉住香香,将红盖头蒙于香香头上。”修改后为:“钧窑火光中,象征钧窑的舞女从钧窑中鱼贯跃出”“伴唱声中,钧瓷精灵化成了如梦如幻的仙女翩翩起舞。”

再说电影。《香魂女》从“电影文学剧本”到“导演工作台本”,再到最终的“完成台本”,我们能够从中清晰地看到一次次的修改与提升。当然,也不是所有的修改都有“提升”。

就《香魂女》而言,其电影改编上映至今已逾三十年,而同名豫剧的公开上演也已二十余年。就新

时期文学而言,真正有生命力的作品会历久弥新,我们相信将来还会有适应观众需求和审美旨趣、深度融入“当下性”的再次改编,使其在不同的文体、艺术舞台“重新绽放”——包括这部《香魂塘畔的香油坊》,也包括作家周大新的其他作品。将来,应该还会有更适应观众需求和审美旨趣、深度融入“当下性”的重新改编。

参考文献:

- [1] 柴鲜. 周大新年谱[M]. 郑州: 郑州大学出版社, 2024.
- [2] 周大新. 村边水塘[M]. 郑州: 文心出版社, 1996.
- [3] 冯牧. 《左朱雀右白虎》及其他(代序): 读周大新近作[M]//周大新. 香魂塘畔香魂女.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3.
- [4] 谢飞. 香魂女(导演工作台本)[M]//谢飞. 中国电影导演的艺术世界丛书: 谢飞集. 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98: 82.
- [5] 湛强, 郑晋鸣, 朱庆. 第六届中国艺术节在南京隆重开幕[N]. 光明日报, 2000-09-29(1).
- [6] 刘成纪. 瓷音舞影 为美而存: 读姚金成的《香魂塘畔的女人》[J]. 东方艺术, 2000(4).
- [7] 河南省戏剧家协会. 悲欣交集: 姚金成剧作十二种[M].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4: 序4.
- [8] 周大新. 周大新文集: 惊讶[M]. 吉林: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6: 自序1.

(责任编辑 刘海燕)

The Adapt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Zhou Daxin's *The Fragrant Spirit Woman*

LI Yongjun

(Zhengzhou University Press, Zhengzhou, Henan 450001, China)

Abstract: Zhou Daxin is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 writers of the “literary School of Yu (short for Henan Province)”, with *The Fragrant Spirit Woman* being one of his iconic works. In 1990, when this novella, originally titled *Fragrant Oil Workshop by The Fragrant Soul Pond*, was first published, it received limited attention from the mainstream literary anthologies of the time. Three years later, the film adaptation of the novel *The Fragrant Spirit Woman* won the Golden Bear Award for Best Film at the 43rd Berlin Film Festival, propelling the popularity of its original work. Ten years later, according to the adaptation of the Yu opera *The Fragrant Spirit Woman* and won the sixth China Art Festival Award, achieving an “alchemical transformation” that imbued the narrative with renewed artistic brilliance. The successful adaptation of the film and Yu Opera won the work from niche readership to mass consumption. The novel text is positively influenced by the adaptation, and it is also “adapted” again and again; the title changes from *Fragrant Oil Workshop by the Fragrant Soul Pond* to *Fragrant Soul Woman by the Fragrant Soul Pond* and then to *The Fragrant Spirit Woman*, thus achieving the communication effect of “same frequency resonance” among readers.

Key words: Zhou Daxin; *The Fragrant Spirit Woman*; adaptation; dissemination

“匪祸”的创伤性记忆书写

——对徐玉诺文学特质的解读

潘磊

(郑州大学文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摘要:研究徐玉诺,必须正视他童年时所经历的匪祸,匪祸带来的恐惧与漂泊的情感震荡,成为萦绕他人生的创伤性记忆,这既成就了他独特的文学世界,也制约着他的文学走向和思考深度。徐玉诺过分拘泥于自身的创伤性经验,某种程度上对当时的社会结构缺乏更为宏观的认知,这限制了他的作品可能达到的深度和力度。徐玉诺游侠式的“疯魔”人生,在中原文化中属特异存在,也是被逼到生存极限之后的一种反击和自我保护。徐玉诺的创伤性记忆写作作为一种地方文化记忆,对其后的作家如阎连科、李佩甫等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关键词:徐玉诺;创伤性记忆;“匪祸”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5.01.002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5)01-0007-06

徐玉诺童年时代生活在河南省鲁山县,这里群山环绕,地势险要,由于战争频发、民风彪悍,民国时期这一地区的匪祸严重。童年是一个人成长的起点,童年的经历会对后来的人生产生重要的影响。而童年的创伤也会一直留在作家的记忆中,成为其创作的母题与原型。因此,对徐玉诺的研究,必须正视他童年所经历的匪祸带来的恐惧与漂泊的情感震荡。对于徐玉诺来说,少时经历的“匪祸”成为萦绕他人生的创伤性记忆,既成就了他独特的文学世界,也制约着他的文学走向和思考深度。

徐玉诺曾告诉叶圣陶:“我们那里是土匪的产地。人家以为土匪的唯一欲望是钱财,是粮食,谁知那些只能居于副贰的地位,主要的还在猎取一种剧烈的刺激。他们掳着枪在路上走,看见农民在田里种麦,忽然高兴,便一枪把农人打死。他们走过一个寨集,忽然高兴,便放起火来……我也喜欢放枪;不为别的,只为放枪能引起强度的兴奋。我告诉你,生活在兴奋之中的人实在与疯子无异。前年我住在省城里,就得了这个绰号,非常确当。我可以作一个譬喻:一个人受了猛烈的火烙,在身体上留下个可怕的疤痕;以后只消抚摸或者看到这个疤痕,当时一切被

烙的惨状就完全涌现在心目中。这怎能叫人不要成为疯子!怎能叫人不要在只求在兴奋之中生活!”^[1]的确,兵匪肆虐的生活不仅改变了人们生活的物质形态,而且改变了人们的精神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徐玉诺作为作家的独特精神世界和生活哲学。

一、创伤性记忆的文学再现

创伤性记忆是指由创伤性事件造成的,能够引起心理、情绪甚至生理的不正常状态的记忆。这些事件可能是战争、自然灾害、交通事故等严重事件,也可能是家人离世、亲密关系的结束、疾病等个人经历。

徐玉诺的小说展现的是豫西这片土地上频繁的匪祸给民众所留下的创伤性记忆。他的代表作《一只破鞋》,曾入选茅盾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二集,虽然是小说,但实际上是作家生命中的血与泪化成的文字。叔叔海是三十一二岁的农夫,“赤着足,仅穿两只已破旧不堪而补着皮头的鞋子;他和蔼而喜乐的尖尖下颚的面孔上,还披散着不能辨住的黄色的乱发”。他虽然不识字,但对“我”这个大侄子

收稿日期:2024-10-15

作者简介:潘磊(1978—),女,河南平顶山人,文学博士,郑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唯有深深的关爱，“我们虽说爱你读书，但是爱你更甚！”淳朴的话语反映出他质朴、善良的性格。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亲人，竟然在兵匪交战中死去了。小说中的“我”，是个正在读书的青年学生，少不更事，带着年轻人的狂妄与漠然，盼望着更刺激、更丰富的人生。面对战火，甚或还有一点小小的兴奋，“有时一只开花弹，从城垛上拭着过，或者一个老人不听响的中了一弹，向后倒下来；我便很失望的恶憎那子弹，他与我太不生关系了”。海叔失去音信后，小说在“父亲”的焦灼痛苦与“我”的漫不经心的对照中推进，有点复调的色彩。“他（父亲）苦苦的寻思着，便没精打采坐在从城上塌下的石块上”，而“那战事的高兴，和纸牌的沉醉，如梭一般缴绕我的思想里”。对于父亲失去兄弟的痛苦，年轻的“我”很难去体会。失去亲人的痛苦，通过文学的方式得以宣泄，但是创伤又很难通过写作平复，痛苦的记忆并不能随着写作而淹没，因此作者在小说结尾写道：“我一点也不能向下写，自此以后我一点不能记忆了……”徐玉诺从人道主义的平民视角书写了兵匪之祸，或许平民不能区分兵与匪的不同，无须追究亲人海叔是死于兵之手还是匪之手，他是在兵匪争斗中失去了生命，所以徐玉诺曾写道：“兵就是匪，匪就是兵。”客观来说，其时兵与匪的界限也并不清晰，如社会学家林耀华所说：“那个年代，土匪和军队的差异实在不大。军队实际上是从土匪之中招募的，二者的区别仅在于后者明显不合法，而前者则是暗中搜刮人民。”^[2]黎元洪 1922 年也曾形象地说：“遣之则兵散为匪，招之则匪聚首为兵。”^[3]⁸⁷

在频繁的战火中，“我”失去亲人，而“我”自己也如草芥一样活着，没有尊严，随时都有失去生命的可能。徐玉诺的“在摇篮里”系列小说并未如《一只破鞋》那样引起学界的太多关注，它们记述的都是童年的经历，叙事也大多是童年视角。儿童不谙世事的天真与人生世事的残酷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天真无忧的童年之梦随时都会被兵匪打断。《在摇篮里》（其一）中，“我”八岁，弟弟五岁，一个寒冷的冬夜，“大约二更打过一点的时候，那冰冷的风从西北角屋顶的空隙中呼呼的刮了进来，雪屑冷森森的在屋里飞散着，显得非常寒冷”，“我们”在寒冷中入睡，“母亲怕我们受着冷，持干草将泥砖烧热，放进被窝去……”在作者细腻的描写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即使是在被兵匪侵扰的艰难日常中，“母亲”依然带着女性特有的温暖，用烧热的伴着干草的砖放进被窝怕孩子受冻，乡村的贫瘠也可见一斑。然而，面对“匪祸”，这温暖是如此脆弱，“兵啦啦……兵啦

啦啦……爷爷老白狼！爷爷秦椒红！”的声响还是打破了“我”和弟弟的美梦。“我”在慌乱中被母亲推到墙头，在极大的恐惧中一头埋在草堆中，身子还露在外面。听到子弹被推进膛中的声音，“我”感到必死无疑，但一个土匪的善念救了“我”一命：“老红！那都是穷人家的孩子；不要管他。”《到何处去（在摇篮里之三）》，写的仍是童年时代“我”在土匪惊扰下的生活：“那时我们寨子果真住着两杆子匪（一杆子是萧老八驾着的一百八十四匹马，荷的都是钢套筒；一杆子是叶县的县队，一共有八九十人，荷的是土枪。都是穿得很褴褛，不知他们为什么来到这里）。我们寨里所有还活着的，虽说不是匪，却都是匪的奴隶。我们的房子都让他们住着，小孩子们给他们放马，男人们给他们搬运东西，女人白天黑夜给他们煮饭缝衣……”“成为匪的奴隶”，形象地反映出土匪驻扎后村庄的现实。出于安全的考虑，父母将“我”送到距离家乡较远的另一所村庄里暂住。“我”和另一个孩童小须常常在田间采摘野菜，因为在土匪的惊扰下村子里已经破败不堪，亲戚老人泥水匠的职业已经很难维持家庭的生计。小说中，儿童的天真与世事的沧桑形成了极大的反差，“虽说我们每天只有两次菜汤喝，我们并不觉得饿，在田间纵横的跑着”，如此艰苦的日子，儿童不以为意，仍是娱乐、游戏。惟其如此，才更映衬出岁月的艰难、时事的残酷。然而，“我”和小须难得的快乐还是被打断了，“渐渐有大土枪的声浪从远远的西方传来”。“我们”还以为是结婚的炮声，其实是土匪来了。懵懂的“我”跟着小须的爷爷开始逃离村庄，路途上孤独、恐惧、焦灼。晚上，“就在一所墓道上白杨林中睡下。这夜天上没有月光，只有繁星闪闪着；地上微微的闻着蚯蚓声，风刮得清冷清冷；我们互相紧靠着，在疲乏而且悲哀的心里，我渐渐的失了知觉，走进梦乡里去了。”在孩童的世界里，惊恐的同时仍然观察着月光、繁星、蚯蚓声，徐玉诺从儿童视角去写土匪带来的恐惧，给残酷的世界蒙上一层温馨的薄纱，然而也更见其在儿童纯真心灵上留下的创伤。父亲趁乱逃出城与“我”重逢，在父亲——一个成年人的叙述中，匪祸是如此恐怖，又如此真实，和儿童朦胧的感受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到了一个村落，本以为是一个平安的地方，小孩子们还在街上玩耍，然而“在夜间不知是兵或是匪，在村头上放了一阵枪，便燃起火来了。那夜还刮着西北风，一时火势很烈；火焰缭绕在黑暗的夜里，仿佛全村都燃着了。一时各家男女老少都惊慌着跑到街上，却都死在街上了。”小说最后的呼喊是让人心碎的，在土匪肆虐的

大地上，弱小的我们已经无处可逃，“我同父亲又跑了，只在荒野上挣扎着——呵，我们到那里去？”《最后的记忆》则是对童年创伤的抽象摹写。所谓“最后的记忆”，就是在兵匪灾祸中“我”成为不再有灵魂、有生命的物化的“票子”，这成为作家一生不断浮现的梦魇。

《在摇篮里》（其一）中的人物“老白狼”（白朗），在历史上确有其人。白朗是河南宝丰大刘村人。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白朗组织农民武装，转战鄂豫皖陕甘五省，先后同北洋军队展开战斗。7月10日，袁世凯以“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名义，悬赏10万元购拿白朗首级。7月26日，白朗和剩余的力量，困守于宝丰、汝州交界之虎狼爬岭三山寨，与北洋军激战两昼夜，被流弹击中。历史学家陈志让曾指出白朗所率领的农民势力的强大：“这个帮（白狼帮）于1913年秋在袁世凯的家乡省份河南开始活动，为了应对段祺瑞个人指挥的北洋军，白狼帮在河南、安徽、湖北、山西和甘肃发动一场打了就跑的战争，最终回到河南，并最终在这里于1914年秋季被将近十镇政府军消灭……白狼帮首领及其部队让北洋军经历了最严峻的考验……”^[4]除白朗外，在当地还有张庆的武装力量。张庆是宝丰县赵庄乡魔冢营村人，绰号“老洋人”。白朗死后，张庆在豫西成立农民武装“河南自治军”，队伍逐渐扩大至两万多人。曹锟曾亲自任命北洋政府陆军第十四师师长靳云鹗为豫省剿匪总司令，使其统一指挥河南省各军围剿“老洋人”。最终，靳云鹗与“老洋人”达成协议，“老洋人”的匪队被官府改编为河南游击第一支队和第二支队，由“老洋人”和张得胜分任支队长，驻扎宝丰、郟县一带。1924年1月，吴佩孚调集驻鄂豫两省军队五个混成旅，对张庆的队伍进行前后堵后截……后张庆被北洋直系军队层层包围，最终被杀害。从白朗、张庆的活动踪迹中，我们也可以感知到当时徐玉诺及家乡民众的生存环境。从宏观的角度看，白朗、张庆的武装配合了当时革命军的力量，冲击了北洋军阀的统治；但若从人道主义视角来看，两方频繁的冲突、交战，又造成了当地民不聊生的现实，普通民众在生死线上苦苦挣扎。徐玉诺的小说从人道主义的视角，以文学的形式，让我们感受到了普通百姓的生之艰难。

身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徐玉诺，在极力展现兵匪灾祸下百姓凄苦的同时，也继承了鲁迅乡土小说的精神，着重揭示他们在严酷的生存环境下精神的扭曲，借用胡风的概念就是“精神奴役的创伤”。《锅腰老公》中的老人，面对激烈动荡的时事，渐渐

变得麻木起来，只求苟活。这是中国近现代频繁的战乱、灾难下社会底层民众朴素的生存哲学——只能活着，顽强地活着，但失去了活着的精神向度。在《行路》中，徐玉诺给我们勾勒出被“趟将”改变的人们的生存处境，人的生命已不再是生命，而成为“趟将”的“票子”——“凡票子当日不赎的，下入地洞。过两天不赎的，就要刮露蹄——刮去脚掌上的肌肉，并将三棱瓦片刺入软肉内。要是过三天呢？那不用说，就是撕票了。”在摇篮中的“我”，因一个土匪的善念，活了下来，但不是每一个孩子都有这样的幸运，东乡太平庄黎老头家的孩子被“趟将”拉去，要八百两银子，黎老头遍乡哀告，才照数收集好，“及把银子交上，去领票的时候，看见已经成一堆肉片在那黑暗的地洞里了”。如果是女子被绑票，就面临更为复杂的问题，“我们华北人最讲究女子贞操，破坏贞操的兴趣很高，保护贞操也格外紧要，就是拿全家生命去换也不惜”。在土匪的眼中，人成为诈取钱财的工具。小说中的“我”本是一个教书匠，为了自己的安全，假扮成“趟将”，穿上他们的服装。起初，“我”总害怕身份被识破，并且对那些被土匪盘剥的行人生出无限的同情。但同行的土匪说出他们的思维逻辑：“‘一个行人一千钱，搜集起来，一百行人就是一百千！’他这样说着，就不觉得那远方之人是人类；正同渔夫捉鱼是一样神气。”客串了一次土匪后，“我”的心理竟然也发生了变化。小说最后，一群小孩子正在用瓦片建桥玩，完全无视“我”这个“土匪”的存在，“犯了我的威气，我恨之踢他两脚，骂他：‘混账东西！混蛋！’”已经有了土匪的神气了。小说以戏谑、幽默的口吻，挖掘出“趟将”横行之处民众心理的变化，在恃强凌弱成为社会常态时，即使是被欺凌的弱者，也产生了变为“强者”从而可以欺辱更弱者的心理。徐玉诺继承了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揭示出民众阿Q式的心理，见了狼变得像羊一样软弱，见了羊变得像狼一样凶狠。

在小说中，徐玉诺多是直观地呈现兵匪灾祸中底层百姓的生死挣扎。在诗歌中，他更加注重从形而上的层面去探究在极度压迫下生命的感悟与哲思。如《命运》：“前面是黑暗的；/无论怎么聪明的人，连他眼前一分钟也不敢断定没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出来；/立在黑暗中的是命运——/他挥着死的病的大斧，截断了一切人的生活 and 希望。”在动荡不安的生活中，这种绝望感是徐玉诺最真切的感受，这首诗与鲁迅的“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有几分相似。再如《生命》：“当恶魔重重围住我/把我的气和血全部抽出的时候，/亲近的人都说我已经死

了。/但我记得，/医生用针刺入我心房的时候，/我的灵魂是平安的，/在另一个地方，/得到极浓厚极甜蜜的安慰。”由于在童年时就常常遭受死亡的威胁，所以在徐玉诺的诗作中有许多对死亡的思考。在这首诗歌中，“我”被恶魔死死缠住，失去了生命的温度，没有了气与血，但“我”的灵魂是平安的，并且得到“极甜蜜极浓厚”的安慰，能够坦然面对死亡。在《人生之秘密》^[5]这首诗中，儿童无忧无虑的童年随时都有被死神造访的可能：

死神是什么味道？

谁知道！

因为她将走近我，并且

我觉得她快要到我身边的时候，

我早已不嗅了。

她有仙鹤一般

美丽而且洁白的两翼么？

我们只觉得她的沉静，寂寞，

一般轻松而且热浊的空气压着；

并未看见她的美丽，

听得她的飞声。

小孩子还在那里，

他的身体依然全备；

可是他只是沉静地睡在那里，

再不提着两条小腿到草地上跑了。

樱桃一般而荡漾着微笑的小面颊

变成蜡纸一般白；

可爱的明珠一般的眼睛，

也再不流动和睁开了。

“我”想象死神的样子，她或许有着如仙鹤洁白两翼般的美，然而“我”只是感受到它的压迫，它的到来使天真的孩子也失去了之前的神采，“可爱的明珠一般的眼睛，也再不流动和睁开了”。死神并未放过天真的孩童——他们本是沉重的现实世界的一抹暖色，然而也被一并带走了。诗人在战争导致的颠沛流离的生活中，难免会遭到死亡的威胁，因此不得不去思考死亡，以死来观照生。

二、创伤性记忆对作家创作和人格的影响

徐玉诺过分拘泥于自身的创伤性经验，某种程度上对当时的社会现实缺乏更为宏观的认知，这也限制了他的作品可能达到的深度和力度。历史学家陈志让认为，1895至1949年之间中国是军绅政权，各地军阀互相争夺地盘，政治黑暗，经济衰退，过度的军费开支都转嫁到民众头上，民不聊生。从上层来说，军阀之间的派系特征非常突出，“结成派系常

以私人关系为基础，有的人把这些关系叫‘感情’，其中包括家族、亲戚、师生、僚属、结拜兄弟、同学、同乡等传统的私人关系。这些私人关系都不是平等关系，把这些传统关系带进中国的政治生活里来……变成不中不西、非驴非马的东西”^{[3]101-102}。由此可见，当时上层政治生态的恶劣，上级政府依靠外债内债，地方政府则通过军绅政权向民众剥取各种收入，以此来维持政府的运转。而“趟将”来源于农民群体，他们不同于安分守己的传统农民，他们见多识广，有较强的反抗性，也有相当的破坏性。客观上来说，他们的行为对当时黑暗的军绅政权有着激烈的反抗意义。鲁山一带白朗和张庆的武装力量在不同程度上冲击了军阀统治，从侧面辅助了革命党人的革命斗争。但囿于自身的创伤性记忆，徐玉诺对“趟将”的刻画是较为单一的，诸如萧军对东北地区土匪豪气、侠义的描写，沈从文对湘西地区兵匪野蛮、残酷而又洒脱任性的生命力的描摹，艾芜以自由生命意识挖掘出西部边陲一群强盗（可视作“匪”）在野兽一般的外壳下温暖的人性内核，这些复杂多元的书写在徐玉诺的作品中是很难找到的。

在创伤性记忆集中书写后，徐玉诺于1920年后淡出文坛。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情感爆发式地书写自己沉重的人生记忆，给他带来极大的精神痛苦。或许这样的回忆性写作，使他不仅没有遗忘反而加深了痛苦记忆，甚至在情感上压垮了他。如他在诗中所写：

你好比一只

奋勇而且驯良的小牛，

在这无穷无尽

黑暗而又满着泥泞的路上

把一辆满载

生活问题的小车，

拽了又拽；

那小灵魂燃烧着你所有的心血……

止不住一阵一阵的向前冲，

感得全世界的泥泞，

都起了神秘不可测的波纹！

可怜啦！

小车

被泥泞黏胶着，

分寸也不向前移动；

你那满身血汗的心灵，

竟活活的死在栋下了！

——《杂诗》(16.17)

诗人自己就是这样一辆被窘迫的生活和爆发式

的情感写作所压垮的“小车”，因此他离开了文学。1923年，鲁迅让《晨报》编辑孙伏园带信给徐玉诺，让他把发表的小说结集出版，并愿为之作序，徐玉诺却以整理新作为由婉拒了鲁迅。学者李丹梦将徐玉诺婉拒鲁迅的原因归结为：“长情沟通的缺弦”和“对长情规则的隔膜”^[6]。事实上，由于徐玉诺在童年时代随时都有失去生命的可能，或者说这命就是捡来的，所以他对现实人生有种超脱的态度，对常人所期盼的功名利禄报之以不屑，童年的经历使他最能体悟人生如寄的感觉吧！与之相反，四川年轻作家周文、东北作家萧军、萧红在1930年代到上海后，得到鲁迅的诸多提携与帮助，因此成为其时文坛比较重要的左翼作家。

放弃了写作的徐玉诺以教书为生，常常有“特异”的言行，以游侠的方式存在于世间。事实上，“特异”的言行既是对童年创伤性记忆的情感宣泄，也是在自我和社会之间筑起了一道心理的防护之墙。1928年，徐玉诺在淮阳师范学校任教，当时的淮阳师范学校分东西两部分，徐玉诺买了一匹马驰骋于东西校园之间：“或竟策马出城而去，常常误了上课时间。有时策马过急，致马性发作，或怒做人立状，或后腿向上直踢，父子二人被翻下马，引得满街大哗。住家妇女，也探身墙头上笑得发颤。有时玉诺君在教室授课，而他的马也在窗外萧萧而鸣。在这当儿，是徐玉诺君精神大放射的时候，更讲得手舞足蹈，忘乎所以。”^[7]徐玉诺上课就像舞台表演，讲到高兴处便手舞足蹈。有一次，徐玉诺从福建回家路过上海，他将身上的八百元散给难民，自己则冲进头等车。检票员检查他的票时，他厉声喊道：“你还不认识我徐玉诺？”他游侠式的做人风格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4月河南省召开第一届人民代表会议，徐玉诺头戴瓦灰色瓜皮毡帽，身穿黑平布夹袄夹裤，外面套着黑棉布开襟背心，脚蹬黑布鞋，满口土话。言行怪诞的徐玉诺，在中原地区的确是一个特异的存在。由于历史上中原地区长期被贫穷、战乱所侵扰，形成了普通民众生存至上的人生哲学，他们有着较强的官本位意识，顺从克己，不敢超越。徐玉诺游侠式的“疯魔”一生，既是中原文化的一个特异存在，也是他被逼到生存极限之后的一种反击和自我保护。

三、创伤性记忆书写的象征意义

徐玉诺的创伤性文学写作，作为一种地方文化记忆，对其后的作家如阎连科、李佩甫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徐玉诺有首诗《哇哇开刀——自己的诗歌

之五》，写一个叫花子在街头做骇人的表演：用刀砍向自己的头颅，向路人讨钱。李丹梦指出：“徐玉诺发现，自己在写作中竟不自觉地成了一个专职表演、兜售底层苦难与鲜血的乞丐或戏子！而且这个乞丐又跟他内心的创伤、阴影——野蛮愚昧的故乡土匪形象叠合一处，这是多么难堪的事实！”^[6]当代河南作家大多擅长凸显生存苦难的写作，如刘庆邦写以煤矿工人为题材的小说，在《神木》里，人成为向煤矿主索取赔偿金的“点子”，使读者触目惊心。李佩甫的《败节草》《生命册》《城的灯》，将匍匐在中原大地上的民众忍耐、卑微、狡黠的生存哲学刻画得入木三分。阎连科的《年月日》《日光流年》《受活》，对乡土苦难的极致化书写，给文坛带来沉重、苦涩的气息。但事实上，河南作家笔下的苦难毋宁说是中国苦难的象征化表达，正如学者所言：“中国是文明古国，河南是炎黄故里……河南在中国被丑化，中国在地上被妖魔化，处境同样尴尬。如果说北京、上海是中国的脸，河南则是中国的里子。在世界上，中国是一个扩大化了的河南……”^[8]所以，苦难书写也绝不仅是河南作家的专利。

这里以四川为例。在现代中国，四川的地域文化由于相对封闭，带有更多的历史积淀和民间特色。在对蜀地生活的表达中，沙汀的小说和徐玉诺的小说有几分相似，都擅长书写兵匪统治下民众的生存苦难。在沙汀的《兽道》中，那个魏老婆子，为刚生完孩子的儿媳妇免遭兵匪们的侮辱，而喊着“我跟你们来哩！”……后来媳妇受侮辱而死，她变疯了。这家庭惨剧，如在读者心上扎了一把尖刀，使人无法忘却。《在祠堂里》中，努力追求个人爱情的连长太太，被巴蜀封闭落后的文化扼杀了年轻的生命。她的母亲是一个洗衣婆，身份卑微，连长将她们母女掳来，自居为她们的恩人。连长发现她的不忠，残暴地毒打她，其他军官不仅没有丝毫同情，还以“婆娘家，洗脚水，洗了一盆又一盆”为由，怂恿连长划破她的脸，将她配给叫花子，或者将她拖到城外让士兵轮奸——兵匪的残暴可见一斑。那些街坊邻居则嘲笑这个女人是“贱皮子”，要吃有吃，要穿有穿，“拿着福享不来”。他们如冷漠的看客，“鉴赏”着连长如何将这个可怜的女性钉进棺材中。兵匪的残暴与看客的冷漠，映衬出封闭的蜀地灰色病态的社会氛围。沙汀所写的城镇，其封闭、灰暗似乎超出了徐玉诺笔下的中原山区。但沙汀并未如徐玉诺那样难以走出自身的创伤性记忆，而是从自己的人生体验出发，在创作中对兵匪肆虐所造成的人性扭曲和病态社会进行沉痛批判和反思。

鲁迅在1931年12月致沙汀、艾芜《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中指出：“两位是可以各就自己现在能写的题材，动手来写的。不过选材要严，开掘要深，不可将一点琐屑的没有意思的事故，便填成一篇，以创作丰富自乐。”^[9]鲁迅指出了文学创作的路径——“选材要严，开掘要深”，否则便流于新闻报道、社会学材料一路。因此徐玉诺后来放弃写作，未尝不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结语

徐玉诺对“匪祸”创伤性记忆的描写，使他在其时的文坛占据一席之地，并引起了鲁迅、茅盾、叶圣陶等著名作家的关注，但执着于反复书写自身创伤性记忆又使徐玉诺的创作存在一定局限，难以向更深处开拓。不仅是徐玉诺，充满创伤性记忆的苦难书写是中原文化烙在豫籍作家身上的共同标识。但豫籍作家如李佩甫、阎连科等对苦难的反复书写，很难形成历史的纵深感，正如李丹梦所言，西方文学中的苦难叙事倾向于存在论意义上的苦难，而“中原突破”的苦难书写更多表现为生存苦难，“物质生活上的匮乏、窘迫，系苦难的重要依据与砝码。由贫穷与苦难一体化而来的压抑、仇恨及人性之恶，成为其叙述的核心动力”^[10]。弗洛伊德曾说，具有创伤性的事件，是未完成的事件，是一种“尚未被处理的紧急任务”。文学对于创伤性记忆的叙述，其核心在于“创伤性自我”向“可能性自我”的转化。如何从

一己的悲欢升华至与全人类共命运的情感与责任，这是所有作家面临的重大难题。在这个意义上，徐玉诺及当下河南作家的写作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这是徐玉诺的文学之路和当代河南作家的创作留给我们的思考。

参考文献：

- [1] 叶绍钧. 火灾[J]. 小说月报, 1922, 14(1).
- [2] 林耀华. 金翼：一个中国家族的史记[M]. 北京：三联书店, 2015: 147.
- [3] 陈志让. 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 [4] 陈志让. 袁世凯传[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3: 212.
- [5] 徐玉诺. 人生之秘密[C]//徐玉诺诗文辑存(上). 秦方奇, 校注.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8.
- [6] 李丹梦. “唯真”的偏至：再论徐玉诺[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17(11).
- [7] 张默生. 异行传[M]. 重庆：重庆出版社, 1987: 199.
- [8] 孙宝灵, 孙云华. 官文化与精神边缘化：文学豫军笔下的村支书与河南人的官本位文化(三)[J]. 学理论, 2010(24).
- [9] 鲁迅. 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M]//鲁迅全集：第4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377.
- [10] 李丹梦. 文学“乡土”的地方精神[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156.

(责任编辑 刘海燕)

Writing of Traumatic Memories of the “Banditry”

— Interpretation of Xu Yunuo’s Literary Characteristics

PAN Lei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Henan 450001, China)

Abstract: The study of Xu Yunuo must face up to the emotional shock of fear and wandering caused by the banditry he experienced in his childhood. This experience has become a traumatic memory that has haunted his life, not only contributing to the building of his unique literary world, but also greatly limiting his literary direction and depth of thinking. Xu Yunuo’s over-attachment to his own traumatic experiences, and to some extent, his lack of a broader understanding of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the time limit the depth and intensity of his work. Xu Yunuo’s ranger-style “madness” life is a peculiar existence in the Central Plains culture, and it is also a kind of counterattack and self-protection after being forced to the limit of survival. As a kind of local cultural memory, Xu Yunuo’s traumatic memory writing has had a certain influence on subsequent writers such as Yan Lianke and Li Peifu.

Key words: Xu Yunuo; traumatic memory; banditry

中国当代阐释学之于生产性批评理论建构的意义

刘芳兵

(郑州师范学院 文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4)

摘要:21世纪以来,“生产性批评”成为国内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研究中的一个关键词。中国当下的生产性批评研究多集中于对西方生产性批评思想进行梳理与汇总,忽视了对本土资源的挖掘。而中国当代阐释学对于生产性批评理论的建构提供了一种可借鉴的理论资源,具体而言,大致有以下三点:其一,为生产性批评理论的建构提供了一种反思的维度;其二,为生产性批评理论确立了一种“公共性”的评价标准;其三,有利于生产性批评理论中国话语的建构。

关键词:生产性批评;中国当代阐释学;中国话语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5.01.003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5)01-0013-06

21世纪以来,中国学界的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研究展开了新的问题域,即艺术生产论研究的批评转向。以姚文放等为代表的一批中国学者,对生产性文学批评理论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与探索^[1]。生产性批评研究热潮的兴起,与走出当下文艺批评的困境及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批评理论之诉求有关。将批评作为艺术生产,强调发挥批评的生产性功能,是生产性批评理论的核心。而批评的生产性问题与阐释学之间具有密切的理论关联,阐释学作为文艺批评理论的一个重要的阅读方法,成为生产性批评理论建构中值得关注的理论资源。有学者已经注意到西方阐释学对生产性批评理论建构具有的理论参考价值^[2],但对中国当代阐释学研究关注不够。

事实上,中国当代阐释学,尤其是张江的“强制阐释论”与“公共阐释论”对中国生产性批评理论的建构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强制阐释的“强制”与公共阐释的“公共”都具有生产性批评理论之“生产性”的特征,都可以作为生产性批评的“生产性”之体现。只不过,“强制”是“生产性”的消极面,而“公共”可以作为“生产性”特征的积极面,以保证批评的生产性功能的实现。而如何在批评的生产性发挥

创造力的同时,还保持对文本阐释的有效性,是批评的生产性功能发挥和范围设定的一个重要问题。具体说来,中国当代阐释学之于生产性批评理论建构的意义在于:首先,强制阐释论的提出为生产性批评理论的建构提供了一个反思的维度,对西方生产性批评思想的弊端进行了“破局”,提出了文本第一位的基本原则;其次,公共阐释论的提出为生产性批评的有效性提供了解决方案,为中国生产性批评理论确立了一种“公共性”的评价标准;最后,中国当代阐释学作为本土文化资源,立足于中国立场,更有助于生产性批评理论中国话语的建构。

一、为生产性批评理论提供一种反思的维度

马克思艺术生产论是生产性批评理论建构的理论原点所在。马克思艺术生产论强调艺术生产同时具有精神性与物质性。将批评作为艺术生产意味着生产性批评也同时兼具精神性与物质性特征。

从生产性批评的精神性特征来看,生产性批评具有超越现实与创造性特征,而这种精神创造性的发挥是由批评者来实现的。批评者作为精神生产者不能满足于对文本进行平面的、赏析式的、拘泥于文本表层意义的解读,而是应该充分发挥批评主体的

收稿日期:2024-09-12

作者简介:刘芳兵(1989—),女,河南巩义人,文学博士,郑州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能动性,对文本意义进行充分的挖掘,并通过有意识的价值引导实现批评生产介入社会现实的意识形态功能。而这也是我们建构生产性批评理论的初衷所在。

可以发现,西方学者的生产性批评理论也更多是从精神性与超越性方面来探讨批评的生产性功能,无论是本雅明从技术角度对批评的生产性功能的发掘,还是接受美学对读者地位的推崇,以及马舍雷等从无意识角度对文本意义的挖掘等,西方学者的生产性批评理论从各个维度拓展了批评的生产性功能。当下中国学者对生产性批评理论的研究也大致遵循这种理论建构思路而展开,即充分挖掘批评的价值增殖意义。当然,这也是生产性批评理论区别于其他批评理论的特色与精髓所在。总之,目前学者对生产性批评理论的建构更侧重于展现该理论富有积极性与建设性的一面。

但是,生产性批评同时具有物质性特征。马克思艺术生产论最具贡献的理论价值在于揭示了艺术生产受物质生产规律的制约,而这种物质生产规律的规定性是从两个维度产生的,即“一定的社会结构”和“人对自然的一定关系”^[3]。把批评作为艺术生产,意味着批评生产也具有艺术生产的这种一般规定性。因此,批评的生产性功能的发挥也是在这两个维度的制约中展开的。生产性批评理论不能忽视这一关键点:批评作为生产既有超越性的一面,又有受制约的一面。具体说来,批评生产具有物质性,作为主观阐释的批评是有限度的,会受到批评物质性的限制,例如:批评语言的限制、批评技术和手段的限制、时代条件对于批评话语的限定等。也就是说,批评作用的发挥不是没有边界的,而是会受到物质手段的制约和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

相比之下,外国学者有关生产性批评的理论,忽视了批评生产性功能受物质生产制约的一面。这样做的后果,就是生产性批评理论在具体的文本实践中出现了“强制阐释”的现象。这尤其体现在一些西方批评理论家在解读文本的时候,往往夸大文本中潜藏的意识形态的控制力量,从而导致文本的意识形态泛化。由此,文学批评“成为对意义无限延展的生产行为”,从而失去了阐释的有效性。有学者已经意识到批评的生产性功能不加约束可能产生的两种后果:泛文本化与意识形态批评的泛化。因此,生产性文学批评应该在文学的审美性和意识形态性之间保持适度张力,寻求最大公约数,以避免批评走向极端化。^[4]这种思考显然具有一定的启发意

义。而张江的“强制阐释论”更进一步,他将西方生产性批评理论不加限制后的“强制阐释”现象上升到一定的哲学高度进行评价。

张江指出“强制阐释”的特征,即“背离文本话语,消解文学指征,以前在立场和模式,对文本和文学作符合论者主观意图和结论的阐释”^[5]。也就是说,以论者主观意图剪裁文本是强制阐释的主要特征。在某种程度上讲,“强制阐释”也是对生产性功能如何发挥的一种思考,这种思考落在了其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上。“强制阐释论”告诉我们生产性功能的发挥也隐含“强制阐释”的破坏效果。这种破坏的后果,恰恰是批评的生产性功能的丧失。这种丧失主要表现为生产性批评的根基即文本意义的缺失与偏离。由此,张江的“强制阐释论”就为中国学者的生产性批评建构树立了一个反思的维度。

以此理论观照当代西方文论中的生产性批评,发现其中确实表露出一些“强制阐释”的理论倾向,如后结构主义者罗兰·巴特等人对作者地位的贬低,以及接受美学等对读者地位的过分强调;阿尔都塞学派等批评家对于无意识、空缺的过度联想;女性主义批评和后殖民主义理论等对文本分析的政治企图等等。这些批评理论都以阐释者的主观立场为主,脱离了文本自身的意义,表现出逻辑混乱、认识与实践的脱离等特征。可以说,西方文论中批评的生产性走向极端化的表现就是“强制阐释”。西方学者的这种“强制阐释”现象,究其原因,就是漠视了批评生产的物质性限制,忽视了批评作为生产要受到生产一般规律制约这一基本规定性。

当然,在中国的文艺理论实践中也存在过这种“强制阐释”现象。如以政治标准裁定一切文本的过度阐释,将文本作为理论演绎的训练场等现象。总之,忽略文本、歪曲文本等,都是强制阐释的表现,是批评生产性功能丧失的表现。因此,中国学者在建构生产性批评理论时必须立足于文本,警惕以论者个人的主观意图和先在立场对文本做出“强制阐释”的行为。

那么,如何规避这种“强制阐释”现象呢?在《再论强制阐释》中,张江再次指出强制阐释的表现在于“借文本之名,阐本己之意”^[6]⁵。也就是说,批评者的地位凌驾于文本之上,从而丧失了阐释的合法性基础。他还从生产论视角对阐释活动作了如下描述,“作者是文本的生产者,文本是意义的承载者,开放的阐释由此而出发”,作者是阐释活动的出发点与起始点,“与文本的自在性及文本意义的自

在性相比,阐释者的生产是第二位的”^{[6]17}。在此,他明确指出文本第一位、阐释第二位的主次划分。从生产论视角来看,阐释或者批评行为作为艺术生产过程中的一个环节,理应遵循艺术生产内部机制的运行规律。马克思强调,在艺术生产过程中,生产环节对其他环节具有主导作用。批评作为艺术生产的最后一环,显然要受制于这一运行规律。在艺术生产中,艺术生产者对艺术批评者具有一定的决定性。只有明确了批评与阐释在艺术生产环节中的主次顺序,坚持生产对其他环节的决定作用,才能避免批评生产中“强制阐释”现象的出现。

总之,强制阐释论的提出,为我们建构生产性批评理论提供了一种反思的维度。我们在理论建构过程中,不仅要重视批评生产的精神超越性与物质制约性之间的辩证法,更要始终坚持文本、作者作为生产环节第一位的主导作用。这是生产性批评理论的基本原则所在。

二、为生产性批评理论确立“公共性”的评价标准

强制阐释论告诉我们,批评的生产性功能的发挥是要有边界和底线的。文本的确定意义是生产性批评理论的一个基本原则。那么,如何在保持对文本阐释的有效性的同时充分发挥生产性批评的创造力呢?批评的生产性功能的发挥是否可以有一个具体的标准来衡量呢?我们虽然反对“强制阐释”,但是我们不是要“抛弃”阐释。否则,就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事实上,我们也不可能做到不去“阐释”,我们在面对文本时的先见与主观立场一定在所难免,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要思索如何做到“有效阐释”。有学者指出,“强制阐释论”在约束“过分主观随意”的阐释行为时,“设置了两个边界:一个是阐释对象的确定性,一个是公共理性”。也就是说,除“阐释对象的确定性”这一个方面,阐释还有另一个重要的维度,即阐释的“公共性”问题。而“公共理性”是阐释有效性的“前提与保障”,“参与公共理性的建构”是“阐释活动存在的价值”^[7]。正是在此意义上,“公共阐释论”的提出为我们建构生产性批评理论提供了一种建设性方案。

“公共阐释”指“阐释者以普遍的历史前提为基点,以文本为意义对象,以公共理性生产为边界约束,且可公度的有效阐释”^{[8]2}。也就是说,阐释的限度在于历史前提、文本的自在意义与公共理性等几个方面,且阐释结果可以实现一定的共识性,是具有确定含义的“有效阐释”。在此,“公共阐释论”的提

出给阐释的有效性设了一个限度,为生产性批评理论的建构确立了一种辩证性与公正性的理论基调。由此,批评的生产性功能的发挥也获得了一个衡量标准,批评可以且应当以生产出具有共识的公共理解为目的,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其对社会的公共性价值。

(一)生产性批评与“公共阐释”的目标指向性一致

将批评作为生产,显示出批评的生产性功能在整个艺术生产机制及其与外部社会生产等相互联系中得以发挥。一方面,将批评作为艺术生产意味着批评环节与艺术生产整个运行机制的关联性。因此,文艺批评不是孤芳自赏,而是作为对整个艺术生产活动有重要影响的一个关键环节,从而发挥其强大的生产性功能;另一方面,批评生产作为艺术生产与社会生产的其他部门也有呼应关系。因此,批评生产肩负着价值重建的社会责任,应充分发挥其对社会生产的生产性功用。这种在关系中进行的批评生产与“公共阐释”具有一致的目标。张江指出“公共阐释”具有六个特征:理性阐释、澄明性阐释、公度性阐释、建构性阐释、超越性阐释、反思性阐释。这些特征可以充分地保证批评的生产性功能的实现。

具体说来,批评的生产性功能的发挥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促进文本意义增值;二是促进艺术生产内部机制的良性循环;三是社会生产领域产生价值引领作用。而将“公共阐释”作为生产性批评的评价标准,更有利于保证这几方面功能的有效实现。从文本角度来看,“理性”“澄明性”“公度性”的阐释,有助于保证文本获得大众的理解,而这种过程就是文本获得“公共性”价值与意义增值的过程;从艺术生产过程来看,生产性批评对整个艺术生产过程具有“建构性”功能,即对艺术生产环节具有引导与策划功能、对艺术传播环节具有监督与调节作用,对大众具有宣传与推广作用;从社会生产领域来看,生产性批评的“公共性”指向体现在它具有一种“超越性”与“反思性”的阐释功能,即它不满足于一般的赏析性和娱乐性,而是追求一种对社会有增进认知和形成良好价值观的建设性功用。因此,“公共阐释”之“公共性”特征与“生产性批评”之“生产性”特征在某种程度上是契合的。可以说,批评的生产性功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发挥,取决于其“公共性”特征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实现。因此,“公共阐释论”可以作为批评的生产性功能发挥是

否有效的一个重要评价标准。

可以发现,西方的生产性批评理论更多强调一种“个体阐释”,即批评的目的是服务于批评者个人。西方学者通过贬低作者与文本,提高读者与批评的地位,因而为阐释的个人性与主观性奠定了理论基础。这种追求“个体阐释”的目标指向与中国学者追求“公共阐释”的目标指向正好相反。“公共阐释”强调“超越并升华个体理解与视域”,强调“实现个体阐释的公共性转换”,具有鲜明的“教化与实践意义”^[8]³。因此,强调批评的“公共性”特征就意味着批评不只是批评家个人的演绎,批评是向外敞开的,是为人民大众和整个社会现实服务的。不同的目标指向会产生不同的批评效果。“个体阐释”的追求最终容易走向“强制阐释”的困局,而“公共阐释”的追求则有利于保证批评有效性的实现。

(二)公共阐释论呼应了中国生产性批评理论建构的现实诉求

我们判断一种理论主张的适用性与有效性,必须充分结合当下中国语境来思考。从中国当下的文艺批评现状来看,最为突出的问题是许多文艺批评缺乏对现实的关怀。强调生产性批评的“公共性”维度,有助于扭转当下中国文艺批评脱离现实的困境。

文艺批评逐渐丧失对现实的阐释效力及其对社会的价值引领功能,许多批评沦为无效批评,是文艺批评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以学院派为代表的批评家,将文艺批评作为一种“知识生产”,推动了文艺批评的理论化,却也使文艺批评在某种程度上与实践脱节;二是借助互联网平台获得批评话语权的大众批评,呈现出碎片化与娱乐化倾向,更多关注的是日常生活琐事,价值意识单薄,批评对于社会的价值引领作用被遮蔽。无论是学院派批评还是大众批评,都出现了批评的“数据化”与“圈子化”倾向。信息技术与数字技术的发展使得文艺批评领域对数字技术的依赖变强,评价标准与评价体系越发以数据为基础对文本进行价值判断。学院派以引用率和影响因子等作为批评的衡量标准;而市场上则以点击率和网站评分等作为文艺批评的重要指标。批评本来是一种非常具有创造性的文艺评论工作,现在逐渐趋于基于数据库分析与汇总以及关键词搜索等缺乏创造性的批评模式,丧失了对现实应有的关怀。另外,围绕新兴媒介创造的互联网平台,微博、微信、博客等社交媒体形成了一定的粉丝效应,一些文学批评活动演变成为一种部落式的、虚拟的行为,而这

种小圈子的形成进一步导致群体内部对外界意见的排斥,这种“圈子化”效应使其批评行为变得更加封闭化。

因此,对批评介入现实之阐释功能的呼唤,成为当下文艺批评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理论诉求。我们的生产性批评既要立足文本,又要有现实的人文关怀。我们在规避“强制阐释”的同时,不能仅满足于没有任何生产性的“表面阅读”,更不能忽视批评对社会的意识形态生产功能。而强调生产性批评的“公共性”特征,既有利于扭转中国当下一些文艺批评的封闭化倾向,又有利于增强批评的当下性与现实性功能。

总之,对生产性批评“公共性”的强调,十分切合当今中国语境和文艺批评的现状。为生产性批评理论确立一个“公共性”的边界,有利于保证批评活动的有效展开,有助于充分发挥批评对现实的介入功能,进而有利于发挥生产性批评理论在艺术生产中的价值导向与引领作用。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批评的意图就在于寻找“公共性”,通过这种“公共性”,“为人类的精神家园提供一份丰富的精神食粮”^[9]。可以说,文学批评只有在寻求公共性的过程中,才是其生产性功能发挥的时候。这种关于文学批评的“生产性”与“公共性”之间关系的思考,对于我们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生产性批评理论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

三、有助于生产性批评理论中国话语的建构

长期以来,中国文艺批评话语处于“失语”状态,无论是面对当下文艺批评现状,还是在与世界文艺批评理论的对话过程中,均显示出无力感与自卑感。这种“失语症”主要表现为:一方面,盲目崇拜西方文艺批评理论,缺少对其理论生发语境的辩证思考,因而难以诊断出其理论在中国语境中的不足;另一方面,缺少中国立场及其对中国语境的分析,缺乏有意识的中国话语的提炼与思考。目前来看,中国的生产性批评理论研究也依然存在这样的问题。

生产性批评理论作为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艺批评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此,中国学者在生产性批评理论的研究与建构方面抱着一定的雄心。与20世纪蔚为大观的西方文艺批评理论相比,中国原创意义上的文艺批评理论一直处于缺失状态。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文学批评的新颖程度”取决于外国“理论旅行的频次与速度”^[1]¹⁵⁸。如何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并能与世界对话的批评理论,一

直是国内学者面临的艰巨任务。如今中国学者已经初步提炼出了“生产性文学批评”这一崭新的概念,并“以建成具有当代中国特色的批评理论体系为最高目标”^[10]。那么,如何进一步建构起这座理论大厦呢?有三种研究路径值得关注:一是立足马克思原理,探讨生产性批评的基本原理,以期为理论建构提供合法性基础;二是强调西方视野,在理论建构的具体问题展开过程中,借鉴西方生产性批评的有益资源;三是回归中国语境,注重对本土理论资源的挖掘。目前来看,中国学者在前两方面都做出了一定的努力与尝试,相比之下,对中国语境的思考较为匮乏。

有学者从马克思艺术生产论出发对生产性批评的基础原理进行深入探讨,试图从理论合法性上证明生产性批评理论建构的可能性^[11];有学者将马克思艺术生产论作为贯穿西方生产性文学批评理论发展史的“一条主线”,并对这条线上的每一个关键节点如转机、雏形、凝练、深化、后现代转折以及政治视域的形成等重要阶段分别进行了细致的研究与梳理^①;有学者从马克思艺术生产论的理论视域出发拓展艺术生产论研究的释义场域^[12];有学者将西方文论的“症候解读”法作为生产性批评的阅读方法^[13];还有学者从西方学者的理论资源中梳理出一条生产性批评的符号批判路径,将生产性批评理论延伸到当今视觉艺术时代,使得生产性批评理论获得了一些当下视野^[14],等等。这些理论工作为生产性批评理论的建构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但总的来说,目前中国学者的研究重心多集中于对生产性批评基本原理的探讨,以及对西方生产性批评思想进行梳理与汇总,而中国本土资源的生产性批评思想被忽视了。由于生产性批评的理论源头在马克思的艺术生产论,而西方学者对马克思艺术生产论有更多的继承和发展,因此,中国学者在对生产性批评理论进行研究时也多从西方学者那里寻求理论资源。但是,中国文艺批评话语要想摆脱一直以来的“失语”困境,就必须找到能够立足中国并与世界对话的理论话语形态,以此重振理论自信。如果缺乏对中国语境与中国话语的建构与思考,那么生产性批评理论的建构将会失去“中国特色”。中国语境应成为我们建构自己的生产性批评理论的出发点。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是:我们的生产性批评理论与西方生产性批评思想有何不同?中国生产性批评理论有何特色?在生产性批评理论的建构过程中,中国本土资源有没有值得借鉴的地方?

可以发现,以张江为代表的中国当代阐释学,为生产性批评理论之“中国话语”的建构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借鉴。无论“强制阐释论”还是“公共阐释论”,都是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提炼。一方面,“强制阐释论”的提出,指出了西方生产性批评理论的缺陷与不足,即对文本意义无止境地追求,最终丧失了批评生产性功能的有效性。这为我们建构生产性批评理论提供了一种反思的维度,有助于破除我们对西方理论的盲目崇拜与追踪模仿的心理;另一方面,“公共阐释论”的提出为生产性批评理论赋予了一种伦理价值的维度,它是基于中国语境的思考而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在于“人民性”,而如何在批评领域体现这种“人民性”特征呢?生产性批评理论的“公共性”特征有助于保证文艺“人民性”的实现。“公共阐释”为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生产性批评理论确立了一种“公共性”的标准,有利于重塑批评对现实应有的价值批判与超越性维度,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这“一破一立”保证了生产性批评建构的限度及其有效性,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辩证的生产性批评理论。

此外,我们发现中国当代阐释学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也进行了充分的挖掘,包括张江在内的许多学者立足于中国传统,从中国古代阐释学资源中寻找理论根基。他们有的对中国训诂学与阐释学的理论关联进行了考察^②;有的对中国儒学的阐释学思想进行了分析^[15],这对于生产性批评理论的建构也具有一定的方法论借鉴意义。那么,中国传统的文艺批评理论中有没有生产性批评的理论线索呢?有少数学者在这方面已经做出了有益的尝试,李春青主要从中国古代文论中的生产性批评理论入手,对古代《诗经》阐释和古代文人趣味阐释中的生产性批评资源进行了挖掘^③,显现出生产性批评理论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所具有的理论价值。当然,这只是一个开始。

总之,无论从理论维度还是从实践维度上看,中国当代阐释学立足于中国语境,更有助于生产性批评理论中国话语的建构。为了避免中国文艺批评理论建构中“失语症”再次出现,我们在建构生产性批评理论时,必须要有中国当代阐释学立足于中国立场的理论建构精神,只有在此基础上,中国学者才可以真正建构起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艺批评理论。

注释:

①相关文章有:姚文放:《经典文学批评:生产性文学批评的

雏形》,《文艺理论研究》,2020年第6期;姚文放:《重审接受美学:生产性批评范式的凝练》,《社会科学战线》,2020年第5期;姚文放:《生产性文学批评的深化:马舍雷的“文学生产理论”》,《文艺研究》,2020年第10期;姚文放:《生产性文学批评的解构性生成与后现代转折:罗兰·巴特批评理论的一条伏脉》,《文学评论》,2018年第2期;姚文放:《审美与政治之间回环往复的“韵律”:弗·詹姆逊的生产性文学批评》,《学术月刊》,2018年第9期;姚文放:《在精神领域进行的意义生产:伊格尔顿的生产性文学批评理论》,《社会科学辑刊》,2019年第2期。

②参见张江:《“训诂阐释学”构想》,《学术研究》2022年第12期;张跣:《阐释、训诂与文本的规定性》,《社会科学战线》2023年第1期。

③参见李春青:《论中国古代文学阐释的生产性问题》,《社会科学辑刊》,2019年第2期;李春青:《论趣味阐释:兼谈中国古代诗学评的生产性问题》,《社会科学战线》,2020年第5期。

参考文献:

- [1]姚文放.生产性文学批评读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
- [2]姚文放.诗学模式/阐释学模式:生产性文学批评的解读方法[J].学术月刊,2022(9).
-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一册)[M].北京:人民

出版社,1972:296.

- [4]蒋继华.建构“生产性”的艺术批评:基于布莱希特、阿尔都塞艺术理论的考察[J].学术论坛,2015(8).
- [5]张江.强制阐释论[J].文学评论,2014(6).
- [6]张江.再论强制阐释[J].中国社会科学,2021(2).
- [7]泓峻.“强制阐释论”的基本立场、理论建树与学术关怀[J].社会科学辑刊,2021(3).
- [8]张江.公共阐释论纲[J].学术研究,2017(6).
- [9]丁国旗.寻找公共性:文学批评的意图[J].山东社会科学,2018(10).
- [10]姚文放.生产性文学批评论纲[J].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1).
- [11]高楠.论文学批评的生产属性[J].山东社会科学,2019(3).
- [12]孙文宪.“艺术生产”视域中的文学批评:释意场域的构建与批评的生产性[J].社会科学辑刊,2019(5).
- [13]姚文放.症候解读:文学批评作为艺术生产[J].文学批评,2016(3).
- [14]方弘毅,甘锋.从“语言学转向”到“图像转向”:生产性批评演进的再考察[J].艺术百家,2021(2).
- [15]郑伟.古典学术何以成为阐释学的资源:以儒学阐释意识和阐释行为为中心[J].学术研究,2022(9).

(责任编辑 刘海燕)

The Significance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Hermeneutic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Productive Critical Theory

LIU Fangbing

(College of Literature, Zhe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new century, “productive criticism” has become a key word in the domestic Marxist art production theory research. At present, the study of productive criticism in China focuses on sorting and summarizing Western productive criticism ideas, neglecting the mining of local resources. Contemporary Chinese hermeneutics provides a theoretical resour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productive critical theory in three main ways: First, it provides a reflective dimensio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productive critical theory; Second, it establishes a “public” evaluation standard for productive criticism theory; Third, it is conduciv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discourse in the theory of productive criticism.

Key words: productive criticism; contemporary Chinese hermeneutics; Chinese discourse

亲子关系与儿童成长的深度思考

——论孙惠芬的儿童小说《多年蚁后》

郝璐

(西北大学 文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27)

摘要:孙惠芬的儿童小说《多年蚁后》,以一个儿童的幻想世界为写作对象,揭示了成人规划对儿童世界的颠覆,并由此造成了成人与儿童之间的心灵相悖;呈现了父母缺席是儿童难以愈合的成长之伤,“多年蚁后”的故事也隐喻了作者对亲子关系的深入思考。小说以童话的形式、意象的使用,以及多重叙述视角的转换,描绘了绚烂多彩的童心世界。从这部作品可以看出孙惠芬创作路径的转向——由“城乡之间”的叙事转向对青少年成长问题的关注。

关键词:孙惠芬;《多年蚁后》;亲子关系;儿童成长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5.01.004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5)01-0019-05

自1982年发表处女作《静坐喜床》以来,孙惠芬已持续创作四十余载,在乡土文学领域构建了“上塘村”与“歇马山庄”两个标志性的文学地理空间。其实,孙惠芬并未局限于“城乡之间”的创作框架,而是持续探索与寻求突破。在她的长篇小说《寻找张展》(《人民文学》,2016年第7期)中,她将关注焦点转向了城市青少年的精神世界,预示了其创作路径的转向。2021年,由接力出版社出版的孙惠芬长篇小说《多年蚁后》,进一步延续了她对青少年成长问题的关注,并将视角延伸至儿童的奇妙幻想世界,通过童话这一艺术形式,实现了思想与艺术的双重创新与突破。

《多年蚁后》作为孙惠芬的首部儿童文学力作,其创作灵感源自她2000年在乡村故居的一次亲身体验。彼时,她每日亲近自然,观察庄稼、树木、河流、河中石块及各式昆虫……孙惠芬曾言:“当你有了孩童一样的目光,当你长时间把人类之外的生灵当成朋友,让自己像蝉和蚂蚁一样在黑暗的洞里体会周边的世界,你会发现关于爱、关于善、关于勇敢,这些人类最基本最朴素的情感,统统有了别样的生动……而此刻,你无须思考如何写作,你只需要与各种生灵心心相印、惺惺相惜。”^[1]《多年蚁后》叙述了

一个因父母离异而与祖父母共居的男孩童童,与一只名为“多年蚁后”的大蚂蚁偶然相遇并走进对方世界的故事。童童四岁便遭遇家庭破裂,母亲离家,父亲远行,由祖父母陪伴成长。直至遇见“多年蚁后”,每晚来访,并讲述关于老爷爷、蝉蛹、老牛及海棠树相互关联的故事,这些看似独立的角色在“多年蚁后”的叙述下交织成网,释放出爱的力量。在与“多年蚁后”的交往中,童童对亲情的本质与生命的意义有了独到的感悟。作品通过一系列紧密相连的故事,不仅描绘了绚烂多彩的童心世界,更深刻探讨了亲子关系与儿童成长中的复杂问题。

一、规训与自由:成人与儿童的心灵相悖

“规训”是“指近代产生的一种特殊的权力技术,既是权力干预、训练和监视肉体的技术,又是制造知识的手段”^[2],实际上就是一种对人的多样性进行规则化和秩序化的手段。儿童在走向社会和集体的过程中,会逐渐产生属于自己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而这些观念和习惯很可能和成人的价值观发生抵牾,遂使两代人无法互相认同。鉴于家庭地位及社会经验的差异,成年人往往自认为拥有对儿童进行支配的正当性,他们倾向于利用身份与年龄的权威来否定儿童的想法,并将自身的价值观念强

收稿日期:2024-11-0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乡土小说与乡村文化变迁的关系、启示研究及文献整理”(19ZDA273)

作者简介:郝璐(1997—),女,山西太原人,西北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研究。

加于儿童之上。这种长期的“不自由”状态,不仅束缚了儿童的身心发展,而且导致他们逐渐丧失了感知美好事物的能力。成人与儿童之间的这种冲突与不兼容,进一步加剧了彼此间的隔阂,使得双方难以真正实现相互理解和接纳。

在儿童的认知世界中,蚂蚁、蝉蛹、老牛等自然生物均被赋予了生命与言语能力,它们能够体验情绪,与人类一样经历快乐与悲伤。这一观察与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相吻合,皮亚杰指出:“儿童最早的活动既显示出在主体和客体之间完全没有分化,也显示出一种根本的自身中心化。”^[3]在此阶段,儿童尚未能清晰区分自我与外界客体,倾向于将自然界视为与自身具有同等生命特性的存在。儿童这种直观且稚嫩的以自我为中心的认知模式,促使他们自然而然地将“一切都等同于有生命的‘我’,不能区分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现象,而把整个世界都作为有生命的和有情感的对象来加以对待”^[4]。维柯亦有类似观点,他认为儿童常“把无生命的事物拿到手里,与它们交谈,仿佛它们就是些有生命的人”^[5]。因此,在儿童这种主客体未分化、自我中心化的思维框架下,自然界的万物皆被赋予了生命、言语与灵性,他们可能会认为树木因落叶而哀伤,风儿能够翩翩起舞,白云亦能潸然泪下。

儿童与大自然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与生俱来的亲密关系,这种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儿童特有的“泛灵论”心理倾向,使得他们与自然的互动相较于成年人更为亲密无间。“他们的思维像一张相互交织密不可分的网,对外在物理世界的把握与原始人一样处于模糊的混沌状态,分不清物理世界与心理世界,分不清思维的主体与思维的对象,所以也分不清现实的东西与想象的东西。”^[6]此外,具备“泛灵论”观念的儿童往往展现出一种远超成年人的“通感”能力,他们对事物的感知更为简单纯粹,能够敏锐地捕捉到自然界生命的微妙变化。通过与动植物的对话与交流,儿童搭建起了幻想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桥梁。在此角度,敏感且内向的童童能够更加沉静地体验与聆听大自然的声音:他知道蚂蚁的声音不是吱吱吱的细声,而是嗡嗡嗡的粗声;蚂蚁和蝉也不一定相处不好,它们也会互相帮助;月光下的种子就像是舞动着耀眼身姿的小精灵,充满了生命的活力。自然界的生命都成了童童想象世界中的主角,而“多年蚁后”就是打开这世界的一把钥匙。正如童童所言:“大人们愿意看孩子们长大,他们却不知道,为我长大开门的,是一只蚂蚁。”^[7]³⁹

相比之下,成年人在功利性的现实生活中逐渐钝化了对自然界的感知能力,出于自我防护,成年人

之间也倾向于不袒露内心世界。在童童的现实生活中,成年人的管制与如同“警卫”般的奶奶成为其孤独感的来源。奶奶对“多年蚁后”的故事持怀疑态度,正如老黄牛的主人不会相信其吐出的食物具有治病救人的神奇功效一样,他们的内心充满了戒备,不愿承认世界上仍存在着许多纯粹的美好。奶奶告诫童童远离红盖植物,认为它们是毒蘑菇,而“多年蚁后”却将红盖植物描述为海棠树下的“小精灵”,是拯救生命的使者,既救治了老爷爷的母亲,也挽救了患病的老牛。

童童的世界充满了纯真与简单,然而成年人却在无情地侵蚀这一片天真烂漫的小天地。“大人太可怕了,他们才疯了。”奶奶不希望童童整日蹲在蚂蚁洞旁,她甚至试图用保温杯中的沸水浇灌蚂蚁洞;当童童想要种树时,奶奶却将他视为“病人”,与其他成年人相互使眼色,“配合”成为童童种树的见证者。孩童代表着人生的起点,而童心则是人心的本真状态。然而,成年人往往对儿童缺乏信任、理解与沟通,他们站在权威的制高点上,为下一代规划设定成长路径;他们似乎未能意识到,唯有通过心贴心的交流与沟通,才能真正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

实际上,不同的感受方式、思维习惯、文化积淀和社会阅历是导致成人与儿童互相不理解的原因。与成人相比,儿童的地位是边缘的,但他们的眼光是“去蔽”的,较少受人类文化或世俗积习的浸染。蒙台梭利在《童年的秘密》中讲道:“成人与儿童的冲突是由于成人没有真正理解儿童导致的。”^[8]童童成长于一个受到严格规训的家庭环境中,而这种规训并非来自父母,而是来自隔代的爷爷奶奶。在成长的过程中,父母角色的缺失以及爷爷奶奶的不理解,使得童童将自己的精神世界寄托在同样孤独的“多年蚁后”身上。正是“多年蚁后”引领童童步入一个充满爱与美好的世界,并通过讲述老爷爷与海棠树的故事,向童童揭示了世界的真谛:“你的心向世界敞开,你真诚善良,你有爱,你的心灵就跟世界上的生命是相通的。世界上所有的生命就都是一家人。”

普列汉诺夫曾说过:“万物有灵论的各种概念的产生都是由于人的天性。”^[9]儿童的世界不同于成年人的世界,他们的目光建立在平等与爱的基础上,童童深信吸引力法则则是宇宙中最为强大的法则,爱是宇宙间最伟大的力量,他坚信只要用心去爱,就能感知到爱,以善良对待整个世界,世界亦将以善意回馈。然而,成年人通过自身的行为向童童展示了现实世界充满了虚假与猜疑,他们既不理解童童的感受,又迫切希望童童能够远离“蚂蚁”的世界,尽早融入他们所定义的“正常”轨道。因此,成人与儿

童之间视野的融合,关键在于成人需要真正且全面地理解儿童。

随着现代都市的快速发展,人与自然的关系日益紧张。城市的大规模开发导致许多动物失去了栖息地,蚂蚁们也不得不频繁搬家,海棠树的种子仅剩一颗,而童童也再未见到过“多年蚁后”……

二、父母缺席与儿童成长之伤

文化和环境对于人格的塑造具有重要的作用。在儿童人格塑造的过程中,来自父母的影响是持久且深远的。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也是儿童成长发育的第一场所。父母在此过程中承担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他们不仅是儿童学习社会规范、形成规则意识的主要引导者,而且其参与儿童社会化进程的程度直接体现在与儿童的互动交流中。

儿童在幼儿时期通过自我感知与看护者建立联系,随着儿童感知、记忆、表象等心理功能的发展,依恋逐渐出现并固化。一旦父母在婴幼儿时期与其子女分离,子女便很难通过这种感知与父母建立初期的联系,后续也难以发展成稳固的依恋关系。四岁的童童被迫接受单亲生活,随后因父亲外出而成为与爷爷奶奶共同生活的留守儿童。双亲缺席的童年经历给童童带来了深刻的孤独感与无力感。爷爷和奶奶扮演着本该父母演绎的角色,但他们始终无法完全替代父亲和母亲的角色。童童的爷爷奶奶年迈且思想保守,他们对童童的呵护有足而关注不够,他们更关心童童吃得好不好、穿得暖不暖,而很少真正走进他幼小的内心世界,也不会注意到童童性格内向,朋友不多,常常会一个人在窗前发呆思考。对年幼的童童来说,他或许并不明白痛苦具体的定义,他只觉得痛苦就是心脏的地方疼,就是“奶奶买菜上楼,累得直喘,自己又没有力气帮她的时候”^{[7]17},就是好奇为什么爸爸妈妈不要他的时候。童童有着超越同龄人的早熟,他经历着成长的孤独,也清楚地明白“长大只是一个人的事”。每次想到妈妈,童童的眼里就会有洪水一样的东西涌出来,淹没了一切。他把对妈妈的思念寄托在小夹被上,他拼命嗅这里面的“妈妈味儿”,尽管这味道早已经被时间带走了……

一直以来,童童都不理解妈妈为什么要离开这个家,不明白妈妈突然为什么不要他了,也不知道他和妈妈以后还能不能再相见。“多年蚁后”的出现使童童渐渐走出了痛苦和阴霾,她用自己的故事向童童述说了“妈妈”这一角色的艰辛与无奈。“多年蚁后”在还没有接受离开妈妈的时候,就已经成为很多孩子的妈妈,她也想念自己的妈妈,可在蚂蚁的世界里,只要做了妈妈,就意味着永远离开自己的妈妈,再也回不了家了。经历无数次“婚飞”的“多年

蚁后”,不想做一辈子的生育机器,她想看看外面的世界,可她的家需要她,她的孩子们也需要她。孙惠芬借“多年蚁后”之口,道出了母亲这一角色的两难与不易,母亲既要承担守护家庭的责任,同时又有着自己的理想与憧憬,当二者发生冲突的时候,便是“多年蚁后”所面临的困境。小时候,童童妈妈给他讲故事的时候,动不动就说“多年以后”,因此,童童对“多年蚁后”产生的亲切感与信任,实际上源于其对母亲的深切思念。童童的母亲同样可能面临着与“多年蚁后”相似的困惑与抉择,只是最终做出了不同的决定。当童童以责备的口吻询问“多年蚁后”为何未能保护好她的孩子时,这实际上也是他对母亲行为的一种追问与不解,内心的埋怨与困惑在这一刻得到了释放。然而,随着童童逐渐深入了解“多年蚁后”的世界与故事,他开始尝试理解母亲的不易,对母亲的态度也变得更加理解与宽容。“多年蚁后”教导童童:“要想念妈妈,就去祝福她,不要掉眼泪。”可以说,“多年蚁后”是童童在儿童“泛灵论”意识下,基于对母亲的思念与理解,主动建构的一个想象世界的产物。这一形象不仅帮助童童缓解了内心的痛苦与困惑,而且促进了他对母亲角色的深层次认识与情感共鸣。

当下家庭亲子关系一个显在的问题就是很多家长缺乏对子女的陪伴与沟通,也因此往往忽略了他们精神层面的需要。究其原因,当下社会快节奏的生活,单一的家庭结构,导致了父母与孩子缺少交流。小说中的童童是一个敏感而自卑的孩子,父母缺席给他童年带来了孤独的特质,他小心翼翼地生活在爷爷奶奶身边,过早地感受与经历着生活的不幸与痛苦,他爱着身边所有的人,包括一只小小的蚂蚁,这份善良与童真背后实际上是无尽的孤独与落寞。在本应享受幸福美好童年、与父母在草地上自由奔跑、展现淘气好动的天性之时,童童却展现出了一种超乎寻常的谨慎与早熟。他常常因无法为奶奶搬运重物、无法为爷爷分担家务而感到内疚与痛苦。这种过早的独立以及对父爱与母爱缺失的体验,促使他迅速成长为一个“小大人”。然而,这不是值得惊喜和庆幸的事情,而是童童的成长之殇,亦是每一个家庭值得思考的问题。

自1980年代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很多父母出于生计,抛下孩子外出务工。城乡大量留守儿童的出现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孩子失去了与父母最直接的交流。而家庭教育和陪伴的缺失,让留守儿童已经演化成当下最大的社会问题之一。家庭作为儿童成长的首个社会环境,其教育功能的发挥至关重要。然而,在单亲或留守的背景下,家庭教育

的完整性和有效性往往受到挑战,这就更加凸显了社会性抚育的重要性。

费孝通在《生育制度》中谈到了两大抚育系统,即生理性抚育与社会性抚育,强调了人类特有的社会抚育的长期性及重要性,婴儿在断乳之后,“生理上虽则可以说已经长成独立的个体,但是还需要一个更长的时期去学习在社会中生活所需的一套行为方式。这是人类所特有的需要”^[10]。单亲家庭或留守儿童所面临的成长问题并非孤立存在的个案,而是社会层面一个深刻且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这些儿童在成长过程中,不仅依赖于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更离不开来自社会各界的合力支持与帮助。《多年蚁后》关注到儿童的成长与心理问题,童童是留守儿童的群体性缩影,而童童与“多年蚁后”的奇妙经历透视了我国单亲留守儿童的成长教育现状及问题。

三、意象叙事与儿童视角

“意象”是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其中,“意”指抽象的内在心意,“象”指具体的外在物象。可以说,“意”借由“象”来表达,“象”是“意”的载体。换言之,意象就是客观物象融入了主观精神而带有了情致的艺术形象,是富有意义的审美载体,承载着独特的人文精神,任何物象与意义的对应与融合都可以构成意象。《多年蚁后》选取了众多的意象,而这些意象也共同组成了童童的幻想世界。

首先是“西瓜”的意象。“世界是一个大大的西瓜,我们都是一个个西瓜籽”,这是作品中重复出现的一句话。“西瓜”在小说中是童童眼中的整个世界。世界就是一个大西瓜,每个人都是里面的西瓜籽,共同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都是有联系的生命个体。因此,在童童看来,爸爸妈妈虽然分开了,但仍然和他一起生活在同一个大西瓜里,这样就相当于他们还在一起,也还是一家人。“大西瓜”是童童主观世界的产物,正如“多年蚁后”故事中的树、蝉、蚂蚁、种子、人,是一个分不开的整体,万物都生活在同一个“大西瓜”里,世界上的生命都是相通的,所有的生命都是一家人。

其次是“小天使”意象。它们是一丛丛金黄色身体的植物,它们“长着红色的盖子,但腰间细瘦挺拔,腰间束着花瓣一样的小裙子”^{[7]86}它们具有治病救人的神奇功效,救了老爷爷的母亲,又治好了患病的老黄牛,也带给了童童美好的希望。“小天使”是善良与美好的化身,善良的愿望需要用善良的念头来守护。“海棠树”是“多年蚁后”生活的地方,也是“小天使”经常出现的地方,老爷爷把它叫作“树神”,是因为它“替天行道”,给了年轻时意外犯错的老爷爷赎罪的机会。“海棠树”代表着一种理想与

准则,时刻提醒着人应当如何成长,如何做一个善良真诚的好人。“那一刻,我感觉,我种下的不是海棠树,是一个大西瓜。”^{[7]166}童童最后种下的那棵海棠树,是他的理想,也是他的整个童年,再次,“蝉蛹”也是小说中一个重要的意象。他们是“多年蚁后”的好朋友,用身上的针感受水分,而蚂蚁们则是用对朋友真诚的爱感受水分。蝉蛹也是“小天使”的搬运工,将小精灵送去有需要帮助的人那里。他们是最善良、最忠诚的昆虫,从不侵犯别人,对朋友也忠贞不渝。蝉蛹帮助了老黄牛回到主人那里,老黄牛也会帮助他找到海棠树。蝉蛹的生命有周期的限制,但生命本就是不可预测的,不同的生命都有不同的限制,他们的死亡是一种圆满与幸福。蝉蛹的故事使童童对死亡也有了新的理解与感悟。老黄牛是忠诚与勇敢的象征,吃了神奇植物病好后一路狂奔往主人家赶,为了尽快救治它瘦弱瘫痪的主人,“它滴水不进,寸草不沾,载着星光,载着月光,载着湿漉漉的露水,载着又一天的早霞”^{[7]112},它一刻不停地奔跑,刚回到主人家,便把胃里藏着的“小天使”吐了出来。老牛爱它的主人,感同身受着他的痛苦。老牛亦真诚而善良,把“小天使”带到了更多需要帮助的人那里。小说中的动植物皆为善良与爱的化身,它们无私而真诚,勇敢而热烈,在童童的世界里播撒下希望和爱的种子。

此外,作品在叙述方面亦颇具特色。孙惠芬是以童童的视角来讲述他对世界的感知。儿童视角是“小说借助于儿童的眼光或口吻来讲述故事,故事的呈现过程具有鲜明的儿童思维的特征,小说的叙述调子、姿态、结构及心理意识因素都受制于作者所选定的儿童的叙事角度,这样一种有意味的叙事策略”^[11]。小说以童童的眼睛为窗口,透视其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读者在童童的引领下,走进了“多年蚁后”、蝉蛹、老牛……的故事,在一步步探索中获得了阅读的审美愉悦。但是,在实际创作中,要让作者完全将自己从叙述者的身份中剥离出来,以一种纯粹的儿童眼光去检视与体察成人的世界,这似乎也是不可能的。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讲:“就小说本性而言,它是作家创造的产物,纯粹的不介入只是一种奢望,根本做不到。”^[12]小说开始和结尾作为童童“老姑奶奶”的成年叙述者的评论声音使读者对童童所展示的世界作进一步的思考,同时也将作品的主题引向更深刻的层面。

《多年蚁后》以童童充当生活的见证人、审视者与叙述人,成人世界与儿童世界的并存,成人话语与儿童话语的复合。小说主要由“我”“童童”“多年蚁后”“多年蚁后的转述”这几个不同的叙述主体构

成。“我”作为写作者,是童童的老姑奶奶,童童把自己和“多年蚁后”的故事写在横格笔记本上,并把它作为礼物送给“我”,而“我”将童童的礼物“包装”成了这部作品。“童童”是叙事的主体,他讲述了自己和“多年蚁后”从相遇到彼此熟悉的故事,并把故事写下来送给老姑奶奶。“多年蚁后”又是童童叙事中的另一个主体,她通过和童童的对话,以第一人称的方式讲述她的故事,同时,她也会转述“蝉”的独白,讲述蝉蛹的故事。这样,小说在多重叙事视角的转换中,将不同的主体联系起来,讲述了一个海棠树下蚂蚁、蝉和人的生命咏叹曲。此外,儿童话语与成人话语共存于文本之中,相互补充,形成了叙述上的复调。复调结构突破了单一的线性结构或一元视角,在儿童的懵懂、稚拙与成人的睿智、功利两套话语、两种认知维度下,世界的呈现与意义的表达趋向多元化,从而拓宽了作品的艺术空间。

《多年蚁后》以童童为叙述者,聚焦于儿童视角下所观察到的自然世界,细腻描绘了一个由蚂蚁、蝉蛹、老牛等多种生物共同构成的丰富多彩的生命体系。作者巧妙地借助这些充满生命活力且心地善良的角色,向读者传达了一个关于爱的深刻哲理——爱,其实一直都在,可是有些人就是感受不到它,好东西也不是谁都能得到的,他得是一个善良有爱的人。

四、结语

在这个碎片化阅读盛行的网络时代,孙惠芬的《多年蚁后》可谓是一股清流般的存在。作品关注单亲留守儿童的内心世界,以童话的形式,通过讲述童童与“多年蚁后”的故事,以及“多年蚁后”与蝉、海棠树、老爷爷的故事,探索着儿童的幻想世界。这是继《寻找张展》之后,孙惠芬的第二本关注青少年成长的作品,不同的是,这部作品更加温和,细语涓涓,充满童真童趣,带我们走进一个绚烂而美好的童

心世界。通过书写留守儿童的孤独体验和成长之痛,孙惠芬道出了当下中国家庭教育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同时也揭示了生命的真相与人性的复杂。对此,她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与建议,守护至真童心,注重家庭教育,走进孤独少年的内心世界,从而使更多的孩子生活在健康、快乐的环境中。孙惠芬创作的转向昭示着她创作的“当下性”,这也实现了一个成熟作家的自我突破。

参考文献:

- [1] 赵乃林. 将文学的种子深埋进童心土壤中[N]. 辽宁日报, 2022-04-09(11).
- [2] 米歇尔·福柯[M]. 刘北成, 杨远婴, 译. 北京: 三联书店, 2012: 232.
- [3] 皮亚杰. 发生认识论原理[M]. 王宪钿, 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1: 23.
- [4] 童庆炳. 作家的童年经验及其对创作的影响[J]. 文学评论, 1993(4).
- [5] 维柯. 新科学[M]. 朱光潜, 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6: 98.
- [6] 王泉根. 儿童文学的审美指令[M]. 武汉: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1989: 43.
- [7] 孙惠芬. 多年蚁后[M]. 北京: 接力出版社, 2021.
- [8] 蒙台梭利. 童年的秘密[M]. 马荣根, 译.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4: 23.
- [9] 陈勤建. 文艺民俗学[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1: 160.
- [10] 费孝通. 乡土中国[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106.
- [11] 吴晓东. 现代小说研究的诗学视域[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1999(1).
- [12] 韦恩·布斯. 小说修辞学[M]. 华明, 等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7: 77.

(责任编辑 刘海燕)

A Deep Reflection on Parent – child Relationship and Child Growth

— On Sun Huifen’s Children’s Novel *Many Years as the Ant Queen*

HAO Lu

(Faculty of Liberal Arts,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127, China)

Abstract: Sun Huifen’s children’s novel *Many Years as the Ant Queen* takes a child’s fantasy world as its subject, revealing how adult discipline subverts the child’s world and creates the spiritual conflict between adults and children; It shows that the absence of parents leaves unhealed wounds in children’s growth, and the story of *Many Years as the Ant Queen* also symbolizes the author’s deep thinking about parent – child relationship. Through fairy tale elements, the use of image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multiple narrative perspectives, the novel depicts a colorful childlike world. It can be seen from this work that Sun Huifen’s creative path has turned from the “urban – rural narratives” to the concern of youth growth.

Key words: Sun Huifen; *Many Years as the Ant Queen*; parent – child relationship; child growth

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结构评价体系研究

王艳

(河南开封科技传媒学院,河南开封475001)

摘要:致力于深入分析新质生产力对农业结构体系影响的学术探讨,选取河南省作为案例,构建一个多维度评价指标体系,涵盖生产资料、生产效率及绿色农业三个核心维度。利用主成分分析法(PCA)对2013至2021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深入量化分析,本研究揭示新质生产力在提升农业生产效率、优化农业产业结构、促进绿色农业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积极影响。研究结果不仅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基于数据的决策支持,而且对于深化理解新质生产力在农业领域的应用及其对农业现代化进程的推动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未来研究需进一步关注新质生产力在农业领域的应用,并探讨其对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贡献。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绿色农业;指标体系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5.01.005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5)01-0024-06

在全球化与科技创新的背景下,新质生产力的兴起已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特别是在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的融入预示着生产方式的深刻变革与升级,这不仅关乎生产效率的显著提升和成本效益的优化,也直接关系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本研究基于国内外文献综述和河南省的农业实践,构建理论分析框架,系统地探讨新质生产力如何促进农业结构的变革,并分析其理论基础与影响权重。

河南省农业发展面临多重挑战,包括自然资源限制、生产效率不足、劳动力流失等,这些因素共同制约着农业结构的转型和现代化进程。此外,智慧农业的发展迫切需要掌握先进知识的高素质人才,而农村教育环境与城市存在差距,农民对智慧农业的适应能力有限,且农村空心化现象加剧了农业人才的流失。本研究探讨农业结构调整中人才培养的定向化调整策略,以应对农业现代化的挑战,并为河南省乃至全国的农业农村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一、河南省农业发展面临的挑战与转型需求

(一)农业多样化发展的局限性与现代化进程的滞后

河南省若干地区的农业发展显示出较为明显的单一化特征,这主要源于自然资源的限制或开发不充分,导致农产品产业结构的单一化。这种现象在经济条件较为滞后、基础设施尚需完善的地区尤为突出。由于经济条件和自然条件的双重约束,地方财政难以通过大规模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先进技术引进来显著提升农业发展水平,而只能将有限的财政资源用于推动适合当地条件的农业机械化,从而小幅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这些地区长期以来沿袭着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难以实现向现代农业的快速转型。

(二)农业生产效率的不足与智能化建设的配套挑战

河南省作为中国重要的农业省份,尽管在农业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农业生产效率不高和资源产出效益不均衡的问题仍然普遍存在。这一现象的成因较为直接,主要是地方财政资源有限,难以支

收稿日期:2024-12-20

基金项目:2023年度河南省软科学“共同富裕视角下河南县域乡村发展动态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测度分析”(232400411069)

作者简介:王艳(1966—),女,河南遂平人,正高级会计师,河南开封科技传媒学院副校长,研究方向:国民经济学。

撑农业现代化所需的资本投入,导致农业科技和机械化水平提升不足。财政资源的不足限制了农业现代化所需的资本投入,包括农业科技的研发和农业机械化的普及,这直接影响了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具体而言,河南省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3.3%,主要粮食作物良种覆盖率达到98%以上,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85%以上。与发达国家相比,农业科技贡献率和机械化水平仍有提升空间。特别是在畜牧养殖、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设施农业等产业的机械化水平相对较低,成为制约农业生产效率提升的薄弱环节。在引入智能化建设后,农业从业者的教育水平和综合素质成为影响智能化生产设备使用和维护的关键因素。提升农业从业者的科技应用能力和操作技能,是实现智能化生产设备有效运用的前提。

(三)农村劳动力流失对农业结构转型的影响

河南省的农业结构作为一个多维度的体系,其演变和发展受到技术进步和生产力发展的显著影响,同时,农村劳动力的变化也对其转型的速度和质量产生重要作用。当前,河南省面临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老龄化人口比例上升、适龄农业劳动力人口减少的挑战。随着劳动力分工的细化和协作规模的扩大,劳动力短缺问题日益凸显,限制了农业结构的多样化和协调发展。

(四)智慧农业人才短缺与农业结构调整的技术支撑需求

河南省农村教育环境虽有所提升,但与城市相比,教育资源和环境仍有较大差距。农民的整体素质和知识水平相对较低,对智慧农业的接受和适应能力有限。同时,一些潜在的新型农民由于农村经济发展的局限性而选择进城务工,加剧了农村的空心化现象。智慧农业的发展需要既掌握先进农业知识又能熟练运用农艺技术的高素质人才。农村基础教育的不均衡发展加剧了农业人才的短缺,这对于农业结构调整和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未来,随着务农人口的减少,对农业领域的专业人才需求将持续增长,特别是在农业机械化和电子商务等领域。因此,如何在农业结构调整中进行人才培养的定向化调整,是本研究关注的重点之一。

二、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结构体系

(一)农业结构体系构建原则

1. 综合性原则

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结构指标体系的构建,应遵循全面性原则,以实现对农业新质生产力水平的全面评价。该体系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理论指导,并融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确保其理论指导性。体系设计紧扣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发展趋势,选取具有战略性、关键性和导向性的指标,以评估和监测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2. 科学性原则

在构建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结构的指标体系时,要从实际发展情况出发结合理论研究的导向。在此过程中需确保指标来源的合理性与结果的动态稳定性。本研究的指标数据主要源自河南省官方统计资料,并采用Stata18软件进行数据处理与分析,确保研究过程的科学性和客观性。

3. 可行性原则

确保研究程序的可操作性是构建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结构的指标体系时的关键,这涉及数据搜集与整理的标准化操作,以及选取那些能够在公开发表的资料中获得的指标。不同指标应能够精确反映新质生产力在农业领域的关键维度。此外,指标体系的构建必须紧密结合农业发展的实际情况,以确保测算结果能够为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指导农业结构的优化,并有效解决实际问题。

(二)指标选取

基于河南省的发展特点和农业生产的特殊性,本文结合王丽双,傅新红,蒋浩,杨锦秀等学者的研究,最终选择生产资料、生产效率、绿色农业作为一级指标,并进一步将一级指标细分为10个二级指标,涵盖了农业生产的物质基础,如科技投入和机械动力;衡量生产效率的关键指标,如单位面积产量和劳动生产率;以及反映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绿色农业指标。具体如表1所示。

三、评价对象及方法

(一)评价对象

本文基于新质生产力形成要素,构建了一个包含生产资料、生产效率、绿色农业三个维度的指标体系,旨在评价2013至2021年间河南省16个地级市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鉴于《河南统计年鉴》中2022年数据的不完整性,为确保研究的准确性和科学性,本研究选择排除该年份数据。

(二)评价方法

在对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结构发展的文献综述中发现,综合性评价指标测算方法拥有多种类别,每种方法均有其特定的适用范围和优势。权重法适用于那些不能简单均分确定权重的贸易便利化指标,其中较为常见的权重确定方法包括层次分析法(AHP)、主成分分析法、熵值法等八种。层次分析

法 (AHP) 适用于专家意见较为重要的情况, 主成分分析法和因子分析法则适用于数据量较大且需要降维的情况, 熵值法 (熵权法) 适用于数据的离散程度

较大的情况。CRITIC 法和独立性权重法等则是基于数据的波动性或者数据之间的相关关系情况进行权重计算。

表 1 贸易便利化水平测算指标构建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说明	单位	属性
生产资料	农业科技经费	I ₁	R&D 经费内部支出 × (地区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 地区生产总值)	元	+
	农业科技人员	I ₂	R&D 人员数 ×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 地区生产总值)	人	+
	农业专利数量	I ₃	直接获取	个	+
	农业机械总动力	I ₄	直接获取	千瓦	+
生产效率	单位面积作物产量	P ₁	粮食总产值 / 粮食播种面积	吨 / 公顷	+
	农业劳动生产率	P ₂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 第一产业从业人员人数	元 / 人	+
	农业产业结构占比	P ₃	农业产值 /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 100%	%	+
绿色农业	灌溉面积	R ₁	直接获取	公顷	+
	范围化肥使用量	R ₂	直接获取	吨	+
	农业塑料薄膜使用量	R ₃	直接获取	吨	+

表 2 综合性评价指标对比

评价方法	主观赋权/客观赋权	相关性要求	数据信息量处理要求	原理
AHP 层次分析法	主观	无	小	专家打分
优序图法	主观	无	小	专家排序
主成分分析法	客观	有	大	降维 + 信息浓缩
因子分析法	客观	有	大	降维 + 旋转
熵值法	客观	无	大	数据熵值信息量大小
CRITIC 权重	客观	有	大	对比强度指标和冲突性指标
独立性权重系数法	客观	有	大	共线性强弱
信息量权重法	客观	无	大	数据波动程序

本研究在本次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结构发展的分析中, 选择主成分分析法 (PCA) 的原因在于其能够有效地处理多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 通过降维技术将原始变量的信息浓缩到较少的主成分中, 同时保留大部分原始数据的信息。这种方法不仅减少了评估指标之间的相关影响, 而且通过基于数据方差贡献率的客观赋权, 提高了分析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此外, 主成分分析法适用于处理大量数据, 并且能够适应由于数据的波动性, 因此主成分分析法成为本次分析的理想选择。

(二) 标准化处理

在本研究中, 鉴于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结构发展的评价涉及多源数据和多样评价方法, 为解决量纲不一致和极端值问题, 采取了数据标准化处理策略。鉴于所有评价指标均为正向, 即指标值的增加均被视为正面发展, 本研究专注于无量纲化处理, 特别采用了最大最小值标准化方法。该方法通过将数据缩放至 [0, 1] 区间, 有效消除了量纲差异和极端值的影响, 确保了不同指标间的可比性, 公式如下:

$$X_i = \frac{X_i - X(\min)}{X(\max) - X(\min)}$$

(三) 权重确定

为了验证二级指标是否符合主成分分析的前提条件, 本研究对所涉及的变量进行了 Kaiser - Meyer - Olkin (KMO) 和 Bartlett 的球形度检验。具体的检验数据和标准呈现在表 3、表 4 中。

表 3 Bartlett 和 KMO 检验结果

Bartlett test of sphericity		
Chi - square	=	1419.318
Degrees of freedom	=	45
p - value	=	0
H0:		variables are not intercorrelated
Kaiser - Meyer - Olkin Measure of Sampling Adequacy		
KMO	=	0.771

四、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结构发展水平测算

(一) 数据处理

为确保量化分析的准确性和数据稳定性, 对于数据缺失较为严重的特定年份, 例如 2022 年, 采取了剔除的策略以避免不完整数据对研究结果造成影响。本研究对于呈现线性特征的数据缺失, 采用了线性插值法, 通过已知数据点之间的线性关系来估算缺失值, 该方法适用于数据变化趋势平稳的情况。而对于非线性特征的数据以及时间序列的端点年份, 如 2013 年和 2021 年, 本研究采用了五年均值法, 通过计算缺失数据点前后各两年的数据平均值来补填, 这种方法考虑了时间序列的平滑性, 为非线性变化的数据和端点数据提供了稳健的估计。

表4 KMO度量标准

KMO 范围	适用程度
KMO ≥ 0.9	极其适用
0.8 ≤ KMO < 0.9	非常适用
0.7 ≤ KMO < 0.8	一般适用
0.6 ≤ KMO < 0.7	一般不适用
KMO < 0.6	不适用

本研究对二级指标进行了 Kaiser - Meyer - Olkin(KMO)和 Bartlett 球形度检验两项统计检验。所得 KMO 统计量为 0.771,依据 Kaiser 关于 KMO 值的解释框架,该数值表明变量间存在适中的共线性,满足进行主成分分析的基本条件。KMO 值接近 0.8,意味着变量间的相关性足以支持通过主成分分析实现数据降维,同时有效规避了共线性过高可能引起的分析失真。此外,Bartlett 球形度检验的 P 值结果为 0.000,表明拒绝原假设,即各变量间的相关系数矩阵为单位矩阵。

借助 Stata18 软件对所有收集到的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主成分提取结果如表 5 所示,方差检验见表 6。

表5 主成分分析提取结果

Principal components/correlation	Number of obs	=	144
	Numberofcomp.	=	10
	trace	=	10
Rotation; (unrotated = principal)	Rho	=	1

表6 方差解释率

Factor	Eigenvalue	Proportion	Cumulative
Factor1	4.902	0.490	0.490
Factor2	1.977	0.198	0.688
Factor3	1.527	0.153	0.841
Factor4	0.592	0.059	0.900
Factor5	0.367	0.037	0.937
Factor6	0.274	0.027	0.964
Factor7	0.152	0.015	0.979
Factor8	0.099	0.010	0.989
Factor9	0.071	0.007	0.996
Factor10	0.038	0.004	1

在进行 PCA 分析的过程中,本研究采用特征值大于 1,这一严格的标准来决定主成分的提取。确保每个主成分在解释数据变异性方面优于原始单一指标;单一主成分至少解释 5%—10% 的数据差异,以保证每个主成分具有实质性的解释力;以及累计方差贡献率至少达到 60%,更严格的标准则要求超过 80%,以确保分析的全面性和准确性。

在本研究中,对 10 个变量进行了主成分分析,得到了特征值、方差贡献率、累计方差贡献率。分析结果显示,前三个主要成分的特征值均超过了 1,并

且前三个主要成分的累积方差解释率达到了 84.06%。意味着每个单独的主要成分都至少解释了总变异的 5% 以上。因此,通过仅保留这三个主要成分,不仅能够减少数据的维度,还能保留原有 10 个变量中 84.06% 的关键信息。

表7 提取主成分荷载系数矩阵

Variable		Factor1	Factor2	Factor3	Uniqueness
农业科技经费	I ₁	0.466	0.807	0.073	0.126
农业科技人员	I ₂	0.638	0.675	-0.206	0.095
农业专利数量	I ₃	0.172	0.442	0.792	0.148
农业机械总动力	I ₄	0.917	0.028	-0.232	0.105
单位面积作物产量	P ₁	0.265	-0.645	0.372	0.376
农业劳动生产率	P ₂	0.608	-0.022	0.703	0.135
农业产业结构占比	P ₃	0.786	-0.432	0.157	0.171
灌溉面积	R ₁	0.938	-0.218	-0.027	0.073
范围化肥使用量	R ₂	0.919	-0.138	-0.251	0.073
农业塑料薄膜使用量	R ₃	0.792	-0.069	-0.277	0.292

由成分矩阵的结果(见表 7),可以得出所选 4 个主成分的表达式如下:

$$\begin{aligned} \text{Factor1} &= 0.466I_1 + 0.638I_2 + 0.172I_3 + \\ & 0.917I_4 + 0.2648P_1 + 0.6077P_2 + 0.7858P_3 + \\ & 0.9375R_1 + 0.9192R_2 + 0.7917R_3 \\ \text{Factor2} &= 0.8073I_1 + 0.66749I_2 + 0.4419I_3 + \\ & 0.0281I_4 - 0.6445P_1 - 0.0216P_2 - 0.4323P_3 - \\ & 0.2181R_1 - 0.1376R_2 - 0.0686R_3 \\ \text{Factor3} &= 0.0725I_1 - 0.2062I_2 + 0.7922I_3 - \\ & 0.2319I_4 + 0.3715P_1 + 0.7034P_2 + 0.1566P_3 - \\ & 0.0273R_1 - 0.2505R_2 - 0.2766R_3 \end{aligned}$$

本研究基于三个主成分的表达式,提取了各个主成分的系数,并将其与各自的方差贡献率相乘。通过这种方式,进一步将得到的乘积与四个主成分累积的方差贡献率(达到 84.06%)进行对比,从而确定每个变量的相对重要性,以农业科技经费为例:

$$\begin{aligned} \text{Factor1} &= 0.466 * 0.490 \div 0.806 = 0.272 \\ \text{Factor2} &= 0.807 * 0.198 \div 0.806 = 0.190 \\ \text{Factor3} &= 0.073 * 0.153 \div 0.806 = 0.013 \end{aligned}$$

在完成主成分分析并获取了各主成分在特定变量上的值后,本文对这些值进行了整合。以农业科技经费(I₁)为例,将 Comp1_I₁、Comp2_I₁、Comp3_I₁ 和 Comp4_I₁ 的值相加,计算出 I₁ 的总得分为 0.474788437。为了使这一得分具有可比性,我们进一步通过将其除以所有 10 个指标总得分之和(4.092),进行了归一化处理。这样,我们得到了 I₁ 的归一化权重为 0.116028052。以此类推,可以求出其他 9 项指标的权重,具体见表 8。

由分析结构推断出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结构评价指标体系综合指数如下所示：

$$Y = 0.116I_1 + 0.121I_2 + 0.085I_3 + 0.122I_4 + 0.017P_1 + 0.017P_2 + 0.094P_3 + 0.120R_1 + 0.112R_2 + 0.097R_3$$

表8 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结构各指标权重汇总表

变量	Factor1	Factor2	Factor3	Comp	二级权重	一级权重
I1	0.272	0.190	0.013	0.475	0.116	0.444
I2	0.372	0.159	-0.037	0.493	0.121	
I3	0.100	0.104	0.144	0.348	0.085	
I4	0.535	0.007	-0.042	0.499	0.122	
P1	0.154	-0.152	0.067	0.070	0.017	0.228
P2	0.354	-0.005	0.128	0.477	0.117	
P3	0.458	-0.102	0.028	0.385	0.094	
R1	0.547	-0.051	-0.005	0.490	0.120	0.328
R2	0.536	-0.032	-0.046	0.458	0.112	
R3	0.462	-0.016	-0.050	0.395	0.097	

五、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新质生产力理论，针对农业结构体系的优化进行系统性研究。运用主成分分析法(PCA)对2013至2021年间的量化数据进行了分析，有效地解决变量间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并通过降维技术提取出关键信息。立足于河南省农业结构体系的深入剖析，并结合新质生产力的评估，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以促进农业农村基础设施的智慧化升级，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并激发农业结构的多样化发展。

(一) 新质生产力建设与农业现代化的协同进步

鉴于农业农村发展问题的多元性，经济基础对农业农村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本研究建议通过智能化改造基础设施，注入经济发展活力，同时创造就业并提高农民收入，通过财政补贴完善农业基础设施。新质生产力的建立将加速农业现代化进程，提高欠发达地区农业的发展水平。本研究提议财政支持智慧农业发展试点项目，结合社会资本与国家补贴，解决初期资金问题，并在试点区域探索农业产业多元化与产业融合，延长农业产业链，提升农副产品价值，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深层次发展。

在智慧化建设的过程中，需要重视技术创新与人才培养的双重驱动。技术创新可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降低成本，而人才培养则为农业现代化提供必要的智力支持。通过建立智慧农业平台，可以实现农业生产过程的实时监控和管理，提高对自然灾害和市场变化的应对能力。同时，通过智慧农业教育和培训，提升农民的科技素养，培养一批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

(二) 生产力水平导向的农业结构优化

农业结构调整是一个动态演化过程，其优化随着农业生产要素的变化而变化。本研究通过数据分析，量化各组分的权重，客观反映不同地区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与农业结构调整的方向。智能化建设的完善将解决农业生产效率低下的问题，缓解农业现代化需求与传统经营方式之间的矛盾，提升农业生产效率。社会多方应通过产学研合作，增强协同发展的效果和协调性。

在农业结构调整中，应注重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通过政策引导和市场激励，促进农业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提高农业的竞争力。此外，应加强农业科技创新，推动农业向绿色、高效、智能化方向发展，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通过优化农业结构，可以提高农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促进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

(三) 乡村振兴战略与新质生产力的深度开发

针对乡村人口老龄化和高素质人才短缺的问题，本研究提出基于乡村振兴战略的系统性解决方案，以应对乡村面临的挑战。首先，从教育层面出发，加强农村基础教育是提升农村人力资本质量的关键。通过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提高教育质量，为农村儿童提供平等的教育机会，从而为乡村发展培养具备现代知识和技能的人才。其次，加大人才引进力度，通过制定优惠政策，吸引外部高素质人才流入乡村，包括提供住房补贴、税收减免等激励措施。同时，完善人才培养和引进机制，为高素质人才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包括重视人才的综合素质培养，加强乡村的人才培养，满足新型农业耕种技能、农业生产经营技能等需求。

进一步推动乡村产业振兴是解决劳动力短缺和人才流失问题的有效途径。河南省可以通过发展特色农业和乡村旅游等新兴产业来创造优质就业机会，以此吸引和留住青壮年劳动力，应对劳动力总量下降的问题，政府应制定相应的政策，通过提供奖学金、助学金等财政支持来减轻农村学生的经济负担，鼓励他们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同时为乡村创业的人才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创业指导和政策咨询，以营造一个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环境。以上举措能够提高农村地区的教育水平和就业质量，促进农业科技创新和产学研用企的深度融合，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农业生产结构和区域布局，提高农业质量效益，最终实现劳动力总量的平衡和乡村振兴的双重目标。

参考文献:

- [1] 马玉丽,周煜. 数字技术推进农业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实证研究[J]. 华东经济管理,2024,38(12):1-8.
- [2] 马贤磊,范佳旭,郭恩泽. 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现实条件与发展路径[J]. 农村经济,2024(9):11-20.
- [3] 王钢,钱龙. 农业新质生产力水平测度及其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J]. 统计与管理,2024,39(9):43-52.
- [4] 杨海华,宋怡宁,闫孟宇. 农业新质生产力之于新农人培育的应然要求与实践路径[J]. 职教论坛,2024,40(10):81-88.
- [5] 王文胜,钟焯洪. 农业保险与中国农业新质生产力耦合协调驱动因素研究[J]. 山西农经,2024(20):188-194.
- [6] 陈文烈,寿金杰. 农业新质生产力赋能民族地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J]. 河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26(5):1-12.
- [7] 杨华,郭越. 新质生产力赋能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逻辑、战略价值及践诺理路[J].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18(3):18-27.
- [8] 张海鹏,王智晨. 农业新质生产力:理论内涵、现实基础及提升路径[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24(3):28-38.
- [9] 文丰安,黄上珂. 新质生产力助力基于新型城镇化的数字乡村建设审视[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50(3):15-26.

(责任编辑 刘成贺)

Research on the Empower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 the Agricultural Structure Evaluation System

WANG Yan

(Henan Kaifeng College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Communication, Kaifeng, Henan 475001, 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conduct an academic exploration of the impac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on the agricultural structure system, selecting Henan Province as a case study. A multi-dimensional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is constructed, covering three core dimensions of production materials, production efficiency, and green agriculture. Using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 to conduct in-depth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the time-series data from 2013 to 2021, this study reveals the positive impac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on enhancing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efficiency, optimizing the agricultural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promot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green agriculture. The research results not only provide data-based decision support for policy makers, but also have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value for deepen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applica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 agriculture and its driving role in the process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Future research needs to pay further attention to the applica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 agriculture and to explore its contribution to achiev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in agriculture.

Key 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green agriculture; target system

河南省数字乡村建设的现实约束与突破路径

李敬

(中共郑州市委党校 中华文化教研部, 河南 郑州 450042)

摘要:数字乡村建设是数字中国建设的题中之义,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有效途径,是促进河南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抓手。当前河南数字乡村建设的目标、发展逻辑与全局战略相适应,但基础设施滞后、城乡数字鸿沟依然存在,建设主体数字低能、数字人才短缺矛盾突出,产业发展受阻、乡村产业数字化尚未成型,治理环节薄弱、乡村数字治理尚未成熟。这急需河南省在国家政策战略的引领下立足省情农情,不断夯实基础设施,为数字乡村建设打造动力引擎;布局人才队伍,为数字乡村建设提供内在支撑;发展数字经济,为数字乡村建设构造产业路径;强化数字治理,为数字乡村建设创新治理模式。

关键词:数字乡村;时代意蕴;现实约束;突破路径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5.01.006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5)01-0030-07

数字乡村是现代乡村建设的重要趋势,是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当前,我国围绕数字乡村建设的顶层设计与政策框架已初步形成,数字乡村建设在国家战略和地域实践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河南省出台的《关于加快推进农业信息化和数字乡村建设的实施意见》,对数字乡村建设提出了明确目标和要求,制定了具体的保障措施,并在全国率先制定出台《“一村九园”数字化建设规范(试行)》,旨在以数字化引领农业农村现代化,打造数字乡村建设的“河南样板”。当前,河南数字乡村建设的目标、发展逻辑与全局战略相适应,但在将信息技术应用于农村基础设施、智慧农业、农村经济、数字治理等领域还面临不少问题和挑战,在重点内容与具体实践上依然存在不相匹配的地方,亟需我们深入研究并探索合适的对策。

一、河南省数字乡村建设的时代意蕴

数字乡村建设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和实体经济的有机融合实现乡村发展的数字赋能,必将为乡村建设添“智”提“质”,整体带动

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

(一)数字乡村建设是数字中国建设的题中之义

广大乡村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重要场域,“农业强国”被写入党的二十大报告并成为强国建设的目标之一。数字乡村建设作为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以信息化培育新动能,用新动能推动新发展,成为铸就农业强国的新引擎。所以,智慧农业发展的广度、深度决定了农业现代化的后劲、速度,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战略的实施离不开数字乡村建设。河南省耕地面积687.1万公顷,居全国第二位,要扛稳中原粮仓的责任,更需要紧跟数字技术步伐。数字技术赋能乡村现代化建设将在补齐数字中国建设的短板、筑牢数字乡村的发展基础、提升农民的数字素养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为实现乡村振兴和数字中国提供有力支撑。

(二)数字乡村建设是乡村全面振兴的有效途径
乡村振兴的总要求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1]。从经济角度要实

收稿日期:2024-12-20

基金项目:2023年度河南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乡村振兴战略中河南省数字乡村建设的现实约束与突破路径研究”(232400410344);2023年度河南兴文化工程文化研究专项项目“高质量推进河南文化强省建设”(2023XWH081)

作者简介:李敬(1982—),女,河南南阳人,中共郑州市委党校中华文化教研部教授,研究方向:政治学、社会学。

现产业兴旺,与发展乡村数字经济一致;从政治角度要实现治理有效,与推动乡村数字治理一致;从文化角度要实现乡风文明,与繁荣乡村数字文化一致;从社会角度要实现生活富裕,与打造乡村数字生活一致;从生态文明角度要实现生态宜居,与建设智慧绿色乡村一致。所以,河南省数字乡村建设可为乡村振兴提供全新的思路和有效的途径,助推乡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多个领域的数字化建设。

(三)数字乡村建设是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抓手

城乡融合发展强调城乡资源双向良性互动,旨在实现城乡共建、共享、共荣。长久以来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阻碍了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等影响了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经济、社会的双重分化限制了农村居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数字鸿沟、经济鸿沟、技术鸿沟普遍存在。缩小这些鸿沟有赖于将数字技术运用到农民的生产生活,强基础、畅流通、促共享,以信息化激发乡村经济发展活力,实现城乡均衡化发展。数字乡村建设打破城乡融合发展现实壁垒,以信息流带动物流、商流、资金流、技术流,促进城乡资源要素平等交换,对城乡之间的土地、资本、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进行优化配置,实现城乡优质资源共享,为乡村发展注入新动力。

二、河南省数字乡村建设的现实约束

调研结果表明,河南省近年来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农村生产信息化趋势不断加强、绿色智慧农村建设不断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重点内容与具体实践仍然存在不相匹配的地方。

(一)基础设施滞后,城乡数字鸿沟依然存在

1. 数字基建发展失范

乡村数字基建缺失统一规划,存在重复建设、承载力低、覆盖深度有限等资源浪费问题;不少现有基建存在难以支撑今后扩建与发展的技术设计困境;物联网、5G网络等信息基础设施和智慧农业设施难以满足乡村发展的实际需要;产业互联网、人工智能设备和一体化大数据中心体系建设步履艰难;现代物流、智能仓储布局失衡,不利于乡村振兴和区域协调发展。

2. 数字技术供给失衡

乡村的空心化、乡民对数字基础建设认识不足、信息管理混乱等导致数字信息化设备资金消耗量大、回收成本高,乡村数字技术难以普及;针对农业农村的大数据创新性应用不足,智能装备研发滞后,农业专用传感器尚未普及;乡村信息服务软件区域

差异性明显,发达城市周边与欠发达远郊的乡村地区数字覆盖不均衡。

3. 数字信息采集失序

硬件不足导致软件落后,数据资源尚未实现有效归集和有序汇集,业务系统缺乏统一建设标准,大数据综合利用能力未能充分发挥;起主导性作用的生产端数据采集不完备,农产品和物联网、大数据等联结还没有达到高标准,网络信息与农业农产品脱离;数据共享、数据协同等方面存在条块分割、各自为政、数据量不足的现象,进而影响大数据的分析、加工和利用。

4. 数字应用场景有待拓展

虽然数字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势头良好,农旅商协同发展方面成绩显著,但“互联网+”数字模式还未在农村地区全面铺开,数字应用场景尚未从生活场景全面延伸至生产经营场景,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未完全深度融合,特别是远程教育、远程医疗、养老等民生领域的智慧化衔接有待增强,急需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二)建设主体数字低能,数字人才短缺矛盾突出

1. 乡村数字化人才匮乏

据第七次人口普查,全国各地数字乡村建设处于起步阶段,数字化人才的供给端与需求端不匹配,缺口将近1100万人,河南也存在乡村人口呈下降趋势且数字化人才匮乏的现象。城市的虹吸效应,致使大量能熟练应用互联网技术的中青年劳动力流入城市,技术性人才外流,乡村空心化、老龄化严重。现有基层农技队伍知识严重老化,音视频制作、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等相关从业人员严重匮乏。农民自身数字素养不高,存在数字认知的困顿与迷茫;专业程度高、创新能力强、发展潜力大的新型职业农民仍较少。留守乡村的老人、妇女和儿童获取、识别和运用数字信息素养较低,互联网使用呈现泛娱乐化趋势。

2. 数字化干部队伍不强

具有数字化思维的基层干部缺乏,部分基层干部自身对数字乡村认识水平有限,对农村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发展趋势缺乏正确判断和把握。年龄结构、专业结构、梯次结构不合理,缺乏专职的管理机构和人才队伍,相关职能部门如网信办、农业农村局信息化部门人员编制较少且缺乏信息化专业专职人员。部分年轻驻村干部掌握信息化能力较强,但驻村工作的阶段性等现实问题导致数字化工作的持续性不强。

3. 人才培养体系不健全

个别地方政府在科技创新体系、财政投入配比、数字人才培养等方面缺乏系统周密的内在机制。高等院校及职业院校涉农专业学科配备不全,数字化人才培养数量较少,科研机构技术性人才培养机制不完善等问题满足不了数字乡村建设整体需求。专业型人才政策有待完善,急需制定合理的人才引进培育政策、建立数字化人才培养基地、进一步增设数字化岗位、加强综合数字化人才储备。

(三) 治理环节薄弱,乡村数字治理尚未成熟

1. 治理主体能力有待提高

个别地方政府存在注重“数字”形式、忽视数字实效的现象,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简单追求更大比例的财政投入和多种类型治理平台的搭建。部分基层干部的工作前瞻性和科学性欠佳,对数字乡村治理实践的规律性认识不深,能动性发挥不足,数字治理观念淡薄。部分社会组织难以与政府形成有效信息交流闭环机制,尚未达成平衡的协作关系,多元化协同治理结构及一体化数字治理体系尚未形成。部分村“两委”与乡镇政府权责边界模糊,村委会和主任职能分工不清,叠加数字化治理对技术能力和制度规范的新要求,进一步加剧了乡村数字治理的复杂性。数字技术带来便捷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面对面”解决问题的人情关怀,部分乡民数字意识和能力参差不齐,数字治理在乡村群体中形成了难以跨越的壁垒。

2. 乡村治理过程整合不够

乡村数字治理全过程包括前期规划与准备阶段、基础设施建设阶段、数字平台搭建阶段、数据收集与管理阶段、应用与服务阶段、监督与评估阶段等。如在前期规划与准备阶段,乡村数字化需求调研不足,相关软硬件基础等资源整合不够;在数字平台搭建阶段,政务平台、农业服务平台、电商平台之间尚未有效互联互通,从而导致具体应用与服务阶段,政务服务应用、农业生产应用、电商应用尚未有效融合;在数据收集与管理阶段和应用与服务阶段,出现了数字化与质量冲突、数据与实质脱节、技术与应用失衡、虚拟与现实分离等数字供给难以满足乡民需求的“数质”悬浮化困境;在监督与评估阶段,缺乏广大群众的监督及对各责任主体的考评制度,缺乏对数字治理应用效果的实时监控和数字治理项目的定期综合评估,没有形成全面的数字乡村建设评价指标体系和相应的反馈回应机制。

(四) 产业发展受阻,乡村产业数字化未成型

近几年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开展,河南省农业

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农产品加工业相对发达,农村电商成效显著以及“豫”字号农业品牌建设发展迅速。在看到这些成绩的同时,我们更应该关注乡村产业发展的薄弱地带。

1. 农业产业化发展受阻

《2023 河南省数字经济发展报告》指出,2022年,河南省农业、工业、服务业数字经济渗透率分别为6.2%、19.4%和37.9%,同比分别提升0.6个、1.5个和3.4个百分点^[2]。数据表明,河南省数字经济对农业渗透率较低且增长速度较慢,数字经济与乡村产业还未实现深度且广泛的融合。土地流转的规模化农业尚未全面形成,长期延续的小农经济生产模式小且分散,农产品的竞争力不强、特色不明显,数字化农业产业投资乏力、要素不足。科技兴农、信息技术富农的有效手段还不够灵活,智慧农业的普及度还不够高。

2. 农业生产流通相对滞后

从生产上看,农业装备智能化水平不高,农业数据采集设备灵敏度差、稳定性低,农业机械设备创新能力不足,低水平竞争现象严重。从流通上看,农产品批发市场和零售企业两大传统渠道信息不对称,急需进行数字化变革。销售端的电商化相对容易实现,如各地电商发展打造出了许多“淘宝村”,但是生产端由于农业生产难以预测、农户分散等特性导致数字化无法实现,农民更是无法参与数据化链条中。

3. 信息化企业难以进入农村

龙头企业带动能力弱,部分农村地区缺乏有实力的龙头企业,现有的企业规模较小、市场竞争力不强,在技术创新、品牌建设、市场开拓等方面难以发挥有效带动作用。现有农村电商销售内容同质化、附加值低,未能深入挖掘其农产品的价值,产品知名度低下。

三、河南省数字乡村建设的突破路径

数字乡村建设的本质是通过挖掘与释放数据要素价值来弥补城乡间在基础设施、资金、人才等方面的差距,改革优化原有的乡村治理、经济发展、文化传播、公共服务的模式,从而助力乡村振兴,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一) 夯实基础设施,为河南数字乡村建设打造动力引擎

1. 持续推进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弥合城乡数字鸿沟

根据河南省通信管理局发布的数据,2024年一季度河南省4.5万个行政村5G通达率100%^[3],提前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在此基础上要进一步

实现通信网络“村村通”向“户户用”延伸,搭建起数字乡村的硬件平台。在规划上,要在前期调研摸排的基础上,整体规划设计、超前科学合理安排数字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硬件配套布局,避免重复建设、资源浪费,确保城乡新型基础设施适配。在具体操作上,加快数字网络基站建设,完善光纤网络、配套机房、农业数据中心等硬件设施,打通智能终端接入梗阻,逐步补齐适老化、适农化的农村智能终端短板,逐渐形成“广覆盖、高速率、重普及、智能化”的数字乡村基础设施体系。在研发上,加强面向农业生产的5G网络、遥感卫星、农机智能装备、物联网等领域的研发与应用。在服务上,加强与移动、联通等通信运营商合作“提速降费”,为农村信息化建设提供更加有针对性的资费套餐;定期对网络状况及网络安全等进行评估和维护。

2. 不断融合乡村数字技术运用场域,全面释放数字红利

推动数字技术全方位渗透到农村养殖、教育、基层党建等多场域,打造智慧政务系统、智慧养殖项目、智慧教育系统、智慧物流系统、智能水利系统、智能供电系统等,实现数字技术的乘数效应和倍增效益。建立“政府+互联网”模式,广泛搜集三农信息,建立数据库,挖掘数据价值,精准助农;建立“政府+金融机构”模式,运用数字技术推动乡村普惠金融发展,为农民解决小额融资和理财问题;建立“政府+电商平台”模式,帮助农民发展具有当地特色的农村电子商务,优化电子商务产业布局。

3. 加快构建乡村基础设施支持机制,匹配数字技术平台

从“公共数据平台”和“应用支撑平台”两方面统筹考虑,既要聚焦于农业农村数据的采集、应用与共享的问题,又要提供全面的乡村公共事务服务与涉农应用服务,以推进乡村治理的数字化、智能化。一是构建农业农村综合信息服务平台,打造涵盖党建服务功能、政务服务功能、村务财务公开功能、自然灾害应急服务功能、公共卫生安全防控功能等于一体的乡村一体化治理平台,解决农业信息服务“最后一公里”问题,实现基层综合治理信息化。二是构建基础数据资源体系,打造“乡村数据大脑”。从农业自然资源大数据、农村集体资产大数据、农村宅基地大数据等方面着手,构建经济、产业、生态、治理等多方位、多角度、多维度的全景地图,强化区域数据的对接,加强信息数据的互联互通,实现信息全面共享、流程全面贯通、管理全面展示,真正做到以数据技术引领乡村公共服务创新发展。三是加大财

政投入力度。设立数字乡村产业发展专项扶持资金;发挥好财政资金与国家级投资基金的引导作用;吸引社会资本和金融机构参与数字乡村建设;建设农业农村大数据普惠金融服务平台、农村金融超市,形成“政、企、银、农、科”五位一体合作体系。

(二) 布局人才队伍,为河南数字乡村建设提供内在支撑

乡村人才是指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具备较高的知识素养和业务能力,具有较强的使命担当和责任意识,愿意为乡村振兴作出贡献的人^[4]。河南省要采用多方聚才的方式,培养造就适应当前数字乡村建设的专业人才队伍。

1. 准确定位,奏响揽才乐章

一是明确乡村人才的内在属性。乡村人才具有较强的本土性意蕴,根植于乡村社会,具有较强的内在属性,突出表现在四个方面:首先是关联性,主要指人才的职业、知识、技术、生活及社会影响、资源禀赋等与乡村有着内在关联,具有支撑乡村发展的价值。其次是空间性,指人才位于乡村社会场域内,生产、生活以乡村为载体,并以服务乡村振兴为己任。再次是归属感,指人才具有较强的情怀和担当,具有奉献乡村振兴的责任感,能够为乡村发展作出贡献。最后是承载性,指人才具有较强的综合能力,在知识储备、思想准备、职业操守、道德积淀等方面扎实有效,能够承载工作职能和历史使命。二是明确乡村人才的来源结构。河南省乡村人才的来源构成主要包括本土人才、返乡人才和下沉人才三种主要类型。要持续培养包括本地的种田能手、文化人才、村组干部、技术人才等在内的本土人才;不断吸引包括外出务工经商人员、退休干部、退伍军人、返乡大学生等在内的返乡人才;持续输送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等下沉帮扶乡村发展的下沉人才。

2. 育用并举,助燃兴才引擎

一是重视加强人才培养与培训。要搭建线上培训平台,整合农业数字化生产、农村电商运营、乡村数字化治理等各类数字乡村课程资源,方便乡村人才随时随地进行学习。要构建由政府相关部门、社会团体及电商龙头企业为主体的农村电商人才培训体系,支持协会与高校、企业相结合,组织农民、种植大户、农业合作社等开展电子商务应用和实训操作培训。二是重视推动产学研融合培养。鼓励高校及科研机构共同参与数字乡村建设,支持高校及科研机构开展数字乡村相关的研究和人才培养工作;鼓励高校及科研机构与乡村地区合作建立数字乡村实践基地,为相关专业的学生和科研人员提供实践场

所,在实践中培养数字乡村人才的实际操作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三是注重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请进来走出去,促进国内外数字乡村人才的交流与合作。积极参与国际数字乡村建设项目,与国外企业、科研机构合作开展数字乡村相关的研究和实践,为河南省内数字乡村人才提供参与国际项目的机会,拓宽其国际视野和发展空间。

3. 齐抓共管,搭建聚才平台

一是建立乡村人才智能化管理平台。准确把握乡村人才基本情况、需求特点、存量结构,实施“一人一档”,各类人才的成长、诚信、待遇、财税、需求等信息及时入库,搭建乡村人才成长载体,实现乡村人才智能化管理使用。建议河南省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或人才工作机构发挥统揽作用,推动乡村人才信息的线上互通。二是搭建引才聚才组织化平台。积极推动成立乡村招才工作机构,研究乡村人才支持政策,发布乡村急需人才需求清单,设立乡村人才工作专门资金,统筹部署乡村招才引才工作。明确把乡村引才聚才工作纳入河南人才专项工作,制定乡村人才工作运行、研究、联系等制度。依托人才组织化平台,推动建立乡村振兴服务基地,设立乡村人才服务专员,打造乡村振兴人才示范点,成立乡村引才聚才联盟等,把分散在人社、科技、农委、组织、文化、社科等部门的乡村人才工作进行整合,切实解决资源分散、职能交叉、力度不足的问题,全面提升乡村人才工作效率和水平。三是创新乡村人才成长化平台。建议设立有助于推进乡村人才成长的三个支撑平台:①智产融合平台。以农业科技创新平台、星创天地、农业科技园区、研发机构为基础,打造研发能力强、转化能力突出、经济效益好的智产融合平台,让乡村人才有“地”可为。②项目化平台。结合乡村振兴战略部署,谋划一批重点项目、重点工程,着力建设产学研用结合、层次结构合理、高层次人才汇聚的项目化平台,使乡村人才有“机”可为。③公共服务平台。以乡村发展规划为引领,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着力完善乡村公共设施,优化生态环境,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设立人才引进绿色通道,打造宜居宜业的公共服务平台,让乡村人才有“利”可为。

4. 软硬共抓,厚植留才热土

一是支持创业创新。为数字乡村领域的创新创业人才提供政策支持和资金扶持,鼓励他们在农村地区开展数字农业、农村电商、数字文旅等项目。例如,对在乡村地区创办数字企业的人才,给予税收优惠、创业贷款贴息、创业补贴等政策支持,降低创业成本和风险,吸引更多人才投身数字乡村创业。二

是完善贴心式生活服务。将引进数字经济领域紧缺人才纳入政府人才支持政策体系,不断完善乡村人才培养、认定、激励、保障、管理机制,在就业、住房、社保、配偶就业、子女教育等方面提供支持,创新性开展新型职业农民、互联网培训师、互联网营销师等新兴职业的认定、培训工作,延伸服务范围,拓宽服务广度和深度,为数字乡村人才解决来豫发展的后顾之忧,吸引更多优秀人才投身到河南省数字乡村建设中。

(三)发展数字经济,为河南数字乡村建设构造产业路径

数字经济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为乡村产业发展带来了蓬勃生机与活力。

1. 推动数字技术贯穿农业产业全过程

推动乡村产业全产业链的发展,提高数字技术对农业领域的渗透程度,让数字化贯穿于乡村产业全过程,农业产业数字化和农业数字产业化双向互动,实现数字经济与乡村产业融合。产前,利用大数据和现代评估技术对土壤、气候、地貌等生产条件进行分析评估。产中,通过“智慧农业”体系推动生产和管理的智能化,扩展农业生产可能性边界。如通过部署各类传感器和监测设备,实时采集农田中的土壤湿度、肥力、温度以及农作物的生长状态等信息。这些数据被传输到中央控制系统,经过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算法的处理,为农民提供精准的种植建议。同时,智能农业机械的广泛应用,如无人驾驶拖拉机、自动播种机和收割机等,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劳动强度,助力实现农业生产的标准化和规模化。产后,畅通农产品供给销售的渠道,充分利用数字经济平台、网络销售平台、农产品电商、乡村主播等为产品销售提供全方位的服务,降低传统销售中人工、运输、广告等多方面的成本。

2. 培育数字农业产业新业态

数字经济使跨界融合成为常态,产业边界日益模糊,农业与旅游业、文化业、教育业等产业相互交织融合。数字经济使上游原料投入环节、中游种植生产环节和下游销售流通环节的关联度更加紧密,从供给端改变了原有的生产结构与布局方式。产品生产者和销售者不断创新转变生产方式,农产品电商平台、乡村直播带货、科技农业观光园区和沉浸式项目体验等乡村新业态和新模式也应运而生。要发展智慧畜牧业,建立养殖动物的数字化档案,实现智能化养殖管理,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质量,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要利用数字技术挖掘河南乡村丰富的

历史文化资源和自然景观,如开发乡村古建筑的虚拟游览项目、民俗文化的数字体验产品等。通过线上宣传吸引游客,线下体验提升旅游品质,推动乡村文旅产业数字化转型,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要完善农村电商物流配送体系,整合物流资源,在乡村建设电商物流服务站,降低物流成本。鼓励农民开展直播带货等新电商模式,将农产品推向全国乃至国际市场,让电商成为河南乡村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

3. 稳步推动乡村产业升级

紧跟国家宏观产业层面的发展战略,围绕区域性经济圈建设,联合制定数字经济发展战略,稳步推进乡村产业升级,保障数字经济持续推动乡村产业振兴。一要把简单的机械租赁、农资推荐等传统模式逐步转变为托管运营、全生命周期管理、全流程管理等新型模式。二要通过充分挖掘乡村产业优势资源,培育地方特色产业,推动农副产品质量标准化、分级化,实现乡村产业的融合发展与转型升级。三要持续推进科技园区、农村创新创业平台的建设,提高地区研发创新水平。四要推动本土特色产品品牌

化、衍生品多样化,塑造本土品牌形象,学习更新营销手段,打造特色 IP,提高市场占有率和利润率。五要引导和支持农业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一定区域内形成产业集群,通过产业集群的发展,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提高农业产业的整体竞争力。

(四) 强化数字治理,为河南数字乡村建设创新治理模式

乡村数字治理是在数字中国顶层设计指导下乡村具体治理场域的有效实践。2024年3月,河南省委省政府《关于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施意见》中明确指出“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数治‘四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5]。

1. 学习先进治理经验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伴随着“数治”的强势崛起,不少地方都在尝试建设“四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形成了许多独具特色的数治模式和经验(见表1),可以为河南数字乡村建设提供借鉴。

表1 乡村数字治理的典型模式和路径

典型模式	具体措施
广西恭城县“三心三治一守”乡村治理模式	“数字化+网格化”,传承“忠孝仁义”传统文化,发挥数据信息应用在网格管理中的核心作用。
陕西省何村“中国大棚第一村”	农业科技研发,以电商销售为主;聚焦数字党建,构建产业发展、公共服务、民生保障等多功能的数字管理平台。
浙江省德清县“数字乡村一张图模式”	建立“一图一端一中心”的三模块应用支撑体系;在乡村规划、经营、服务、环境和治理五大方面实现数字化发展。
宁波市周巷镇“两防三提升”	实现工作数据化、数据可视化、可视应用化。
上海市宝山区“社区通”	问题分类分层处置机制、“四治一体”工作机制、线上线下联动机制。
浙江省“乌镇管家”	以社会服务和社会治安为中心;搭建多元主体合作平台;形成治理舆情分布图。
四川省邛崃市“为村”模式	涵盖“党建、服务、治理、产业”四大领域;问题逐级回应机制;网络基础设施和智能终端设备制度。
浙江省衢州市龙游县“龙游通”	建立村情通、社情通和企情通三大板块;形成“龙游通+全民网格”的基层智慧治理新模式。
湖南省油溪桥村“村级事务积分考评管理系统”	以乡民自治为基础,制定详细的村级事务积分制;乡民根据积分参与村集体收入分红;根据积分管理考核党员干部。

2. 统一规范治理机制

一要统一平台运营标准。通过对河南省现阶段数字乡村试点地区进行调研发现,在宏观层面上主要以国家出台的政策性文件指导数字乡村建设,在微观层面上缺失针对数字平台建设、运营机制、主要功能、人员权责等的相关文件,运营中仍以 App 和公众号两种传统的数字平台模式为主。建议相关文件及时跟进,对数据共享、数据安全问题进行统一规范,对技术架构、算法处理、界面交互、平台运行等内容实现标准化管理。二要制定合理评价体系。建议在遵循简易性、科学性、情感性的基础上,制定合理的评价体系,解决乡村数字治理的“形式主义”、数字悬浮等问题。要坚持以人为本,促进数字技术赋能的价值回归,既重视数字本身的重要性,又避免把

“数字”成绩作为评定绩效的唯一标准。要紧扣乡民实际需求,既要重视治理内容的真实性、治理活动的价值性,又要考虑评价方法和指标体系的社会认可度和群众接受度,还要保护乡村数字治理的“情感性”,将柔性治理与数字治理结合起来,实现工具性和价值性的平衡。三要健全持续运营机制。首先,要确保技术的持续更新与优化。不断引入先进的信息技术,提升平台的稳定性、安全性和功能性。加强对数据的采集、管理和保护,建立严格的数据安全机制,防止数据泄露和滥用,为实现乡村长远发展和数字治理长效运营提供可靠的数字环境。其次,建立健全评估和反馈机制也是必不可少的。定期对数据平台的运营情况进行评估,收集用户的意见和建议,及时发现问题并加以改进。

3. 完善多元治理格局

在乡村数字治理中,为避免出现数字的悬浮化、政府主体的“一头热”现象,需要政府、企业、社会组织 and 农民等建构多元治理主体参与格局,从而激发乡村数字治理的最大潜力。政府在数字乡村建设中要发挥引领者作用。通过制定科学合理的政策法规,为数字乡村建设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加大对数字基础设施的投入,确保乡村地区网络覆盖全面、信息流通顺畅。同时,政府要积极引导产业发展,推动数字技术与农业、农村服务业等深度融合,为乡村经济注入新的活力。企业作为数字乡村建设的有力推动者,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创新的理念。如科技企业要致力于研发适合乡村场景的数字产品和解决方案;通信企业要不断完善乡村网络基础设施,提升网络服务质量,为数字乡村的发展奠定基础。社会组织在数字乡村建设中也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如公益组织积极开展数字教育普及活动,提升农民的数字素养;文化组织利用数字技术保护和传承乡村文化,挖掘乡村特色文化资源,推动乡村文化产业发展;行业协会则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促进企业与乡村之间的合作交流,共同推动数字乡村建设。农民和乡村干部作为数字乡村建设的主体力量,不断提升数字素养至关重要。要积极鼓励乡民参与乡村数字治理的实践,让乡民做治理的主人,在数字治理实践中广纳民意、广思民需、广建民心。通过基础培训、提升培训、拔高培训等方式对基层干部队伍进行数字化培训,定期更新最新的经验和课程,紧跟发展步伐,使乡村干部时时有收获。

四、结束语

随着新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传统乡村迎来了历史发展的契机。当前,我国已经构建了数字乡村建设的顶层设计架构和基本政策支撑体系,地方探索实践也陆续展开。河南省也在国家政策战略的引领下立足省情农情,坚持改革创新,数字乡村建设取得很多成绩,但仍需清醒认识面临的诸多挑战:数字乡村建设整体还处于探索阶段,乡村数字治理体系尚未完全建立。未来,需要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数字化生产力,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坚持求真务实,坚持聚焦发力、提质增效、规范引领、多元共建,不断探索河南省数字乡村建设的有效路径。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 (2017-10-27)[2024-11-29]. https://www.gov.cn/zhuanti/2017-10/27/content_5234876.htm.
- [2] 河南省数字经济发展报告[N]. 河南日报,2023-11-20.
- [3] 河南4.5万个行政村全部通5G[N]. 河南日报,2024-06-20.
- [4] 叶广林,刘涛. 新时代乡村振兴的路径构建研究[M]. 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22:204
- [5] 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 关于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施意见[EB/OL]. (2024-04-29)[2024-11-29]. <https://www.henan.gov.cn/2024/04-29/2984968.html>.

(责任编辑 刘成贺)

The Practical Constraints and Breakthrough Path for Digital Rural Construction in Henan Province

LI Jing

(Chinese Culture Teaching and Research Department, Zhengzhou Municipal Party School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Zhengzhou, Henan 450042, China)

Abstract: Digital rural construction is the essenc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China, an effective way to achieve comprehensive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an important lever to promote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Henan. The current goals, development logic, and overall strategy of digital rural construction in Henan are in line with the overall strategy, but there are still problems such as lagging infrastructure, low digital capabilities of construction entities, weak governance links, and hindere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t is urgent for us to make efforts in improving infrastructure, developing rural digital industries, attracting talents, and building a digital governance system to solve the mismatch between key content and specific practices.

Key words: digital countryside; the connotation of the times; practical constraints; breakthrough path

乡村振兴视角下我国农村绿色物流 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

高博, 谢震宇, 张亚茹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商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44)

摘要:乡村振兴旨在全面提升农村的经济、社会、生态和文化发展水平,绿色物流作为发展绿色经济的关键一环,对促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农村绿色物流发展目前处于较低水平,增长空间巨大。利用AHP层次分析法发现我国农村绿色物流发展存在专业技术人才缺失、绿色发展意识不足、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衡、绿色物流基础设施薄弱、农村绿色物流法律体系和绿色物流体系不够完善等问题。我国农村绿色物流高质量发展需要加大绿色物流的投资力度、提高绿色物流意识、进一步关注农村经济发展、完善农村绿色物流体系和法律体系等。

关键词:乡村振兴;农村;绿色物流;高质量发展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5.01.007

中图分类号:F259.22;F32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5)01-0037-05

一、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已进入新发展阶段,推进‘双碳’工作是破解资源环境约束突出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要,是顺应技术进步趋势、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迫切需要,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求、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迫切需要。”^[1]农村绿色物流的高质量发展能够延缓农村空心化趋势、提高农产品质量,进一步提升农业安全性和发展可持续性。近年来,我国农村物流业快速发展能够帮助解决农村地区就业、农民增收及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问题。但物流产业快速发展,同时也给当地的环境带来了一些问题^[2]。党的二十大以来,农村生态环境建设与发展仍然是当下的重要任务。高效的交通物流体系是连接农村与外部市场的桥梁,它为农村提供了将独特优势转化为经济价值的窗口^[3]。

乡村振兴旨在全面提升农村的经济、社会、生态和文化发展水平,绿色物流作为发展绿色经济的关

键一环,对促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农村绿色物流不仅是实现农产品有效流通、提升农业竞争力的手段,更是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和电子商务的发展,农村经济水平逐步提高,农民消费观念渐渐改变,对物流的需求量与日俱增,因此,发展农村物流以推动乡村振兴势在必行^[4]。

二、乡村振兴与农村绿色物流高质量发展

(一)乡村振兴对农村绿色物流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

农业不仅关乎国计民生,而且也是带动乡村振兴的一个重要力量。目前农村面临着人口流失、经济产出值较低、农民增收困难、经济作物价值潜力有待开发、土壤保护、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农村生态环境改善等问题。农村目前收入来源主要是农作物收益或者是当地旅游业发展等。农产品高效流通,需要高效率的物流系统。但由于目前的农村基础设施以及物流网点建设仍处于一个不完善的阶段,农

收稿日期:2024-12-27

基金项目:2024年度郑州工程技术学院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新时代地方本科院校商科应用型人才高质量培养研究与实践”(ZGJG202427B);2023年度河南省本科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基于模糊物元法的城市物流能力综合研究——以国家中心城市郑州为例”(202311068020)

作者简介:高博(1982—),男,河南信阳人,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开放经济、绿色物流。

村物流业的发展会受到制约。发展农村物流并助推农产品走出农村实现农作物价值,是目前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同时,农村绿色物流也是我国绿色物流发展的一个缩影,农村绿色物流业的发展所需成本相较于其他产业较低,可在农村发展完善后运用于其他产业。

(二)农村绿色物流对乡村振兴的促进作用

完善我国农村绿色物流体系可以推动农产品贸易和农村市场发展,有效带动当地的经济,助力乡村振兴,在发展现代农业、繁荣农村经济和促进农民增收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农村建立完备的绿色物流体系能够减少农产品损耗以及冗余成本损耗,实现充分利用资源并减少浪费。通过绿色物流将农产品流向市场,发挥农产品的价值,提高农民收入,带动乡村发展,提高乡村知名度,进而能够借助当地生态环境发展旅游业,增加额外收入、吸引人口回流并进一步助力乡村发展。绿色物流的环保理念也能够给农民科普现代绿色环保知识,提高农民的绿色意识水平,强化对环境的保护意识,切实保护好土壤生态与环境生态,建立起兼绿色环保与经济繁荣为一体的富饶农村。

(三)乡村振兴与农村绿色物流的经济关系

乡村振兴与农村绿色物流的经济关系相辅相成。物流讲究时效性,保证效率会导致增加额外损耗,相应地也会增加额外成本。农村绿色物流能够减少损耗降低成本,同时是以减轻对环境的破坏为出发点,对传统物流方式进行优化与改进。乡村振兴则需要通过物流引进经济资源,农村绿色物流能够为乡村振兴减少成本投入。二者的结合也是循环经济的体现:循环经济的实质就是生态经济,出发点是尽量减少经济发展中造成的资源消耗,加强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促进经济建设和环境保护之间实现协调统一^[5]。对于农村绿色物流的发展来讲,主要是基于可持续发展思想理论、环保理论,旨在促进物流功能要素实现节能、低碳、减排有效的信息管理集成与技术集成^[6]。乡村振兴推动农村绿色物流进一步实现低成本,农村绿色物流推动乡村振兴经济收入最大化。

三、我国农村绿色物流发展程度分析

农村绿色物流发展程度评价指标的选取严格按照指标构建的系统性原则、可行性原则、科学性原则,指标体系的构建也遵照实际适合我国农村绿色物流的发展现状。本文采用层次分析法(AHP)确定评价指标体系中各级指标的权重,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目前我国农村绿色物流现状进行评价与分析。

(一)农村绿色物流发展程度评价指标体系设计

根据发展绿色物流的一些必要条件且借鉴相关专家学者的指标选取成果,选择从农村绿色物流发展基础、发展潜力、发展质量3个维度作为一级指标,进而对一级指标进行细致划分为12个指标,如表1所示。

表1 农村绿色物流发展程度评价指标体系及权重表

目标层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值
农村绿色物流发展程度	发展基础 $A_1(0.60)$	乡村人数(万人) A_{11}	0.30
		粮食货物周转量(百万吨公里) A_{12}	0.10
		耕地面积(千公顷) A_{13}	0.30
		农村道路里程(万公里) A_{14}	0.30
	发展潜力 $A_2(0.20)$	农村宽带接入用户(万户) A_{21}	0.09
		农村建设投资额(万元) A_{22}	0.41
		邮递线路(公里) A_{23}	0.36
		绿色食品销售额(亿元) A_{24}	0.14
	发展质量 $A_3(0.20)$	农村恩格尔系数(%) A_{31}	0.30
		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 A_{32}	0.10
		农产品合格率(%) A_{33}	0.25
		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 A_{34}	0.35

(二)利用层次分析法(AHP)确定各项指标权重

层次分析法(AHP)步骤如下:

(1)建立评估指标集合:评估指标集合分为3个层次,具体结构为目标层 $U(A)$ 、要素层 $C(A_n)$ 、指标层 A_{ni} ;

(2)建立判断矩阵集合:根据 $U = [u_{ij}]_{m \times n}$ 构造判断矩阵, u_{ij} 表示对于 u 来说, A_i 相对于 A_j 的重要程度,并用数值进行体现。

(3)一致性检验: $CR = CI/RI$ (CR :一致性比率; CI :一致性指标; RI :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其中 $CI = (\text{最大特征根} - n) / (n - 1)$ (n 为评价指标的个数,最大特征根即为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值),若 $CI < 0.1$,则表示一致性检验通过。

根据上述农村绿色物流发展程度指标体系,并结合各级指标之间的相对重要程度(1—9级),计算得出一级指标以及二级指标的各项权重占比,同时得出判断矩阵并进行一致性检验(见表2)。

通过计算可得,所有 CR 值均小于0.1,则可知权重分配均为合理。

(三)基于AHP的模糊综合评价

为了使评价更加准确并降低偶然性与误差,结合《中国统计年鉴》、农业农村大数据等资源,搜集了近五年来的相关数据指标,并且结合相关问卷调查计算出了各个指标的权重。

对于已经建立的指标体系模型,通过模糊综合评价法确定评价集,评价集的选取通过数据统计进

行隶属度计算,从而建立单因素评价矩阵,进而计算指标层评价指标的模糊得分,然后运用去模糊化计算出一级指标及二级指标的具体得分。

表2 农村绿色物流发展程度判断矩阵计算以及一致性判断

一级指标	A_1	A_2	A_3	ω	$\lambda_{\max} = 3.00$
A_1	1	3	3	0.60	$CI = 0.00$
A_2	1/3	1	1	0.20	$RI = 0.52$
A_3	1/3	1	1	0.20	$CR = 0.00 < 0.1$

二级指标	A_{11}	A_{12}	A_{13}	A_{14}	ω	$\lambda_{\max} = 4.000$
A_{11}	1	3	1	1	0.30	$CI = 0.000$
A_{12}	1/3	1	1/3	1/3	0.10	$RI = 0.890$
A_{13}	1	3	1	1	0.30	$CR = 0.000 < 0.1$
A_{14}	1	3	1	1	0.30	

二级指标	A_{21}	A_{22}	A_{23}	A_{24}	ω	$\lambda_{\max} = 4.260$
A_{21}	1	1/3	1/3	1/3	0.09	$CI = 0.087$
A_{22}	3	1	1	5	0.41	$RI = 0.890$
A_{23}	3	1	1	3	0.36	$CR = 0.098 < 0.1$
A_{24}	3	1/5	1/3	1	0.14	

二级指标	A_{31}	A_{32}	A_{33}	A_{34}	ω	$\lambda_{\max} = 4.060$
A_{31}	1	3	1	1	0.30	$CI = 0.020$
A_{32}	1/3	1	1/3	1/3	0.10	$RI = 0.890$
A_{33}	1	3	1	1/2	0.25	$CR = 0.023 < 0.1$
A_{34}	1	3	2	1	0.35	

$$X = (0.2705 \ 0.2714 \ 0.2163 \ 0.2418) \times \begin{bmatrix} 100 \\ 75 \\ 50 \\ 25 \end{bmatrix} = 64.27 \quad (1)$$

$$X_{A1} = (0.2045 \ 0.2968 \ 0.2506 \ 0.2481) \times \begin{bmatrix} 100 \\ 75 \\ 50 \\ 25 \end{bmatrix} = 61.44 \quad (2)$$

$$X_{A2} = (0.1367 \ 0.3496 \ 0.3024 \ 0.2113) \times \begin{bmatrix} 100 \\ 75 \\ 50 \\ 25 \end{bmatrix} = 60.29 \quad (3)$$

$$X_{A3} = (0.1493 \ 0.2547 \ 0.1602 \ 0.4358) \times \begin{bmatrix} 100 \\ 75 \\ 50 \\ 25 \end{bmatrix} = 52.94 \quad (4)$$

经计算,农村绿色物流发展程度为64.27分,位于50—75分区间内,表明当前农村绿色物流发展程度一般,还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需要提高农村地区的物流基础设施水平,推广绿色物流理念,同时加强政策支持和宣传推广等。具体结论如下:

一是农村绿色物流发展基础得分为61.44分,该得分属于合格水平,但仍需发展。目前可以满足

一些基本的农业与物流业发展需求,但在一些基础设施建设、道路建设、土地开垦等方面仍然需要重视并持续发展。

二是农村绿色物流发展潜力得分为60.29分,处于合格水平,但无法为农村绿色物流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可以通过加大投资力度、建设更多物流线路、推广绿色农作物销售、促进城乡经济融合等方式为农村注入经济动力,从而为农村绿色物流发展提供经济基础。

三是农村绿色物流发展质量得分为52.94分,这说明农村绿色物流发展质量处于较差水平,存在无法为农村带来较高收益、农民可支配收入较低、农产品合格率不符合期望、人才资源不足导致科技贡献率较低等问题,同时各项发展亟待提高,以让绿色物流促进农业产业、物流业发展。

四、我国农村绿色物流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

通过上述数据分析,我国农村绿色物流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不仅表现在发展质量层次上,还表现在发展基础及发展潜力层次上。本文通过构建的指标体系挖掘出深层问题,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农村绿色物流发展潜力中突出的短板表现为农产品合格率和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这两种指标大多是由绿色物流基础设施建设薄弱和专业技术人才短缺引起的。农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率表现不理想归根结底是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不足,进而导致农村绿色物流发展受到制约。从其他层次的突出指标分析得出农村宽带接入用户少,从侧面体现出农民对绿色发展认可度不高且不能快速掌握创新技术,而耕地面积和农村建设投资额与法律体系建设相关。

(一) 专业技术人才缺失

事实上,我国农村绿色物流行业的发展时间较晚,存在严重的人才短缺问题。一方面,虽然我国贯彻落实人才强国战略,但绿色物流的观念还未深入人心,致使政策发布之后,也是停留在理论层面,导致物流技术和物流模式的绿色化发展与专业人才的队伍发展严重受限。另一方面,我国人才培养的内生动力不足。拥有物流相关专业的高校数量不多,开设的专业课程内容还保持在原有的理论知识层面,与现代化社会存在脱节的现象。同时,相关高校没有将绿色物流理念植入课堂教学活动中。很多高校采用先理念灌输,再到实习单位进行实践操作的方式。企业方面,对于绿色物流发展人才的培训力度不够。大多企业仍然停留在传统的物流观念上且更关注物流效率和成本控制,而忽视绿色物流人才培养。企业缺乏与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合作,不能充

充分利用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丰富资源,不能共同开展绿色物流人才培训和研发,从而限制了绿色物流人才的产出。在人才本就匮乏的情况下,农村人才外流严重,专业人才更偏向在城市就业,加大了农村绿色物流发展的难度。农村物流从业人员并非专业人士,未经过专业培训直接上岗,从业人员知识水平和素质参差不齐,对于高新技术产品和信息化技术无法迅速应对。

(二) 绿色发展意识不足

绿色发展作为一种创新型的发展范式,根植于对传统发展模式的深刻反思与革新之中,旨在促进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高效性、和谐性及持续性,已成为当今时代不可逆转的重要发展趋势。然而,在众多乡村地域,由于文化教育水平的相对滞后,民众对于绿色发展的核心理念及其深远意义认知不足,往往容易忽视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部分政府决策者存在绿色物流意识相对薄弱的问题,在促进绿色物流发展需要的有序市场环境方面不能提供强有力的帮助,使得物流行业向绿色化发展变得更加困难^[7]。对于物流企业自身来说,各级领导在绿色物流的认知程度上不同,不能充分理解绿色发展,导致企业的发展规划、内生制度建设和内部机构布局等方面不适合绿色化发展道路。

(三) 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衡

目前,部分乡村振兴示范区农业发展水平偏低,且存在不平衡现象。农村地区的市场建设相对滞后,交易机制不健全,农产品流通渠道不畅通,农产品价格波动大,农民收益不稳定。与此同时,道路交通、水利设施、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滞后,道路不畅会加大农产品在运输过程中产生的货差和货损频数,导致农产品运输成本较高等,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四) 绿色物流基础设施薄弱

我国农村基础设施不够完善主要表现在交通网络不健全、设施现代化水平较低、信息化技术应用不足。相较于城市,农村道路状况不佳,导致物流运输过程中,时效较低。在传统物流的基础上,农村绿色物流的发展受到传统物流设施的约束。首先,旧有的物流基础设施普遍落后,高污染、高能耗问题不能满足“双碳”背景下的绿色物流发展需要。其次,物流基础设施之间的衔接性较差,存在设施不配套、无法兼容的问题。除此之外,物流设施站点的数量不足、分布不均。在农村,信息化技术的应用是一大短板,农村地区的物流信息系统相对滞后,缺乏统一的信息平台和标准化的数据处理方式,妨碍了物流信息的有效传播和共享以及智能化和精细化管理。

(五) 农村绿色物流法律体系和绿色物流体系不够完善

我国农村绿色物流发展时间短,且缺乏绿色物流的专项立法,导致绿色物流的发展不能得到系统性的规划和指导。除此之外,现行的法律法规体系中,绿色物流业的各个环节存在复杂的法律主体关系,相关规定过于分散,层次和效力较低,导致绿色物流企业及相关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划分不明确,各主体之间的利益容易产生冲突。再者,法律监管机构职权划分不明晰,监管机构职能重叠,与物流相关的多个部门共同监督容易造成抢夺职权和相互推诿,形成另一种降低行政监管运行效率的“非绿色行政”,无法发挥法律法规对绿色物流的建设作用。法律法规是绿色物流赖以发展的外部环境,对绿色物流的实施起到约束和推动作用。而绿色物流体系即为内部条件。内部运作正常有序高效,外部资源才能得到充分利用。当前,我国农村绿色物流缺乏统一的绿色包装标准和规范,产品的运输和储存过程中使用的包装材料多样且不规范,很难对包装进行有效的分类和回收。

五、乡村振兴下我国农村绿色物流高质量发展路径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全面推进乡村振兴。”^[8]农村绿色物流并非限制点,而是促进农村资金流动的工具,也是使得农村生活便捷化和多元化同时还保护生态的方式之一。

(一) 加大绿色物流的投资力度,提高内生驱动力

农村绿色物流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政府、行业协会、企业、学校、消费者的努力。政府方面不仅要约束和指导农村绿色物流,也要制定激励机制,激发消费者对农村绿色物流的热情,增加引进农村的专业人才数量。学校和教育机构要加大绿色物流教学投资力度,注重农村绿色物流的相关教学内容,拓宽教学范围和教学方式,并将教学资源进行及时更新,鼓励学生和员工接触绿色物流。行业协会一方面要提高研讨会、论坛等活动的质量,促进绿色物流理念和重要性普及整个行业;另一方面还要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促进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之间的合作交流,共同开展绿色物流人才培养,研发高新科研项目,推动绿色物流技术的创新和应用。

(二) 提高绿色物流意识,促进绿色化发展

除了资金、物质投入之外,还需要从精神层面推动绿色发展,加强环保宣传教育,提高公众对农村绿色物流的认识程度。政府及行业协会要广泛宣传绿

色理念,积极引导企业及消费者,创造浓厚的社会氛围。企业也应该提高绿色物流意识,弘扬企业内部绿色文化,从领导层到基层培育环保意识和绿色理念,加强相关培训,提高员工绿色理念以及专业素养。

(三)加大乡村振兴的支持力度,关注农村经济发展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刺激了农产品需求的增长,从而增加了大众对物流服务的需求。因此,农村经济的发展是绿色物流的前提。首先,强化帮扶产业分类指导。通过巩固、升级、盘活、调整产业,推动产业提质增效、可持续发展。保持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用于产业发展的比例总体稳定,强化资金项目绩效管理。其次,加快农产品销售市场基础设施建设和物流基础设施建设。为了进一步提升农产品销售市场效率和物流效率,各地区政府应尽快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改造农村地区交通网络,加强现代物流设施建设,让农产品更加便捷地从产地输送到销地最后到客户手中。

(四)完善农村绿色物流体系 and 法律体系

目前我国没有专门制定绿色物流的法律法规。完善法律体系,要先构建法律法规框架。可以通过将各项法律进行规整分类来建立明确的框架,再对复杂的主体对象明确精细化的权利和义务。同时,完善绿色物流执法和监管机构,加强对绿色物流企业的日常监管和执法检查,以确保绿色物流措施得以有效执行。构建绿色物流体系是一个复杂烦琐的

过程,需要从多方面协同工作,而技术是推动绿色物流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为此,在绿色物流体系构建中,应优先考虑采用节能环保的物流设备和技术,如智能化的运输工具和设备、高效节能的仓储设施、清洁能源的应用等,以降低能源消耗和减少环境污染。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发展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J]. 求是, 2022(10): 4-9.
- [2] 李宗蔚. 乡村振兴战略下的农村绿色物流发展路径研究[J]. 农业技术与装备, 2023(8): 97-99.
- [3] 吴应蔚. 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物流经济发展的阻碍及对策[J]. 全国流通经济, 2024(6): 165-168.
- [4] 崔艺衡, 夏子欣, 徐艺嘉, 等. “双碳”背景下农村电商平台绿色物流提升路径研究: 基于 PDCA 循环模型分析[J]. 物流工程与管理, 2023, 45(4): 36-38.
- [5] 白兰琼. 乡村振兴背景下桂西地区农产品冷链物流发展研究[J]. 商场现代化, 2020(13): 47-49.
- [6] 梁议化, 程允俊, 程海芳. 基于循环经济背景下乡村绿色物流发展对策研究[J]. 物流科技, 2022, 45(18): 74-76.
- [7] 王守丽, 罗敏. 物流行业绿色化转型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J]. 物流科技, 2023, 46(15): 70-71.
- [8] 朱隽, 贺林平, 常钦, 等.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必须全面推进乡村振兴[N]. 人民日报, 2023-04-16.

(责任编辑 刘成贺)

Research on the High - Quality Development Path of Rural Green Logistics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GAO Bo, XIE Zhenyu, ZHANG Yaru

(School of Business,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Rural revitalization aims to comprehensively enhance the economic, social, ecological,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levels of rural areas, and green logistics, as a crucial component of green economy development, holds great significance in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Currently,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green logistics in China remains underdeveloped, with substantial potential for growth. Through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analysis reveal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green logistics in China faces issues such as the lack of professional and technical talent, insufficient awareness of green development, uneven levels of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weak infrastructure for green logistics, and imperfect legal systems and frameworks for rural green logistics. To achieve high - 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green logistics in China, it is imperative to increase investments in green logistics, raise awareness of green logistics, pay further attention to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mprove the rural green logistics system and legal framework.

Key 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countryside; green logistics; high - quality development path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多维探赜

钱燕娜

(国防大学政治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系,上海 201602)

摘要:文化自信是“四个自信”的重要基础,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将文化自信和道路自信、理论自信以及制度自信作为有机整体提出来,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对文化在发展全局中重要战略地位的总体把握与深刻认识。文化自信并非凭空产生,而是有其基本依据。从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历史、文化基因和精神特质,从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建设,从道路、理论、制度自信等方面展开论述,明确文化自信的战略地位。只有准确把握文化自信“何以可能”,才能真正把握这一重要论述的精髓要义,实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丰富和发展。

关键词: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战略地位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5.01.008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5)01-0042-09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必须增强文化自信,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快适应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新形势,培育形成规模宏大的优秀文化人才队伍,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自信源自党、人民和中华民族对这种文化的深刻认同。通过对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文化自信的历史梳理,不难发现,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经历了一个由秦汉以来对贯穿整个封建社会的传统文化自信到近代传统文化失范的文化自卑,经由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取得巨大历史成就的历史比较基础上的文化自信到改革开放初期中西交往比较中一定程度存在的不自信,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伟大成就并在此基础上重建文化自信的波浪式前进的发展历程。

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历史根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坚定文化自信,坚持走自己的路,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2]中华文化传统及其丰富的文化资源,不仅是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生成的重要因素,而且在革命、建设、改革的进程中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孕育出崭新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当代中国文化自信的历史根基。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

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悠久而又伟大的民族,这个伟大的民族在历经艰难曲折、不断涅槃重生的历程中逐渐凝练出具有自身独特精神标识的文化传统,并汇集成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宝库。当代中国文化自信的培育和提升,必须植

收稿日期:2024-12-20

基金项目:2022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专项课题“高校思政课教学中‘意识形态漂浮’现象及对策”(22VSSZ156)

作者简介:钱燕娜(1982—),女,江苏南京人,国防大学政治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系哲学与军事思维教研室副教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上。从人类文明起源的角度看,世界上四大文明发源地依次为古巴比伦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经过数千年的发展,这四大文明中,只有中华文明绵延不绝持续发展至今。中华文明诞生于公元前 2000 多年的黄河、长江和西辽河流域,至今号称有 5000 余年的文明史,其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中华文明的发展虽历经天灾人祸,但却一脉相承,绵延不绝,是四大文明中唯一没有断流的文明,它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不断发展更新,所产生的文明成果对整个世界作出了独特的、卓越的贡献。中华文明悠久的历史无疑是中国人文化自信的历史根源。在数千年的历史中,中华民族的生存环境不知发生了多少次翻天覆地的变化,经历了多少次灾难和战乱,但中华文明却顽强地存在下来,并不断发展。这使中华民族的历代子孙倍加相信民族文化强大的生命力、凝聚力、同化力和绵延力,确信它具有应对任何困境的强大能力,确信它不会被任何外来的力量所摧毁。

中华文明的发展之所以没有出现断层,原因很多,有自然地理原因,也有各种社会历史原因,但最为重要的是,中华文明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稳定的文化传承机制。首先,从文字上看,文字是人类用表意符号记录、表达、传播信息的最基本的方式,凝聚了一个民族的文化风格,同时也是文化传承的最基本的载体,是标志民族文化独特性的符号。古巴比伦文明、古埃及文明和古印度文明中都形成了自己的文字,但时至今日这些文字都已消失,仅仅成为考古的对象。唯有中华文明的文字,即汉字,虽在历史上经历了多次演变,有多种写法,形成了许多字体,但其基本的构成要素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汉语的语法结构或句法结构虽然也经历了古今之变,但也始终保留着最基本的结构形态,因此我们至今读得懂 2000 多年前留下来的诗文辞章。其次,从传统文化的思想内容上看,中华文明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创生奠基、传承发展和改造变革三个大的基本阶段。在创生奠基阶段,《易经》被公认为中国文化最古老的经典,它包含了古代先人对自然、社会和人事的认知,蕴含着对宇宙法则的朴素理解和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对后世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被誉为“诸经之首,大道之源”。时至今日,中国人常用的汉语成语很多都是直接源自《易经》。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繁荣时期,产生了诸如道家、儒家、墨家、法家、名家、兵家、阴阳家、纵横家等为代表的诸子百家学说,形成了互不相同又密切相关的各种学术思潮和派别,在哲学、

伦理学、文学、政治学、法学、军事学等各个思想文化领域创立了诸如“四书五经”这样相对完整的思想体系和理论学说,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化的思维方式和话语方式,构成了中国文化的思想主体。在传承发展阶段,先秦文化发展的成果以不同的方式在秦以后各代学者那里得到了发挥和发展。特别是在西汉时期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策略后,儒家思想便在中国整个封建文化的发展时期占据主导地位,得到了历代王朝的推崇和维护,并且作为伦理纲常深入到社会成员的日常生活和日常行为中。在这个时期,学者们做学问的基本方式之一就是注经解经,亦即对来自先秦的古代儒家经典进行“注疏”,因而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史上就有“六经注我”和“我注六经”之说。然而无论是“注”还是“疏”,无论是“六经注我”还是“我注六经”,都离不开中国经学的原本。这虽然表现出中国传统学术的保守性,但也自觉不自觉地维系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脉。因而,先秦以后中华民族 2000 多年的历史发展过程经历了无数次战乱和外族的入侵,但中华文化的传统没有因此被断送,相反最终都在文化上征服了外族,显示出中华文化强大的生命力。

(二) 中华传统文化具有优秀的文化基因和精神特质

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拥有独有的文化基因,这些基因深埋于它们的文化遗产之中,进而铸就了独特的人文精神和与众不同的文化传统,使其与其他国家或民族区别开来。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人群之间的交流与碰撞使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也使得各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得以传承并不断发扬光大。中华民族的传统包含了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中,儒家教义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然而,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简化为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不够准确的。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是多种思想和学派相互交织、融合而成的复杂整体。每个学派和观点都具有其独特性,从不同角度贡献于这一文化的丰富多样性。不同的思想流派持有各自独特的看法,并展现出各自的特色。因此,就形成了一种多元并存的局面。从另一个角度看,不同的思想观点互相补足和融合,共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精神领域。它包括儒、道、佛三家思想。在这一文化体系里,既包含了优秀的元素,也有不尽如人意的部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经过几代人的传递,其核心价值观已融入民族的根本,形成了民族的基本精神支撑。

深植于中华民族血脉的精神基因,既隐藏在民族文化核心之中,也显现在新时代的活力与光辉里。尽管历经千年挑战,中华文化始终保持着生机与繁荣,传承不息而不是逐渐消失或断裂。这主要归功于中华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中华民族最核心的精神元素,这些元素能够维持其旺盛的生命力。在山东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了培养一种积极向上和追求善良的动力的重要性,以此来促进中华卓越传统文化的推广。他还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培育、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系列关键观点。他指出,中国人民的价值观念和精神世界深植于中国卓越的传统之中,并随着历史和时代的发展不断演进和更新。

其一,“自强不息”的向上精神基因。这种精神基因展现出了一种“永不屈服”的积极态度。这种精神特质深刻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深层精神追求,不仅是民族持续生存与发展的动力来源,同时也构成了与其他民族鲜明区别的特有精神象征。“民以食为天”“天下为公”体现了一种责任和担当的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生动地描绘了这种精神基因的早期阶段。这既是一种理想人格形象的表达,又是对一个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的深刻警示。它不仅是为当前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宝贵的思考资源,同时也在构筑和谐社会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一个伟大民族的文化精华,“天下”与“仁”有着内在统一的联系。这种“刚健、自强不息”的精神特质,在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得到了传承和弘扬,激发了一代代中华儿女持续努力、奋斗不止和勇往直前的精神,成为中华民族充满活力和进取心的精神支柱。从这个意义上讲,“自强不息”是一种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对于国家的兴衰,每个人都承担着责任。这种责任感,加上先为天下忧的觉悟,共同助力了民族凝聚力的建立。这不仅是中华民族持久发展的动力,也是其保持活力的关键。“居安思危、防微杜渐”的警世箴言和“知耻而后勇”的英雄主义则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进取心和革故鼎新的精神,正是中华民族不断进步和发展的明确体现。将“天道酬勤”这一理念应用于实践,就变成了积极进取的明确途径。

其二,“厚德载物”代表了一种向善的精神特质。在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过程中,这种品质显著地体现在以民众日常生活和内在心灵为核心的道德伦理文化中。“天人相应”的思想则进一步揭示出道德与天地自然之间存在密切关联,并在人类社会

实践中不断得到升华。“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不仅为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供了思想资源,而且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厚德载物”的理念是从人的生活 and 心灵出发,强调通过个人的修炼,使人的德行变得厚重、崇高,能够承载万物。道德人格与社会环境共同构成一个人良好品德形成发展的基础,而在这个过程中又有个人因素和家庭环境因素对其产生的重要影响。历史长河中的经典故事,展现了中华民族始终遵循的高尚道德准则与精神基因,即“厚德载物”。传统道德如诚信、仁爱、包容及和谐,不仅是行为规范的核心,也清晰反映了中华民族追求善良的精神特质。

其三,爱国主义的精神基因。中国文化遗产中深植的爱国主义传统,不仅是各民族团结精神的基础,也是爱国情感传递的重要纽带。爱国主义在中国文化中始终占据核心且永恒的位置。从古代的“天下为公”理念到“至死不渝”的奉献精神,从“忠诚报国”的壮举到“个人有责于国家兴衰”的观念,这些都展现了中华民族爱国主义与民族精神的灿烂光辉。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深刻而永恒,已经超越了时间与空间的界限,牢牢扎根于人们内心深处。这种精神不但巩固了民族的凝聚力和共识,而且也持续激励着中华儿女一代又一代为了国家和民族的繁荣昌盛而持续奋斗。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各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作为一种既定的历史条件,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中国共产党人在实现民族复兴伟业的进程中,善于以科学态度对待优秀传统文化,使之成为中华新文化的重要源泉。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人继往开来,不断深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和创新发展给予了高度重视,并在此基础上做出了众多独创性贡献。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作为中华民族超过五千年文明历史的结晶,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本质上讲,它属于一种先进文化。在我国的文化进步之路上,必须坚定地维护中华文化的立场,这不仅是文化的基石,更是精神的归宿。在这一基础之上,还需持续致力于创新性的转化和发展,以不断推动中华文化走向新的辉煌阶段。中华文化立场和双创原则,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深化和升华,是当代中国在文化领域引领优秀传统文化的行动指南。它既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尊重,又展现了对文化创新发展的坚定决心。在新时代背景下,要坚定文化自信,主动将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相结合,为我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添砖加瓦,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现实基础

在唯物史观的视野中,人类的意识起源于社会生活,它是人们在实践活动中对客观现实世界逐步形成的主观映射。马克思和恩格斯均指出,那些从事物质生产与交换的人,在改造自己生存方式的过程中,也在重新塑造他们的思维和观念模式。这种改变是以人的思想为中介进行的。不是意识塑造了生活,而是生活塑造了意识。^[3]作为属于社会意识层面的文化自信当然也根源于社会存在,有其生成的现实基础。中外的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人们的文化自信与否总是与国家的命运、民族的盛衰密切相关。秦汉至宋明时期中华民族对自身文化的高度自信,是建立在强大的综合国力基础上的。同样,近代以来西方“资产阶级的民族”的文化自信以及先进的中国人民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的进程,也是建立在西方国家发达的综合实力基础上的。自新中国成立之日起,在中国共产党的引领之下,中国人民确立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先进的社会体制,并在经济、政治、社会和生态等多个方面都获得了显著的进步,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强,为在新时代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自信,建立了坚固的现实基础。

(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重大成就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们的意识取决于人们的存在而不是相反”^[4]。社会意识的发展往往伴随着社会存在的演变,经历着持续的变化。然而,无论这些观念如何进化,它们始终深植于经济现实的深层基础之中。新时代中国人民文化自信力的不断提升也有其时代的经济根据,也是深深地埋藏于新时代的经济事实之中的。社会主义生产实践为构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供现实基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创新发展是在改革创新的社会主义实践中找到源泉活水的。恩格斯指出经济发展与先进文化的辩证关系,“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之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5]。社会主义经济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当代中国处于和以往任何时代皆不相同的历史发展机遇期

和挑战期,中国从农业文明古国到近代的积贫积弱,再至如今的崛起的大国、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从旧的社会制度迈入社会主义的人民民主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面发展,与此同时,全世界都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和大调整的巨变时代,中国处于机遇与挑战并重的新时代,民族文化的“软实力”成为国家综合实力竞争的关键,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中之重。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党的十八大这三十多年,是社会主义中国启动改革开放和创造经济奇迹的历史时期。自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了显著成就,这些成果不仅体现在经济总量的增长上,更在于经济结构的优化、创新驱动的加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等多个方面。一是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经济总量稳步提升,国内生产总值(GDP)从2012年的54万亿元增长到2023年的超过126万亿元,年均增长率保持在较高水平,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和稳定器。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服务业增加值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撑起“半壁江山”。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显著提高。新型城镇化扎实推进,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持续提高。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实施。三是科技创新取得重大突破,如“嫦娥”奔月、“北斗”组网、“奋斗者”号逐梦深蓝等,R&D经费投入强度超过欧盟国家平均水平,国内有效发明专利数量突破400万件,高新技术产业不断发展壮大,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增长显著。四是全面深化改革向纵深推进。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稳步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更加完善,全国统一大市场加快形成,各类经营主体活力不断激发,全方位高水平开放型经济加快形成,货物贸易规模连创新高。五是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中国GDP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显著提高,稳居世界第二位,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居世界第一位。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守新的发展观念,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全球瞩目的突破。在新的历史发展方位下,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持续改善,为当代中国文化自信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大进步

马克思主义认为,特定时代人们的思想文化不仅受该时代经济基础的规定和制约,而且也与该时代的政治结构紧密相连。中国人民的文化自信,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息息相关,更与作为这种经济集中体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密不可分。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征程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持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日益完善,走出了一条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在新的历史发展方位,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致力于提升并进一步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同时着手于推动国家治理架构及其管理效能的现代化,这被视为全面加深改革的根本目标。与此同时,民主政治的构建也获得了显著的进展。表现有三:一是始终坚守党的全方位领导,同时党的领导结构和机制也在不断地得到完善,党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深化党风廉政建设,此外,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始终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一项重大战略任务,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二是通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持续完善和发展,已经形成了一个政治格局,其中社会主义民主持续发展,党内民主更为广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得到全面推进,爱国统一战线得到巩固和发展,而民族宗教工作也在不断创新和推进。同时还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民主集中制,加强对各级党组织权力运行监督约束力度。三是通过推进法治中国的建设,科学的立法方法、严格的法律执行、公正的司法程序和全民遵守法律的原则,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6]逐渐健全,全社会对法治的认识也明显加强。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尤其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背景下,党在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上所取得的突出成就,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基本政治保障。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的显著成就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等文化主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等各方面在文化心理上的价值认同和高度肯定,“文化”上的自信是其集中呈现和核心内容。中国共产党人在新中国成立以来,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在思想文化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已然成为民族复兴伟业的软实力,也是新的历史发展方位下文化自信的主要依据。

在新时代的历史脉络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再次强调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化发展道路的重要性,目的在于唤起全国人民对文化创新和创造活动的热情。并致力于塑造一个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形象,就文化问题发表了系列重要讲话,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指南。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的思想文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首先,习近平总书记在思想宣传工作、文艺工作、新闻舆论工作、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会议上,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使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得到强化。其次,通过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思想道德基础建设、理想信念教育等举措,致力于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深深植入人们的内心,大力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时确保大众参与的精神文明建设活动能够稳定推进。再次,通过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和深化文化体制改革,通过不断地提高公共文化服务质量,可以确保文学和艺术创作的持续繁荣,同时促进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最后,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加强中外文化交流等举措,努力增强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以及中华文化的影响力^[6]。在这个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的文化建设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凸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深厚自信。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战略地位

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制高点,指出文化自信在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重要作用,文化自信关乎文化选择、发展方向及路径,要做到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首先需要强调的就是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文化自信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根本性问题,不能孤立地看待文化自信,必须明确“四个自信”的联系与发展。文化自信决定道路自信的生成逻辑,正是因为拥有了文化自信,才能形成制度自信,而文化自信和理论自信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总体来看,文化自信是其他“三个自信”的基础和支撑。

(一)文化自信是道路自信的内核和源泉

文化自信和道路自信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文化自信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提供了思想指引和精神源泉。只有坚定文化自信,才能使道路自信拥有坚实的基础;只有以文化自信为前提,才能保证道路自信的持续性,这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国家整体凝聚力的提升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目前的国际局势正在变得越来越复杂,在这种

情况下保持定力、增强活力尤为重要,道路自信不是盲目自信,而是源于实践的自信,社会主义实践证明,只有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发展中国、振兴中国。

首先,道路自信也是文化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的选择,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选择的必然结果。从世界范围看,不同国家的发展道路和本国经济模式、政治模式密切关联,但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文化选择。所有的文化都来源于实践,所以文化自信从本质上看属于实践自信,从一定意义上讲,有什么样的实践,就有什么样的文化思想、文化认同与价值理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我们高度重视文化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究其本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选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有力地证明了道路选择不只是一种政治选择,从深层次看更是一种文化选择,道路自信背后有文化自信的支撑。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明确指出,“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是我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7]。中国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最终选择的发展道路与其他的国家和民族不同,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做出这种选择是由中国历史传承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决定的。马克思主义文化道路的选择指明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方向,标志着我国文化发展进入决定性阶段。“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8]马克思主义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民在屡次碰壁后的历史性选择,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确定了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发展方向。“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9]新思想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思维方式和做事方法,给苦苦探索出路的中国人民指明了前进方向,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力量,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人民做出了正确的判断和抉择,使人民有了对社会发展更高的追求,产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的选择,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选择的必然结果。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唯一正确的道路,是中国人民共同选择了这条道路,这也是由中国文化决定的。

其次,文化自信是道路自信的源头和基础。中国共产党人的道路选择面临着复杂的形势和许多困难,之所以能够在每一次关键抉择中找到正确的道路,是因为道路自信的背后有文化自信的支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人也是凭借马

克思主义的指导,成功地进行了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释放了社会主义的生产活力,使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充满了生机,调动了中国人民的生产积极性,激发了中国人民的创造力,使中国经济实力迅速提升,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极大地影响了冷战以后的国际格局。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带领中华民族实现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坚持协调发展,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守正创新,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成功完成了在现行标准下对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的脱贫任务,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与此同时,中国的发展经验也伴随着“一带一路”的推进惠及着更多的国家和民族。

具有深厚积淀的中华文化,为世界文明、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滋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文化自信,离不开对中华民族历史的认知和运用”^[10],从历史中汲取的治国理政大智慧为道路自信提供了文化支撑,比如“天下为公”“天人合一”“大同世界”的理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担当意识和爱国情怀、“仁者爱人”的智慧、“安不忘危”“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等,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历史和现实的交汇中闪耀着人文精神的光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从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所以这条道路更具有中国特色,更为中国人民所接纳和认同,从而充满了生命力和凝聚力。

最后,文化自信为道路自信提供精神动力。国家和民族的强盛离不开文化的支撑,对于正处于民族复兴关键节点上的中国,更加需要树立和强化文化自信,为道路选择提供文化精神动力,文化自信助力道路自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创立和发展中发挥着强大的吸引力和影响力,激发出中华民族的内在活力和强大的凝聚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行的过程中,改革是主题,不同思想观念竞相碰撞,必然需要一种强大而具有统摄力、整合力的文化价值观来凝聚人心,汇聚正能量,引导国人解矛盾,辩证地看待世界。具有深厚积淀的中华文化体现的高度精神追求,内在地影响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和发展,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伟大改革开放的重要起点,“两大奇迹”已经向世界展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无可辩驳的时代性和科学性,是对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的有力回击。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

来的探索过程中,中国人民创造了具有理想主义色彩、敢闯敢拼、不怕牺牲的革命文化和具有中国特色、开放包容、向上向善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一直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精神动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奋勇前进的过程中,更加需要文化自信提供持久的精神力量,需要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忘初心,坚定文化自信。

(二)文化自信和理论自信相辅相成

文化自信是推动理论发展的重要因素,在坚定文化自信的前提下,才会有理论体系的产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首先源自对马克思主义的自信,在此基础上开启了实践探索,可以说这一理论体系的性质和方向是由马克思主义决定的。理论自信源自文化自信,同时理论自信又是对文化自信进行凝练而得到的精髓,为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提供了思想基础与制度基础。

首先,文化自信是推动理论发展的前提。对马克思主义的自信,是我们走上中国道路的文化前提,基于这一文化前提,中国共产党人敢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遇到发展难题和改革中的障碍时能够不畏惧、不退缩,在面临国际社会主义低潮时能够勇敢、坚定地继续高举社会主义大旗,并在艰难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化解危机,冲破层层阻碍,迎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广阔前景。多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几代领导人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不断结合国情发展马克思主义,坚持用先进文化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发展,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在新的历史机遇下,研究内涵丰富的文化自信理论有利于更好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面对国际国内复杂的经济政治形势,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中国、放眼世界,以开放的胸怀、宽广的视野和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思想,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立足民族复兴伟大梦想的伟大理论创新,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其内涵十分丰富,不仅涵盖政治、经济、文化领域,而且在外交、党建等方面都有新的突破。这一深邃的思想理论体系将指导中国发展再创辉煌,使我们越来越接近民族复兴的梦想,同时,它将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理论支撑。

其次,文化自信为理论自信之基石,理论自信为文化自信之价值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是“四个自信”的基石,在文化自信的基石上逐渐构建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没有文化自信就没有理论自信,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与中华民族

文化复兴具有密切关系。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看,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被中国人接受,是因为二者在精神追求上相融相通。马克思主义文化精神的某些要素更加具有现代成分,从而为中华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更强大的时代性和活力,加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文化也得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丰富与滋养,显得更加具有时代张力。因此,在实现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要求,也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性质,对共产主义伟大理想信念的追求和践行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历史使命。蕴含在其中的独特价值理念、思维方式和道德资源深深地融入每个中国人的血脉和灵魂,成为中华民族在世界上得以安身立命的基础,这种丰富的文化滋养不仅是我们文化自信的重要源泉,也是中华文化走向未来实现更好发展的依据。

(三)文化自信是制度自信的思想根基

文化自信和制度自信具有紧密的联系,文化自信虽然看起来只是一个文化领域的问题,实际上却对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一个和社会的制度设计与运行必然离不开文化的制约和影响,只有先进、科学的文化价值体系才能产生先进的社会制度,也只有坚定文化自信,才能确保真正的制度自信。

首先,马克思主义是制度自信的文化支撑和理论来源。制度自信源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种优越性首先体现在其对人民群众的深刻关怀上,调动人民积极性、凝聚人民的磅礴力量、服务人民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的重要特点。马克思注重人民群众的思想理论建设,他指出:“理论一经群众掌握,也会变成物质力量。”^[11]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任务是解放全人类,消灭剥削和压迫,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利益的代表者,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忠实信仰者,自1921年成立以来就肩负起带领中国人民走向伟大复兴的使命,关注人民发展,做人民的公仆,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努力奋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在人民取得政权的基础上进行的,人民创立的国家代表的是人民的利益。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具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特征,这一制度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而确立的,它从法律上确保了人民在管理国家时能够正常行使其权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也是在中华文化的滋养下产生的。文化自信是推动中国实践的

基础和源泉,而制度是在文化指导下的实践中、根据社会主义建设需要逐步确立起来的,是具有鲜明中国文化内涵的表达模式,是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是文化自信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一制度承载着马克思主义的崇高追求,是为了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既有近期目标,也有远大追求;既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又具有顶层设计和人文关怀的特点,充分调动了广大人民参政议政的积极性,是既具有马克思主义特色又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制度。

其次,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是制度自信的内在文化基因。制度的创建和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的内在要求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优秀的传统文化能够有力地支撑国家和社会发展的运行机制,促进社会发展和进步;落后的传统文化则会制约制度的制定和运行,阻碍社会的良性发展。回顾古今中外发展的历史,文化特别是传统文化对于国家制度的创建与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影响。

站在新时代的舞台上,习近平总书记充满自豪地指出文化自信的重要性:“文化自信是根基。”^[12] 承载着悠久历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巨大的思想价值和丰富的治国理政智慧,其富有思辨性的宇宙观和历史观具有现代科学的特点,这些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中仍然具有不可替代性。例如,“民本”思想和现代意义的“以人为本”的思想只是表述不同,二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因此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价值,反映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设计中,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合”文化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种特质。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中法重要外事活动时指出,中国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13]。这表达了习近平总书记热爱和平的思想,总结出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特点:崇尚和谐、以和为贵,这种思想和行为方式在内容上源自传统文化,在时代发展中与时俱进,呈现出现代思想特质,对涵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起到了关键的文化支撑作用。《周易》中的“保合太和”,是指保持宇宙中万事万物阴阳和谐的状态,这是和谐的最高境界;《国语》中的“和实生物”,指出实现了和谐,万物即可生长;《论语·学而篇》中的“礼之用,和为贵”,虽然表述不同,但也是从行为方式和价值标准相统一的角度进行的阐释,表达了孔子的一个重要思想:对于治国、处事,应以和谐为价

值标准。这些价值理念在一定范围内广泛存在,对中华民族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世界上也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其本质已经融入中国人的思想和灵魂,在塑造民族性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成为中华民族精神中的基础基因,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文化基因。正是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之上,才有了中国的一系列制度,这些制度具有共同的文化基础,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它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我们要坚信导致这一制度产生的文化的先进性和独特性,坚定文化自信和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是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选择中确立和发展的,文化自信以制度自信为保证,并成为制度确立的强大根基,成为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支撑和不竭源泉。

(四)文化自信是更深厚的自信

文化自信是“四个自信”中更深厚的自信,其精神标识是在传承发展中确立的,不是在短期内形成的,对中华民族的民族心理起着深层次的潜移默化作用。^[1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是中国雄厚的软实力和强大的精神力量,也是当代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深刻表达。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强调优秀传统文化与文化自信的重要性,坚定文化自信既是立足时代发展与推动社会进步审时度势的需要,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和血脉传承发展与创新的战略考量。文化自信贯通过去、现在和未来,连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中华民族得以傲立于世界的丰富文化内涵与独特精神标识,是族群归属与文化认同的共同民族记忆和价值基础。文化自信从深厚的历史中走来,是穿越时空依然闪烁时代魅力的精神之钙、文化之根、民族之魂,是比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更深厚的自信。纵观中国历史,越是在战乱纷争时期,越是呼唤大一统,特别是面临国破家亡的危急时刻,这种潜意识的思维模式和行为习惯会自动激发起中华民族的共同心理基础:深厚的文化自信驱动整个中华民族不怕牺牲、敢于抗争,直至取得最终胜利。

习近平总书记对优秀传统文化有深刻的理解,并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转化和创新充满自信,“对文化发展前景充满自信”^[15]。正是基于对深厚的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为人类发展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有利于推动世界建立平等相待、和谐共进的关系,体现了我国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发展格局,向世界发出了中国声音。面对多极和多文明的世界,不同思想文化交流、交融甚至碰

撞、交锋的形势将会更趋激烈,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应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在古今中外文化中汲取更多力量,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地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断提升我们的精气神,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精神厚度不断拓展,为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汇聚十几亿中华儿女的磅礴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在历史的重要节点上提出了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深厚的自信,为人民群众更好地进行文化认同提供了基础,使文化自信具有了现实根基,为其他“三个自信”提供了文化心理上的重要支撑,不仅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使然,更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确方向的要求。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N]. 人民日报,2024-07-23(1).
- [2] 习近平. 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N]. 人民日报,2023-06-03(1).
-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25.
-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98.
-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284.

- [6]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4.
-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23.
- [8] 习近平.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14-09-04(1).
- [9] 毛泽东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516.
- [10] 习近平. 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7.
-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21.
- [12]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16-07-02(2).
- [13] 习近平. 在中法建交5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14-03-28(2).
- [14] 习近平. 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3-14.
- [15] 习近平.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15-09-04(1).

(责任编辑 谢春红)

Multidimensional Exploration of Cultural Confidence i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QIAN Yanna

(Political College, National Defence University PLA China, School of Marxism, Shanghai 201602, China)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of the “Four – sphere Confidence”, the confidence in culture is a “more fundamental, profound, and enduring force”. Taking the confidence in the path, theory, system and culture as an organic whole, CPC demonstrates its overall grasp and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the important strategic position of culture in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The confidence in the culture does not arise out of thin air, but it is fundamentally rooted in and developed from the unique historical legacy, cultural DNA, and spiritual attributes inherent to Chinese nation, from socialist economic, political,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construction, as well as from the confidence in the path, theory and system. The strategic position of cultural confidence is clarified. Only by accurately understanding “how cultural confidence is possible” can we truly grasp the essence of this important discourse and achieve the enric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socialist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new era; confidence in socialist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trategic role

脱敏数据侵权的法律救济规则选择

——以“卡—梅框架”为分析视角

王雯灏

(天津大学法学院,天津 300072)

摘要:当前我国数据脱敏所实现的不可识别程度是渐进的,但数据脱敏的法律效果却是断层的,法律规定的匿名化“绝对性标准”无法实现,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匿名化数据向“去标识化”逃逸的现象。“卡—梅框架”可作为检验现有脱敏数据侵权法律救济规则与确立未来规则的标尺。基于“卡—梅框架”以是否承载法益和交易成本为基准,将脱敏数据划分为未承载法益的零散数据、承载法益的模糊化数据和准匿名化数据。依据“卡—梅框架”,未承载法益的零散数据侵权无需进行规制,模糊化数据侵权可适用财产规则保护人格权性权能,责任规则保护财产权性权能,准匿名化数据可适用责任规则的保护方式,如此方可实现脱敏数据利用与侵权规制的帕累托改进。

关键词:脱敏数据;去标识化;匿名化;数据侵权;“卡—梅框架”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5.01.009

中图分类号:D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5)01-0051-06

一、问题缘起——数据脱敏程度的渐进性与法律效果的断层性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73条将个人数据根据脱敏程度划分为原始个人数据、去标识化数据和匿名化数据,后两者为本文所指的“脱敏数据”。依据法律条文,“去标识化数据”和“匿名化数据”分别指“经过处理,使其在不借助额外信息的情况下无法识别特定自然人”的数据和“经过处理无法识别特定自然人且不能复原”的数据。与欧盟“合理可能的不可识别”的匿名化标准不同,我国对个人数据匿名化的要求是“不可复原”的绝对匿名化。表面看更加严格的标准似乎给予个人数据更大程度的保护,但从技术层面来看,绝对匿名化是难以实现的^[1],因为匿名数据具有动态性和场景依附性^[2],在A场合无法识别的个人数据置于B场合也许就可被轻易复原。例如,“一名45岁男性”这一形象在广场上可能无法被识别定位,但将其置于女子学校这一场合,其被识别的风险就大大增加。在现行“不可识别且无法复原”的绝对化法律标准难以实

现的情形下,司法实践中对匿名化数据的判断呈现向“去标识化”逃逸的趋势,法院多以“不具有个人信息可识别性”“不能被辨认”“不可单独识别特定自然人”“与已识别自然人无关”等作为个人数据匿名化的认定标准(见表1),但均未提及“不可复原”。即法院通常以“不具有识别信息主体可能性”作为匿名化数据判断的实践标准,但该标准与《个人信息保护法》第73条规定不完全契合,往往会导致判决逻辑难以自洽。例如,在“安徽美景科技公司诉淘宝”案中,被告在记录、采集用户于电商平台上进行浏览、搜索、收藏、加购、交易等活动所留下的痕迹而形成的海量原始数据基础上进行脱敏处理和整合加工,产生匿名数据——“生意参谋”,法院认为“生意参谋”属于目前《个人信息保护法》意义上的“匿名化数据”,却又同时指出商家利用“生意参谋”在不同场景下进行决策时,原本已经过脱敏处理的数据就产生了被重新识别的风险,甚至可能在特定场景下还原出完整的用户画像,进而侵犯个人隐私以及商户的经营秘密。再如,在“陈婷诉百度”

收稿日期:2024-12-21

作者简介:王雯灏(2000—),女,河南平顶山人,天津大学法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商法学。

案中,尽管被告对用户画像进行了“不具有识别主体可能性”的匿名化处理,但是一审法院认为结合其另外抓取的浏览记录、搜索关键词、IP 地址等信息可以识别原告网络活动轨迹,被告仍构成侵权。

表 1 “匿名化数据”司法实践认定标准

案号	“匿名化”标准
(2022)京 04 民终 601 号	不可单独识别特定自然人
(2022)京 0491 民初 2138 号	与已识别自然人无关
(2021)京 0491 民初 5094 号	不可直接识别自然人特定身份
(2022)粤 01 民终 3937 号	不可直接或间接识别特定自然人
(2021)粤 03 民终 9583 号	不可与其他平台信息结合识别具体特定个人

在学界,部分学者指出“朱烨诉百度”案中二审法院认定相关信息为匿名信息并不妥当,至少从 Cookies 抓取的用于网络活动的信息来看,便很有可能属于间接识别个人的信息。^[3]上述案件及学者观点均证明目前司法实践标准下的匿名化数据仍存在不完全脱敏甚至“再识别”的风险,匿名化数据向“去标识化”逃逸,存在侵权可能。且《中国互联网定向广告用户信息去身份化指引》也指出“随着技术发展及单位公布或获得的数据和信息量的增加,再识别风险可能发生变化”,进一步强调了绝对化标准难以实现,并不存在“放之四海皆准”的匿名化数据脱敏处理,但其规范位阶偏低,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有限。

综上,虽然数据脱敏所实现的不可识别程度是渐进的,但数据脱敏的法律效果却是断层的:《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4 条和《网络安全法》第 42 条将匿名化数据排除在法律保护之外,即符合法律标准但向“去标识化”逃逸的匿名化数据有侵权可能而无法律规制,但去标识化数据又和原始个人数据同等适用《个人信息保护法》,法律针对有梯度的脱敏数据采用“非黑即白”的断层保护,如此一定程度上会造成司法适用混乱和权责失衡。

二、“卡—梅框架”分析脱敏数据侵权的可行性

“卡—梅框架”是由美国学者圭多·卡拉布雷西和道格拉斯·梅拉米德提出的法经济学概念,其从法律效果而非传统的行为模式(如公法私法、物权债权)出发,将法律规制划分为“财产规则”“责任规则”“禁易规则”(又称“不可让与规则”)。^[4]三规则的适用前提是“法益”(legal entitlement)^[5]的存在,当一种法益被财产规则保护时,除非法益持有者自愿转让,否则不得强制转让,即法益持有者被赋予法益的“定价权”;当一种法益被责任规则保护时,非法益持有者可以不经法益持有者的同意而“使用”其法益;当一种法益被禁易规则保护时,即使交

易双方均自愿同意,该法益也不得以特定方式私自转让、出售,如禁止器官买卖。“卡—梅框架”“既可以对已有的法律文本进行分析,也可以对某一社会问题法律救济的逻辑起点、利益衡平等方面进行审视,还能为制定有效的法律规则提供路径选择”^[4],运用“卡—梅框架”分析脱敏数据侵权问题具有可行性与独特优势。

首先,“卡—梅框架”引入科斯的社会交易成本概念作为法律救济规则的选择标准,其研究对象应当具有经济性。^[6]就脱敏数据的上位概念数据而言,其具有经济价值已经成为学界共识^[7],《个人信息保护法》和《数据安全法》等相关立法也足以证明数据具有“法律上应受保护的权利和利益”^[8]。

其次,在“卡—梅框架”下,法律救济方式与法律规制绑定,“法益”的存在必然伴随特定的救济,因此对于以法律救济为重点的侵权责任来讲,其作为逻辑分析工具具有天然的优势。故对于脱敏数据,既可以利用该框架归类与评价脱敏数据既有侵权规范的实践效果,也可以指导新型侵权的法律救济模式选择,有利于实现市场最优配置和个人数据保护的价值平衡。

三、基于“卡—梅框架”对脱敏数据法律规则的检验与类型化分析

(一)基于“卡—梅框架”对现有规制的检视

不论是《民法典》还是《个人信息保护法》,均对数据侵权作出了一定程度的规制。因此,可以以“卡—梅框架”为参考,评估现行法律救济模式,探讨现有规则是否因高昂交易成本而限制大数据功能的实现。

1. 脱敏数据承载的人格权、知识产权侵权

脱敏数据集合承载了人格权的相应法益,再识别后法益也有被侵害的可能。企业在数据匿名化处理过程中大多会保留适当的识别因子,这是平衡数据利用的商业价值与法律风险的必然选择,但如此也为数据主体隐私被再识别与人格权侵权埋下隐患。《民法典》第 1033 条和 1019 条在隐私权和肖像权的保护方面,均采取了“未经同意,不得使用”和“法律另有规定除外”的类似表述。此处的“同意”即为财产规则,强调隐私和肖像法益的移转以数据主体的自愿让与为前提;“法律另有规定除外”指向数据利用的责任规则,为特殊情况下数据的高效率使用预留了空间。例如《信息安全技术个人信息安全规范》第 5、6 条明确,对与国家安全、国防安全、重大公共利益等直接相关的个人数据的收集与使用,数据控制者无需经过数据主体的授权同意。

脱敏数据实际上是以原始数据经过去识别化处理形成的数据汇编,若其在数据的选择、编排上具有独创性,就符合《著作权法》第15条所规定的汇编作品的判定标准,自然可以获得《著作权法》中侵权责任的保护,即使被抓取并用于汇编的数据已被匿名且不受《著作权法》保护。《著作权法》的核心是法益自由转移、价格自愿协商,而为了平衡著作权人的权利与社会公共利益,又制定了以“客观补偿”为基础的法定许可使用规则,且在侵权保护方面采用了财产规则中的停止侵权和责任规则中的损害赔偿。因此,我国对著作权的侵权保护选择了“卡—梅框架”下财产规则与责任规则的混合保护模式。

2. 脱敏数据承载的信息侵权

对于数据所承载的信息本身,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13条、《民法典》第1035条、《网络安全法》第22条、《电信和互联网用户个人信息保护规定》第9条等都确立了以“告知—同意”为核心的个人数据处理规则。“同意”实为“卡—梅框架”中的财产规则,以法益拥有者(数据主体)的自愿让与作为该法益移转的前提条件。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2条及《民法典》第1036条规定了在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利益等重大利益时,数据主体的让渡义务。此种“让渡”本质是对法益的强制转移,造成侵权时法律规定的客观补偿及侵权赔偿实际上是“卡—梅框架”中责任规则的表达。同样地,《民法典》第1038条第1款、《网络安全法》第42条也确定了已经过处理、无法辨认、无法复原的脱敏信息未经信息主体同意也可强制交易的责任规则。

“卡—梅框架”的核心在于对救济方式与交易成本的经济学考量。通过上述分析可知,目前数据财产规则是占据主流的规范表达,但在数据主体与数据处理者的信息不均衡的今天,面对过载数据,同意的作出需要极高的交易成本^①,数据主体也面临风险误判和风险规避过于谨慎的困境^[9],此时对财产规则的过度依赖就会引发不效率与不利益。且在数据脱敏的法律标准可操作性不强、脱敏效果与法律规制断层的背景下,若部分数据处理者以浅层脱敏数据冒充去标识化甚至匿名化数据,以适用责任规则,难以保障数据安全。在复杂的数据收集和处理环境中,侵权后估价规则的确定会消耗高于交易成本的资源,从而使责任规则在法益流转和保护两方面的效率和交易成本优势不复存在。再如,部分数据处理者投入大量成本进行脱敏处理形成去标识

化数据,却仍需履行和原始个人数据相当的保护义务,适用交易成本较高的财产规则,也会白白折损脱敏数据价值。

(二) 脱敏数据的再分类——以是否承载法益和交易成本为基准

“法益”是适用“卡—梅框架”的充分必要条件,因此在探索此类特殊侵权的救济规则时可以先借助“卡—梅框架”的适用前提,即以是否承载“法益”为基准,对匿名化数据进行类型化分析。

1. 未承载法益的零散数据

在“雁过留痕”的大数据时代,每个个体都会留下海量“痕迹”,如浏览器页面设置偏好、过期时间较快的临时参数、浏览时长记录等。大量偶然的“标签化”行为轨迹具有高度离散化特征,对于用户而言并无实际价值,对于数据处理者而言其价值也基本在于形成整体画像以改进产品提升所有用户体验,因此不会也无需对数据个体进行重新识别,即便重新识别也不会侵犯合法权益。如杭州铁路运输法院指出“浏览、搜索、收藏、加购、交易等活动所留下的痕迹而形成的零散的原始数据^②,其实用价值并不在于数据本身”。故而此类零散数据并未承载“法律应当保护的利益”。

2. 承载法益的脱敏数据集——模糊化数据和准匿名化数据

经过收集整合的脱敏数据集有承载法益的可能。因为数据本身具有承载财产权、隐私权、知识产权等法益的能力,虽然高离散化数据价值微薄,但就投入了技术成本与管理成本,经整合后的脱敏数据集而言,无论是从法哲学“劳动财产理论”,还是从法经济学“激励理论”出发,对其保护的正当性很容易得到论证。且在当前绝对化匿名标准无法实现的情况下,零散地去识别化数据就如拼图碎片,经过整合便有拼凑关键甚至完整用户画像的能力,进而完整地承载原始个人数据的相应法益。

“卡—梅框架”的精髓是以交易成本为基础选择救济规则。交易成本低时,法律应优先适用财产规则;交易成本高时,法律应优先适用责任规则。因此可以以交易成本为基准,对承载法益的脱敏数据集继续分类。实际上,我国已存在数据脱敏的软法标准,即《个人信息去标识化效果分级评估规范》(后文简称《评估规范》)。《评估规范》系技术标准,以重标识风险大小为依据将个人信息标识度划分为4级,分别为能直接识别主体的数据、消除直接标识符的数据、重标识风险可接受数据和聚合数据。其中,1级数据实际为原始个人数据,2、3级数据为

去标识化数据,4级数据为基本接近绝对匿名化数据的去标识化数据,也为如今符合法律匿名化标准的数据(前文已说明技术上的绝对匿名化当前无法实现)。对数据进行脱敏处理和对脱敏数据进行重新识别的技术均需要耗费成本,上述数据脱敏技术成本也逐级增高(见表2),因此可以结合脱敏效果,将《评估规范》中2、3级数据划分为一类,为去标识化且再识别成本低的数据,为了与《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的去标识化数据区分,笔者称其为“模糊化”数据;4级数据为一类,即基本无法再识别或再识别成本高昂的去标识化数据,笔者称其为“准匿名化数据”。另外,在绝对匿名化不可能实现的今天,笔者认为可以暂且不予适用“匿名化数据”这一表述,因为本身“个人信息”与匿名化的“非个人信息”二元概念区分就存在不合理性。^[10]实际上,目前许多国家(或组织)在数据脱敏评估标准上均未使用“匿名化数据”这一概念(见图1)。例如,根据

《加利福尼亚州消费者隐私法案》(CCPA),美国仅将脱敏数据分为“假名化”数据和“去识别化”数据,并未对真正匿名化效果作出法律要求。^[11]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在其2015年发布的《个人信息去身份化规程》(NISTIR 8053)中曾强调不应使用“匿名化”这一表达方式,因为现有脱敏技术难以实现数据绝对匿名的实际效果;同样地,欧盟第29条数据保护工作组(WP29)考虑匿名化数据的再识别风险,在其通过的《第05/2014号意见书:匿名化技术》(Opinion 05/2014 on Anonymization Techniques)中也并未使用“匿名数据/信息”这一概念。

表2 评估规范

脱敏技术成本增加 ↑	4级	聚合数据	↓ 重新识别风险增大
	3级	重识别风险可接受数据	
	2级	消除直接标识符的数据	
	1级	能直接识别主体的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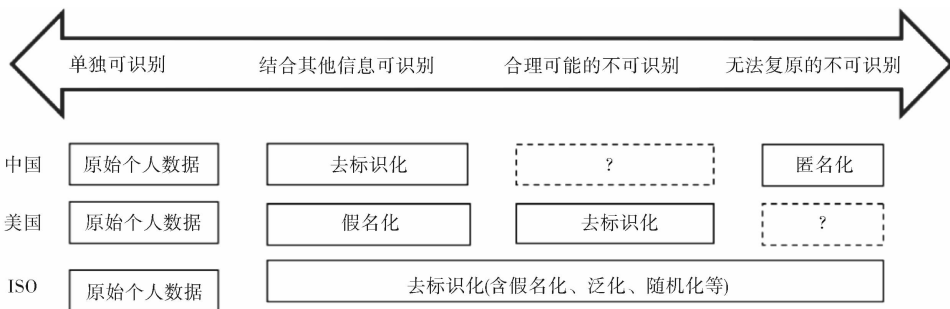


图1 不同国家(组织)数据脱敏光谱

总之,目前针对脱敏数据侵权类型并无直接法律规制,对于脱敏数据可能涉及的人格权侵权、商业秘密侵权、个人信息侵权等,我国基本采取了责任规则和财产规则的混合救济模式,但从“卡—梅框架”以交易成本选择保护模式的角度考量均不是最优解。针对数据脱敏法律效果的断层,可以以“卡—梅框架”为研究视角,以是否承载法益和交易成本为基准,对脱敏数据进行再分类,将技术标准与法律标准相衔接以便于进一步研究利用脱敏数据侵权的法律救济模式。

四、基于“卡—梅框架”对脱敏数据侵权救济规则的选择

对数据进行脱敏处理的最重要原因就是推动数据更顺畅地交易,而禁易规则过于严苛,难以助推数据流通,因此其适用空间极小,但并不意味着禁易规则在脱敏数据保护中被全盘否定。笔者认为,针对涉及国家主权安全、国家秘密等政府数据,应适用禁易规则,取缔该类数据交易市场,具体理由显而易见,不再赘述。后文将重点讨论财产规则和责任规

则的适用情形。

(一) 未承载法益的零散数据——无需规制

在法经济学的逻辑下,如果实施某一权利的成本要高于没有赋权的状态,则该权利不应被设置,也不存在值得保护的利益。^[12]结合前述分析,具有高离散性的零散数据对于数据主体没有实际价值,数据处理者或第三方也缺乏再识别动力,即便被重新识别也不会对数据主体的人格权等权能产生侵害,因此其不承载法益,也缺乏法律保护的正当性基础。倘若适用财产规则进行保护,第一步确定权益拥有方并协商定价就会花费巨大成本或者说根本无法实现;若选择责任规则进行保护,虽然可以跳脱“知情—同意”和“协商定价”这一框架,但事后补偿的法律救济也会引发不利益和低效率,显然不符合“卡—梅框架”的规则选择原理,故未承载法益的零散数据目前没有提供法律救济的必要。

(二) 模糊化数据——财产规则为主

按照法定标准脱敏成功的模糊化数据在二次利用中又被重新识别,进而侵犯他人合法权益时,需要

借助“卡—梅框架”考虑财产规则与责任规则的成本与效益,进而确定法律救济方式。

财产规则的关键点在于“自愿交易”,保护法益的自由转移。权益所有者享有自主定价的权利,数据购买者需在相对人知情、愿意的情况下方可进行交易。首先,财产规则下模糊化数据主体的自由定价权并非意味着需要设置数据财产权(目前数据的财产权属性仍存在争议),而是运用财产规则保护个人数据之上个体的自决权。其次,财产规则是寻求数据权益保护与发挥脱敏数据潜在价值平衡的最优选择。财产规则下,数据主体与数据购买者通过“知情—同意”规则形成类买卖合同关系。一般来说,购买者以对数据主体的服务作为支付的对价,同时负担避免模糊化数据再识别、保护数据使用安全和个人隐私不受侵犯的义务,无需另行负担数据使用费,数据主体自愿提供个人数据作为享受数字化服务的对价。财产规则下的模糊化数据侵权既可适用违约救济规则,也可适用侵权规则,要求侵权方停止侵害、返还原物、恢复原状、排除妨害、消除危险与惩罚性赔偿等。其与责任规则的重要区别在于财产规则承认“停止侵害”的救济方式,若仅使用责任规则,意味着该类数据的收集者不能阻止他人使用,也不能在发生侵权的情况下,要求侵权人停止侵权,更无法实现自主交易定价,一定程度上是对他人使用模糊化数据的默许。因此,模糊化数据权能束中较为重要的信息性隐私权、被遗忘权、信用权等人格权性权能可以适用财产规则。此外,对于模糊化数据权能束中的利用(处理)、收益、处分等财产权性权能,可以适用责任规则以去除“知情—同意”这一烦琐过程。从交易成本和权益保护相平衡的角度看,相较于人格权性权能,财产权性权能所涉及的法益对于数据主体重要性较低,若适用财产规则会增加数据处理器不必要的交易成本,降低效率。且目前去标识化数据与未经处理的原始个人信息,在责任承担方面完全相同,如此会导致数据企业丧失脱敏处理的动力。通过责任规则规制数据部分权能可以实现对模糊化数据侵权的梯度化处理,从而避免此类情况发生。

因此,“卡—梅框架”下以财产规则为主,责任规则为辅的救济方式方能使模糊化数据主体与数据购买者利益达到平衡的状态,既不会因强硬的禁易规则限制数据流通和数据市场发展,又不会因为单独适用财产规则徒增数据处理者的交易成本,也不会因责任规则的“强制交易性”导致模糊化数据主体权益遭受无法停止的侵害,实现帕累托改进。

(三) 准匿名化数据——责任规则

责任规则有双重作用。首先,其背后逻辑是鼓励交易、强制交易,所谓“只要愿意支付一个客观确定的价值,就可以消灭一个初始法益”^[13]。因为在数据交易过程中,并非所有财产规则之下的自愿交易都是有效率的最优选择。责任规则下准匿名化数据主体拥有的是一项可以被他人以法定赔偿强行剥夺的有限权利,而非财产规则保护下完整的权利。其次,责任规则相较于财产规则更为温和。不论是2018年针对英国航空公司数据泄露事件作出的1.839亿英镑处罚、2021年《深圳经济特区数据条例》对于数据侵权最高可处5000万元或上一年度营业额5%罚款的规定,还是(2018)京0108民初13742号判决书中被侵权人针对微博动态数据侵权提出千万索赔请求,均是对财产规则的运用。但对于准匿名化数据,这并不是最好的保护。脱敏数据中的准匿名化数据基本没有被识别的可能,此时倘若适用财产规则要求数据处理者、使用者承担责任,意味着被侵权人可以要求相关数据处理企业进行损害赔偿、停止侵权(切断事实上已实现匿名化的数据流通或删除数据,以阻止其后续使用的可能性),并处以高额惩罚性赔偿,这对数据流通的打击也不必多言。如此适用财产规则,不留余地地对新兴产业进行过于直接的干预,使准匿名化数据价值难以充分发挥,违背脱敏处理初衷之一——促进人格利益向财产利益转化,为数据流通套上枷锁。倘若选择“卡—梅框架”下的责任规则作为准匿名化数据侵权的法律救济方式,则数据处理器不需要征求海量准匿名化数据主体的同意即可利用,在此情境下,侵权责任仅限于赔偿和停止侵权性使用,侵权人无需完全停止数据使用或彻底销毁该数据,而是通过事后支付相应的法定价格获得继续使用权。这种方式既保障了准匿名化数据主体的相应法益,又激励大数据企业和经营者妥善处理和利用数据资源,避免因立法过于严苛而阻碍准匿名化数据的流通。

五、结语

在立法尚不明朗且绝对化匿名无法实现的情况下,可以以“卡梅框架”作为分析工具,以是否承载法益和交易成本为基准,将脱敏数据进行类型化考虑,同时抛弃“匿名化数据”概念,以弥补脱敏数据侵权法律规制的断层。对于未承载法益的零散数据,法律无需规制;对于再识别成本较低的模糊化数据,应选择财产规则规制人格权性权能,辅以责任规则规制财产权性权能;对于目前基本无再识别可能的准匿名化数据,应选择责任规则的法律救济模式,

以实现数据流通和数据主体权益保护的平衡。

注释:

- ①“同意”的高交易成本体现在两方面:数据主体阅读大量隐私条款的时间成本和数据处理者发出通知和收集同意的设计、测试、邮寄等成本。
- ②根据(2017)浙8601民初4034号判决书原意,此处的“原始数据”并非未经处理的原始个人数据,而是指进行过简单脱敏的零散数据。

参考文献:

- [1]张丽,许多奇.风险控制理念下我国个人信息匿名化处理的法律规制[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9(2):220-231.
- [2]张建文,程海玲.“破碎的隐私承诺”之防范:匿名化处理再识别风险法律规则研究[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3):76-86.
- [3]韩旭至.大数据时代下匿名信息的法律规制[J].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9(4):64-75.
- [4]凌斌.法律救济的规则选择:财产规则、责任规则与卡梅框架的法律经济学重构[J].中国法学,2012(6):5-25.
- [5]范进学.权利概念论[J].中国法学,2003(2):13-20.

- [6]凌斌.经济运行的法律影响:论法律界权在科斯框架中的功能与成本[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27(3):88-99.
- [7]冯晓青.大数据时代企业数据的财产权保护与制度构建[J].当代法学,2022,36(6):104-120.
- [8]张新宝.论作为新型财产权的数据财产权[J].中国社会科学,2023(4):144-163.
- [9]丁晓强.个人数据保护中同意规则的“扬”与“抑”:卡—梅框架视域下的规则配置研究[J].法学评论,2020,38(4):130-143.
- [10]丁晓东.论个人信息概念的不确定性及其法律应对[J].比较法研究,2022,36(5):46-60.
- [11]陈美.开放政府数据的隐私风险控制:美国的经验与启示[J].情报杂志,2021,40(8):81-86.
- [12]菲利普·黑克.利益法学[M].傅广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39-40.
- [13]崔淑洁.数据权属界定及“卡—梅框架”下数据保护利用规则体系构建[J].广东财经大学学报,2020,35(6):78-87.

(责任编辑 刘成贺)

Choice of Legal Remedy Rules for Infringement of De-identified Data Dissemination

—Taking “the C&M Framework” as an Analytical Perspective

WANG Wenhao

(School of Law, Tianjin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2, China)

Abstract: The current level of unidentifiability achieved by data de-identification in China is progressive, but the legal effects of data de-identification are disjointed. The “absolute standard” of anonymization stipulated by law cannot be realized, leading to instances in judicial practice where anonymized data escape towards “de-identification.” “The C&M Framework” can serve as a benchmark for evaluating existing legal remedies for data de-identification infringement and establishing future rules. Based on “the C&M Framework”, data de-identification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scattered data without legal interests, fuzzy data with legal interests, and quasi-anonymous data, using the criteria of bearing legal interests and transaction costs. According to “the C&M Framework” scattered data without legal interests do not require regulation for infringement, while fuzzy data infringement can apply a protection approach primarily based on property rules and supplemented by liability rules, and quasi-anonymous data can be protected primarily through liability rules. Only through this approach can a Pareto improvement be achieved in the utilization and regulation of de-identified data.

Key words: de-identified data; data masking; anonymization; data infringement; “the C&M Framework”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中人民观的展开逻辑及现实启示

张文,陈旭辉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广西桂林 541004)

摘要:1945年,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毛泽东向大会提交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时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取得决定性胜利、“两个中国之命运”的较量与抉择即将展开之际,人民观犹如一条红线贯穿了《论联合政府》的始终。基于数字人文技术的分析结果,从“人民—主体”“人民—权利”“人民—军队”“人民—国家”“人民—世界”等方面透析其展开逻辑,可以清晰地看到《论联合政府》所蕴含的人民观拥有着穿透时空的真理力量和精神力量,启示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要充分激发人民的历史主动精神、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大力弘扬拥军爱民的光荣传统、保持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推动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伟大理论创新、实践创新,推动中国共产党人民观的传承开新,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实践注入强劲动力。

关键词:毛泽东;《论联合政府》;人民观;展开逻辑;数字人文技术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5.01.010

中图分类号:A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5)01-0057-07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充分激发全体人民的历史主动精神。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中国人民的事业,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汇聚蕴藏在人民中的无穷智慧和力量,才能不断创造新的历史伟业。”^[1]其中“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正是引自毛泽东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人民观是《论联合政府》的核心观点,是贯穿其始终的一条红线。虽然《论联合政府》的发表距今已有整整八十年了,但是“人民”一词始终处于中国共产党人心中的最高位置。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将“坚持人民至上”概括为经过长期实践积累的十个方面宝贵经验之一。^[2]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必须坚持人民至上”总结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六个方面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之一。^[3]因此,重温《论联合政府》这一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程中的经典文献,采用更加与时俱进的数字人文技术,深入挖掘其中蕴含的人民观,对于助力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毛泽东《论联合政府》中人民观的量化分析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文科学领域的学者开始采用基础数据科学和数据科学的数字人文技术,对政策文本、访谈内容、开放性问卷等进行量化分析。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中,亦有学者采用 CiteSpace 知识图谱等量化分析手段,对本学科中的一些理论与实践问题展开了深入的研究。但目前采用数字人文技术对毛泽东原著文本展开的研究数量仍然较少。因此,本研究筛选《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所有含有“人民”一词的语句,形成内含283句、合计18397字的对象文本,并采用 Python 对筛选后的原著文本进行高频词提取及排序、LDA 主题模型聚类等量化分析,再结合主观的文献分析,对毛泽东《论联合政府》蕴含的人民观进行梳理与归纳,以求增强分析

收稿日期:2024-09-20

基金项目:2020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共产党红色精神的历史演进与传承开新研究”(20BKJ138)

作者简介:张文(1965—),男,湖南邵阳人,法学博士,桂林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结果的全面性与科学性,从而更加深入地阐释毛泽东的人民观,发扬其当代价值,助力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一)毛泽东《论联合政府》中人民观的高频词分析

本研究使用当前学界较为常用的 Python 中文分词组件“Jieba”来对筛选后的对象文本进行精准切分,并建立停用词(Stop Words)词库,以过滤代词、数词、量词、介词、连词、助词、叹词等不具有实际意义或其他与研究主题无关的词语,提取出现超过2次词语共计506个,囿于篇幅限制,仅展现排名前36的词语及其频次(见表1)。

表1 《论联合政府》人民观论述原文高频词(节选排名前36)

序号	词语	频次	序号	词语	频次
1	人民	360	19	实行	22
2	中国	230	20	组织	22
3	国民党	79	21	抗日战争	21
4	民主	59	22	法西斯	20
5	军队	55	23	团结	20
6	日本	51	24	力量	20
7	侵略者	49	25	经济	20
8	抗日	43	26	群众	20
9	解放区	43	27	新民主主义	20
10	政府	41	28	建立	19
11	自由	38	29	制度	19
12	国家	34	30	全国	18
13	发展	34	31	解放	18
14	中国共产党	31	32	民族	18
15	统一	29	33	集团	18
16	政策	28	34	文化	18
17	反对	26	35	压迫	17
18	工作	24	36	联合政府	16

根据高频词回溯原文,可以清晰地看到人民观犹如一条红线贯穿全文,由此也可以得出毛泽东的人民观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第一,毛泽东的人民观具有彻底性。报告开头第一个标题即“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报告的最后也再次强调了“为着人民的利益”^{[4]1098}，“人民”一词在《论联合政府》中随处可见。第二,毛泽东的人民观具有全面性。毛泽东不仅高度关注人民在政治上的自由权利,而且同时也关注着人民在经济、文化上的需要。在“我们的一般纲领”中,毛泽东强调,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特别是其政权组织“保障人民的一切必要的民主活动”^{[4]1057},而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以及文化也都是“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第三,毛泽东的人民观具有科学性。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时中国人民争取自由、统一的道路上的障碍物主要有两个,一是侵略者,二是国民党内的主要统治集团。值得注意的是,《论联合政府》中“讲抗日的部分不太多”^[5],而关于

代表着剥削阶级利益的国民党主要统治集团的内容则较多,毛泽东还将其定性为“反人民集团”。这一点在对象文本中体现得非常明显,“国民党”一词出现了79次,“侵略者”一词出现了49次。这主要是因为,国民党内的反人民集团一方面“捆起人民的手足,使他们不能反对日本侵略者”^{[4]1069},另一方面“压迫民众,将民众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等项自由权利剥夺得干干净净”^{[4]1070}。更为长远的原因是,毛泽东以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军事家、战略家的长远眼光,警醒人们:“如果国人不加注意,不去揭露它的阴谋,阻止它的准备,那么,会有一个早上,要听到内战的炮声的。”^{[4]1051}

(二)毛泽东《论联合政府》中人民观的LDA主题聚类分析

隐含狄利克雷分布模型,即LDA(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模型,是一种非监督机器学习的文本挖掘技术,可以用来识别自然语言中潜在的主题信息。研究团队进行了32组主题数量分别为3、4、5、6、7、8、9、10,词语数量分别为10、15、20、30的交叉运行测试,每次运行测试的训练轮次为50。研究团队经过仔细比对,认为在主题数量为7、词语数量为20时的分析结果(见表2),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毛泽东《论联合政府》中的人民观的展开逻辑。

表2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中人民观的LDA主题聚类词语

主题1	主题2	主题3	主题4	主题5	主题6	主题7
人民	人民	发展	人民	人民	人民	中国
中国	政策	人民	国民党	全国	中国	人民
法西斯	中国	自由	集团	工作	日本	国民党
胜利	国民党	取消	日本	团结	组织	自由
国家	军队	经济	侵略者	知识分子	群众	侵略者
势力	抗日	惩办	民主	破坏	民主	日本
民族	政府	分子	实行	斗争	侵略者	民主
努力	发展	解放区	军队	干部	解放区	统一
外国	民主	废止	和平	解放区	力量	中国共产党
战争	实行	承认	抗日战争	政府	军队	政府
利益	作战	军队	工作	中国	抗日	抗日
人民战争	少数民族	新民主主义	解放区	希望	同盟国	国家
失败	农民	改善	世界	民族	情况	反对
地位	统一	救济	生产	国家	配合	独立
苏联	消极	生活	配合	压迫	打败	建立
反法西斯	反动	国民党	粮食	革命	制度	解放
压迫	八路军	国家	中国	发展	国民党	军队
共产党人	新四军	保障	文化	战争	困难	努力
中国共产党	参加	一党专政	原则	国民党	政府	解放区
希望	生产力	地位	作用	事业	实行	富强

由于LDA主题模型无法得出文字性结论,因此需在前人已有研究成果特别是共识性成果的基础

上,对主题聚类结果进行归纳,分析出毛泽东《论联合政府》人民观的核心内涵,提炼出贯穿其中的核心主线(见表3),并结合文本定性分析,考察毛泽东《论联合政府》中人民观的展开逻辑及现实启示。

表3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中人民观的核心主线、核心内容及其对应主题

核心主线	核心内涵	对应主题
人民—主体	人民—利益	主题3、主题4
	人民—军队	主题2
	人民—国家	主题5、主题7
	人民—世界	主题1、主题6

二、毛泽东《论联合政府》中人民观的展开逻辑

高频词分析呈现了毛泽东《论联合政府》中人民观三个方面的主要特征,即彻底性、全面性、科学性。主题聚类分析与文本定性分析的结合,则更为系统、深入地呈现了毛泽东《论联合政府》中人民观的展开逻辑,其核心主线为“人民—主体”,其核心内涵为“人民—利益”“人民—军队”“人民—国家”“人民—世界”这四个方面。

(一)“人民—主体”:毛泽东《论联合政府》中人民观的核心主线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6]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不仅创造了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同时也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毛泽东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4]1031} 将人民视为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始终强调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地位,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唯物史观特别是群众史观的坚持与运用。其一,一切为了群众,积极维护人民群众应有的一切自由。当时压迫中国人民的主要有两股势力,一是日本侵略者,二是国民党内的反人民集团。毛泽东在回顾日本侵略者自九一八事变以来侵华罪行的同时,更强调了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内战政策、消极抗战政策等所造成的恶劣影响。此外,国民党内的反人民集团还实行了严酷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国民党统治区内的人民群众深陷“民生凋敝、民怨沸腾、民变蜂起”^{[4]1045} 的苦难之中。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解放区内,中国共产党一方面积极对日作战,在敌后战场严重缺乏武器的恶劣条件下,抗击着半数以上的侵华日军和绝大多数的伪军;另一方面积极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同时充分保护人民的各项政治自由。解放区广大的人民群众“都有饭吃,有衣穿,有事做”^{[4]1048}。其二,一切依靠群众,高度肯定人民群众发挥的关键作用。毛泽东指出,一切中国问题的关键所在就是两条路线问题。这两条路线即“国民党政府压迫中

国人民实行消极抗战的路线和中国人民觉醒起来团结起来实行人民战争的路线”^{[4]1034}。它们之间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是否重视并发挥了人民群众的重要作用。毛泽东不仅高度评价了人民群众在过去已经发挥的重大作用,更进一步看到了人民群众在未来将要发挥的新的更大作用,强调中国人民“在保障战后世界和平上将起极大的作用,在保障东方和平上则将起决定的作用”^{[4]1033}。此外,毛泽东既指出了最广泛的人民取得胜利的这一天是必然到来的,同时也强调了这一天到来的早或晚也要依靠人民的觉悟、团结和努力的程度来决定,体现了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和人民主体的选择性的辩证统一关系。

(二)“人民—利益”:毛泽东《论联合政府》中人民观的价值归向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之所以不同于以往任何的剥削阶级的运动,就是因为它“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7]。毛泽东曾在《为人民服务》中化用司马迁《报任安书》中“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典故,深刻阐述了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为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奋斗的价值归向。这样的价值归向,在《论联合政府》中也得到了非常充分的彰显。在抗战期间,国民党内的反人民集团提出了所谓“两阶段论”的荒唐论调,鼓吹民主民生改革应该在抗战结束之后再进行,妄图为其维护剥削阶级利益的卑劣行径掩盖上一层遮羞布。与之相反,中国共产党则坚决主张要重视民主民生问题,强调:“不解决民主民生问题,就不能建立抗日根据地抵抗日本的进攻。”^{[4]1076} 在解放区内,中国共产党实行了减租减息的政策,既提高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减少了地主对于中国共产党发动农民抗日的阻力,战后还将有步骤地发展“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人民的利益从来都不是抽象的,而是十分具体的,既包括经济方面的利益,同时也包括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利益。在《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化用、延伸了孙中山在论述新三民主义时所提出的“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者所得而私也”^[8],强调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应该“为一般平民所共有”,而不是“少数者所得而私也”。反观那个“集中了孙中山一切不肖子孙在内的团体——国民党内的反人民集团”^{[4]1076},则彻底沦为了剥削阶级利益的代言人,站在了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对立面。而中国共产党正是因为代表了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在内的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才能不断从胜利走

向胜利,给中国带来光明的前途与命运。

(三)“人民一军队”:毛泽东《论联合政府》中人民观的战略支撑

马克思指出:“工人阶级必须在战场上赢得自身解放的权利。”^{[9]1006}毛泽东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进一步强调了武装力量的重要意义。在当时的中国,解放区内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以及其他的人民武装,不仅要抗击大多数的侵华日军以及伪军,还要时刻提防来自国民党内反人民集团的明枪暗箭。国民党政府为了破坏和消灭解放区的人民军队,炮制出了“你交出军队,我给你自由”这一荒谬绝伦的“学说”,妄图以“自由”“合法地位”为饵,诱使解放区的人民放弃自己的武装。毛泽东回顾了过去的历史以及当下的情形,对此给予了彻底的驳斥。在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武装力量十分微弱,但后来国民党政府非但没有给中国共产党人以自由,反而将昔日并肩作战的盟友视为仇敌,发动了血腥的反革命政变,大肆施行“清党”、屠杀革命志士。正是基于此,毛泽东彻底驳斥了国民党政府的这一谬论,指出:“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4]1074}人民军队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这一宗旨的指引下,人民军队在残酷的战争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系列适应人民战争、为人民战争所需要的战略战术。一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无产阶级的解放在军事上同样也将有特殊的表现,并且将创造出一种独特的、新的作战方法”^[10]。其一,人民军队有人民自卫军和民兵等群众武装组织一道配合作战。解放区的一切青壮年男女都可以自愿在不脱产的情况下加入人民自卫军。自卫军中的精英分子既可以加入军队和游击队,也可以加入民兵。其二,人民军队将自己划分为了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两个部分。前者负责执行超地方的作战任务,后者则负责协同民兵、自卫军保护地方和进攻当地的敌人。其三,人民军队得到了解放区内一切抗日人民的热烈援助。这样的援助既包括动员人民参加军队、运输粮食、保护伤员等对军队作战的直接帮助,也包括积极开展政治、经济、文化、卫生等各项建设工作。毛泽东对此高度评价:“这就是真正的人民战争。只有这种人民战争,才能战胜民族敌人。”^{[4]1041}

(四)“人民一国家”:毛泽东《论联合政府》中人民观的基本要求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开头就提出了“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并将其概括为一句话“走团结和民主的路线,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4]1030}。毛泽

东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认为这两个方面都为这一基本要求的实现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只要充分利用这些条件,加之中国人民的不断奋斗,这一基本要求就一定会实现。在当时,要想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除了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打败日本法西斯侵略者外,最为关键的就是要“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4]1066}。毛泽东反复强调了这一点的极端重要性,“再说一遍,一切这些具体纲领,如果没有一个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政府,就不可能顺利地在全中国实现”^{[4]1086}。国家是国体与政体的统一,而民主又与国体、政体紧密联系。列宁强调:“民主就是多数人的统治。”^[11]同时又指出:“民主是国家形式,是国家形态的一种。”^[12]毛泽东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的国家学说,站在唯物史观的高度,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及其规律的视角出发,敏锐地认识到了国家政权的重大影响。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的那样,“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9]559-560}。国民党内反人民集团的一党专政,不仅是阻挠团结和统一中国人民夺取抗战胜利的障碍,而且是造成了国民党统治区民生凋敝的罪魁,在将来更是会成为导致内战惨剧的祸胎。国民党内的反人民集团终将自绝于人民,而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人民的忠实代表,则终将带领人民将当时的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

(五)“人民一世界”:毛泽东《论联合政府》中人民观的外交原则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所提及的“人民”,不仅包括中国人民,也包括世界各国人民,其中既有反法西斯同盟国的广大人民,也有身处法西斯国家但同样饱受本国法西斯独裁政权压迫、摧残的广大人民。在谈及“中国沦陷区的任务”时,毛泽东号召沦陷区的一切抗日人民,学习法国人民和意大利人民的榜样,组织地下军,在时机成熟之时,配合外部进攻的部队,里应外合消灭法西斯侵略者。不仅如此,毛泽东还以长远的眼光指出,战后如果“没有日本人民的民主制度,便不能彻底地消灭日本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便不能保证太平洋的和平”^{[4]1086}。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所提及的一系列外交原则,其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其所坚持的立场都是人民立场。其一,在分析国际形势时,毛泽东看到了当时的国际形势

为中国人民实现“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基本要求所提供的极其有利的条件，指出：“苏联人民加上其他反法西斯同盟国的人民的努力，使打倒法西斯成为可能。”^{[4]1031}其二，在表达外交态度时，毛泽东一方面对苏联政府及苏联人民长期以来的援助表示感谢，另一方面告诫各同盟国政府特别是英美两国政府不要采取任何违反中国人民意志的政策，以免损害与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其三，在追求独立平等时，毛泽东深刻认识到依靠外国政府废除与中国的平等条约、订立平等新约并不能使中国获得真正的独立与平等地位。只有把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上建设成为一个新民主主义国家，只有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努力，才能得到真正的独立平等。

三、毛泽东《论联合政府》中人民观的现实启示

作为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伟大历程中的经典之作。人民观正是贯穿其始终的一条红线，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民至上的价值导向，具有穿透时空的真理力量与精神力量，至今仍然可以给予新时代的人们诸多启示。

（一）充分激发人民的历史主动精神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中国人民的历史主动精神是“在历史进程中积累的强大能量”^[2]。党的二十大报告也在开篇部分就强调要“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3]。人民的历史主动精神源于人民的历史主体地位。而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哲学家们总是在具体的、现实的人之外探寻历史主体，把诸如“上帝”“绝对精神”“自我意识”等概念凌驾于人之上，将其视为历史主体。^[13]马克思、恩格斯发动了哲学的革命，将这一颠倒的历史观重新立正。毛泽东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的唯物史观理论，强调无论是打败日本侵略者，还是建设新中国，最基本最关键的都是要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的力量。后来的实践也充分证明，只有依靠人民的全面的战争，才能打败法西斯侵略者、战胜民族的敌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只有依靠人民一致的努力，才能变落后的农业国为先进的工业国，推动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充分激发人民的历史主动精神，焕发亿万中国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的磅礴力量。要坚持人民创造历史的根本观点，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倾听人民的呼声、汲取人民

创造的经验、尊重人民拥有的权利、汇聚人民发挥的力量，始终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夺取新的胜利。

（二）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人民至上”，“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3]。中国共产党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不仅源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而且也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民为邦本”的思想观念。《管子·版法解》曰：“与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之；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谋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14]。人民至上，最关键的就是要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根本。毛泽东不仅在“我们的一般纲领”中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都要“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绝不应该是为“少数人所得而私”，而且在之后的“我们的具体纲领”中，毛泽东也重点强调了“人民的自由”“人民的统一”“人民的军队”等问题。这一切都是围绕着人民的利益、要求与呼声展开的。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人民也因此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根本的力量源泉、最坚实的底气所在。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最忠实的代言人，谁要是不尊重中国共产党，谁就是在实际上不尊重最广大的中国人民，谁就一定要失败。”^{[4]1087}实践已经充分证明，这一论断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正是因为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导向，中国共产党才能团结带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在百余年的奋斗历程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成就，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三）大力弘扬拥军爱民的光荣传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大力弘扬军爱民、民拥军的光荣传统，不断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关系。”^{[15]629}拥军爱民是人民军队创立以来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一如毛泽东在《杂言诗·八连颂》中指出的那样，“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16]。毛泽东将人民是历史创造者这一唯物史观的根本观点作为自己军事思想的关键基石。一方面，在谈及“人民战争”时，毛泽东详尽说明了人民群众对于充分发挥人民军队的战斗力的决定性意义，侧重于阐明“拥军”；另一方面，在谈及“人民的军队”时，毛泽东则主要论述了人民军队对于保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关键性作用，侧重于阐明“爱民”；二者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相互统一于“拥军爱民”的光荣传统。一直以来，我们党都高度重视人民军队建设，人民军队的战斗力也因此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越是发展壮大，遇到的风浪、受到的阻力就

会越大,在这“中流击水浪更险”的关键时刻,必须时刻紧握“兵民是胜利之本”的重要法宝,大力弘扬拥军爱民的光荣传统,确保人民军队始终成为党和人民可以完全信赖的英雄军队。

(四)保持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

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指出:“单靠先锋队是不能胜利的。”^[17]因此,中国共产党必须时刻保持与最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血肉联系,方能无往而不利。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首次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作风”,其中极为重要的一条就是“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4]1094}。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是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必然要求。只有坚守不忘初心使命的人民性本色,才能真正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才能真正避免命令主义和尾巴主义这两种错误倾向。不仅如此,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在三大作风之中处于枢纽地位,与实践相结合的作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是相互贯通的。“党的三大优良作风聚焦到一点,就是党与人民群众的价值关系格局。”^[18]一方面,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与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是相互贯通的。“党的理论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理论”^[3],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任何理论只有源自人民的实践活动、符合人民的实际利益、经过人民的实践检验,才能最终成为真理。另一方面,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与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也是相互贯通的。毛泽东指出,“人民是最好的鉴定人”^{[4]1038}。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是我们党的工作的最高裁决者和最终评判者”^{[15]213},同时指出:“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19]无论是批评还是自我批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洗洗澡、治治病”,去除任何玷污面目、侵害肌体的灰尘和微生物,丢弃一切不符合人民需要的错误思想和过时办法,始终做到为了人民的利益而不懈奋斗。

(五)推动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20]毛泽东的一生既是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利益不懈奋斗的一生,也是为了世界各国被压迫人民、各被压迫民族不断奔走呐喊的一生。他在《论联合政府》的开头部分就对当前的形势作出了概括,“整个世界上反对法西斯侵略者的神圣的正义的战争,已经取得了有决定意义的胜利,中国人民配合同盟国打败日本侵略者的时

机,已经迫近了”^{[4]1029}。毛泽东旗帜鲜明地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视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组成部分,既看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所取得的决定性胜利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客观条件,更看到中国人民在对日作战中不屈不挠的努力为确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胜利起到了极为重要的能动作用。这无疑是毛泽东作为一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国际主义者所作出的重要判断。如此伟大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的思想,贯穿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外交思想当中。^[21]这也为战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创立,乃至新时代以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打下了坚实思想基础、提供了充足精神养分。从《共产党宣言》到党的二十大报告,从“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22]到“必须坚持胸怀天下”^[3],国际主义思想贯穿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而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中国人民面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23]这一重大课题给出的又一时代答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对毛泽东外交思想的守正与创新、坚持与发展。作为具有全球视野、世界眼光、天下胸怀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坚持国际主义精神,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建设、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稳步向前。

四、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毛泽东同志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党和人民,留下了永志后人的崇高精神风范”,同时强调“对毛泽东同志的最好纪念,就是把他开创的事业继续推向前进”。^[1]时值中共七大召开、《论联合政府》发表80周年前夕,重温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经典之作,学习人民立场、人民情怀这一毛泽东“永志后人的崇高精神风范”,并从中汲取现实启示,对于助力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把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23-12-27(002).
- [2]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N]. 人民日报, 2021-11-17(001).
- [3]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N]. 人民日报,2022 - 10 - 26(001).

[4]毛泽东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毛泽东文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272.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295.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411.

[8]孙中山选集(下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616.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332.

[11]列宁全集(第30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383.

[12]列宁全集(第3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96.

[13]薛俊清,王硕岩. 唯物史观视域下历史主动精神的生成 逻辑[J].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3(10):52 - 60.

[14]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23:63.

[15]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23.

[16]毛泽东诗词集[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189.

[17]列宁全集(第39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72.

[18]孔翠萍. 党的三大优良作风的唯物史观解读[J]. 科学 社会主义,2016(2):57 - 61.

[1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 2020:70.

[20]毛泽东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20.

[21]王巧荣. 论毛泽东外交思想的时代价值[J]. 北京师范 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6):49 - 57.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8:704.

[23]习近平. 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携手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N]. 人民日报,2024 - 06 - 29(002).

(责任编辑 谢春红)

The Logic and Real – World Implications of Mao Zedong’s Views on the People in *On Coalition Government*

ZHANG Wen, CHEN Xuhui

(School of Marxism, Guilin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Technology, Guilin, Guangxi 541004, China)

Abstract: In 1945, the Seven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as held in Yan’an, where Mao Zedong presented the political report *On Coalition Government*. At a time when the Chinese people’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and the global anti – fascist struggle had achieved a decisive victory, and the contest and choice between “China’s two possible destinies” were about to begin, his views on the people ran like a red thread throughout *On Coalition Government*. An analysis based on digital humanities technology reveals, from perspectives including “people – subject”, “people – rights”, “people – army”, “people – state” and “people – world”, that his views on the people embedded in *On Coalition Government* possess timeless truth and spiritual power. This suggests that in the new era and on the new journey, we should fully stimulate the historical initiative of the people, consistently uphold the fundamental stance of putting the people first, vigorously promote the glorious tradition of supporting the army and caring for the people, maintain the fine conduct of forming close ties with the masses, and work towards jointly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humanity. In both theory and practice, this will invigorate th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 views on the people, injecting strong momentum into the grand practice of Chinese – style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Mao Zedong; *On Coalition Government*; views on the people; digital humanities technology

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对化解历史虚无主义的借鉴

陈元明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西 桂林 541004)

摘要:葛兰西围绕“在哪里实施”“谁来实施”“怎样实施”等问题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文化领导权思想。他认为文化领导权在现代国家领导权中占有重要地位,文化领导权的主要作用场域是市民社会,文化领导权的实践主体是有机知识分子,“阵地战”“运动战”和“包围战”是获得和巩固文化领导权的重要策略。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为化解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坚持“三位一体”,加强对市民社会的引导;“三管齐下”,造就强大的有机知识分子队伍;“多面夹击”,综合运用“阵地战”“运动战”和“包围战”。以上措施能有效应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挑战,进一步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不断巩固我国的文化领导权。

关键词:文化领导权;历史虚无主义;市民社会;有机知识分子;阵地战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5.01.011

中图分类号:B5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5)01-0064-07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坚定历史自信,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但多年来,历史虚无主义盛行,削弱了人们的历史自信,否定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进而削弱了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文化领导权是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领导权,这种影响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企图争夺文化领导权的过程。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葛兰西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文化领导权相关问题,为我们应对历史虚无主义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借鉴。但学界较少将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和历史虚无主义结合起来进行研究,鉴于此,借鉴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探索化解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有效策略,对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进而巩固文化领导权大有裨益。

一、三位一体,加强对市民社会的引导

葛兰西结合20世纪20—30年代中西欧国家的

实际,提出“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1]217}。他进一步解释:“我们目前可以确定两个上层建筑‘阶层’:一个可称作‘市民社会’,即通常称作‘私人的’组织的总和,另一个是‘政治社会’或‘国家’。”^{[1]7}这里,葛兰西所说的市民社会“是指非正式的、非暴力的、民间的种种组织结构系统和精神力量,以及间接影响政治的各种辅助力量”^[2],如教会、行会、社区、学校等不受国家直接支配的相对自主的社会团体等。他认为现代社会的统治阶级主要依靠文化领导权对市民社会进行统治。统治阶级往往通过工会、媒体、教会等社会团体,将自身的意识形态向被统治阶级传播,使其自觉认同统治阶级的合法性,自愿服从其统治。如此一来,市民社会成为文化领导权的主要作用场域。

基于对市民社会的深入分析,葛兰西不仅主张无产阶级在革命时期要与统治阶级在市民社会中争夺文化领导权,而且预见无产阶级“即使牢牢掌握

收稿日期:2024-09-17

基金项目:2020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关于‘改革开放前历史时期’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评析及对策研究”(20BDJ023);2022年度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科研专项“文化领导权视阈中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透视”(US22026Y)

作者简介:陈元明(1980—),男,河南周口人,法学博士,桂林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社会思潮、抗战史。

了政权,也必须继续以往的‘领导’。……为行使有效的领导权,就不应单单指望政权所赋予的物质力量”^{[1]38-39}。这是因为即使革命成功,瓦解了资本主义的政治社会,但被瓦解的旧势力还有相当大的力量存在于市民社会这个堡垒中。要夺取这个堡垒,仅靠暴力无济于事,原因在于历史文化存在很大的惯性。葛兰西的这些论断为分析我国市民社会的文化领导权问题提供了启迪。

(一)我国加强对市民社会引导的原因

那么我国是否存在类似葛兰西论述的“市民社会”呢?从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我国的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高度合一,“政治国家做了市民社会要做的几乎一切事情,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几乎任何问题如从就业到家庭矛盾事无巨细都需要由国家及各级政府解决”^[3],几乎不存在类似葛兰西所述的市民社会。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成分由单一公有制转变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经济体制逐步从计划经济转轨到市场经济,政府也逐渐从对经济社会的全方位控制转向宏观调控为主、直接控制为辅。同时,我国城镇化水平迅速提高,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2%跃升至2023年的66.16%^[4],这些变化导致非国家因素在社会上的自主活动空间得到较大拓展,私人领域不断扩大,各类民间组织、社会团体、大众传媒尤其是网络自媒体的种类和数量迅速增多,其中不少组织、团体或媒体不受国家直接控制,具有相对的自主性。因此,我国正在逐渐形成类似葛兰西所述的市民社会。

改革开放以来,在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下,我国对市民社会的文化领导权受到形形色色社会思潮的影响,其中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是影响较大的一种。从国内来看,新中国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被推翻的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等旧势力的拥趸不甘心失败,趁着改革开放后比较宽松的舆论环境兴风作浪,散布否定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和中华民族发展史的种种历史虚无主义观点。从国外来看,冷战结束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总体上长期处于低潮,一些西方国家加紧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反向运用”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在我国市民社会领域大搞文化渗透。历史虚无主义是他们惯用的工具,他们通过一些非政府组织和民间媒体在市民社会中大肆散布历史虚无主义信息,同我国争夺文化领导权。近年来,许多历史虚无主义现象主要来自网络自媒体、民间

组织、境外机构等,这就是明证。这就提醒我们,必须加强对市民社会的引导,有力应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对我国文化领导权的挑战,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懈怠。

(二)加强对市民社会引导的策略

加强对市民社会引导的策略方面,应做到“面”“线”“点”有机结合,三位一体,协同发力。

1. 在“面”上推进唯物史观和历史知识社会化

加强对市民社会的引导,必须在“面”上做足功课。多年来,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一再泛滥,至今死而不僵,其直接原因是大众缺乏科学历史观的指导以及相关历史知识。唯物史观是已被无数实践证明了的科学历史观,不少人也知晓这个概念,但不善于灵活运用,遇到历史虚无主义者散布的鱼龙混杂的信息,就容易被错误观点“带节奏”。历史知识的匮乏也严重影响大众的历史辨析能力,一些人直觉上感到某些历史虚无主义信息有问题,但由于缺乏相关历史知识而无法辩驳,久而久之也容易被错误观点所迷惑。概言之,唯物史观和历史知识社会化程度不高的现状给了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可乘之机。

基于此,我们必须在“面”上大力推进唯物史观和历史知识社会化进程。具体而言,一是广大学者走出书斋,走向社会,尽力将“学术话语”转换为“大众话语”,运用百家讲坛、口述历史、短视频、辩论赛、动漫等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通过多种媒体及时向大众传播正能量的研究成果,并对大众关于唯物史观和历史知识的疑惑作出及时回应。二是相关部门大力加强对网络、电视、书籍、报纸、杂志、自媒体等各类媒体及学校、培养机构等组织从业人员的唯物史观和历史知识教育,因为他们是社会舆论的“把关人”,其唯物史观和历史知识水平直接影响着唯物史观和历史知识的社会化程度。总之,“理不辩不明,事不说不清”,在“面”上推动唯物史观和历史知识的社会化意义重大。抓住了这些“面”就如同抓住了被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攻击的“躯体”,唯物史观和历史知识社会化就是市民社会大众“强身健体”的妙方良药,能有效提高大众的历史认知和历史辨析能力,增强自身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免疫力。

2. 在“线”上加强“五史”教育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我国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要害在于“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5]。长期以来,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主要围绕

否定中国共产党、否定新中国、否定改革开放、否定社会主义、否定中华文明等核心观点展开。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至关重要的指导思想,否定党的领导就意味着否定社会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否定新中国、美化旧中国也是为了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道路;否定改革开放意在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否定中华文明,推崇西方文明,旨在把我国引导到全盘西化的邪路上去。相应的,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和中华民族发展史等“五史”就成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重点攻击的五条“主线”。

鉴于此,我们要反其道而行之,紧紧抓住这五条“主线”,坚定捍卫这五条“主线”,在市民社会中大力加强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和中华民族发展史等“五史”教育,并以“五史”为主线,顺藤摸瓜,对“五史”中的种种历史虚无主义观点进行条分缕析,逐步祛除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这些领域散布的烟雾弹,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概言之,抓住这五条主线就如同抓住了被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攻击的“经络”,加强“五史”教育就像疏通经络,经络通则身体强,从而不断筑牢抵制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多道防线。

3. 在“点”上实施重点突破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对中国历史的所有方面都进行“虚无”,而是有所虚无,有所不虚,往往选择有利于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道路的若干关键点,围绕中国历史的重点、难点、疑点、易混点问题进行虚无。如对中华文明的评价、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评价、革命与改良的关系、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及对孙中山、毛泽东、蒋介石等重要历史人物的评价等。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企图通过歪曲或颠倒在唯物史观指导下经过严肃的研究得出的既有历史评价,趁机在这些重要问题上散播相关历史虚无主义观点。

因此,我们要紧紧围绕受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攻击的这些关键点进行重点突破,将涉及这些关键点的相关问题向人民群众讲清楚,尽力压缩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这些关键点上的生存空间。抓住了这些关键点就如同抓住了被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攻击的“命门”。只有在这些方面实施重点突破,做好防守反击,才能打到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七寸”,有效

减少被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攻击的漏洞,以点带线、以点带面,起到事半功倍之效。

值得注意的是,在对市民社会进行“面”“线”“点”三位一体的引导和教育中,三者必须密切配合,互相支撑,形成强大的“合力”,切忌孤军奋战,更不能相互矛盾。同时,在这一过程中,必须耐心细致地做好说理和说服工作,使人们心悦诚服,而不能动辄强迫人们服从,在自主性较强的市民社会面前,任何强灌硬输都只会适得其反。这里的关键不在于强迫大众违背自己的意愿和良知、屈从统治阶级的权力压迫,而是让个人心甘情愿,积极参与,被同化到统治集团的霸权中来。^[6]在现代国家,文化领导权不仅是政治权力合法性的基本条件,而且是一种保障以广泛认同为基础的政权稳定性的方法。^[7]一个阶级的文化领导权意味着该阶级成功地说服其他阶级自愿接受自己的道德、政治和文化价值标准并予以自觉认同和服从。正如葛兰西所言,“如果统治阶级不再发挥‘领导’作用,只能‘统治’,实施强权,这就意味着广大群众已经脱离了传统的意识形态,失去了从前的信仰”^{[1]229}。如此一来,在市民社会中已获得的文化领导权也可能得而复失。

二、三管齐下,造就强大的有机知识分子队伍

葛兰西认为,知识分子在争取和巩固文化领导权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但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是文化领导权的实践主体。他将知识分子分为“传统的”和“有机的”两大类,传统知识分子代表落伍的生产方式,有机知识分子则是伴随现代生产方式而产生的,与所代表的新阶级联系密切。“有机知识分子”是指能明确表达所属阶级在政治、社会和经济领域的集体意识,批判旧的意识形态,构建本阶级的意识形态,并把这些意识形态通过书籍、杂志、讲坛等大众易于接受的文化方式在整个社会予以传播,^[8]从而为本阶级争取或巩固文化领导权,并觉悟到自己必须同群众保持紧密联系的知识分子。在葛兰西看来,只有有机知识分子才是文化领导权的实践主体。

当今我国的历史虚无主义者也深谙此道,他们借助知识分子的身份,利用其掌握的各种媒体,不断向研究人员、教师、学生等群体传播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相关信息,以争取更多的知识分子加入他们的队伍,弱化我国的有机知识分子队伍,一步步削弱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多年来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蔓延与我国有机知识分子队伍比较单一、力量

涣散密切相关。而缺乏强大的有机知识分子队伍,无产阶级就难以巩固已经获得的文化领导权。因此,我们必须“三管齐下”,灵活运用多种策略,造就强大的有机知识分子队伍,才能有效应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挑战。

(一) 巩固现有的有机知识分子队伍

早在1956年1月,我国宣布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种判断在当时无疑是符合实际的。但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随着阶级阶层的迅速分化,知识分子队伍也发生了一定的分化。因此,我们需要辩证地看待当代知识分子。

近年来,虽然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流行一时,不少知识分子受其裹挟,但仍有许多专家、学者、教师等在勇敢地反击这股思潮,大力维护我国的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这些知识分子是我国现有的有机知识分子,主要存在于宣传部门、社科院所、党校、高校和官方媒体等组织或机构中。这些有机知识分子是国家的宝贵财富,国家相关部门和媒体应该鼓励和支持这些知识分子多出驳斥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精品力作,为其相关活动提供便利。

(二) 培养新的有机知识分子队伍

在新时代,反击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挑战,维护我国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仅靠现有官方、半官方的有机知识分子是不够的。近年来,各类民间组织、自媒体和网络大V等不断涌现,深刻影响着社会公众的思想。鉴于此,我们要善于在各类民间组织、自媒体和网络大V中挖掘正能量的组织和个人,用以发现和培养新的有机知识分子,为我国的有机知识分子队伍不断带来新生力量。“要不断提高人民中越来越广泛的阶层的智识水平。这意味着要努力培养出一种新型的直接从群众中产生出来,而还同群众保持联系的知识分子精英。”^{[1]252}但培养新的有机知识分子队伍并非一蹴而就,往往“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其中包括行动和反行动,结合和分裂以及纷繁复杂的新组织的建立”^{[1]308}。这就需要国家不断加大对正能量的民间组织、自媒体和网络名人等的支持力度,将其整合到有机知识分子队伍中,与现有的有机知识分子队伍密切结合,形成官方与民间的良性互动。

(三) 转化部分传统知识分子

根据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的逻辑,在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是有机知识分子,受封建的、资本主义的思想文化影响较深的是传统知识分子。那么,传统知识分子有可能转化为有机知识

分子吗?葛兰西提出,“任何在争取统治地位的集团所具有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它为同化和‘在意识形态上’征服传统知识分子在作斗争,该集团越是同时成功地构造其有机的知识分子,这种同化和征服便越快捷、越有效”^{[1]4-5}。转化传统知识分子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大有裨益的,既能彰显有机知识分子的感召力和凝聚力,也可减少资产阶级的喉舌和意识形态宣传工具,有助于无产阶级夺取文化领导权。^[9]

散播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知识分子无论把自己包装得多么新颖,其实仍未脱离传统知识分子的窠臼。但受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影响的传统知识分子并非铁板一块,也是分层次的,有些受深层次的影响,有些受浅层次的影响。“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这种策略也可反其道而用之,尽力促使部分传统知识分子转化为有机知识分子,从而扩大社会主义的有机知识分子队伍,这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对此,我们要对受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影响的传统知识分子进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仔细分辨出他们受影响的层次,对受深层次影响的知识分子进行转化的难度较大,而对受浅层次影响的知识分子进行转化相对容易。我们可重点转化受浅层次影响的传统知识分子,逐步用正能量影响他们或让部分有机知识分子伪装成历史虚无主义者,深入其内部,逐步瓦解历史虚无主义者的队伍,对其实施“地下战”等,尽可能多地将其转化成有机知识分子,从而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的有机知识分子队伍,缩小传播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传统知识分子群体。

此外,值得重视的是,有机知识分子不能依靠“散兵式”的孤军作战,那样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往往难以承担巩固文化领导权的重任。这是因为历史虚无主义者往往是团体作战的,所以单个的或某一类有机知识分子是难以有效应对的。鉴于此,要尽快把各类有机知识分子组织起来,进行整合,聚沙成塔,结成文化组织或文化团体,在相关历史问题上统一思想,形成集体意志,最后形成“没有内部矛盾的同质的政治经济历史集团”^{[1]32},进行集体行动,与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协同作战。同时,有机知识分子只有深入群众,深入市民社会之中,从中汲取养分,才能不断获得成长和进步。这是因为“向着知识阶层的每一步跃进,都是和‘普通人’群众方面的类似运动相联系的——群众把自己提高到更高的文化水平,同时向专门化的知识阶层扩大他们的影响范围,产生出具有或大或小的重要性的、杰出的个人

和集团”^{[1]244}。

总之,通过巩固现有的、培养新的有机知识分子和转化“旧的”(部分传统知识分子)“三管齐下”,并且形成合力,深入群众,才能不断造就强大的有机知识分子队伍,从而更好地巩固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

三、三面夹击,综合运用“阵地战”“运动战”“包围战”策略

关于夺取文化领导权的策略,许多学者只强调葛兰西的“阵地战”,其实他提出了多种策略,主要包括“阵地战”“运动战”和“包围战”。“阵地战”是指统治阶级已经取得了市民社会的文化领导权,革命者无法直接摧毁统治阶级的政权,只能首先通过建立自己的文化组织,在人民群众中开展宣传和教育,逐步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文化阵地,最后待时机成熟,夺取国家政权。“运动战”是指直接向资产阶级发起正面进攻,迅速制敌,夺取政权,以速战速决、正面进攻和暴力革命为特征。“包围战”是指集中优势兵力,夺取处于危急中的决定性的阵地,在实施过程中“要求付出极大的耐心和聪明才智”^{[1]194}。

葛兰西所说的“阵地战”“运动战”“包围战”本来是用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争取文化领导权的策略。但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早已获得文化领导权,还需要运用这些策略吗?葛兰西强调文化领导权需要持续维护,即便赢得了政权,也要继续运用这些策略巩固文化领导权;否则,就会导致认同危机,形成统治集团和被统治集团的对立,可能导致文化领导权的丧失。因此,在无产阶级已获得文化领导权的社会主义国家,仍然需要运用这些策略。

值得警惕的是,葛兰西提出的这些策略也可能被国内外反社会主义势力用于争夺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领导权。苏联解体就是前车之鉴,在苏联解体过程中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发挥了重要的“助推器”作用。苏联的历史虚无主义者从否定斯大林开始,发展到否定斯大林领导下的三十年社会主义建设,再到丑化马特洛索夫、卓娅等著名苏联英雄,否定苏联卫国战争,否定列宁,直至否定整个苏联历史。从中可以看出一条比较清晰的脉络:历史虚无主义者以“阵地战”开始,逐步夺取一个个文化阵地,直至用“运动战”和“包围战”夺取核心阵地,最后夺取文化领导权。

冷战结束后,一些西方国家加紧了对社会主义国家文化领导权的争夺,企图像对付苏联那样,用这

些策略对付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我国作为当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首当其冲。多年来,国内外反华势力频频利用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对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开展“阵地战”。他们奉行“宁可一月不将军,不可一日不拱卒”的策略,逐步“从底层破坏历史”,诱导大众怀疑我国社会主义的历史和文化,与我国争夺文化领导权。20世纪90年代的“告别革命”、21世纪初的“重评历史”、戏谑英雄,以及近年来的“精日”、毒教材、毒教辅现象等,都是明证。在这种复杂的形势下,如果应对失当,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有得而复失的危险。幸运的是,在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对我国即将由“阵地战”转向“运动战”和“包围战”的关键时刻,党和国家果断出击,组织部分有机知识分子驳斥了历史虚无主义的种种谬误,并出台《英雄烈士保护法》,立法严惩丑化英雄烈士的行为,初步遏制了这股思潮的泛滥。但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仍然死而不僵,不断地改头换面,继续以软性历史虚无主义、隐性历史虚无主义等形式影响社会,争夺文化领导权。

(一)灵活运用“阵地战”

鉴于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日常的“阵地战”攻击,我们必须灵活运用“阵地战”策略,“以彼之道还施彼身”。

首先,要派大批有机知识分子深入人民群众,认真做好针对性的调研。一要调研人民群众的实际需要,获得人民群众的认同。这是因为文化领导权的“本质目标在于取得人民群众的自觉‘同意’,绝不能是一种不顾后果的单向传输,而必须结合人民群众的需要来建构这种自觉的‘同意’”^[10]。二要调研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具体情况,了解敌情。正如葛兰西所说,“在阵地战中要先‘侦查’地形,分析资产阶级是以哪些‘战壕和堡垒’成分捍卫其政权的……只有这样,无产阶级的新道德、新理想、新生活方式等才能彻底攻克一座又一座资产阶级的‘暗堡’”^{[1]27}。如此,就能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其次,有机知识分子要注意思想理论的大众化。在宣传中,有机知识分子要把批驳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理论性较强的学术语言及时转化为普通群众容易理解的通俗化的大众语言,逐一驳斥和澄清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制造的种种谎言和迷雾,采取短视频、动漫、影视、海报、宣传画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并通过各种大众媒体和自媒体把正能量的相关历史研究成果传播出去,进行有效的文化引导,将被这股思潮影响的普通人的“微小思想”一一纠正过来,渐进

式地提高其思想觉悟和历史辨析能力,逐步“从底层修复历史”。

最后,有机知识分子要多关注微观层面的民众日常生活。有机知识分子要在细微的日常生活中逐步改变人民群众的心理倾向和思想观点,这需要树立持久作战的思想,不可操之过急,因为这是一个漫长的“分子过程”,其中可能会有反复,需要足够的耐心。在实施“阵地战”过程中,要“永不懈怠地重申自己的论据(虽然要提供花样翻新的表达形式):重复是影响群众思想的最好的教导手段”,因为这是“某种特定的、为任何旨在取代常识和旧世界观的文化运动所必须满足的要求”^{[1]252}。但要特别注意绝不能只是机械地、简单地重复,那样只会让人产生反感,而要灵活多样地采用不同形式从不同角度不断强调类似论断,以使人们对这些论断习以为常,自觉认同,从而逐步收复被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夺走的各个文化阵地。

(二)适时采取“运动战”

“阵地战”固然重要,但“运动战”也不可或缺。葛兰西虽然对“阵地战”倍加重视,认为“运动战更多地被阵地战所取代”^{[1]198},但并未说完全取代。他进而提出“阵地战到一定的时机又转化为运动战”^{[1]185},可见他对“运动战”还是比较重视的。关于夺取和巩固文化领导权的具体策略,不能拘泥于一时一地,而一定要根据当时当地的情况灵活运用。毕竟,已经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中国与葛兰西所处的时代、地域和环境有很大差异,中国共产党已连续执政七十多年,早已取得了文化领导权,只是受到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一定的威胁,并未丧失文化领导权。鉴于这种情况,我们党既要高度重视“阵地战”,也要充分利用自身的执政地位、不失时机地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发起正面的进攻,开展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如近年来开展的“四史”学习教育,就是反击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一种“运动战”。在前期反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阵地战”取得一定成效的基础上,通过这种大规模的历史主题教育,往往可以在短期内迅速向人民群众普及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相关历史知识,从而压缩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影响人民群众的空间。在实施“运动战”过程中,党和政府相关部门还可以抽调精兵强将适时组织“突击队”(其成员不必为固定工作所羁绊),给予充足的活动经费,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渲染的一些突出问题(如否定革命、“精日”现象、丑化英烈等)进行重点

进攻,组织精心选择的人员进行突袭,“可以不分昼夜出其不意地发动决定性攻势”^{[1]188},这样能较快地解决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相关的一些棘手问题。此外,开展“运动战”也要注意对历史虚无主义者进行分类处理。虽然同为历史虚无主义者,但根据其散布的错误观点的不同,也有不同的类型,有些属于思想认识问题,有些则属于法律问题。对属于思想认识问题的历史虚无主义者,要以说服教育为主,指出其错误所在,促使其改过自新;对属于法律问题的历史虚无主义者,要依法处置,如果法律在这方面存在漏洞,应及时立法。

(三)精准开展“包围战”

除“阵地战”和“运动战”外,夺取和巩固文化领导权的策略还有“包围战”。葛兰西提出“如果由于种种原因,某些阵地失去了自身的价值,只有决定性的阵地处于危急当中,人们就会转向包围战”,也即调动各种力量对决定性的阵地进行长期围困,迫使敌方逐渐丧失抵抗意志,停止抵抗,最终我方获得胜利。就当前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而言,其决定性的阵地是历史观上的唯心主义和方法论上的形而上学,表现在贬低革命、贬低社会主义、贬低中国共产党、贬低中华文明等方面。夺取这些阵地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不可操之过急,在开展“阵地战”和“运动战”的同时也需要开展长期的“包围战”。实施“包围战”首先要选准对象,抓住主要矛盾,进行重点突破,这是因为“在意识形态战线,辅助部队和较为次要的附庸者的失败,连微不足道的重要性也不具备。在这里,必须同最杰出的敌手交锋”^{[1]345-346};其次要集中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为长期围困决定性的阵地做好充分准备,使被围的历史虚无主义者在较大的力量差距面前逐渐丧失斗志;最后要付出极大的耐心和聪明才智,使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被围营盘抵抗得越久,士气就会越低落,随之产生痛苦、疲倦、困乏、疾病,继续发生不断破坏的慢性危险”^{[1]194},直至获得最后的胜利。

总之,应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挑战,巩固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不仅要重视“阵地战”,而且要重视“运动战”和“包围战”,三者密切结合,适时转换,灵活应用,努力实现“1+1+1>3”的良好效果。

四、结语

综上所述,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为我们今天应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对我国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的挑战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当前,有效应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对我国文化领导权的严峻挑战,必须

做到“面”“线”“点”有机结合,加强对市民社会的引导;三管齐下,造就强有力的有机知识分子队伍;多面夹击,灵活实施“阵地战”“运动战”“包围战”等策略,逐步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自觉认同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不断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逐步巩固党和国家的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

参考文献:

- [1] 安东尼奥·葛兰西. 狱中札记[M]. 曹雷雨,姜丽,张跖,译.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
- [2] 杨仁忠. 葛兰西市民社会观念的文化转向及其理论意义[J]. 理论探讨,2010(1):36-39.
- [3] 梁涛,冯晓艳. 市民社会、“阵地战”和“有机知识分子”:兼论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战略[J]. 甘肃社会科学,2006(6):185-187.
- [4] 国家统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 展统计公报[N]. 人民日报,2024-03-01(010).
- [5]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习近平同志关于党的历史的重要论述[J]. 中共党史研究,2013(9):7.
- [6] 陆扬,王毅. 大众文化与传媒[M]. 上海:三联书店,2000:39.
- [7] 刘莘. 葛兰西:文化领导权及其诠释[J]. 探索,2007(2):143-147.
- [8] 谷少杰. 试论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理论及其当代启示: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到葛兰西[J]. 天府新论,2012(2):114-118.
- [9] 冯燕芳. 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再审视[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7(6):44-52.
- [10] 谢琦. 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及其对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启示[J]. 学习与探索,2020(5):9-16.

(责任编辑 谢春红)

The Reference of Gramsci's Thought of Cultural Hegemony on Resolving Historical Nihilism

CHEN Yuanming

(School of Marxism, Guilin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Technology, Guilin, Guangxi 541004, China)

Abstract: Gramsci has systematically discussed the idea of cultural hegemony by addressing the questions of “where to establish”, “who constitutes the agents” and “how to achieve it”. He argues that cultural hegemony holds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modern national leadership, with civil society as its primary domain, organic intellectuals as its key agents, and strategies such as the “war of position” and “war of manoeuvre” as central means to secure and consolidate hegemony. Gramsci's idea of cultural leadership provides a valuable reference for dissolving the trend of historical nihilism. Accordingly, in order to dissolve this trend, it is necessary to adhere to the “tripartite approach” and strengthen the guidance of civil society; create a strong team of organic intellectuals via “three-pronged approach”; comprehensive adopt “multi-dimensional tactics” like the “war of position” and “war of manoeuvre”. Only through those measures can we effectively cope with the challenges of historical nihilism and further strengthen our historical self-confidence and enhance our historical initiative. It is only by effectively countering the challenges of historical nihilism, further strengthening historical self-confidence, enhancing historical initiative, and continuously consolidating China's cultural hegemony.

Key words: cultural hegemony; historical nihilism; civil society; organic intellectuals; positional warfare

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规则的历史演进与启示

江虹

(湖南农业大学 公共管理与法学学院, 湖南 长沙 410128)

摘要: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规则即 SPS 规则的制定、发展和完善是一个不断演进的历史过程。20 世纪 80 年代,为应对异化的 SPS 措施给自由贸易带来的障碍,SPS 规则开始产生;20 世纪末,WTO 多边自由贸易体制下 SPS 规则逐步完善,SPS 规则的制定目的也是发展变化的,其适用实效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21 世纪上半叶,SPS 规则先呈现出鲜明的区域主义特征,后又呈现出实体性、程序性要求高标准发展趋势。SPS 规则的历史演进对中国的启示主要有:SPS 规则的理念应与时俱进、中国自贸协定应引入高标准 SPS 规则、中国农产品安全标准应加强对外输出。

关键词:SPS 措施及规则;高标准发展;制度型开放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5.01.012

中图分类号:R18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5)01-0071-05

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以下简称 SPS 措施)是各国为保护农食产品安全与人类健康而采取的动植物检验检疫法律法规、标准和程序的总称。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规则(以下简称 SPS 规则)旨在规制各国 SPS 措施,防止其异化为非关税壁垒,从而实现农食产品安全与自由贸易间的平衡。在当今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的大背景下,成员国以农食产品安全为由重新筑起技术性贸易壁垒,这给 SPS 规则带来了新挑战。自 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SPS 规则已实施了 30 余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梳理 SPS 规则的历史演进与发展脉络,阐述 CPTPP 协定超越 WTO/SPS 协定的新发展,对中国双边及多边经贸谈判具有较好的示范与借鉴作用。同时,基于中国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新需求,梳理中国高标准 SPS 规则“引进来”与“走出去”的历程,对消除技术性贸易壁垒、推进中国高水平开放、对接高标准 SPS 规则、提高中国在 SPS 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一、SPS 规则产生的历史背景

任何社会现象的产生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

SPS 规则的产生与农产品自由贸易的发展关系密切。自由贸易极大改变了农食产品生产、加工、分配和消费模式,也使污染物、毒素、致病有机体等安全风险种类增多、跨境传播概率增加。^[1]不采取任何控制或限制措施的农食产品自由贸易,显然违背国际社会维护公共健康的职责,也违背各国开展自由贸易的本意。这些为保障本国农食产品安全与公共健康而采取的安全措施被称为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简称 SPS 措施)。因此,对自由贸易的限制也是 SPS 措施的应有之义,而这也为贸易保护提供一定的空间。^[2]各国在满足对农食产品安全与公共健康要求的同时,极易倾向于不断扩大政府监管自由裁量权,强调国家公共政策的自主性,尤其在一些敏感领域,从而使 SPS 措施逐渐偏离其保护人类、动植物生命与健康的初衷而异化成为贸易保护手段。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贸易保护主义盛行,除了关税、配额、进口许可证等传统贸易保护手段外,异化的 SPS 措施因其隐蔽性、多样性与差异性而成为更复杂的技术性非关税贸易壁垒。^[3]1985 年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指出,国际贸易的非关税壁垒已经变

收稿日期:2025-01-04

基金项目:2024 年度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自贸协定对接高标准 SPS 规则研究”(24ZDB017)

作者简介:江虹(1981—),女,内蒙古包头人,博士,湖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与法学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法制史研究。

得比关税更重要,特别是在农产品贸易方面。异化的 SPS 措施构成自由贸易的主要障碍,对 SPS 措施进行必要的国际规制尤为重要,故而 SPS 规则的产生成为历史必然。

二、SPS 规则的历史演进与发展

(一)20 世纪末:多边自由贸易体制(WTO)下 SPS 规则的演进

1. SPS 规则的生成

SPS 规则的生成经历了一个由初创到完善的历史过程。WTO 成立前,1947 年 23 个国家共同签署《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简称 GATT1947),开始涉及自由贸易与公共健康领域的规制,这是 SPS 规则的萌芽阶段。1973 年 9 月,GATT 缔约方在东京回合谈判时通过了《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规范各成员实施的与食品安全、人类生命与动植物健康保护有关的技术法规。该协定仅对 32 个缔约国有效,缔约国有限加之争端解决机制不完善等原因限制了协定的应有作用和实际约束力。至此,SPS 规则已初现端倪。为顺应国际贸易的发展,乌拉圭回合谈判于 1993 年 12 月签署《农业协定》(包含 13 个部分 21 个条款),基于第八部分第 14 条“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而产生《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即《SPS 协定》,期望农产品国际贸易不会被变相异化的壁垒措施所侵害。

2. SPS 规则的目的

SPS 规则的目的也有一个发展变化的历史过程。SPS 规则产生之初仅作为多边自由贸易体制下保障公共健康的例外条款,随着《SPS 协定》的实施,规则的目的已经超越“例外条款”的定位。《SPS 协定》既明确各成员有权采取 SPS 措施保护本国公民、动植物生命健康与安全,又要求各成员所实施的 SPS 措施必须符合其自由贸易的义务。协定核心规则即科学证据、国际协调及风险评估与适当保护水平,规则旨在确保各国基于科学理由而采取 SPS 措施,没有充分科学依据不得实施,以便实现贸易自由化与农食产品安全之间的协调。^[4]一成员采取必要的 SPS 措施,既是主权权利的体现,也是国际贸易正常开展的条件。“促进贸易自由化”与“保护农食产品安全与公共健康”这两种价值目标之间存在着冲突,然而,虽有冲突但无法舍弃其一,必须加以兼顾才可维系与增进国际社会的基本秩序、自由、效率及福利。^[5]

3. SPS 规则的适用实效

SPS 规则的适用实效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世贸组织成员因采取 SPS 措施而发生贸易纠纷可提请 WTO 争端解决机构处理,从而,WTO 争端解决机

构诉讼案件反映了 SPS 措施贸易争议状况,也反映了《SPS 协定》的实施实效。《SPS 协定》自 1995 年生效至 2025 年初,提交 WTO 争端解决机构的 SPS 案件共有 54 起,这些案件呈现如下特点:

一方面,发达国家在 20 世纪末及 21 世纪第一个 10 年利用争端解决机构解决纠纷较为积极。在 54 起 SPS 措施贸易争端案件中,起诉方是发达国家的案件为 33 起,占案件总数的 61.1%,起诉方是发展中和不发达国家的案件为 21 起,占案件总数的 38.9%。美国、加拿大利用争端解决机构较积极。发展中国家提起交涉的案件不占多数,但这并不等于发展中国家受到贸易限制也少。SPS 措施贸易争端涉及复杂的科学技术问题,既对交涉人才要求较高,也对安全检疫检测手段要求较高,这些都是制约发展中国家提起贸易争端案件的重要原因。21 世纪第二个 10 年,全球化遭遇逆流,WTO 多哈回合步履维艰,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2018 年因美国的阻碍,WTO 争端解决机构陷入停摆状态,各成员无法正常利用 WTO 争端解决机构解决纠纷。

另一方面,协定实施 30 余年间,争端案件审结或解决的比率不高,许多案件仍悬而未决。54 起争端案件中,经专家组或上诉机构程序审结案件仅 14 起,占案件总数的 25.9%;双方达成解决方案审结的案件 11 起,占案件总数的 20.4%,其余案件仍处于磋商阶段或专家组组建阶段。这表明自由贸易与农食产品安全、公共健康问题属于各成员较为敏感的事务,涉及不同成员诸多利益冲突,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SPS 协定》本身存在模糊或不明确等问题,使争端各方及争端解决机构对规则适用争议较大,不容易得出结论。

(二)21 世纪初:区域自由贸易协定下 SPS 规则的历史发展及评析

二战以后,多边贸易体制的建立使区域一体化与全球一体化同步发展;20 世纪下半叶,多边贸易议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21 世纪上半叶,区域一体化进程呈现出鲜明的区域主义特征。WTO 多哈回合谈判由于各不同成员利益冲突而陷入僵局,各成员纷纷向区域合作与自由贸易区寻求突破,自由贸易协定因成员较少、形式灵活而迅速发展。因此,自由贸易协定以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专章形式纳入 SPS 规则越来越成为一种发展趋势,SPS 规则也从 WTO 框架下的《SPS 协定》逐渐向双边、区域自由贸易协定中的 SPS 章节发展。

1. SPS 规则的历史发展

CPTPP 协定是晚近大型区域贸易协定的新模

式,协定全称《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于2018年生效,旨在通过消除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以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致力于实现更高水平的市场准入和贸易便利。CPTPP协定第七章为SPS规则,其发展理念在于超越WTO/SPS规范体制,包含诸多SPS-beyond规则和SPS-plus义务,代表未来国际规制SPS措施的发展方向,日益成为塑造SPS规则的重要力量。鉴于SPS规则内容繁杂,本文选取直接规制SPS措施的科学证据、风险评估、国际协调、预防原则等核心实体规则,以及间接协调SPS措施的等效性、适应地区条件及透明度等程序性规则加以分析。

(1) 实体性规则

科学证据与风险评估规则发展变化较大,CPTPP协定纳入严格的科学证据规则与完整的风险分析规则。该协定第7.9条规定的成员确保其SPS措施遵循科学原则,成员采取的SPS措施应“符合”相关国际标准、指南或建议,否则应保证这些措施以相关的“记录在案的客观科学证据”为根据。CPTPP协定引入“风险分析”规则,区分风险评估与风险管理两个不同概念与过程,且纳入风险沟通环节,形成完整的风险防控机制。CPTPP未明确提及预防原则,仅在第7.14条规定了“紧急措施”条款,该条款允许成员采取为保护人类、动植物生命或健康必需的紧急措施。

(2) 程序性规则

等效承认与区域化规则在20世纪末多边贸易体制下的规定简单化,很难被成员援引适用,CPTPP协定对规则予以细化、提高了其可执行性。CPTPP协定第7.8条要求成员在可行且适当的限度内“应当”对一组措施等效互认或在全体体系基础上等效互认,且对进口方承认出口方SPS措施等效性的具体要求做出规定。有关区域化条件的规定,CPTPP协定第7.7条要求进口方应在合理期限内启动评估并确定流程,如未能做出承认则应提供理由。与WTO/SPS协定相比,CPTPP协定增强了区域化认定过程中进口方的证明责任,进口方不认可地区条件时须承担相应证明责任。CPTPP协定第7.13条规定了SPS透明度规则,在SPS措施公布、信息交换、及时通知等方面,比WTO/SPS协定要求更加详细、具体。CPTPP协定第7.11条进口检查规则和第7.10条审核规则,体现了CPTPP协定对WTO/SPS协定的发展和突破。进口检查规则明确规定进口检查过程中的信息公开和进出口方的权利义务,重在强化进口方义务。审核规则规定了审核的参考因

素、内容和完整程序,且强调以体系为基础进行审核。

2. SPS规则评析

21世纪初,CPTPP协定对20世纪末多边自由贸易体制下WTO/SPS协定的增进与发展主要体现为程序性SPS监管合作的规定,而实体性规则既有SPS-plus要素,也有对WTO/SPS协定的偏离。

(1) 实质性规制:有突破、有不足

CPTPP协定中纳入风险分析规则,为风险评估与风险管理的区分提供了文本基础,该规则不仅强调风险评估与风险管理是两个不同过程,而且提高了对风险交流义务的要求。CPTPP协定引入“记录在案的客观科学证据”规则,试图提高各成员实施SPS措施的门槛,增加SPS措施滥用的难度,但也存在对科学理解的局限性,该条规定看似提高SPS措施规制要求,促进贸易自由化,实质上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成员的SPS监管主权。

SPS规则通过援引国际标准,协调各成员SPS措施,旨在限制成员利用自身科学技术优势,任意提高市场准入的技术与标准门槛。WTO/SPS协定使用了“based on”(根据)国际标准与“conform to”(符合)国际标准两个不同词语,但对其含义没有明确界定,从而对发达国家实施比国际标准保护水平更高、更严格措施的做法缺乏实质性的约束力。因此“根据”与“符合”国际标准的含义以及与此相关的举证责任认定问题一直处于争议之中。然而CPTPP协定对此没有专门规定,笼统沿用WTO/SPS协定规定,维持SPS-equal水平。

CPTPP协定紧急措施规则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WTO/SPS协定第5.7条规定,但并不能取代预防原则,因为紧急措施规则与预防原则存在本质区别。紧急措施规则表明其为紧急情况而设计,这意味着紧急措施只能涵盖部分预防原则的适用范围,因此一定程度上紧急措施规则是对预防原则的偏离,呈现出SPS-minus倾向。此外值得注意的是,CPTPP协定将生物技术产品(包括转基因农食产品)置于国民待遇和市场准入章节予以规制,这种规定实质上是对生物技术产品的一种软化或弱化规制。

(2) 程序性规则:SPS监管合作呈SPS-plus特点

CPTPP协定关于对等效性、适应地区条件、透明度、审核等程序性规则进行完善,扩展延伸出诸多SPS-plus义务,旨在促进监管合作、提升监管效率、消除不必要的监管壁垒。WTO/SPS协定对SPS措施等效承认、区域化条件以及透明度等规定,相对简

单,CPTPP 协定对上述规则进行细化完善,以提高规则的可操作性与可执行性,增强监管环境透明度。

值得注意的是,CPTPP 协定不仅在 SPS 章节对监管合作做出规定,而且专章规定监管一致性,代表了高标准自贸协定发展新趋势。监管一致性是自贸协定深化发展的重要议题,虽是一个横向议题,但可渗透到任何一个具体领域。监管一致性议题是在从传统关税贸易壁垒向非关税、“边境后”措施壁垒转变的背景下出现的。监管一致性被视为消除监管壁垒、促进市场更加开放、推进经济一体化深化发展的重要手段。

三、对中国的启示

探讨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规则的演进历史,对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推进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对接高标准 SPS 规则具有重要的历史启示:

(一)高水平开放背景下 SPS 规则理念应与时俱进

1978 年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主要从事商品、生产要素和服务进出口贸易,这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这种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顺应了当时经济全球化发展大势,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当今国际社会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逆全球化浪潮下,中国作为贸易大国受到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负面影响,与此同时,对外贸易中的土地、劳动力等低成本要素逐渐丧失竞争优势,亟须寻找新的发展红利,中国需要从要素比较优势驱动转变为制度竞争优势驱动。^[6]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再次强调,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机制体制,以开放促改革,深化外贸体制改革。制度型开放的核心在于国内与国际两个层面规则与制度趋于“一致”:一是规则与制度的“进口”,即在国内形成与国际经贸领域高标准要求高度衔接的规则制度体系;二是规则与制度的“出口”,即将国内已经正式制度化的规则体系转变为国际通行的制度体系。^[7]

新时代,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是中国扩大对外开放与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在此背景下,中国的身份和利益双重性开始凸显,中国不应固守“发展中国家 SPS 规则”的理念。国家身份二分法总体符合国际社会现状,但是关于“发达”或“发展中”的判断说到底还是程度问题,不可绝对化。对待二分法,我们应用辩证的、历史的、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中国实力快速增长,国家利益和身份定位也在变迁,不宜

使用统一不变的标准将自己的身份僵化。因而,中国应从过去处处强调“防守需要”的发展中国家立场,转向逐渐展示主动性、进取性的态势,不囿于“发展中国家 SPS 规则”的传统定位,实现“攻守结合”,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和改革的独特利益点,争取国际经贸规则话语权。^[8]

(二)中国自贸协定应引入高标准 SPS 规则

自由贸易协定是中国对接高标准经贸规则的重要平台。中国自贸协定建设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即起步阶段(2001—2005 年):2002 年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签署,正式开启自贸区合作框架。第二阶段即快速发展阶段(2005—2010 年):2007 年中国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双边、多边经贸合作快速发展。第三阶段即新发展阶段(2010 年至今):国际经贸新格局下中国积极参与高标准自贸协定谈判,引入“21 世纪议题”。截至 2025 年初,中国已与 30 个国家和地区签署 23 个自由贸易协定,除个别开放程度较高的自贸协定如 RCEP 以外,中国多数自贸协定 SPS 规则以 WTO/SPS 协定为基准,基本移植 WTO/SPS 协定内容。WTO/SPS 协定核心规则的模糊性,使其对 SPS 措施规制水平不高,已然无法有效规制 SPS 措施的滥用和异化,协定原有设定与规则体系面临重塑。因此,中国自贸协定 SPS 规则,应立足国际经贸规则重构与制度型开放新要求,对接高标准 SPS 规则,使规则范围与内容不断拓展 SPS - beyond 和 SPS - plus 义务。

1. 纳入风险分析与预防原则

中国自贸协定 SPS 规则应纳入风险分析规则,从而提高 SPS 措施规制水平。风险分析包含风险评估、风险管理和风险沟通三部分,其中包含的 SPS - plus 义务既可防范农产品安全风险,又可避免 SPS 监管措施的变相滥用。中国自贸协定 SPS 规则应纳入预防原则,预防原则与风险确定情况下所采取的意图防险的风险政策有所不同,预防原则适用于科学证据不确定的情形。

2. 细化 SPS 监管合作规则

中国自贸协定 SPS 规则应强化 SPS - plus 义务,从而推进深层次 SPS 监管合作。当前中国自贸协定 SPS 规则侧重于有关主管机构间技术合作与交流,这种合作属体制性监管合作,合作形式较为松散,且合作的范围与深度有限,对 SPS 措施并无直接规制作用。因此,中国自贸协定 SPS 规则应重在通过补充、细化或深化等效性、适用地区条件、审核及透明度等规则,来推进深层次 SPS 监管合作。监管

一致性是中国有效参与全球经贸治理无法回避的议题,对中国的重要性日趋上升。监管一致性移植于美国国内行政法,内涵并不十分清晰,且涉及国家监管主权让渡,触及各国监管体制,在具体操作上尚存诸多权衡因素,中国自贸协定不可盲目推进,软性推进 SPS 监管一致性是适合中国的务实做法。

3. 强化 SPS 规则约束力

部分中国自贸协定规定 SPS 章节(也即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章)不适用或暂不适用争端解决机制,这种规定使 SPS 规则陷入软法困境。强化自贸协定 SPS 规则约束力,需将自贸协定争端解决适用范围扩大至 SPS 规则,以增强争端解决机制的硬性约束保障。

(三) 中国农产品安全标准应加强对外输出

为适应高标准 SPS 规则,应加强国内农产品安全标准建设,防止农产品安全标准与高标准 SPS 规则脱节。SPS 规则 30 余年演进历史表明:国际标准是协调各国 SPS 措施的重要手段,SPS 措施与国际标准的相符性越高,其合法性越容易被证明。对中国而言,采纳国际标准不仅能有效保障农产品安全,也是证明 SPS 措施正当化最简便的方式。如果将中国国家标准融入国际标准,则既可减少被动接受带来的遵从成本,又可减轻贸易争端中的举证责任。

中国融入国际标准的进程包含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移植国际标准,即参考国际标准建立国家标准框架;第二阶段为深度参与国际标准体系的制定;第三阶段为在国际标准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即从国

家标准参照国际标准转变为通过国际标准推广国家标准。中国农产品安全标准建设目前处于第二阶段,并致力于向第三阶段过渡。中国应强化与国际标准化机构的深度合作,将国内农产品安全标准体系置于国际环境并且开放可塑,才能在标准化领域作为引领者而非追随者,实现规则、标准的“走出去”。

参考文献:

- [1] 石阶平. 食品安全风险评估[M]. 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10:10-12.
- [2] 董银果. 中国农产品应对 SPS 措施的策略及遵从成本研究[M].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1:26-29.
- [3] 王贵国. 世界贸易组织法[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9-11.
- [4] 王传丽,史晓丽,周超. WTO 农业协定与农产品贸易规则[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9.
- [5] 肖冰. 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研究[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30-31.
- [6] 王宝珠,王利云,冒佩华. 构建新型国际经济关系:理论与实践——兼析“制度型开放”[J].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2020(6):88-89.
- [7] ZHANG YUYAN. China's Opening Up: Idea, Process and Logic [J].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2019(2):145-146.
- [8] 刘彬. 新时代中国自由贸易协定法律范式研究[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177-178.

(责任编辑 谢春红)

Evolutionary History of SPS Rules and Enlightenment

JIANG Hong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Law,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128,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19th century, free trade agreements have undergone significant changes, but trade protectionism has never been eliminated. The SPS measures that were alienated in the 1970s became an important non-tariff trade barrier. At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Agreement on Sanitary and Phytosanitary Measures became the main rule regulating SPS measures under the WTO multilateral free trade system.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1st century, SPS measures have exhibited distinct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Over time, they have further evolved toward heightened substantive and procedural standards.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SPS measures offers China three key insights: the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SPS measures must evolve with the times; China's Free Trade Agreements should incorporate high-standard SPS provisions; and China's agricultural safety standards need to enhance their international promotion.

Key words: SPS rules; high standard development; institutional openness

新时代以来电视剧中妇女主任形象的 呈现形态与建构策略

梁园园¹, 金守波²

(1. 巴音郭楞职业技术学院, 新疆 库尔勒 841000; 2. 信阳学院, 河南 信阳 464000)

摘要: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农村题材电视剧拍摄在数量和质量层面取得了长足发展。其中以表现妇女主任形象为主要特征的剧情片得到了众多国人的肯定。究其原因,不仅得益于演员的精湛演出,更体现在妇女形象的形态呈现与建构策略的科学性和新颖性,其一反传统人物塑造中的“扁平化”创作手法,取而代之的是“圆形人物”的形象勾勒,进而使新时代农村妇女主任形象以朴实而真挚、平凡而伟大的荧屏形象进入国人的视野。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新时代农村电视剧妇女主任形象虽然颠覆了传统电视剧叙事中一味强调的“半农半官”女性特质,但在艺术审美效果与现实意义表征等方面还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需要以“艺术的真实”创作理念来贯穿整个情节叙事,从而为中国农村电视剧的健康发展提供方法与策略借鉴。

关键词:新时代;农村电视剧;妇女主任形象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5.01.013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5)01-0076-07

从当下的文学艺术创作形式来看,电视剧欣赏依然是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审美途径;通过对电视剧人物形象以及情节叙事的现代呈现,电视观众足不出户就可以实现高质量的艺术欣赏。“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的农村电视剧在荧屏热播,并几度创下了可观的收视率。农村电视剧作品中的‘新农村人物形象’,已逐渐成为当下电视观众喜闻乐见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1]党的十八大以来,为了更好地助推新农村建设,以塑造妇女主任形象的农村电视剧逐渐流行开来,这些电视剧多是讲述妇女主任在乡村一线践行党的扶贫政策的故事。由于农村电视剧表现的是农民、农村、农业等问题,人民群众在观看的过程中比较容易产生心灵共鸣,进而实现高质量的电视剧艺术审美体验。“在诸多的电视剧中,电视剧的文本作者直面人生,多视角表现各种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诠释多彩的生活和人的生命现象。这样的作品用时代的精神和人物的心灵感动着

受众。”^[2]因此,将农村题材的电视剧搬上荧屏,可以让人民群众在内心层面产生身份认同感,也可以通过各色人物的精彩演绎,更好地将新农村建设中的巨大变化呈现给观众。总的来看,以农村妇女主任为主要表现对象的农村电视剧有助于人民大众在情感层面获得一定的价值认同与情感共鸣,而对女性角色的深入挖掘,将会使电视观众对基于女性视角的价值理念产生认同。

一、新时代妇女主任形象与农村电视剧艺术叙事

妇女主任是由妇女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基层妇女干部。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49年3月24日至4月3日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在这次由近500位妇女代表出席的盛会上,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正式成立。“国家对农村社会进行了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一直游离于政权统治之外的农村妇女被纳入现代国家的控制之下,在妇女解放的话语下完成了从‘家庭人’向‘社会人’的身份

收稿日期:2024-11-06

作者简介:梁园园(1986—),女,河南偃师人,文学硕士,巴音郭楞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化传播、语文教育。金守波(1983—),男,河南濮阳人,文学硕士,信阳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影视美学、文学批评。

转型。”^[3]此后,新中国成立后的农村女性开始步入有意识地争取属于自己的公民权利的阶段。“中国农村妇女参政方式主要通过村民委员会中女性委员和村民代表大会中女性代表‘专职专选’制度来实现的。该制度是对男性与女性在参政领域不平等地位的现实承认,打破了女性在既有政治格局中的从属地位和结构性障碍。”^[4]妇女主任作为农村基层妇女干部,对于提高农村妇女自身的政治地位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妇女主任这一身份包含着女性意识觉醒与传统男权思想的对抗,也交织着国家权力的执行与群众利益的代言,其承载着多重天然的矛盾。矛盾冲突历来是戏剧的灵魂,而妇女主任角色被搬上荧屏亦是时代发展的必然。农村社会中的妇女主任往往是众多农村妇女的“形象代言人”,她们是维护农村妇女权益的现实执行者,在农村基层社会的扶贫工作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扶贫叙事的现实关怀特性延续了农村电视剧与现实同步的创作传统,反映了精准扶贫的现实要求,并继承了‘入世’的中国传统艺术观。”^[5]对农村题材电视剧中妇女主任形象的形态呈现与建构策略进行深入研究,可以作为带领广大人民群众一起感知新时代农村改革发展时代背景下广大农民心路嬗变的一把金钥匙,同时也为我国新时代农村电视剧的角色塑造和整体发展提供价值参照。

进入新时代以来,随着国家对农村扶贫政策的大力实施,在电视剧创作领域也取得了新成就。“近年来农村题材电视剧在备案、发行数量上呈现出快速增长趋势,也出现了多部精品力作,显示出这一题材良好的创作势头。”^[6]根据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的全国拍摄制作电视剧备案公示的数据统计,2019年全国电视剧拍摄制作备案公示的剧目共905部,当代农村题材77部,占比8.5%。2020年全国电视剧拍摄制作备案公示的剧目共670部,当代农村题材82部,占比12.2%。2021年全国电视剧拍摄制作备案公示的剧目共498部,当代农村题材60部,占比12.05%。可以看出近年来农村题材电视剧拍摄制作的比重有所上升且相对稳定,而涉及妇女主任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的电视剧主要有《兰桐花开》(2019年)、《最美的乡村》(2020年)、《好雨知时节》(2021年)、《温暖的味道》(2021年)、《功勋》(2021年)、《大山的女儿》(2022年)等。这些电视剧中的农村妇女形象“主要类型有:生产经营型、政治引领型、文化传承型、社会建设型和生态治理型。她们的典范事迹丰富多彩,体现出

爱国爱党、心系农村,求真务实、真抓实干,艰苦奋斗、勤劳俭朴,爱岗敬业、无私奉献,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等精神特质。”^[7]总体来看,农村电视剧中的妇女主任形象有助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发展,并将以正能量的形态构建来推动故事情节的进一步发展。

二、新时代妇女主任形象在电视荧屏中的多样化呈现

(一)作为配角的妇女主任形象:脱贫攻坚交响乐中的最强和声

许多农村电视剧中的妇女主任形象多是一些小角色,但却突显出她们尽职尽责的质朴品质与责任担当。《最美的乡村》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重点剧目,于2020年6月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黄金档首播。“该剧在人物塑造、叙事结构和内涵开掘等方面都进行了创新性尝试,与此前相同类型的电视剧相比表现出一些新的美学特质:‘高矮结合’的人物塑造方式、类三部曲和复合序列的叙事结构,以及精准扶贫和个人价值相结合的内涵开掘。”^[8]

人们常说妇女能顶“半边天”,在现实生活中亦得到了印证,此种情况被称为“超半效应”。“新时代农村妇女受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农业机械化的大力推进、科学种养技术的广泛推广,为农村妇女进一步发挥‘超半效应’提供了文化基因、时空条件和科学支撑。”^[9]在《最美的乡村》中,妇女主任牛姐的衣着具有天然的农民气质,她身着藏蓝色宽松衬衣,愈发显得皮肤黝黑,而爽朗的语言特点与大方的肢体行为,彰显出牛姐要强的妇女主任风范。当牛姐与叶冰见面问好时,她并没有局限于对个人生活现状的描述,而是直接告诉叶冰村里最为红火的当数高端旅游合作社以及养蜂合作社,其目的就是突出此行来意。其次,当叶冰询问绣品的创作者是谁时,妇女主任牛姐则能够凭借线头的颜色和长短快速认出39位绣娘的作品,以至于叶冰都发自内心地夸赞牛姐担任妇女主任最为称职。在这一简短的场景演绎中,导演与编剧试图通过较为细致的言语和行为描述,来体现这些描述对故事情节的联结与支撑作用,从侧面亦体现了小角色表现出来的大担当。

一般而言,农村电视剧的情节勾勒往往蕴含了对现实社会的艺术反映,而妇女主任角色的设置亦蕴含了具体而深刻的人生成长感悟。“作为以影像艺术反映和呈现乡土文化、书写乡土民众生活、还原乡土人文形态的农村题材电视剧,既是我国电视剧重要类别之一,也为我国电视剧发展做出了具有鲜

明地域特色的艺术贡献。”^[10]电视剧《温暖的味道》中的刘海棠既是石沟村妇女主任,又是煎饼合作社的负责人;她虽然不是整部电视剧的主角,但从电视剧的人物形象塑造等方面来看显得尤为成功。从作为石沟村妇女代表迎接新书记孙光明开始,妇女主任刘海棠的形象架构便逐渐铺陈开来,例如她从徐唯一手里抢花并理直气壮地说“这是我的”,然后再送给孙光明表示欢迎的情节,彰显出刘海棠热情泼辣的性格。后来,当煎饼合作社的煎饼被退回后,刘海棠将事件的原因归咎于孙光明,一气之下将被退回的煎饼全部搬到孙光明住的谷仓而使其无处下脚。除此之外,当孙光明反对将煎饼卖给张子灏时,刘海棠选择联络村委会其他成员试图罢免孙光明。以上情节反映出刘海棠遇事慌张、心直口快、只顾眼前利益。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刘海棠在孙光明的影响和带领下,最终成长为一个有思路、有规划、有担当的妇女主任。

(二)作为主角的妇女主任形象:乡村振兴主题曲中的最美主唱

电视剧本对人物形象的塑造问题历来是考验编剧水平的关键所在,正如古希腊戏剧创作中的“二分法”原则一样:好人从头至尾一直善良,坏人则与之相反。按此类艺术手法创作易导致艺术创作脱离了现实生活,带给观众的是一味地说教。基于以上原因,把妇女主任这一角色塑造为“圆形人物”,不仅可以使观众感到亲切,还能推动生动曲折的情节叙事。被称为“时代报告剧”的《石头开花》,是于2020年11月首播的以脱贫攻坚为题材的电视剧,该剧通过十个单元分别介绍了十个不同区域的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故事。在该剧的《信任》篇章中,晓起村的妇女主任陈玉霞担任着村妇女主任,还兼任村会计,并经营着一家家具厂,闲暇之余还要兼顾辅导女儿的作业、带女儿看病等生活琐事,是一个事业与家庭都要兼顾的女强人。陈玉霞的工作能力毋庸置疑,但在村里的口碑却很差,原因是三年前的一则新闻报道。陈玉霞带着时任记者的李爱民对晓起村的垃圾污染状况进行调查采访后,报道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断了村里部分人的“生计”,因此全村人都将陈玉霞视为“叛徒”。随着剧情的进一步发展,当陈玉霞得知李爱民被任命为晓起村对口扶贫第一书记后,竟然在村支两委会上直接称呼李爱民为“骗子”,由此陈玉霞泼辣、敢爱敢恨的性格跃然纸上。当然,村妇女主任与第一书记的矛盾也推动了剧情的发展,通过之后的交流和沟通,陈玉霞与李爱民逐渐消除了误会,齐心协力带动全村人治理

排污,并通过电商直播的形式将晓起村从“垃圾村”变成了“淘宝村”,而对口扶贫第一书记李爱民也获得了全村人发自内心的信任。

农村题材电视剧是表现新农村建设风貌的便捷路径,其侧重的是内在的心灵冲击。一部优秀的农村题材电视剧,不仅生动呈现了农村生活的点滴细节,更深刻彰显了时代精神和民族风貌。从人物角色的成长历程来看,电视剧中人物所经历的日常琐事常来自观众的现实生活,在谈及拍摄感受时,晓起村妇女主任陈玉霞的扮演者黄小蕾表示,整个制片团队都感慨万分,大家纷纷说道,他们原本没想到扶贫工作的进展会如此迅速,成效会如此显著,以至于想要找一个相对破旧、贫穷的地方作为拍摄场景,都不得不跑到很远的地方去寻找。演员黄小蕾除了在《石头开花》中饰演过妇女主任这一角色,在电视剧《好雨知时节》中同样出演了苹果村的妇女主任倪小燕。这部剧是为数不多的以妇女主任为女主角的电视剧,全剧围绕苹果村的未来发展之路生发开来,讲述了苹果村村民如何实现农副产品的全方位发展,并推动和实施全民创业与乡村振兴的故事。全剧开篇是苹果村村民张灯结彩拆迁搬家的场景,妇女主任倪小燕和书记冯久旺正张罗着迎接上级领导视察,但此时接二连三的插曲瞬间打破了村里的祥和氛围:大宝和春生闹着要换房,老栓叔家的羊丢了,马二虎偷了素娟家的苹果……以上插曲的出现一方面引起观众的兴趣,另一方面推动了剧情的发展,使村里的人际关系充满了叙事张力。农村事本就是平凡事,而在平凡的故事讲述中如何突显出不平凡的情感认知,进一步考验着编剧与导演对人物与事件的加工与塑造能力。

赋予更多农村女性与男性平等的权利,将会使新时代农村建设呈现新气象。提升农村妇女在乡村振兴中的自我效能感,是激发她们积极参与乡村振兴的关键所在。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鼓励她们亲身投入乡村振兴的实践中。在实践中,她们的自我效能感会逐渐得到增强,而这种增强又会进一步激励她们更加积极地参与到乡村振兴的各项工作中来。《好雨知时节》中的倪小燕身兼数职,不仅是村妇女主任,更创建了民宿“燕鸣山庄”,同时兼任老人幸福院的院长。在协助村支书工作方面,倪小燕通过为村里60岁以上的老人准备重阳宴的形式缓解村民们的焦虑。此外,她还只身面对果树受灾而围堵村委会的果农,通过组织村里的妇女集体学习英语的方式来拓展对外交流,真可谓有勇有谋。在组织开展妇女工作方面,倪小燕组织村里的

妇女编排了苹果艺术节旗袍走秀节目,带领她们筹办了胶东民俗展,让她们化身“篮球宝贝”为农村举办的篮球比赛鼓劲加油。在商业运营操作方面,倪小燕借助网络媒介售卖从村里收购的土鸡蛋,通过撰写村落共享项目书拉拢陈总投资,其灵活的商业头脑可见一斑。从处理情感关系层面上看,倪小燕通过为有情人牵线搭桥,真正做到了“成人之美”。在家庭关系方面,倪小燕一改在工作上的雷厉风行,体现出对儿子的关爱与呵护。例如,面对儿子对自己的误解,她通过给儿子讲述村里的果农因受灾影响收入的现状,向孩子传达了“无论是财富还是知识,都是一点一滴积累”的道理。

(三)英勇且矢志不渝的致富领路人:巾帼不让须眉

2021年首播的电视剧《功勋》是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理想照耀中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展播活动剧目之一,以单元剧的形式展现了八位首批“共和国勋章”获得者的真实事迹。该剧是在新中国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时,为英雄们书写的传奇篇章;也是在踏上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的起点,为中华优秀儿女献上的一曲明德颂歌。该剧的第五个单元《申纪兰的提案》主要以现实生活中的共产党员申纪兰为创作原型,讲述了其从1947年出嫁到1954年当选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期间的故事。申纪兰于1953年4月被选为全国妇女代表,并出席了第二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在1973至1983年期间,她还担任了山西省妇联主任。在《申纪兰的提案》单元剧中,申纪兰被推选为西沟村妇救会主任,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相当于“妇女主任”,而申纪兰的一生始终都在为争取妇女的劳动权益而奋斗,这也成就了“大兰子”这一角色的经典人生演绎。电视剧开篇呈现的是1946年秋,在巍峨的太行山脚下,婉转缭绕的山歌回响之中,主角申纪兰乘坐着毛驴车“亮相”,她随身携带的纺车足以说明彼时人们的生存与生活环境。从申纪兰向二姐“显摆”自己与丈夫的脚一样大,可见其并没有旧社会“女人脚大应该害臊”的世俗观念。

在驴车的绳子断了的情况下,申纪兰使出全身力气拉了三里远,她的一句“我能受”把自己不拘小节、韧性十足的性格鲜明地展现了出来。即使这样,她依然与从军打仗的丈夫错过了见面时间,但在其一路追赶下,在部队领导的主持与出征打仗战士们的见证下,隔着山沟,申纪兰用红绸子系上新纳的鞋子,扔向了自己的新婚丈夫大海。此种情愫凝结而成的新婚送别场景,成了申纪兰在以后艰难岁月中

值得回忆和守望的温馨画面,而送夫出征也成了申纪兰觉悟高的最佳诠释。嫁到西沟村的申纪兰改变了全村妇女的思想和生活方式,正如秀芝爹所言,“自从申纪兰来了,西沟村妇女都不安生了”。当申纪兰依靠完成纺花任务换回来满满的一车小米时,亦狠狠地帮村里纺花组的妇女们争了口气,用事实向那些批评她“带头闹腾”的人作出了最好的回应。靠纺花“挣”回来实实在在的小米后,纺花组的队伍逐渐发展壮大,直到村里一位名叫歪歪的小伙子加入,正如他所说,“解放区男女都一样,男人干的女人也能干,反过来女人干的活男人也能干!”此种信念道出了申纪兰及所有妇女的心声,使纺花组在村里站稳了脚跟,也使“大兰子”在村里树立了威信。当申纪兰看到初步的成功后,便想更进一步,于是成立了妇女互助组,号召大家“晚上纺花,白天下地”,但在村口集合的却只有秀芝一人;由此可见,西沟村“好男走到县,好女不出院”的老思想不会轻易被破除。县里派来调查的李队长的到来,为申纪兰打开了另一扇窗,她不但与申纪兰同吃同住,教申纪兰识字,还召集西沟村全体村民宣布正式成立了妇救会,并支持申纪兰担任主任。从此之后,申纪兰终于拥有了自己的舞台,她不断追逐着“与大海一同进步”的方向和目标。

生活的真实之处在于人们在顺风顺水的过程中,往往伴随着些许戏剧性的偶然事件;曾第一个全力支持申纪兰的秀芝因难产而死,秀芝的死使申纪兰陷入了思想困境和舆论的漩涡:她不仅失去了自己最好的朋友,更被秀芝父母将秀芝的死归咎于自己。平时乐观豁达、坚韧不拔的申纪兰陷于深深的自责之中。这一情节的设计使剧情更加跌宕起伏,也使申纪兰这一人物形象塑造得倍感真实且血肉饱满。新中国成立后,申纪兰带着西沟村妇女一路从旧社会走到了西沟村合作社成立。为了证明“男人干的活,女人也可以干”,同时为了争取同工同酬,申纪兰与村民石头比赛犁地;这一情节的设置既切合人物内心的真实想法,又将劳动的乐趣以及劳动者的风采展现得淋漓尽致。此后,申纪兰替老师为扫盲班上课,在县农业工作汇报上发言、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采访、开山修路炸石头以及当选人大代表赴北京开会等情节环环相扣,将申纪兰一路的成长轨迹串联起来。主人公申纪兰也有情感脆弱的时候,那就是与丈夫大海的书信对话;电视剧通过以第一视角的口吻再现了申纪兰对丈夫的思念、期盼和担忧,此处亦是编剧赋予主人公“圆形人物”性格特点的真实写照。

三、新时代妇女主任形象在农村电视剧中的建构策略探究

(一) 妇女主任形象在新时代农村电视剧创作中的表现困境

妇女主任是中国农村广大妇女最支持和信任的权益“代言人”，是连接农村社会和家庭生活的纽带，其进行的每一个思想引导和政策推广都能牵动每一户家庭的“神经”。当说到电视剧里的“农村题材”，有人觉得它就是“三农”题材，讲的是农村、农业和农民的故事；也有人提出是“四农”题材，在农村、农业、农民的基础上，还加上了农民工。其实，不管是“三农”还是“四农”，都是紧紧围绕着“农”这个字眼展开的题材。”从唯物史观的视角看，通过发生在妇女主任身上的故事，亦可以审视中国乡村振兴不断推进和深化的改革历程，串联出整个新中国农村建设发展的整体脉络。妇女主任形象作为中国农村电视剧艺术创作中的重要环节在人物形象塑造与思想探源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难以实现艺术审美与现实意义的双重目标。

首先，人物设定的同质化掩盖了人物本身应该具有的个性。在表现农村土地改革、脱贫攻坚主题时，无论是《女人当官2》中的杨桂花，还是《石头开花》中的陈玉霞，抑或是《好雨知时节》中的倪小燕，她们除了具有妇女主任热情泼辣、精明能干等共同特征之外，缺少的是作为独立个体而需要呈现的个性特征。通常情况下，电视剧编剧与导演往往会将妇女主任这一角色的性格进行普适化套用，即将妇女主任的形象塑造向“传声筒”式的机械化生产靠拢，进而忽略了现实生活中“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在以时间为脉络、反映农村时代变迁以及个体人生经历的电视剧情节叙事中，如《麦香》中的麦香、《兰桐花开》中的孙桐花以及《山海情》中的李水花，都是经历了岁月的种种磨难之后，才当上了村妇女主任。可见，这种同质化的故事情节与性格设置忽略了人物角色的个性化特征，容易使观众产生审美疲劳之感，亦需要电视剧编剧在创作剧本的过程中追求更多的独创性和新颖的叙事方式。

其次，电视剧故事情节设计的相似特征亦弱化了观众与主人公的情感共鸣，进而导致剧情的吸引力与新鲜度呈下降趋势。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在方针政策的指引下，许多电视剧编剧们也开始将目光投向农村基层，并将剧本中的情节叙事与农村扶贫、环境保护、土地流转、脱贫攻坚等政策导向相关联。在肯定编剧紧跟时代步伐进行创作的同

时，亦应指出其存在的问题：一些编剧因缺乏必要的农村生活体验，在创作剧情的过程中过多地主观臆想，很容易导致故事情节严重脱离农村实际，进而被当作农村“浪漫喜剧”看待。此外，一些编剧对于农村妇女主任的工作实际缺乏深入认识，有时只通过典型人物的新闻报道就进行千篇一律的仿写与照搬，这导致农村电视剧在表现妇女主任形象的情节设定上存在诸多的相似性；如《女人进城》的开篇就讲述了村妇女主任王红艳如何组织和带领全村妇女张灯结彩迎接丈夫们回家，这与《大村官》中的妇女主任吕金凤为迎接村主任的到来，组织村民跳广场舞的情形有相似之处，而《乡村爱情12》中的谢大脚当上妇女主任后，也通过组织村里的众多妇女跳广场舞的形式来进行烘托和渲染。总体来看，这种相似的情景呈现不仅会削弱妇女主任形象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还会在情节安排上给观众带来千篇一律之感。

最后，新时代以来的电视剧剧本创作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也存在因过度追求新奇故事情节，而忽略了从现实出发的创作根基。近两年来，农村题材电视剧的整体艺术水准不断提升，并涌现出了一大批农村电视剧编剧和导演，他们在塑造生动的“新农村，新农民”形象的同时，也着力在荧屏中展现新时代中国农村的新气象。例如在《温暖的味道》一剧中，电视剧主创把与剧情有密切联系的52道美食制作过程拍摄了下来，而在《最美的乡村》《石头开花》《好雨知时节》等脱贫攻坚为主题的电视剧中，尽管故事的主人公的经历有所不同，但都融入了直播带货以及网络助农等情节。毋庸置疑的是，网络主播与新媒体人在农村电视剧的融入是为了追求观念上的与时俱进，但其在过度依赖互联网作用的同时，往往会出现与农村传统意义上的辛勤劳作形成冲突，即很容易使人错误地认为振兴农村经济的路径就是依靠直播带货。当然，这种追求新奇故事情节讲述以及“标新立异”创作理念或许是为了突显艺术表达效果，但为了打破观众对于传统农村题材电视剧的刻板印象而进行的“艺术创新”，实在难以在观众的心底引发情感共鸣。在剧本创作中，应当紧密贴合当前农村妇女的实际需求。有研究表明，农村妇女目前最需要的政策支持，按照需求比例从高到低依次是：小额贷款项目、创业与就业信息的提供，以及实用技术的培训。而影响她们对这些政策需求的主要因素，则包括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以及社会资本等多方面因素。艺术创作中的情感共鸣应来源于故事情节与现实生活的无限贴近，来源于观众在审美过程中的似

曾相识,更来源于强烈的时代代入感;所以说,以上层面无法依赖电视剧的某种表现手法来实现。

(二) 妇女主任形象在新时代农村电视剧创作中的建构策略

现实生活中的农村妇女主任是广大基层妇女同志的代表,她的所思所想代表了新时代农村妇女对现实生活的期盼,这就决定了新时代农村电视剧在塑造妇女主任的形象时,要时刻做到“来源于生活,又要高于生活”,力争在电视荧屏上呈现新时代农村女性的精神面貌。电视剧不但要紧跟时代步伐、传达社会心声、映照民众生活,还承担着弘扬主流价值和充盈人民精神世界的重要使命。所以说,妇女主任形象的成功塑造和构建,可从侧面展现新农村时代的发展和变化。此外,由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所产生的矛盾冲突和观念转变,又时刻牵动着观众的内心,而妇女主任所肩负的女儿、妻子、母亲、干部等多重身份的纵横交织,又容易使人透过现实迷雾与历史烟云,审视个人身心所经受的内在冲击,进而通过个体成长感悟人性之美。

妇女主任形象塑造应从现实生活出发,紧密围绕其本职工作重点展开,切忌出现“摆架子”“喊口号”等脱离群众的负面典型。妇女主任在农村电视剧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关键情节的叙事中起支撑作用。编剧无须对其职务的重要性进行过多阐释,而是通过朴实顺畅的情感表现以及多维赋权的形式彰显其核心作用。通过多维度赋予权力,增强少数民族农村妇女的性别意识,使社会性别观念成为村级治理的主流思想,促进她们从“女能人”成长为“治理精英”。这一过程将激发她们的内生动力,并吸引外部资源的支持,从而实现她们在村级治理中从旁观到参与的转变,同时为乡村振兴注入活力。《申纪兰的提案》中的“大兰子”,始终没有将自己是“妇救会主任”“合作社副社长”等名号挂在嘴上,但她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在为妇女争取平等的劳动权利和“男女同工同酬”的权益,此种务实的工作作风与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仅感染了剧中人,还感动着现实生活中的电视观众。《温暖的味道》中的妇女主任刘海棠有自私、目光短浅等与“妇女主任”身份严重不符的个体特征,但作为一位土生土长的农村妇女,其最终能从利益交织与亲情牵绊中摆脱出来,尤其在关键时刻保持了头脑清醒,凸显了人物战胜了“旧我”并获得新生的成长轨迹;因此,贴近现实生活的形象塑造,更能使观众对妇女主任形象塑造充满期待。

在艺术创作过程中,对于创作者而言,试图感动

观众的前提是感动自己。农村电视剧作为服务于大众艺术审美需要的艺术类型,其创作决定了剧中的妇女主任形象塑造应与真情实感紧密相连。在《申纪兰的提案》一剧的拍摄过程中,剧组为了还原西沟村的旧时风貌,采用新房子上糊黄泥、水泥路上铺黄土等手法,试图从视觉角度带给人们真情实感。此外,为了还原彼时村民的生活与内心感受,拍摄团队与演员们深入群众生活,通过交谈走访了解真实的塔沟村历史,并同村民一起吃烤土豆,以此形式忆苦思甜。演员在开机拍摄后的日子里穿戏服生活,同时还要学着去干所有的农活,长期的生活实践使观众隔着屏幕都能够感受到演员与农民之间情感的联结。在与现代社会的交融与碰撞中,农村影像空间的构建展现出了其独特面貌,不仅在文艺创作上具有重要的审美价值和导向作用,而且为人们理解中国农村问题及现代化进程提供了新颖、积极且动态的视角和切入点。申纪兰在深夜迷茫、困惑、伤心时,通过与丈夫的书信交流,展现了“大兰子”坚强的外表下蕴含的温柔女人心,将一个英雄形象下的“平凡”一面表现得淋漓尽致,进而使其更具烟火气、更贴近实际。《好雨知时节》中的妇女主任倪小燕在面对儿子的任性时,从暴怒、克制再到富含温情的情感衍变,把现实生活中真实而生动的母亲形象搬上了荧屏。由此可见,真挚的情感融入是衡量电视剧剧本出彩与否的重要元素。

电视剧中妇女主任的形象建构取决于对细节的取舍,主要来自对女主人公的言谈举止等细节描述进行完美演绎。剧本叙事过程中,除了演员的精彩演绎外,还需要民间音乐文化的融入。发掘并推广具有浓郁农村地方特色的民间音乐文化,既能够为民间音乐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又能借助电视剧的广泛传播,促进该地区的文化与经济双重繁荣,实现传播学意义上的双赢局面。此外,由于农村妇女主任的职位特点,其需要扎根农村,并通过与父老乡亲“打成一片”,用以体味人民群众的苦辣酸甜咸,这就需要编剧和导演在塑造这一人物形象时,要扩大表现视野,同时还要掌握生活中的多处细节,因为细节往往是支撑宏大叙事的关键。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强调的“细节”不仅指《大山的女儿》中妇女主任罗梦兰说服丈夫韦平力争当致富带头人的“软磨硬泡”,还包括《申纪兰的提案》中那句独具方言特色的“我能受”,甚至包括第一个要求加入纺花组的男性成员歪歪:一边把小米往嘴里塞,一边因想起离世的母亲而边吃边哭。正是这些看似不经意的细节,才使观众从电视剧的人物塑造和情节叙事中捕捉到似曾相

识的情感体验,这种强烈的情感互通是演员与观众产生共情的密钥。

四、结语

妇女主任身兼“半农半官”的身份特质,是众多女性角色中尤为特别的类型人物。妇女主任坚强的外表下隐藏着温柔细腻的“女人心”,角色设置通过融入时代大环境和回归职能本身来实现,并通过电视媒介进行时空传递和艺术传播,深深打动和感染了观众。新时代以来,电视剧中的妇女主任形象塑造通过“管中窥豹”的形式彰显其尽职尽责,通过历史性时空对比展现其成长脉络,通过动人的细节描绘来刻画其丰满人设,进而彰显其平凡中的伟大。如果说农村题材电视剧谱写了一曲讴歌中国农村与中国农民波澜壮阔的“山乡巨变”之歌,那么妇女主任就是这首歌曲中的特殊吟唱者,其形象已成为中国农村电视剧女性形象的标志性突破。

参考文献:

[1]李玉琴,刘虹.新世纪乡村电视剧人物形象的文化学解读[J].文艺争鸣,2011(14):49-51.
[2]李冬茵.浅谈乡村电视剧的绿色基调[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8(11):54-55.

[3]袁博,张海鹏.新中国成立后农村妇女的身份转换(1949—1965):以山东农村妇女的身体改造为视角[J].党史研究与教学,2020(1):51-60.
[4]宋瑜.中国农村妇女参政:能动性、权力分配与传承[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7(6):44-50.
[5]郭学军.农村电视剧扶贫叙事的主体、历史和文化逻辑[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2):104-112.
[6]丁莉丽,郝文琦.当前农村题材电视剧的创作特点和发展态势[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21(4):66-70.
[7]廖和平,文成豪.新时代农村妇女典范人物事业发展的经验启示[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3):133-141.
[8]郭学军,位迎芬.《最美的乡村》:农村电视剧的一种新类型[J].电影文学,2021(1):128-131.
[9]廖和平,朱有志.试论新时期与新时代农村妇女的“超半效应”[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2):43-50.
[10]朱婧雯.“农村”:作为媒介场域的影像呈现与变迁: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农村题材电视剧发展综述[J].电影评介,2019(19):108-112.

(责任编辑 林川)

The Presentation Form and Construction Strategy of Women Director Image in TV Dramas since the New Era

LIANG Yuanyuan¹, JIN Shoubo²

(1. Bayinguoleng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Kuerle, Xinjiang 841000, China;

2. Xinyang University, Xinyang, Henan 464000,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dawn of the new era, China's rural TV drama shooting has made great development both in quantity and quality. Among them, the TV dramas with the images of women directors as the main feature have been affirmed and praised by many Chinese people. This success not only stem from the exquisite performance of the actors, but also from the scientific and novel form presentation and construction strategy of women's images. These dramas oppose the “flat” creation technique in traditional characterization and replace it with the image outline of “round characters”. Then the rural women in the new era are depicted as simple and sincere, ordinary and great screen images entering into the vis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omprehensively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although rural TV dramas in the new era subvert the stereotypical “semi-peasant and semi-official” images of women directors, limitations exist in terms of artistic aesthetic effect and realistic significance representation. To address this, the creative concept of “artistic reality” must be integrated into the narrative framework. It provides methods and strategies for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Chinese rural TV dramas.

Key words: new era; rural TV dramas; women director image

本土实践、叙事快感与文化症候

——论近期国产悬疑影视中的孤勇者形象

董鑫

(中国传媒大学 戏剧影视学院, 北京 100024)

摘要:近期国产悬疑影视中广泛出现的孤勇者形象, 因应了悬疑影视的本土化创作与探索, 反映了国产影视剧的核心特质与价值诉求。此形象一方面凭借创伤、暴力等元素成为这些影视剧叙事快感的重要来源; 另一方面, 它又揭橥当下与历史的对话关系, 尝试反抗“当下”的文化工业幻景, 进而展现大众面对1990年代这一“历史起点”时复杂的文化心态。考察国产悬疑影视中的孤勇者形象, 在阐明国产影视创作特色与价值诉求的同时, 可为我们捕捉当代中国大众的隐匿心态提供一个切入点, 进而展现影视文本与大众意识形态症候的精巧对接。

关键词:国产悬疑影视; 孤勇者; 本土实践; 叙事快感; 文化症候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5.01.014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5)01-0083-06

“爸你看, 下雪了”

“这雪爸见过, 这是从, 过去来的”^①

这是电视剧《漫长的季节》(2023)最后一集中王响与继子的对话, 他经年累月查案终于知晓了儿子失踪的真相, 面对天空下起的白雪, 他突然感慨地说道, 电视剧的画面也配合他的思绪不断叠映过去的画面。台词与画面精准地展现了他始终如一的追凶姿态, 其间不乏怀旧、哀怨情绪, 令人动容。近年来, 悬疑影视逐渐成为最受观众喜爱的国产影视类型之一, 在生产数量与质量上均有显著提升。在爱奇艺“迷雾剧场”、腾讯“X剧场”、优酷“白夜剧场”的推动下, 这一剧种得到广泛传播, 受到青年观众的青睐。细致考察这类影视, 发现它们较多地出现王响这样的孤勇者形象(观众戏称之为“执着/固执/偏执的主角”)。其出现与国产悬疑剧的新近实践探索、核心特质、价值诉求有着紧密的关系, 呈现出具备本土特色的悬疑风景。不过, 若单纯以艺术逻辑来阐述这一形象, 似乎并不能切中肯綮。事实上, 它还深刻嵌入国产悬疑剧的创伤叙事、暴力叙事, 成

为剧集快感的重要来源, 进而吸引了青年观众。此外, 它还表征着当代中国社会的隐性症候, 通过对孤勇者形象中男权、父权问题的揭示, 国产悬疑剧集隐蔽而公开地完成了对大众意识形态的表达。那么, 这种艺术逻辑与文化逻辑是如何交织的? 孤勇者形象究竟体现出怎样的时代症候, 并在剧集的叙事中呈现出来? 这些问题指向了孤勇者形象生产背后的研究旨趣, 值得深入探究。

一、孤勇者形象与国产悬疑影视的本土实践

近期不少悬疑影视中均出现孤勇者形象, 以《三大队》(2023, 包含剧版和电影版)中的程兵、《漫长的季节》(2023)中的王响、《沉默的真相》(2020)中的江阳、《狂飙》(2023)中的安欣、《平原上的摩西》(2023)中的庄树、《尘封十三载》(2023)中的卫峥嵘等为代表。他们有着执着(有的则是偏执)、坚毅、隐忍、勇敢, 数十年不更其志的典型特征, 内含一种仁学思想, 是一种理想化的人格形象。这是悬疑文艺本土化创作与探索的重要成果, 反映了国产悬疑文艺的核心特质、实践探索与价值诉求。

收稿日期:2024-11-12

作者简介:董鑫(1997—), 贵州遵义人, 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戏剧与影视学专业2023级在读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影视叙事、中国电影史。

从影视史来看,本土悬疑剧与公安剧、刑侦剧常常指向同一类剧集,原因是它们的主角无一例外都有警察身份,都显示出一定的政治理念,创作者几乎被限定在特定的叙述框架内,并不能做更多的形式实验,也无法进行超越人伦纲常的剧情设定。然而,对于近年来的青年观众来说,这样的塑造方式显然没有吸引力,影视势必要通过一些新探索,来贴合他们的价值诉求。这正是孤勇者形象的出现契机。观众对这一形象的喜爱,表明这种探索取得了成功。整体来看,以孤勇者形象塑造为中心,这些探索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剧集对这些孤勇者形象的塑造通常采用“寓谐于庄”的方法。作为正义之士,他们秉持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同时,他们又有着鲜明的平民特性,诙谐、平易近人,其擒凶之举也夹杂着私人因素。这增强了人物形象的可看性、真实感与可爱之处。譬如《狂飙》中的安欣,正直而勇敢,数十年如一日追凶,除了为民除害,也是为解除自己的道德困扰。一方面满足了主流意识形态对于影视剧的总体要求,另一方面也契合了青年观众的审美需要,较为精准地把握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法则,即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增强了观众对人物的共情。

第二,以孤勇者的故事为中心构建多线情节,丰富剧集的叙事。早期悬疑剧常用单元剧的模式展开剧情,以单线叙事为主,不同案子间鲜少关联。而新近这些悬疑剧则以孤勇者的故事为中心,打通了案子之间的联系,不同案件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联。那些已经破获的案件在之后的叙述中还会以闪回、主人公的回忆等方式,再次对叙事进程产生作用。这些剧虽然仍存在多起案件,但本质上都是一个“元案件”的延伸。并且这个“元案件”常常是主人公创伤的直接来源,构成他持续破案的源动力。譬如,《沉默的真相》使用严良、江阳、侯贵平三位人物的故事进行平行蒙太奇叙事,运用通感手法将三个时空接续在一起,指向同一个凶案。而这正是剧集在对江阳、张超等孤勇者人物故事的缝合、观众对这些人物的期待中完成的。此外,有些悬疑影视还融入各种类型元素,提升了观赏效果,如《开端》对“时间穿越”这一玄幻元素的运用。

第三,作为故事情节发展的关键推动者,孤勇者形象精准地反映了国产影视剧的价值诉求。正如前文所说,本土的悬疑剧、刑侦剧、公安剧常常指向同一类剧种,且都富有正剧特征,旨在宣扬正向的社会价值观。孤勇者形象或者出于心中道义,或者被周

围人的误会,甚至被误会为案件的“凶手”,或者因为亲人不知所终,义无反顾走上追凶之路,数年如一日收集线索,最终让“陈年旧案”沉冤得雪。在《狂飙》中,如果不是安欣对案件真相的一心求索,可能不会有人记得这个案子,更不用说破案,他总是向社会(同时也是向观众)提醒这桩陈年旧案的存在,最终才迎来案情的告破。这些剧集倾向于把警察塑造为一种理想化的人格象征,打造成银屏道德楷模。舍生取义,始终把国家和人民利益放在最高位置的警察,成为观众审美理想的寄托,这最为精准地反映了国产影视剧的核心特质与价值诉求。

除了反映国产影视的价值诉求,这一形象还因应了世界悬疑文艺从推理派到社会派的艺术规律的变化。作为一种类型元素的“悬疑”,早以侦探小说的形式广为人知。这类小说大都以推理为核心看点,暴风雪山庄、孤岛模式、乡间别墅派等诸多流派均试图规避现实,建构一个单纯的推理空间。怪诞的犯罪手法是这些文本引人入胜的秘诀之一。在柯南道尔所写的以福尔摩斯与华生为主角的侦探小说中,杀人手法的异想天开、解谜时的环环相扣,让悬疑小说成为精巧到极致的解谜游戏。本格推理固然有趣,不过“杀人诡计”的设计极耗精力,且容易流于模式,很快就产生观众让审美疲劳。二战后侦探小说已经不再执迷于展现精巧的悬念设计,而是致力于构建复杂人物、融入社会议题,承担着揭露人性、批判世情的使命。譬如日本推理小说家东野圭吾所著《嫌疑人X的献身》,尽管读者对作案细节与犯罪动机了然于心,但仍被故事中散发的人性光辉吸引。

国产悬疑影视从“狄仁杰”系列、“重案六组”系列,到《隐秘的角落》《漫长的季节》等,也符合这一艺术规律。与之前相比,近期的悬疑剧突破了模式化的人物塑造,呈现了具有丰富故事线、引发观众共情的人物。这在孤勇者形象中体现得比较明显,他们的内心世界在剧集中得到呈现。譬如《三大队》中程兵即使面临生活的种种不如意,仍然拒绝了同事的挽留,坚定走上擒凶之路,剧集清晰地呈现他做出这一决定的缘由。不同于过去国产悬疑剧中扁平化、功能化的人物塑造,孤勇者立体、复杂的人物内核,增强了形象的审美厚度,提升了剧集的审美品格。角色不再沦为剧情的附庸,悬疑剧不再仅以案件的奇观化以及公安与凶手之间的身份冲突来推动剧情,孤勇者形象中的性格冲突、意志冲突成为剧集重要看点。此外,这些剧集通过全面展现孤勇者形

象的生活环境,以及与敌人的残酷斗争,有效融入社会议题,增强了剧集的现实意义。

二、孤勇者形象与国产悬疑影视的叙事快感

仔细考察这些孤勇者形象,会发现他们几乎都深受来自案件的创伤记忆的侵扰。这种创伤元素的植入,一方面契合了如上所言的艺术逻辑,让剧集的人物塑造、情节构建、审美力量都得到丰富,深化了主题意涵。另一方面,它也嵌入剧集的叙事机制,参与缔造剧集的快感效果。笔者在《论国产悬疑剧的“创伤”叙事》一文中曾指出,国产悬疑剧中几乎到处弥漫着“创伤”元素,显示了当代民众在城市化进程中的现代化焦虑。^[1]在这些孤勇者身上能够非常鲜明地看到创伤对他们的影响,他们性格执拗,家庭破碎,从病理学的角度来说,这正是一种创伤应激症状。

在创伤应激下,孤勇者通常一意孤行,偏执地、不顾周围人劝阻地寻求案件的真相,并与凶手发生冲突。而这正好符合悬疑剧的叙事要求。由于悬疑剧总是伴随着暴力,因此它们几乎是完全顺畅地把暴力元素融入孤勇者形象上。暴力元素,一方面出现在擒凶的过程中,譬如《三大队》中警察程兵正是因为暴力殴打犯人被判入狱,其出狱后的追凶之旅也不时出现他的暴力之举。另一方面,它也常常因社会公平、法治环境出现问题而出现,甚至是凶手出现的原因,譬如《漫长的季节》中沈默姐弟的父母死于工伤,却饱受欺凌,最后走上犯罪道路。此外,悬疑剧集还通常从侧面展现社会的暴力,譬如《漫长的季节》中人群围在警局面前要求公道,有人还向公安投掷硬物。在厂长宣布下岗名单时,人群骚动,有人直接上台揍领导,其中就包括孤勇者王响。巧妙的是,孤勇者的暴力看似在追凶过程中被迫发生,却正好是其在创伤应激症后的心理疏通诉求。在这个意义上,这些孤勇者反而令人讽刺地成为暴力狂、癡症病人。

按齐泽克的说法,暴力存在主观暴力和客观暴力之分,“客观暴力是无形的,因为它支撑着我们用以感知某种与之相对立的主观暴力的那个零层面(zero level)标准……如果我们要理解那些看似主观暴力的‘非理性’爆发的事物,我们就必须考察这种客观暴力”。^[2]换言之,所谓“客观暴力”,是指潜藏在肉眼可见的“主观暴力”背后的东西,因为它不仅支配了“主观暴力”的出现,而且巧妙地将自身隐藏起来,使人难以察觉。这一观点提示我们看到支配国产悬疑剧中暴力元素的系统性力量,即社会公平、

法治力量缺失时,孤勇者常以暴力狂、癡症病人的面貌去撬动这一秩序。

在这种系统性力量的影响下,剧中孤勇者形象的生活并不顺利,常常被放逐。剧集精巧地使用暴力来阐释过去为何会被遗忘——凶手通过隐藏在人群中,甚至变为权力主导者,用警察、司法等暴力机构粗暴地使当事人遗忘过去。最典型的便是《狂飙》中赵立冬、孟德海等人对案件真相的遮蔽,以及对安欣的放逐。这套机制暗中也助长了孤勇者对暴力的使用,他们在唤醒大众记忆时,或者需要化身匪徒,进入敌人内部,通过暴力的方式收集证据,或者需要更高级的暴力机构介入,才会真正把大众的目光吸引到陈年旧案上。

这种系统性力量的另一种影响则是,不少凶手也有孤勇者形象的特质,譬如《迷雾追踪》里的父亲一角,在女儿死后,到处寻找真相未果,最终被逼上梁山。即使是这样,他也只是报复伤害其女儿的凶手而不殃及其他人。又如《漫长的季节》中的沈默姐弟,同样具备执着、坚韧,数年不移其志的孤勇特征,且他们几乎是在系统性力量的迫害下被逼走向犯罪。相比正面人物,他们的故事有时也能得到观众的共情,进而合理化他们的暴力报复行为。

以上正反两面的创伤与暴力元素,进一步印证了国产悬疑剧的寓言性,暗示了支配它的来自历史与社会的客观暴力,一种社会整体的暴力。正是暴力元素的存在,以及由它们构成的极端叙事,让这些剧集可以通过“爽剧”的外壳,完成(或部分完成,或暂时完成)纾解大众焦虑的功能,当看到孤勇者终于将罪犯制伏收监时,观众不免感到轻松。“国产悬疑剧通过将主角不断贬损而后赎回其名誉的方式,使正义再度回归人心”^[3],这是一种颇有效力的快感叙事机制,成为近年来悬疑影视颇受欢迎的原因。

当然,这些悬疑剧也要面临一个重大问题,如何让这些孤勇者真正融入“当下”?最直接的方式便是解决他们心心念念的旧案。《漫长的季节》中,与那段激烈的社会转型相伴的,是王响儿子和老婆的去世。关于儿子死亡真相成为王响的死结,也成为他始终不能原谅那段历史的原因。剧集最后,当他找到儿子死亡的真相时,才终于释怀。所以,他才能对着由过去的自己开过来的火车大声呼喊:“向前看,别回头!”在侦破案件,犯罪分子对这些年逃亡经历的讲述(电视剧《三大队》甚至专门安排一集来实现这一目的),影视剧直白地呈现案件真相,然

后孤勇者才慢慢放下心中的执念,融入当下的生活。

然而,在很多情况下,这些孤勇者并没有机会融入“当下”,他们几乎是以殉道者的身份去唤醒人们对过去的记忆。譬如《沉默的真相》中江阳、张超等为了激活大家的历史记忆,以身入局,通过在地铁里制造骚乱的方式把公众的视线引到过去历史上。即使在《漫长的季节》这样的孤勇者似乎与过去和解的剧集中,也暴露出一些隐微的裂隙,如在王响喊完“向前看,别回头”之后,插曲《再回首》却“不合时宜”地响起来。在这个意义上,这些悬疑剧集恰恰显示出一种有些矛盾的叙事机制:看似已经完全敞开了过去的真相,但围绕在这些孤勇者形象身边的极端叙事,以及剧集对“过去”的暧昧态度,又表明这种敞开是脆弱的、是随时可能崩塌的。

三、孤勇者形象与“历史天使”的辩证意象

不妨说,这些孤勇者形象看似是被过去的案件真相束缚,实际上是被过去的生活绑定,即使周围人已经与过去和解,他们仍然没有办法直面未来。《漫长的季节》以怀旧、温情的面貌呈现过去的桦钢及作为机车长的王响。在电视剧片头,火车呼啸着穿过庄田,王响坐在火车椅上怡然自得地喝茶,微笑着向外招手。镜头一转,回到当下,随着年华老去的王响风光不再,正在开车载客。过去与当下的生活境遇的落差,难免让他“怀旧”。《三大队》同样是如此,程兵随身携带着以前“三大队”合影的照片,他的追凶,实际上是追寻之前的生活。在剧集第19集,他与刑警队长在雪地殴打时,他哭着说道:“我把自己搞丢了,我要找回来。”

简言之,孤勇者形象本质上是一种被过去的历史/记忆绑定的形象,他们始终致力于向当下的人唤醒过去的记忆。他们融当下与过去双重时间于一体的姿态,呈现出某种超时间性与文化批判性,这无疑让我们联想到本雅明的辩证意象。这一概念是本雅明为反抗资本主义幻象而提炼出来的一个具备革命性内涵的概念。在他的历史哲学中,“革命”就是打断历史被物化和神化的连续性,粉碎其史诗的虚假光晕,把内在于历史中的断裂点,作为一个单子(即历史真理)从资产阶级史学所构造的不断进步的历史连续体中“爆破”出来的过程。这个“爆破”出来的单子即被本雅明称作“辩证意象”。^[4]通过对拱廊街、世界博览会、商品等具体的“辩证意象”的并置与呈现,本雅明指认了资本主义文明幻境,揭露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本质,使人们重新思考历史与当下的关系。

本雅明的考察给我们批判商业文化提供了一个视角,以他的概念与方法再回到国产悬疑影视文本中,我们便会发现孤勇者形象恰好具备着本雅明所谓革命性的内涵。他身居当下的美好幻景中,却总是提醒人们回到过去那个不太光彩(或者按本雅明的话——废墟)的时间原点。他们欢愉地生活在“过去”,却总是忧郁地面对当下,而忧郁正是本雅明认为的能够辨认出辩证意象的情感基础,“如果忧郁眼中的对象成为寄喻,那么忧郁就会让这对象中的生命流逝”^[5]。在悬疑文本中,这种忧郁在创伤、暴力等叙事元素下,更加得以强化。

进一步考察,我们会发现这些孤勇者携带的“完整历史”,恰恰是20世纪90年代的历史——这些剧集无一例外都把“过去”的背景设定在1990年代至新世纪初。于是,按以下这种方式去解读这些文本就有了可能:孤勇者携带着20世纪90年代的“完整历史”的记忆,但是这些记忆却似乎在“当下”不被接纳,已被遗忘。这无疑提示我们,这些形象蕴含着较为鲜明的文化批判效力,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当下涌动的新的社会文化走势与社会心理诉求。也就是说20世纪90年代作为改革开放政策实施后中国内地社会发展急剧提速、社会分化迅速推进的一个时期,正逐渐被“当下”的文艺创作者和接受者们共同指认为某种文化史意义上的“历史起点”——既联结着我们今天享受的成果,也决定了我们今天必须面对的限度。20世纪90年代后,社会涌现新自由主义思潮,维护个人自由,调解社会矛盾,维护自由竞争,带动商业文化的发展。然而,这在当下正受到质疑,因为它也带来了个体的原子化、社会阶层差距的扩大及意识形态凝聚力的弱化。

于是,批判商业文化、新自由主义“原始积累的血腥暴力、零工经济形成的现代奴隶制、住房医疗教育市场化造成的贫困”^[6]的观念,便在国产悬疑影视中的20世纪90年代叙事中得到展现。通过对孤勇者过去与当下生活状况差异的描述,影视文本展现“当下”对“过去历史”的忽视与漠视,质疑了所谓的历史进步主张。当孤勇者及他们所携带的20世纪90年代美好记忆(“当下”的起点)重新出现在破乱不堪的“当下”时间中,也对过去给人们允诺的各种好处提出了质疑。实际上,对“商业文化自由发展会给人们带来好处”这一观念的质疑,在近年来的全球影视中均有体现,以底层、边缘者、流民为主角的影视剧——如《小偷家族》(日本)、《寄生虫》(韩国)、《小丑》与《无依之地》(美国)、《我是布莱

克》《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英国）等——均受到这一思潮的影响。这些影视质疑了市场商业文化、新自由主义的线性时间论、历史进步论，这正是本雅明所言对历史连续体的“爆破”。

有意思的是，这些孤勇者形象无一例外都是男性角色。围绕在这些形象周围的女性角色，仅仅是其陪衬。在电视剧《三大队》里，程兵一意要追凶探案，他的朋友也想同去，但因妻子对此不满，只得作罢。这种叙事潜在地表明女性在这场追凶大戏中的边缘角色（“她”不能直接参与追凶），并暗示男性不能一起追凶，是因为女性、家庭的阻拦。剧集并没有深刻剖析孤勇者形象舍弃家庭、执意追凶对于女性的残酷影响。同时，这些孤勇者形象也以父辈的形象出现，他们携带着历史的完整记忆，尝试着唤醒子一代的孩子们，《漫长的季节》中王响把对儿子的爱全部寄托在了收留的继子身上，也常常教育继子的同龄人。对男权、父权的潜在推崇与怀念，也可看成影视文化怀旧、质疑历史进步论的一种体现，因为女性主义思潮显然随着新自由主义、市场商业文化的发展而壮大。

在这样的叙事下，国产悬疑影视通过构筑历史意象来拯救孤勇者，即在历史中救赎他们。在电影《三大队》的结尾，程兵终于把凶手追拿归案，他茫然地站在人流穿梭的十字街头，随后观众和他回到历史时空，他与三大队一起在警局面前完成合影，故事到此结束。又如《漫长的季节》最后一集，在红毛衣燃烧殆尽后，王响一个人孤独地走在路上，一场大雪缓缓降落。在这场预示“秋天”结束的大雪中，镜头闪过主要人物一生中的重要时刻。诚如本雅明所言：“历史会衰变为意象，而非衰变为故事。”^[7]这两幕已经不是简单的故事结尾，它们旨在构成一种颇具张力的叙事意象，呈现出一种把现在叠加于过去之上的双重性辩证意象，意在从历史中拯救这些孤勇者。走出“漫长的季节”，意味着走出这类辩证意象所指向的结构性关系，“救赎”的重点是“重生”。有论者指出，“这是一种典型的中国式救赎，他们的救赎是从历史中救赎，在救世主的位置上，是正义和秩序，一种带有人世间温度的朴素的信仰”^[8]。

黄平等曾指出，近期东北文艺中流行的20世纪90年代叙事，写的不仅仅是东北人的故事，而是一代中国人的故事，并且指向了当下。^[9]这一东北叙事如何显示中国人共有的情感结构？恰可以通过孤勇者形象来实现，此形象贯穿了包含东北题材在内的众多题材。可以说，影视文本通过孤勇者形象完

成了与大众意识形态症候的精巧对接。面对商业文化带来的种种后果，大众对20世纪90年代这一历史起点保持游移不定的文化心态，并对仍在前进中的“当下”存在着焦虑与紧张的心态。而这些情绪恰巧被影视文本收编整合，塑造了孤勇者形象，他们一心侦破陈年旧案，以建立一种“整全的历史”，对“当下”的文化工业幻景保持质疑精神，不为其他因素所动。在这个意义上，孤勇者一如本雅明在《历史哲学论纲》中描述的历史天使：

克利一幅名为《新天使》的画表现一个仿佛要从某种他正凝神审视的东西转身离去的天使。他展开翅膀，张着嘴，目光凝视……回头看着过去，在我们看着是一连串事件的地方，他看到的只是一整场灾难。这场灾难不断把新的废墟堆到旧的废墟上，然后把这一切抛在他的脚下。天使本想留下来，唤醒死者，把碎片弥合起来。但一阵大风从天堂吹来；大风猛烈地吹到他的翅膀上，他再也无法把它们合拢回来。大风势不可挡，推送他飞向他背朝着的未来……这大风是我们称之为进步的力量。^[10]

四、结语

近期国产悬疑剧中广泛出现的“执着的主角”，即孤勇者形象，并非偶然。它因应悬疑影视的本土化创作与探索，反映了国产影视剧的核心特质与价值诉求。同时，这种形象刚好契合了国产悬疑剧中的创伤叙事、暴力叙事、极端叙事、快感叙事，打造了一个颇具社会寓言意义的文本，使我们可以将其与当代中国的社会进程勾连起来。大众关于1990年代的“历史起点”想象，并对其所允诺的各种好处产生了一定质疑，最终催生了当下悬疑文本中的孤勇者形象，彰显了大众在面对20世纪90年代这一历史起点时游移与捉摸不定的文化心态。

行文至此，我们也要反思一个问题：前文把孤勇者形象作为一种文化症候进行文化批判是否切中肯綮？它是否只是商业文化主导下的一种乌托邦幻想？换言之，作为历史天使的孤勇者形象看似完成了对文化的批判与反思，但它也可能是这一文化工业幻景中的内在组成部分，其反思或许仅仅部分地纾解了大众的焦虑，却反而进一步巩固了“当下”的文化制度，生产出更多的文化幻景。不少影视剧都在复刻这一人物形象，却没有《漫长的季节》《狂飙》《三大队》等文本的思想深度，便印证了这一点。这

表明,一些意象所具备的文化批判效力在刚出世的时候,可能具有先锋性和批判性,能够获得大众的青睞,但它也很有可能因此被商业文化收编,进而削弱其批判力度,以温和化、扁平化的意象嵌入并巩固了商业文化编织的文化幻景,沦为一般的文化消费产品,不再具备思想批判效力,而这一点显然值得我们深思。

注释:

①电视剧《漫长的季节》台词,辛爽导演,2023年出品,上海腾讯企鹅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出品。

参考文献:

- [1]董鑫.论国产悬疑剧的“创伤”叙事[J].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0(3).
- [2][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暴力:六个侧面的反思[M].唐健,张嘉荣,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2.
- [3]杨毅.国产悬疑剧的社会寓言与叙事伦理[J].中国图书

评论,2022(1).

- [4]汪民安.文化研究关键词[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29.
- [5][德]瓦尔特·本雅明.德意志悲苦剧的起源[M].李双志,苏伟,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222.
- [6]积木.《漫长的季节》:东北彪学、弥赛亚与“去中心化”现代性[EB/OL].澎湃思想市场,2023-08-11. <https://mp.weixin.qq.com/s/n9n9Z0M9cLqhRukfWWqpPQ>.
- [7]詹明信.班雅明:多重面向[M].庄仲黎,译.中国台北:台湾商周出版社,2022:475.
- [8]黄平.“往前看,别回头”:《漫长的季节》与普通人的救赎[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3(11).
- [9]黄平,刘天宇.东北·文艺·复兴:“东北文艺复兴”话语考辨[J].当代作家评论,2022(5).
- [10]本雅明,杨俊杰.历史哲学论纲(1940年)[J].文化与诗学,2015(2).

(责任编辑 林川)

Local Practice, Narrative Pleasure and Cultural Symptoms

—On the Portrayal of Lone Heroes in Recent Domestic Suspense Films and TV Shows

DONG Xin

(School of Drama, Film and Television,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24, China)

Abstract: In response to the localization creation and exploration of suspense films and TV shows, the widespread appearance of lone heroes in domestic suspense films and TV shows in recent years reflects the core characteristics and value demands of domestic films and TV dramas. On the one hand, this imag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source of narrative pleasure for these films and TV dramas by means of elements such as trauma and violence. On the other hand, it also reveals the dialogu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resent and history, tries to resist the “present” cultural industry illusion, and shows the complex cultural mentality of the public when facing the “historical starting point” of the 1990s. Examining the portrayal of lone heroes in domestic suspense films and TV shows not only elucidate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value demands of domestic film and television creation, but also provides us with a glimpse into the hidden mentality of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public, thereby showcasing the intricate connection between film and television texts and the ideological symptoms of the masses.

Key words: domestic suspense film and television; lonely warrior; local practice; narrative pleasure; cultural symptoms

“两个结合”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探究

——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为例

张培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4)

摘要:将“两个结合”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是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使党的思想理论在大学生中走深走实的必然要求,也是丰富思政课教学内容,推动高校思政课教学守正创新的现实需求,更是坚定大学生理想信念,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内在要求。加大“两个结合”科研转化力度,为高校思政课教学提供丰富的理论素材;提升高校思政课教师理论素养,发挥其在教学中的主导作用;利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和媒介,通过多种方式实现教学目标;开展实践教学,构建思政课协同育人机制,加快实现高校思政课立德树人的根本目标。

关键词:“两个结合”;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探究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5.01.015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5)01-0089-06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了“两个结合”重要论述:“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1]党的二十大报告又重申了“两个结合”重要意义,深刻总结并阐述了“两个结合”科学内涵。高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是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的重要载体,是宣传党的科学理论的主阵地。讲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以下简称“原理”课程),需要不断融入党的理论创新成果,“两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及发展规律,是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科学方法和原则。我们需要将“两个结合”重要论述融入“原理”课程教学中,不断丰富“原理”课程教学内容,实现让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发挥铸魂育人作用。

一、“两个结合”融入“原理”课程的时代意义

(一)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必然要求

党的二十大报告为我们如何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擘画了宏伟蓝图,是我们行动的纲领。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就为什么推进“两个结合”、如何推进“两个结合”作了深刻阐述。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战胜其他各种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就在于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并在实践中推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两个结合”是党的二十大精神的重要内容,是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科学方法和原则,是永葆党的思想生机和活力的法宝,我们要毫不动摇地宣传好、利用好“两个结合”,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不竭理论动力。

在“原理”课程中融入“两个结合”重要内容,不仅有助于丰富“原理”课程教学内容,提升大学生理论素养,而且有助于学习、宣传和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收稿日期:2024-11-26

基金项目:2023年度河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研究生教育类)“新建本科高校学士学位授予质量保障体系研究”(2023SJGLX100Y);2024年度河南省社科联调研课题“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的路径研究”(SKL2024913)

作者简介:张培(1980—),女,河南许昌人,博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神,宣传好党的理论精神,使党的思想理论在大学生中入脑入心,走深走实。

(二)推动高校思政课守正创新的现实需求

把“两个结合”融入“原理”课程教学,是推动高校思政课守正创新的现实需求。中国共产党从事的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守正才能不犯颠覆性错误,创新才能把握和引领时代。守正创新体现了一种辩证法思维,我们不仅要坚守正道,坚守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不动摇,而且要不断发展真理,实现党的理论创新发展。“两个结合”坚守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动摇,并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会贯通,有效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2]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发展,是坚持守正创新的光辉典范。

守正不等于守旧,创新才能发展。“原理”课程旨在对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帮助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观察和分析问题,逐步养成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实践自觉。在教学内容上,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要紧跟时代步伐,不断实现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的创新发展。“原理”课程教学内容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与时俱进,将“两个结合”精神及时融入“原理”课程教学,不断丰富和优化“原理”课程教学内容,既体现了“原理”课程的与时俱进性,也是大学生学习贯彻党的最新理论思想的体现。

(三)坚定大学生理想信念的内在要求

青年大学生富有朝气和活力,敢于担当,自信有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力军。但是,当代大学生出生在和平年代,社会阅历不足,缺乏远大抱负,尤其在国家、民族利益和个人利益冲突时,意志力不够坚定。我们要加强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大学生,培养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目标、胸怀祖国、吃苦耐劳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者和接班人,为国家的永续发展提供不竭人才支撑。中华五千年文明为我们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基础,是我们的精神之基和民族之魂,唯有不忘本来才能开创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重申了“两个结合”科学内涵,并突出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性,把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摆在重要

位置,在结合的过程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的相互融合,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发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中华文明的道德品质、思想观念和经验智慧,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原理”课程教学中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对学生进行润物无声的文化熏陶,不仅有助于大学生汲取传统文化精华,自觉将文化中蕴含的优秀道德品质、价值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更加坚定他们的文化自信和历史自信,而且有助于引导大学生在纷繁复杂的外部环境中抵制不良诱惑,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3]

二、“两个结合”融入“原理”课程教学的理论依据

(一)“两个结合”与“原理”课程主题内容的契合性

“第一个结合”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实践经验的总结,体现了党的创新理论要从中国实际出发,体现中国国情。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面对国内革命接连失败的问题,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意识到右倾投降路线和“左”倾冒险路线都无法指引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才能挽救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面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临的一系列问题,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人总结苏联改革失败的教训,深入分析社会主义本质,从实际出发,提出改革开放政策。江泽民同志将中国具体实际与时代特征相结合,提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的同时还要大众化和时代化,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源于西方,要在中国落地生根,被中国人民所接受,就需要融入中国元素,不断进行中国化。

“原理”课程2023版教材第一章马克思主义哲学部分讲到,矛盾具有普遍性与特殊性,是辩证统一的关系。这一原理是我们坚持“第一个结合”,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依据。中国共产党正是坚持了这一哲学基础,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鲜明的中国特色,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使马克思主义具备了强大的实践指导能力,更加符合中国实际。

“第二个结合”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体现了中华民族强大的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中华民

族长盛不衰的精神根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国家观、历史观和天下观是劳动人民在长期的劳动实践中总结出的经验智慧,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提供了理论指引,我们要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的相互融通。在二者结合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因吸收了中国元素而更具中国特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而跨越地域界限,更具时代性。

“原理”课程2023版教材第三章唯物史观中讲到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先进的社会意识推动社会发展,而落后的社会意识阻碍社会发展,这一原理是我们发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论基础。第三章第二节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中讲到文化对社会发展起到了思想指引、精神动力和凝聚力量的作用,强调了文化的重要性,这与“第二个结合”中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有异曲同工之处。

(二)“两个结合”与“原理”课程立场观点的吻合性

“两个结合”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广大人民群众,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立场,这与“原理”课程导论部分对马克思主义人民性的描述是相吻合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揭示,人民群众既是历史主体、创造主体、实践主体,也是价值主体、评判主体。”^[4]“两个结合”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即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论是“第一个结合”强调从中国实际出发,还是“第二个结合”强调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都是为了使马克思主义能够深入扎根中国,指导中国实践,服务中国人民。比如: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对当下社会主要矛盾转化问题的把握,指出当下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我们追求的目标,精准扶贫,打造“五个一批”脱贫路径等,都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汲取其中的养分和精华,比如传统文化中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民贵君轻等思想就是人民性的体现。“原理”课程2023版教材的导论部分,详细阐述了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马克思、恩格斯从一开始就站稳人民立场,指引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维护无产阶级利益,马克思主义更是无产阶级的学说,代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所以,从人民性这一立场来看,二者是相吻合的。

“两个结合”体现了发展的、整体的和实践的观点,这与“原理”课程2023版教材第一章联系发展的观点及第二章实践论和守正创新的观点是相互吻合的。“两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从“第一个结合”到“第二个结合”的提出,体现了党的理论成果的动态性和发展性。“两个结合”是有机统一的整体,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精神命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不能脱离中国实际,更不能失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离开了文化基因,理论的发展就是无根之草、无本之木,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树只有注入中华文化的血脉,才会在中国大地生根发芽。“两个结合”是我们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不同历史时期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原理”课程第一章讲到联系和发展的观点是唯物辩证法的总特征,联系具有普遍性,我们要运用整体的观点把握事物之间的联系。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又构成了运动、变化和发展,发展的实质是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灭亡。第二章认识论中讲到实践的观点是认识论中首要的和基本的问题,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动力、目的和检验标准。所以说,从发展性、整体性和实践性来看,“两个结合”与“原理”课程相关观点是相吻合的。

(三)“两个结合”与“原理”课程价值追求的一致性

“两个结合”与“原理”课程在社会价值追求方面具有一致性。“两个结合”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引导人们不断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发挥其思想引领作用,为社会成员提供共同的价值追求。比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导向,又融合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精髓,有利于凝聚社会力量,维护国家稳定和民族团结。“两个结合”通过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例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亲仁善邻、和谐、友善等思想,有助于培养良好的社会风尚。“两个结合”通过宣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向人们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有助于增进不同地域、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增强人们的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

“原理”课程引导大学生树立唯物、辩证的观点,知道世界的本原是物质,世界统一于物质;让大学生掌握实践和认识的辩证关系,并重视实践在认识中的决定作用;让大学生知道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遵循一定规律,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是历史的主

人;让大学生理解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最高理想,增强大学生的价值认同感,引导大学生爱党爱国爱人民,坚定理想信念,勇于投身社会实践,通过努力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原理”课程为大学生提供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工具。例如:学习了唯物辩证法,能够熟练运用联系和发展的观点处理问题;学习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能够运用矛盾分析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三、“两个结合”融入“原理”课程教学的实践路径

(一)加快“两个结合”科研成果转化,丰富“原理”课程教学内容

我们要加强对青年大学生进行“三观”教育,引导大学生追求远大理想,实现人生价值。思政课肩负着立德树人的使命,是青年大学生进行理想信念及价值观教育的主阵地,自然而然有责任和义务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传递给大学生。“两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党的实践经验的总结,“两个结合”提出之后,思政界关于“两个结合”的理论研究呈现出火热态势,科研工作者要加大对“两个结合”研究成果的转化力度,择优选出具有时代意义、适合高校“原理”课程教学的科研素材,将“两个结合”研究成果最快最有效地传递给在校大学生,使他们能够不断领会到党的最新理论成果,并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学术界关于“两个结合”的理论研究相对较多,如何将其转化为行之有效的教学内容,是“两个结合”融入“原理”课程教学的关键。关于“两个结合”的理论研究,不外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视角去分析。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可以结合“原理”课程2023版教材导论中的第二个内容:马克思主义的创立与发展去展开讲解。党的二十大报告重申了“两个结合”科学内涵、提出“六个必须坚持”等理论创新原则,这本身就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可以作为很鲜活的案例讲给同学们。二是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入手分析研究“两个结合”。文化这方面可以结合“原理”课程2023版教材第一章第一节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来进行讲解。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物质,具有指导实践改造客观世界的作用,在这里可以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经典名句来进行讲解。例如“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民为邦本”等观点不仅是过去朝代治理的方法,对于当下我们党在治国理政方面仍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习近平总书记今天提出的“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民至上”等观

点,其实就根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在“原理”课程第三章第一节中讲到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原理,先进的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推动作用,落后的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阻碍作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必须同传统文化相结合,才能真正成为大众文化,为我们所利用。^[5]针对这些理论部分的讲解,我们可以把“两个结合”内容很好地融入进去。第二节当中也提出了文化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动力作用。足以说明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这与“第二个结合”的内涵是相吻合的。“两个结合”理论深邃,立意高远,思政课要结合课程特点,讲深讲透其中的逻辑和意境,彰显“两个结合”的科学性、学理性和权威性。

实践的脚步没有停滞,理论创新就不会停滞。思政课教学要紧随时代步伐,不断将党的最新理论成果融入课堂教学中,尤其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后,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如在2024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讲话,这些鲜活的素材都可以很好地融入思政课尤其是“原理”课程教学中,不断丰富“原理”课程教学内容,增强“原理”课程教学实效性。

(二)提升理论素养,发挥教师在融入过程中的主导作用

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强调:“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关键在教师,关键在发挥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6]¹⁰“原理”课程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主课堂,尤其在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后,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原理”课程教师的重要政治任务。“两个结合”是党的二十大精神的重要内容,“原理”课程教师完成这一使命,需要不断与时俱进,率先成为“两个结合”的学习者、宣传者、笃行者和示范者,发挥好自身在“原理”课程教学中的榜样和引导作用。具体可尝试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

第一,“原理”课程教师要不断提升自身理论素养。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老师要给学生一杯水,自己就要有一桶水,思政课教师要讲好思政课,充当学生的心灵导师,需要不断充实自我、提升自我,不断学习、与时俱进,通过学习阅读经典文献、使用学习强国平台、专题培训等途径学习党的理论知识,深化对“两个结合”的内涵理解,提升自身理论素养,把最新、最前沿的思想理论源源不断输送给学生,不断丰富学生的理论认知,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第二,“原理”课程教师要不断提升自身教学水平。教学是专业技术性较强的行业,思政课教学更具特殊性。思政课教师要具备政治的敏锐性和知识的学理性,把政治性、学术性、建设性和批判性统一起来,开展专题教学和学术教学。^[7] 思政课教师通过观摩、讲示范课、同行听课等方式,磨炼内功,学习借鉴别人优秀的教学方法,提升讲授、解读“两个结合”的教学能力,重视学情分析,针对不同年级、不同专业的学生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提升思政课教学效果,使党的理论精神在大学生中入脑、入心。如:专题导入法,以“两个结合”作为教学导入来讲解“原理”课程导论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内容;问题讲授融入法,从某种程度来讲,是否具备问题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课堂教学的成败,通过设置什么是“两个结合”、为什么要提出“两个结合”以及“两个结合”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关系等问题帮助学生理解“两个结合”的内涵。

第三,加强“原理”课程教师的业务培训和同行之间的经验交流。除了不断学习理论知识、增强自身教学能力之外,同行之间、不同学校之间思政课教师的经验交流,也是提升思政课教师自身业务能力的一项重要途径。例如:聘请校外优秀专家学者进行专题辅导,与全国、全省重点马院进行学习与交流,进行集体备课,线上学习等。

(三)借助多媒体技术,融入丰富的教学媒介

1. 采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传统“原理”课程在整个教学过程中以教师讲授为主,这种教学方式不利于学生积极性的发挥。在互联网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广泛应用的今天,思政课教师要改变传统教学方式,采用体现时代特色的现代化教学手段才能不断满足学生的求知欲,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增强思政课的教学效果。我们可以采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方法,传统与现代相结合,利用好互联网这个平台,借助雨课堂、智慧树、中国大学MOOC等现代化教学手段,抓好课前、课中和课后环节。^[8] 例如:课前通过雨课堂发布“两个结合”学习资料,引导学生思考“两个结合”的内涵、“两个结合”为什么是党的理论创新的科学方法等问题,让学生通过课前预期自己寻找问题答案,加深对“两个结合”的理解;课中借助雨课堂发送相关问题,了解学生对“两个结合”的掌握程度;课后利用雨课堂发布作业及阅读材料,如:阅读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两个结合”论述的相关材料,观看视频,进一步巩固所学内容。鼓励学生借助人民网、学习强国、学校公众号等网络资源,培养学生自主学

习能力,使学生由被动学习转为主动学习。尤其是利用AI技术工作学习的软件也出现在学生视野中,作为“原理”课程教师,就需要引导学生正确看待新生事物,尤其是利用AI技术为自己的学习生活服务,使它们发挥正积极作用。

2. 利用网络媒体等社交平台,多渠道与学生互动,发挥“生活思政”的作用。网络信息时代,思政课教师要利用好互联网这个平台,在课堂之外借助企业微信、QQ、微博、腾讯会议等网络工具,与学生线上交流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心得体会、生活感悟,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也利于学生在轻松愉悦的环境中敞开心扉,把自己内心的一些想法、生活感悟与老师进行交流,这样不仅巩固了教学效果,也激发了学生学习党的思想理论的兴趣。

(四)开展实践教学,共创“原理”课程协同育人机制

1. 开展课堂实践教学活动。“原理”课程教师要向学生宣讲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引导大学生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学习、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和矛盾。除此之外,“原理”课程教师要进行学情分析,针对不同专业、不同能力学生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因材施教。高深的理论会使学生感到枯燥,失去学习兴趣,教师在讲授原理时,可以结合学生所学专业知识、学科背景,以及学生感兴趣的现实问题,如情感、恋爱、就业等话题,把这些内容融入理论课教学中,使学生能够感受到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对自己是有帮助的,是科学的理论。

2. 开展校园实践教学活动。校园实践教学是对课堂教学的有益补充,课堂教学无法实现的部分可以通过校园文化活动进一步开展,巩固学生对党的思想理论的掌握。比如:开展党的二十大精神知识竞赛、演讲比赛等,鼓励学生参与其中,使学生在准备材料、记忆背诵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将“两个结合”思想理论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最近一些高校选拔优秀大学生进入宣讲团,让大学生充当思政课老师,抽调到各个院系、学校、社区开展党的二十大精神宣讲活动。这些实践活动的开展非常有教育意义,不仅在各个地方掀起了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热潮,使党的理论精神深入人心,而且锻炼了大学生,使他们更加深刻领悟到“两个结合”“六个必须坚持”等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内涵,激发了大学生学习党的思想理论兴趣,增强了他们学习的动力。一些高校成立了以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主要目的的学生社团,如青马社团。学生加入这些社团,利用重要节假日组织社团活动,走上街头社区宣传

党的二十大精神,或者利用网络平台在学生中宣传党的思想理论。

3. 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学校要主动与企业、博物馆、文化馆等单位开展对接,建立校外实践基地、爱国主义基地、党员教育基地等开展校外教学活动。帮助学生从现实的体验中深化对所学思政理论的认同和内化。一些高校与当地博物馆联合建立实践基地,定期组织学生到这些场馆参观走访,感受历史文化的魅力,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这也是宣传党的思想理论的很好途径。除了校外实习基地,各个学校的校史馆也是思政课教师开展实践教学的良好资源,校史馆具有路途近、参观方便、便于组织的优势,思政课教师要利用好这一资源,在校庆日,新学期开学等关键节点,组织学生参观校史馆,开展课堂之外的实践教学,使学生了解学校的建校与发展历史,感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社会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通过实践教学,使学生学到书本之外的知识,了解中国社会的真实变化,激发学生学习党的理论的热情,为党的理论在大学生中入脑入心打下基础。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 [2] 习近平. 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J]. 求是,2020(17).
- [3] 徐艳玲. 深刻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J]. 求是,2023(4):65.
- [4] 孙雷,石峰. “两个结合”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守正创新的价值意蕴[J].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3(8):46.
- [5] 张营. 从“两个结合”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的三重维度[J]. 理论观察,2022(2):42.
- [6] 张志强,郝琦. 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3(10):62.
- [7] 田歧立. 高校思政课讲“两个结合”的道理蕴涵及实践策略[J].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4):130.
- [8] 谢哲毅,吴常柏. “两个结合”思想融入高校思政课的三维探析[J]. 河北开放大学学报,2023(4):79.

(责任编辑 许峻)

Research on the Integration of the “Two Combinations” into the Teaching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aking the Course of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as an Example

ZHANG Pei

(School of Marxism,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Integrating the “two combinations” into the teaching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not only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studying and implementing the spirit of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but also for making the Party’s ideological theories penetrate deeper and be more effectively implemented in universities. It is also a practical need to enrich the teaching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and promote the preservation of integrity and innovation in the teaching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t is also an inherent requirement for strengthening college students’ ideals and beliefs and cultivating builders and successors of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We should accelerate the integration of the “two combination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chievements, so as to provide rich theoretical attainments for the teaching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e should utilize modern teaching means and media to achieve teaching objectives in various ways, carry out practical teaching, jointly create a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mechanism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and accelerate the realization of the fundamental goal of fostering virtue through education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Key words: “two combinations”; integrati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eaching exploration

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大思政课”的价值意蕴与实践进路

王 鹏

(湘潭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南 湘潭 411105)

摘要:在高校“大思政课”的实践推进进程中,有机融入红色文化资源是高校承继红色基因的内在要求,也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实践指向,以此推进高校“大思政课”的提质增效。当前,红色文化资源在融入高校“大思政课”实践过程中存在与学生距离之“远”、与高校“大思政课”距离之“远”、与融入机制距离之“远”等诸多现实困境。摆脱这些困境,需要从方法、融合、机制与内容等多元维度共同发力,持续推动红色文化资源赋能高校“大思政课”建设。

关键词:红色文化资源;大思政课;价值意蕴;现实困境;实践进路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5.01.016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5)01-0095-04

“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1]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在全国各族人民接续奋斗进程中,红色资源内涵得以不断延展,并呈现出红色物态资源、红色精神资源等多元样态。在高校“大思政课”建设过程中有效融入红色文化资源是新时代场域之下稳步推进高校思政教育进程的重要路径,是把握学生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的主要举措。因此,我们要从理论维度对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大思政课”这一时代课题进行深入探究。

一、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大思政课”的价值阐释

文化问题在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过程中自始至终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与作用,红色文化内蕴着崇高的革命精神,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在高校“大思政课”中融入红色

文化资源,有利于红色文化资源社会价值功能的有效发挥,扎实推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进程。

红色文化资源内涵丰富、意义重大,是一种积极向上的革命文化。红色文化资源作为中国特色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自身呈现出不可复制性、历史传承性等重要特征。为充分发挥我国在国际竞争中的显著优势,集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力量,我们要始终传承与弘扬红色传统、红色精神,以其为教育方式、方法,不断强化对大学生的思政教育。红色文化资源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重要精神宝库,与高校“大思政课”之间存在紧密的内在联系。进一步加深广大学生对红色文化资源的认知程度,有助于积极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与价值观。红色文化资源与高校“大思政课”高度契合,既可保障高校“大思政课”的发展方向,也可进一步

收稿日期:2024-11-30

基金项目:2023年度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新媒体视域下湖湘红色文化赋能高校思政教育的价值与实践探析”(23C0036);2024年度湘潭大学学位与研究生教学改革研究一般项目“数智时代湖湘红色文化资源与研究生思政课实践教学协同创新研究”(YJGYB20240009);2024年度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大数据时代湖湘文化数智化创新研究”(24YBA009);2025年度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课题“全媒体时代数字教育中的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范与应对策略研究”(XSP25YBC036)

作者简介:王鹏(1987—),男,山东烟台人,博士,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博士后,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红色文化相关问题研究。

凸显其自身的审美熏陶功能。作为中华民族独有的民族精神,红色文化资源本身就是传统精神与时代精神融合的集中呈现。依托多元方式、方法,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大思政课”具备一定的现实可操作性。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国家的进程中,红色文化作为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法宝,其地位与作用不可替代。

二、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大思政课”的现实困境

(一)红色文化资源与学生距离之“远”

一方面,从时间维度来看,部分红色文化资源主要产生于革命战争年代,与其他红色文化资源之间的时间跨度较大,这使红色文化资源整体上时间分布不均。对于广大在校学生而言,他们往往是将其作为一种固定不动的历史资源,而不是视为与自身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重要资源,这些因素的共同存在导致部分学生对红色文化资源相关的历史事件等内容研究兴趣并不高,从而难以产生积极的影响效应。另一方面,从空间维度出发,红色文化资源空间分布大多集中于农村地区、革命老区,导致城市红色文化资源较少,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广大学生对红色文化资源的认知程度。此外,红色文化资源中的有机构成要素,如人、事、物等,因其本身所呈现出的崇高性特征而导致与学生易于接受的草根文化、快餐文化等存在一定的心理距离。

(二)红色文化资源与高校“大思政课”距离之“远”

在全面推进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大思政课”建设进程中存在一定问题,主要表现为:首先,红色文化资源丰富内容与思政课教学结合的程度较低,在思政课具体教学过程中,往往只注重红色资源的宣讲性,而忽视了从理论维度对红色故事内在精神的阐释,从而导致思政课教学的系统性、有效性较低,形式往往大于内容,难以真正实现红色文化精神与思政课教学的深度融合;其次,基于红色文化资源的特殊性与具体性,应因地制宜采取多元方式来开展红色教育具体活动,但目前高校往往采取主题征文、校外参观与寒暑假实践活动等传统方式,亟需根据学生实际特点来不断创新融入方式,进一步提升思政课教学的有效性、针对性;再次,针对目前思政课教学所取得实践效果,对于红色文化资源而言,其本身所具有的育人精神并未得到最大程度的彰显,红色教育也只是片面停留在单一宣讲等固有学习模式,学生并不能对红色文化资源的内在精神进行系统性认知,而宣讲活动的结束也预示着红色文化资

源育人进程的停滞,红色教育最终育人效果差强人意,得不到切实有效的反馈、评估;最后,在重视红色文化资源党性教育、政治引导等功能的基础上,还有待进一步挖掘其人文素质教育、审美教育的功能。

(三)红色文化资源与融入机制距离之“远”

一方面,从育人主体维度来看,高校“大思政课”建设育人主体呈现多元化特征,思政课教师、党政干部等多元主体的共同存在及其合力可形成一支结构合理且功能优化的人才培养队伍。但在高校思政育人的具体过程中,多元主体切实运用红色文化资源的合力并不突出,缺乏一定的长效机制。另一方面,基于高校育人目标,结合红色文化资源的内在优势,在思政课教学过程中需要不同课程、不同活动之间的分工与配合。在具体教学过程中,教师往往会选取革命英雄事迹、革命故事等案例,以视频图片等形式来讲授红色知识,在借助理论讲授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实践教学,不同思政课之间、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之间所建立的链接较为薄弱,存在一定的提升空间。另外,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大思政课”过程中缺乏一定的施教体系与有力的保障体系,红色文化资源与思政课教学之间未能充分建立有效的联系,二者融合的运行机制、评估机制等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三、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大思政课”的优化路径

(一)方法维度:坚持守正创新方法论,扎实推进红色文化资源有机融入思政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立足于引导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全面客观看问题,就不用担心在政治上出问题。”^[2]首先,要始终坚持用学术讲政治,凸显红色文化资源的政治性。在高校“大思政课”实践进程中,红色文化资源的应用要始终突出教育引导功能,坚决不走形式主义、拿来主义的老路,杜绝思政课形式化,要将红色文化资源内在价值与知识传授相融合,始终确保红色文化资源利用的政治方向,以用学术讲政治为方法,避免资源利用的片面化,在扎实探究红色文化资源史料的基础上,通过由浅入深的学理分析,有效开展对学生的精准说服与引导。其次,不同地区与学校要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切实做好实物、口述史等原有资源的保护、利用与研究,科学研究与其相配套的红色课程体系,以此凸显出主题的鲜明性、逻辑的严谨性,便于推动红色文化资源的搜集整理、实地调查等工作。对于高校思政课教师而言,要采取多元方式来积极创新与研发红色文化教育课程,以此再次激活红色

文化资源的强大生命力,不断深入挖掘其内在价值,全面打造红色主题特征鲜明的思政课教学体系。再次,要始终坚持运用新技术、新手段,凸显红色文化资源的在场性。在数智时代场域之下,要以提升红色文化资源的课程表现力为抓手,实现红色文化资源的数智化发展,借助多元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合理构建智慧课堂,再生部分已消失的红色文化资源,突破时间、空间与环境等多重因素的客观限制,实现红色文化资源的创新性应用、创造性发展,让红色文化历史真正活起来、传下去。最后,要始终营造感染力,凸显红色文化资源的一体性。要以切实推进红色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为目标,以学校整体环境为实践场域,全力营造联结历史的文化氛围,实现红色文化资源的去他者化,深化学生的身份与历史认同,推动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的融合发展,在学生日常生活中形成较为稳固的情感结构、群体记忆。

(二)融合维度:创新思政教育融合论,建立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思政教育保障机制

红色文化资源内蕴着伟大的民族奋斗精神以及崇高的革命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百年革命奋斗的重大成果,红色文化的发展与中国革命密切相关,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大思政课”将为大学生理想信念的正确树立奠定坚实基础。对此,我们要不断创新二者相融的教学方式、方法,积极开发高校思政教育载体,以此为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思政教育提供牢固的保障机制。首先,要不断深入挖掘红色文化资源,以红色文化资源与高校思政教育结合为发力点,全面建构红色文化资源思政教育长效机制,依托学校主导力量,采取一系列实践措施来不断加强校园红色文化建设,借助数智技术优势来重点开辟红色文化建设平台阵地。其次,要结合高校思政理论课的教学要求,在深入研究红色文化资源的基础上,深度激发大学生自觉接受红色文化熏陶的爱国情怀,将爱国情感与实践活动紧密结合,全面提升自身素质。最后,要始终坚持多样性与针对性相结合的重要方针,推动红色文化资源与课堂教材的融合发展,积极创办红色文化教育实践基地,重点打造红色文化资源产品体系,以此加强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巩固其自身理想信念。此外,对于红色文化融入思政教育教学而言,要更多地采取讨论式教学方式,以讲授+案例的教学方法来促使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被再次激发,从而不断提升课堂教学的自主性、直观性,借助社会资源的内在优势来积极搭建大学生社会实践平台,进而促使红色文化资源的有效渠道被

进一步拓宽。

(三)机制维度:构建红色文化资源机制论,夯实高校思政课教师红色文化资源知识储备

在切实运用红色文化资源不断提升高校“大思政课”实效性的实践过程中,结合本地区区学校实际情况,以解决学生需求为出发点,对于部分有条件的马克思主义学院而言,要以红色文化资源为重要抓手,积极研发本地区红色资源校本课程,以此为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大思政课”助力,从而不断提升高校“大思政课”的有效性。首先,对于马克思主义学院而言,要积极推动教师学习红色文化资源长效机制的构建,不断夯实高校思政课教师的红色资源知识储备。全面打造红色文化资源数字化平台,为思政课教师提供思政课教学数智化红色资源,全力营造良好的红色文化学习氛围。通过广泛采取“线上+线下”等多种学习模式,在开展红色传统教育的过程中不断巩固思政课教师的理想信念。其次,要以红色文化为重点,持续推动红色网络资源、红色视频资源与红色文本资源的深度融合,从而不断提升思政课教师的备课效率,减轻思政课教师备课负担。以高校智慧课堂建设的积极推进来逐步提高高校“大思政课”的吸引力,增强“大思政课”教学的有效性。对于马克思主义学院而言,要逐步探索课堂教学模式的创新性发展,并推动这种创新性发展的真正落地,为不断提升高校“大思政课”的实效性提供切实保障。最后,要最大程度凝聚高校、政府与社会等多元主体的合力,在全面统筹与协调校内外红色文化资源的基础之上,切实发挥马克思主义学院的主导作用,夯实多元主体之间的合作,着力打造多元化智慧课堂、红色资源学习平台等重要平台。同时,还要积极争取其他社会力量的积极加入,与之建立全面且长期的合作关系,形成开放且多元的教学服务机制,切实推动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大思政课”教学的实践进程。

(四)内容维度:聚焦思政课内涵论,推动红色文化资源在思政课中的内涵式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用好红色资源,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深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3]在红色文化资源具体运用过程中,学校要在结合自身实际情况的基础上,严格落实教学大纲统一性要求,采取体验式教学、探究式教学、互动式教学等多种课堂形式,凸显红色文化资源的内涵式教育,这也是知识进一步转化为价值认同的关键所在。在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大思政课”

的实践进程中,重点在于如何讲史,而难点则在于如何讲得好。首先,要学会讲好历史,借助历史的固定性与教师的灵活性,推动思想政治教育成为一门极具说服力的课程。在利用红色文化资源的过程中,要深入挖掘细节、情节,准确把握好红色故事与当前生活的内在联结,在课程实践教学过程中不断提升红色故事的生命力、针对性。要避免红色历史宣讲的简单化处理,充分重视高校“大思政课”中红色数据的支撑作用,使其产生持续的影响力、感染力。要重视教学环节设计,在讲述红色故事的同时还要注重场景还原,营造出身临其境的现场感。其次,要学会讲清逻辑,塑造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学党史讲党史不能停留在讲故事、听故事层面,而要通过讲故事引导广大党员加深对党的历史理解和把握,加深对党的理论理解和认识。”^[4]在高校“大思政课”教学过程中,要切实推动红色文化资源的创新性转化、创造性发展,以逻辑性的内在魅力来吸引与引导广大学生融入直至转化与应用过程之中,使其更为坚信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更为坚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认同且深刻认识其重要作用,更为坚持红色文化资源中的优良传统,从而彰显新时代场域之下中国共产党的实践品格。最后,要学会讲明道理,始终用好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观点与方法,培养学生看清问题、看清本质的本领,以红色文化资源为支点,将大道理进行由浅入深的集中化表达,从而讲清楚高校“大思政课”。同时,还要积极主动回应学生关注的现实问题,以红色文化资源中的重要人物为原型,以红色文化精神为支柱来积极应对新时代所面临的各种挑战,在现实问题解决过程中加深学生对红色文化资源的认识,引导他们形成科学的思维方式与应对方式,从红色文化中汲取自身所需的重要力量,从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而不懈奋斗。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用好红色资源,赓续红色血脉,努力创造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新业绩[J]. 求是,2021(19):4-9.
- [2] 习近平. 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J]. 求是,2020(17):4-16.
- [3]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44.
- [4] 习近平. 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J]. 求是,2021(7):4-17.

(责任编辑 许峻)

The Value Implication and Practice Approach of Integrating Red Cultural Resources into “Bi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ANG Peng

(School of Marxism,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Hunan 411105, China)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the practice of “bi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organic integration of red cultural resources is the inherent requirement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inherit the red gene, and also the practical direction of implementing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moral education, so as to promote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bi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t present, in the practice of integrating red cultural resources into the “bi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re are many realistic difficulties such as the distance from students, the distance from the “bi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and the distance from the integration mechanism. The key link to solve these difficulties is to make joint efforts from multiple dimensions such as methods, integration, mechanism and content, so as to continue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bi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empowered by red cultural resources.

Key words: red cultural resources; bi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value implication; realistic dilemma; practical approach

红色文化融入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教育的路径研究

宋晓霞¹, 吴冠磊²

(1. 南京审计大学 审计文化与教育研究院, 江苏 南京 211815;

2.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 康复科学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08)

摘要:当前高校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教育无法全面满足培养高素质人才的要求,应当从红色文化内核特征及其政治社会化功能的角度,深入挖掘红色文化融入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教育的意义。在融入的过程中,着力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提升高校政治社会化过程的可控性,营造良好的思政育人环境,发挥第一课堂教学优势等措施,将高校政治社会化教育过程中的挑战化解于无形。

关键词:红色文化;政治社会化教育;政治品格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5.01.017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5)01-0099-05

政治社会化是政治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标志。“政治社会化对于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政治合法化和政治稳定有着重要意义。”^[1]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鲜明政治标识,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为理想和信仰拼搏奋斗。它作为重要而宝贵的精神文化资源,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亦是建设文化强国的战略选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强调:“我们要继续弘扬光荣传统,赓续红色血脉,永远把伟大建党精神继承下去、发扬光大!”^[2]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用好红色资源,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深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然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尤其是受到西方多元文化思潮的影响,红色文化的发展也遇到了一定的困境,一方面是出现了社会大众对红色文化的

片面理解现象,另外一方面是在发展传播的过程中因缺乏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而未能有效发挥其应有的引导和教育作用。

一、红色文化的内核特征与其政治社会化功能

(一)红色文化的内核特征

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红色文化是对革命精神的高度概括和凝练。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历经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建立新中国的伟大征程中锻造的宝贵精神财富,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奋斗进程中凝聚而成的神圣精神力量,是全体中国人民的精神文化纽带。“凝聚在红色血脉中的红色基因,是中国共产党人坚守初心使命、不懈奋进的精神力量源泉。”^[3]

红色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和独特的时代特点。红色文化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凝聚力和感染力。红色文化的基本特征即“党性与革命性的统一、人

收稿日期:2024-10-27

基金项目:2019年度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项目“政府公共危机治理能力提升研究”(2019SJA0362);2021年度江苏省高等教育学会辅导员工作研究会专项课题(指导项目)“少数民族大学生传承红色基因的机制研究”(21FYHLX015);2021年度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项目(思政专项)“残障大学生传承红色基因的路径研究”(2021SJB0234)

作者简介:宋晓霞(1980—),女,河南周口人,硕士,南京审计大学审计文化与教育研究院讲师,研究方向:政治改革与政治发展;吴冠磊(1981—)男,山东郑城人,硕士,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康复科学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青年社会工作。

民性与阶级性的统一、科学性与时代性的统一、民族性与开放性的统一”^[4]。红色文化有利于构建核心价值观,有利于推进优秀文化的保护传承,有利于引领社会风尚,有利于提高大学生思想免疫力。

(二)红色文化的政治社会化功能

政治社会化的目的在于“政治体系通过对其成员进行观念和技能的教育,培养其对政体的认同和支持,最小化其治理成本”^[5]。红色文化在个体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具有思想教育功能,主要体现在意识形态价值引领、道德实践规范、实现精神富有等。

1. 坚定意识形态价值引领的政治功能

在人生历程的不同阶段,随着人格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个体的政治社会化在特定的政治文化环境中生成并不断演化。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历史再次验证了政治文化和制度的变化对一个国家的政治具有重要的影响。显然,政治社会化对于政治意识形态在现代民族国家构建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个体面临着多元化思潮的影响,主导性的价值观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作为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红色文化作为政治社会化的核心内容,发挥着坚定意识形态价值引领的政治功能。红色文化倡导的是崇高思想境界和革命道德情操,个体在政治观念内化过程中更加坚定理想信念,在多元思潮中胸怀“国之大事”。

2. 提供道德实践优秀案例的规范功能

政治社会化在传播政治知识,培养公民政治意识,促使个体积极参与政治,推进政治民主化的进程中,还需要通过政治实践加以巩固。政治知识反复灌输比较枯燥,很难达到内化于心外化为行的境界。红色文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而产生的一系列物质和精神成果,为人民群众提供丰富的马克思主义运用于实践案例,启迪个体通过掌握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和理论,在实践中不断坚定政治理想。红色文化彰显了革命道德精神,所蕴含的精神内涵提供了价值标杆,其感召力是书本理论不可比拟的,对个体政治社会化有着充分的说服力。此外,红色文化贯穿于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各个时期,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未来发展方向一致,具有“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重要作用。

3. 实现精神富有提升综合素质的塑造功能

政治社会化是培养个体获得适应社会政治人格的过程。马克思追求的未来理想社会的终极目标是“人真正的充分的自由”,这意味着社会主义要同时实现物质和精神的统一协调发展。习近平强调:

“促进共同富裕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高度统一的。”^[6]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精神富有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红色文化资源的价值归宿是促进全体社会成员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从红船启航到踏上伟大复兴之路,百年风雨历程证明,共同富裕不仅是人民过上富足的物质生活,更要使人民享有富足的精神生活。运用红色文化特有的精神价值和文化内涵去塑造个体健全的人格,培养受教育者健康的心理素质和高尚的精神境界,进而可以更好地培养个体形成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个体在积极投身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之中锤炼意志品质,磨炼责任担当,不断提升综合素质和能力,实现人格的健全,最终成为优秀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二、红色文化融入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教育的意义

(一)高校红色文化传承的历史回顾

红色文化传承是高校的历史使命。传承红色文化,赓续红色基因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光荣传统和精神力量源泉,是我国高等教育的优良传统和牢固信仰。红色文化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而诞生,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发展壮大于改革开放时期,升华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诞生于延安时期的陕北公学和抗大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高校,流淌着红色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最早在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也是我们党在北京早期革命活动的历史见证地,在建党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7]20世纪50年代,在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交通大学师生听党指挥跟党走,铸就了光荣的“西迁精神”^[8]。新时代高校肩负着传承红色文化,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使命担当。

(二)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政治社会化教育的现实意义

1. 红色文化自身发展规律的内在要求

传承红色文化,赓续红色基因是新时代大学生义不容辞的责任和担当。“红色文化作为一种宝贵的思想文化资源,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9]政治社会化教育是高校相关职能部门和教师通过理论授课、社会实践活动等途径和方法,让青年学生坚定政治信仰,不断提升政治参与的意愿和能力,并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过程。要用红色精神武装头脑,浸润青年学生

的心田,种上红色文化的种子。要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接受红色文化教育,实现“润物细无声”的教育效果,必然要将红色文化元素融入学生喜闻乐见的校园文化活动中,融入高校的育人全过程。

2. 弘扬革命精神提升大学生思政教育的实效性

红色文化归根结底是为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而服务的。革命年代虽然已经远去,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要铭记心上,凝聚而成的革命精神更要发扬光大。弘扬革命精神是高校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实践,有助于坚定新时代大学生的政治信仰。当今青年大学生学习生活成长的环境,性格特点、精神文化的差异化需求,给新时期的高校思政教育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政治社会化教育能更好地满足红色文化服务大学生的现实需求。思政教育与红色文化传承具有内在契合性,相互促进,相辅相成。新形势下,红色文化育人的方式方法也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根据新时代大学生的特点和需求进行相应创新,提高大学生文化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扩大大学生文化参与的覆盖面,增加大学生文化参与的机会,提高红色文化育人成效。

3. 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增强文化自信的有效举措

作为先进文化的红色文化对爱国主义教育、增强文化自信至关重要。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0]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增强文化自信,培养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是新时代高校的光荣责任和使命担当。有效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增强大学生文化自信,首先要从红色文化中汲取养料,通过丰富政治社会化教育的民族特色、推进红色文化融入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教育,不断赋予红色文化新活力。高校通过将红色文化元素嵌入校园文化和实践活动中,将红色基因融入高校文化育人工作中,培养新时代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意识,传承革命精神,使红色文化蕴含的优秀文化理念切实成为新青年提高思想觉悟,增强文明素养和文化自信的有力武器。

三、高校政治社会化教育的挑战因素

(一) 主导价值面临着个体价值多元化选择的挑战

1. 错误思潮的冲击使高校政治社会化教育面临的挑战增大。“历史虚无主义、消费主义、泛娱乐化思潮、普世价值论、新自由主义等不同程度地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产生了冲击。”^[11]拜金主义、实用主

义、个人主义、功利主义等或多或少存在于校园中,这些话语气体系潜藏的逻辑其实就是个人利益至上,助推了意识形态风险的产生,违背了社会主义道德原则,对部分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塑造造成一定的影响。

2. “精致利己主义”现象的存在影响了集体凝聚力。少数“00后”学生甚至是极少数党员学生感恩意识欠缺,集体意识淡薄,待人情感冷漠;学习期间参加活动的目的性、功利性强,重视眼前利益,缺乏长远考虑;重视专业课学习,忽视大学思想政治课学习;过于重视个人利益,大局意识弱;过于看重学习成绩,忽略综合全面发展。这些现象无疑会加剧个人与公共利益的冲突,严重时削弱大学生对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认同感。

(二) 高校政治社会化育人的效能面临复杂难控的局势

1. 校园文化活动中红色元素偏少,基层党团组织红色文化功能弱化,组织力、动员力有限。据初步统计,部分“00后”学生喜欢的是说唱、游戏类校园文化活动,对于传统文化类活动兴趣不够。高校的校园文化活动中娱乐元素居多,红色育人活动较少。学生团支部、学生党支部等基层党团组织忙于统计各种报表,完成事务性工作,组织策划红色文化实践活动的动力严重不足,红色文化育人功能被弱化、被虚化。

2. 主题教育流于形式,内容单调缺乏吸引力。主题教育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促进每位大学生全面而有个性发展。然而,一些主题教育活动形式更多的是会议,会上老师和同学们讲讲话、举举手、拍个照,会后写个新闻稿。活动缺乏计划性和整体设计,作为活动的主体,学生被动参与。部分红色主题教育实践活动,红色旅游的部分偏多,对红色教育的意义和主旨挖掘不够。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学生参与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造成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效大打折扣。

3. 思想政治课堂教学方法亟待改进。目前思想政治教育课堂教学出现了“重教书,轻育人;重言传,轻身教”的现象,这些问题的出现直接弱化了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教育的有效性。例如,部分思政课教师照本宣科,满堂灌,教育教学方法陈旧落后,课堂上师生互动、生生互动不足。这些情况造成了部分大学生对思想政治课程重视不够,产生了“考试通过就好”的心理,学习兴趣不高,致使课程育人的成效有待提高。

四、新时代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政治社会化育人的路径策略

(一)着力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新时代新征程,着力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要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首先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高校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教育中的指导地位,这一制度具有深远的意义,有助于筑牢全体大学生的思想基础,凝聚团结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为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供坚实的思想保障。推动红色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有效融入高校政治社会化育人过程,有助于巩固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使中华民族的天下观、社会观和道德观与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世界观、价值观、文明观等结合起来,成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与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把握好红色文化融入的时、度、效,增强政治社会化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让大学生爱听爱看、产生共鸣,培养大学生敢于斗争、敢于担当的政治品格,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坚决抵制异质话语体系的侵袭,进而使整个社会形成昂扬奋进的精神风貌。

(二)推进多方主体协同提升高校政治社会化过程的可控性

新时代高校要坚定正确政治方向,培育社会主义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培育更多的大国工匠和应用型技能人才。政治社会化的主体机构包含家庭、学校、社会组织等,它们在高校青年学生政治社会化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中学校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家庭、社会组织等主体对于政治社会化也产生直接而全面的影响。高校大学生从不同政治社会化渠道获得的政治信息越是一致,不同主体机构的合力越大,其政治社会化效果就越能得以强化。因此,将新时代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政治社会化育人的过程中,通过建立稳定、连续和一致的政治社会化机制,推进不同政治社会化主体和机构之间相互协调,发挥各自作用,从而使高校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教育达到良性成效。

(三)充分发挥红色文化资源优势营造良好的思政育人环境

1. 充分认识红色文化在人才培养中的意义、地位和作用。红色文化集中体现了党的奋斗历程和伟

大成就,与党的性质宗旨、行动理念具有高度的内在契合性,为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提供了认同基础、精神引领和情感纽带。高校肩负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光荣使命,是传承红色基因、弘扬红色文化、实施红色育人的主战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社会主义教育就是要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也是我国大学最鲜亮的底色。”^[7]要将红色教育贯彻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全过程,强化大学生对红色文化的价值认同,在校园文化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中,主动嵌入红色文化元素,融入红色基因,提升校园文化活动和实践活动的号召力、感染力、影响力。

2. 加强党团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营造学习英雄典范的良好氛围。英雄典范人物的示范,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政治社会化方式。“英雄品格与英雄精神是红色基因的重要元素,既是历史的,也是当代的。”^[12]红色文化为大学生提供了丰富的优秀人物事迹,为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提供了激励榜样。高校基层党团组织是有效实现党的领导的坚强战斗堡垒,也是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重要场所和载体,在提升大学生的政治社会化水平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高校应不断加强党团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其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通过把握政治方向、坚持政治原则,组织引导广大学生讲好英雄故事,学习英雄事迹,传承英雄精神,为学习英雄典范营造良好的氛围。

(四)加强思政教育队伍建设发挥第一课堂教学优势

1. 构建具有高度政治责任感和育人使命感的高素质辅导员队伍。政治社会化也是培育符合中国发展需要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过程。辅导员是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引路人,是青年学生的贴心人、引路人,成长成才路上的指导者。辅导员在高校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教育工作的一线,围绕学生并贴着学生的心做思想工作,这对辅导员的职业素质和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这支队伍必须具备过硬的政治素养,保持政治先进性和纯洁性。辅导员的专业化与职业化显得尤为重要,是增强高校大学生政治社会化育人的实效性、针对性、吸引力与感染力的关键。因此,建设具有崇高政治理想、严格政治纪律的辅导员队伍,才能更好地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

2. 发挥第一课堂教学优势,提供多种课堂选择方式。红色文化是先进的政治文化,是社会主义政

治文化的源头,是高校开展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社会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宝贵资源,红色文化有力地推动了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由于高校不同专业、不同学科背景的学生对红色文化的了解程度、理解能力和学习态度等均存在着差异,要让新时代大学生主动内化红色精神,必须创新育人方式,改革教学内容。课堂教学是政治社会化的主渠道,将红色文化资源转化为优质的教学资源融入第一课堂,将红色文化资源的精神等内容贯穿到理论课的教学过程中,必须发挥第一课堂的教学优势。通过创新教学方式方法,结合学生的实际需要,传授以红色文化为内核的政治知识和信息,有效推进红色文化资源转化为大学生成长的精神养分。

拓展新时代红色文化与高校政治社会化的融合育人路径,要将红色文化资源与大学生日常生活“三大课堂”相融合,在发挥第一课堂教学优势的基础上,还应充分发挥第二课堂和第三课堂的重要作用,实现第一课堂主渠道、实践活动主阵地和网络媒体新课堂的全面贯通。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深刻改变着人民群众的的生活方式,同样也深刻影响着教育领域。当代大学生是随着网络信息化时代发展而成长的,是典型的网络原住民,信息化对他们的影响深刻而长远。教育信息化有助于推进红色文化融入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教育体系,充分发挥第一课堂、第二课堂和第三课堂的育人作用,三者互相促进、有效互动、深度融合,可以提供多种课堂选择方式。

参考文献:

- [1] 孟令梅. 论“互联网+”时代政治类学术期刊的政治社会化功能[J]. 政治学研究, 2018(2): 116-124, 128.
- [2]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21-07-02.
- [3] 胡和平. 立足文化和旅游特色用好红色资源、传承红色基因[N]. 人民日报, 2021-07-19.
- [4] 徐功献. 中国红色文化百年变革求真的历史演进与传承路径[J]. 湖南社会科学, 2021(3): 19-20.
- [5] 苗红娜. 国内政治社会化研究三十年述论[J]. 教学与研究, 2014(12): 96.
- [6]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四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2: 146.
- [7] 邱水平. 传承红色基因, 培育时代新人[N]. 人民日报, 2021-07-21(010).
- [8] 张哲浩, 陈晨, 闫潇. 用“西迁精神”厚植一代代学子的心灵之根[N]. 光明日报, 2021-07-07(005).
- [9] 刘振琳. 红色文化的政治社会化功能探析[J]. 思想政治课研究, 2022(1): 46.
- [10]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41.
- [11] 秦在东, 庄苓. 论增强高校红色文化育人的实效性[J]. 学校党建与思想, 2021(11): 44-45.
- [12] 周静. 论新时代红色基因传承的鲜明特色[J].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2): 17.

(责任编辑 许峻)

Research on the Path of Integrating Red Culture into College Students'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Education

SONG Xiaoxia¹, WU Guanlei²

(1. Institute of Auditing Culture and Education, Nanjing Audit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1815, China;

2. School of Rehabilitation Sciences,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of Special Education, Nanjing, Jiangsu 210008, China)

Abstract: At present, the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cannot fully meet the needs of cultivating high-quality talents, so the significance of integrating red culture into the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should be deeply explor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re characteristics of red culture and its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function. In the process of integration,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enhance the cohesion and guiding role of socialist ideology. By improving the regulation of the process of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ostering a conduciv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nvironment,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first class teaching and other measures, the challenges in the process of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an be imperceptibly addressed.

Key words: the red culture;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education; political character

新时代高校“大思政”育人体系探析

何艳冰

(郑州旅游职业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郑州 451464)

摘要:新时代高校“大思政”育人体系建设取得了巨大进展。各高校“大思政”育人体系的架构已初步完善,“大思政课”各要素之间,特别是“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协同度得到大幅度提高,高校不同人才培养路径融入更多思政因素。但也存在高校育人规划相对碎片化现象,高校内各主体间联动效用赶不上时代需要,各学科教育未达到优势互补的目标等问题。高校需要进一步用好新技术实现跨域教学资源共享,用好时代鲜活素材拓展理论资源,用好社会实践资源丰富课程体系,推动新时代高校“大思政”育人体系的进一步完善。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大思政”育人体系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5.01.018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5)01-0104-0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高校是党领导下的高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1]在新时代,要办好中国的高校,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就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坚持把人才培养与高校“大思政课”建设紧密结合,充分发挥铸魂育人功能,构建“大思政”育人体系。高校各育人主体要通力合作,同向同行,立足国际大视野,把准“大思政课”建设的战略性、全局性和时代性特征,贯彻“三全”育人理念,善用国家大事、社会大潮、生活大剧的鲜活素材丰富思政课的内容,运用好“大思政”育人体系,引导当代大学生在理论与实践的融会贯通中全面发展,更好地担负民族复兴大任。

一、“大思政”育人体系现状分析

所谓“大思政”,顾名思义就是从广义的思政概念出发,在坚持“立德树人”根本目标的前提下,坚持把思政课贯穿于高校教育教学的全过程,通过全员参与和全方位育人的方式,达到思想政治的教学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一定要跟现实结合起来。”^[2]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强化思政课建设与改革创新力度,奏响“三全育人”的时代强音,首先必须厘清思政育人

的现状,找准掣肘“大思政”发展的关键问题。

(一)各高校“大思政”育人体系的架构已初步完善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要把立德树人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贯穿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各领域,各学科体系、教学体系、教材体系、管理体系要围绕这个目标设计。”^[3]所以,“大思政课”育人体系的实质,就是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以“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和“怎样培养人”为基本要求,搭建“三全育人”体系架构。

“大思政课”育人体系的构建必须首先抓好顶层设计,探索适合各高校自身特色的“大思政课”育人体系架构。在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讲话的指引下,在党中央的整体布局下,各高校高度重视“大思政课”育人体系建设,已取得巨大进展。多数高校纷纷出台加强思政课建设的指导性计划,建立思政课程、课程思政和思政教育三者相互协作、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育人体系。

多数高校进一步加强了党对“大思政课”建设的领导,使高校成为坚持党的领导的坚强阵地。许

收稿日期:2024-09-18

基金项目:2023年度郑州市社会科学调研课题“新时期高校‘大思政’育人体系研究”(ZSLX20231769)

作者简介:何艳冰(1981—),女,河南南阳人,硕士,郑州旅游职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多高校都在深入研究青年学生成长规律、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和思想政治课教学规律的基础上,努力开拓文化育人、实践育人、网络育人、社区育人的途径,并尽力实现与课程育人的协同,将思想政治教育、思政课教学和“五史教育”紧密结合,提升思政教育的实效,引导广大青年学生立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各高校积极拓展思政课的实践育人途径,紧密结合思政课程、课程思政理论教育,推动合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培育。

(二)高校“大思政课”各要素之间的协同度大幅提升

“大思政课”之“大”,不仅指思政课的范围大,更包含思政课的主体多——不仅包括思政课教师,更包括专业课教师。这就需要思政课程、课程思政、思政教育之间,思政课教师、思政教育工作者和各学科教师之间的同向同行。积极引入思政课教师作为课程思政的共建人,构建以各专业教师为主体,以思政理论课教师为辅助,充分发挥思政课教师在政治教育方面的经验,实现公共课教师与专业课教师之间的资源共享、共建,是大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在新时代背景下,多数高校坚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紧密结合,推动思政课内涵的丰富和拓展。多数高校能够运用现代计算机技术、无线通信网、卫星等渠道,通过电脑、手机、数字电视等终端,利用微信、微博、抖音、小红书、钉钉、腾讯会议等现代信息传播手段,以更加现代化、科学化、人性化的方式,为用户提供教育服务,受到青年学生群体的青睐。多数高校也都能理解实践教学是理论教学的一种适当和必要的延伸,是推进素质教育,提高教学实效性的重要方式。多数高校都开展形式多样的、结合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的各种社会实践活动。多数高校也都鼓励和支持马克思主义学院和各专业学院加强协调协同,注重各专业院系和团委、学生处等行政部门之间的同向同行。整体上,“大思政课”各要素之间再也不是相互分割、相互独立、互不隶属的独立单元,而是协调配合越来越普遍,一体化程度越来越高。

(三)高校“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结合度更高

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来,高校思想政治课建设在实践中发展,在理论中创新。党和国家事业的决策部署、政策方针随着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不断加强、不断深化、不断创新。伴随时代发展,我国在各个领

域都取得了伟大的成就。挖掘其中所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将其融入思想政治课教学,可以实现最有力度、深度、温度的思想政治教育。

把高校思政课与“课程思政”有机结合起来,挖掘其他课程里思想政治教育素材,丰富思想政治课教学内容,为实现思想政治课程的目标和任务助力,是“大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重要内容。进入新时代,特别是2016年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和2019年全国思政课教师座谈会后,各高校教师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政治教育一系列讲话的精神,明确课程思政建设的根本目标,用好课堂教学主渠道,加强高校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之间的联系,不仅让鲜活的时代素材以及党中央的新思想新理论及时融入高校思想政治课教学内容,用通俗易懂的理论阐述,实现生活世界向科学世界的转化,更能让学生在接受专业知识和技能教育的同时,实现思政教育的目标。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实现了高校思想政治课教学内容的改革创新,填补了传统思想政治课教学内容与生活实际之间的鸿沟。

(四)高校不同人才培养路径更多融入大思政因素

“大思政”是高校思政课改革和创新的目标导向,是党中央对高校思政课建设提出的更高要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人才培养的重要内涵。必须始终坚持把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与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人才培养目标紧密结合,从根本上满足培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需要。

新时代党中央在治国理政上的新思想新理论,丰富了当代高校思政教育的理论和实践宝库,对教育事业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也为新时代高校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与此同时,思政教育也面临转型期的挑战与考验。“我国改革发展稳定面临不少深层次矛盾躲不开,绕不过,党的建设特别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面临不少顽固性、多发性问题,来自外部的打压遏制随时可能升级。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4]新时代的人才培养必须直面这些问题,大思政建设也必须回应这些挑战。将这个宏大的时代、这些鲜活的素材和生动的实例,融入思政教育当中,与新时代人才培养的路径紧密结合,与新时代人才培养的手段紧密结合,是顺应时代发展、提升育人效果的必然选择。

当前,多数高校通过规章制度,通过奖惩措施,

构建专业合理、政治过硬、业务精湛的教师队伍,不断鼓励和培育各种“名师”,形成各具特色的“精品课”“优质课”“特色课”。鼓励教师不断拓展授课形式和方式,探索社会实践路径,并不断完善成果显著、特色鲜明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课程体系,从而实现了高校育人体系的多元化、现代化。

二、“大思政”育人体系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一)育人规划相对碎片化

高校“大思政”教育理应是多主体、多要素的融合,不仅包括学生,也包括各级党委领导、行政管理人员以及各科老师,要从宏观的角度明确各个主体的具体责任,精心设计整个教学框架。然而,目前国内许多高校在整体规划上存在育人碎片化现象。

一方面,高校在制定教学计划的过程中,往往忽视学科特色和院系特色,只关注育人的方式,而没有因地制宜地将其与各个学科、院系的特色融合起来,这种做法对整体教学效果产生负面影响。因此,要重新审视教学计划的设计,确保它能够充分展现各个主体的特色和优势,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优化和调整。另一方面,高校内部各部门之间分工太过僵化,各个教学主体之间没有实现优势互补,高质量的教学资源不能有效共享,造成了高校内部各个部门之间的碎片化。高校在宏观设计上存在制度漏洞,导致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很难将书本上所学到的知识同社会生活实际相结合。

(二)高校内各主体间联动效用仍然赶不上时代需要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需要贯穿教学全过程。教学队伍不应该囿于思想政治课教师,需要融入更多的教学主体,增加思政课育人力量,形成良性互动、优势互补的局面。然而,目前实践上还没有形成有效的协同机制。

要强化各教育主体之间的协同效应,全方位注入思想政治教育活力。一是专业课老师和辅导员之间的协同效应有待深化。专业课老师和辅导员是高校教育中的两个重要角色,有着各自不同的教育方式和经验。加强专业课老师和辅导员之间的沟通与合作,共同关注学生的思想动态和行为表现,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将会产生更好的教育效果。二是专业课老师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老师之间的协同效应有待强化。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专业课教学相结合能更好地发挥作用。三是教师和行政管理人员之间的协同效应也有待加强。行政管理人员是高校教育中的重要支持力量,与教师一起共同制定教育计划和方案,

为学生提供更好的教育环境和服务。

除高校的支持保障之外,还需要全面落实政府、社会团体、研究机构等育人主体,形成育人的整体协同效应,加强各育人主体之间的合作与交流,共同探讨如何更好地发挥各自的优势和特长,形成整体的教育合力,加强对学生的引导和教育,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以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和综合能力。

(三)各学科教育仍未达到优势互补的目标

创新高校“大思政”教育,应注重全方位、全过程、全员参与的融入方式,改进传统教育方法。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往往只注重理论知识的传授,忽略实践性和学生的参与性,导致教育效果不理想。应注重引导学生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了解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更好地掌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知识。需改进传统教育方法,采用案例分析、小组讨论、角色扮演等更加生动、有趣、互动性强的教学方法,让学生更加容易接受和理解思想政治教育知识,从而更好地掌握教学内容。

培养学生道德情感,注重学生主体地位的发挥。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注重学生的情感体验和情感交流,让他们在情感交流中更好地学习思想政治知识,更好地完善自己的人格塑造,从而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三、新时代高校如何践行“大思政”育人体系

(一)用好新技术实现跨域教学资源共享

随着信息技术高速发展,各种新兴技术进入网络视野,对思想政治课建设带来了重大机遇,为实现“大思政”创造了新的平台。对于传统思想政治课教学,由于场域限制和时间限制,思想政治教育的亲和力和感染力呈现还不够,导致思想政治课教学效果不佳。“大思政”强调把“思政小课堂”和“社会大课堂”有机结合,打通两者之间的壁垒,用好时代素材,消除场域与时间限制,让思想政治课教学不拘泥于课堂课本学习。同时,大数据时代带动新媒体的出现,例如微信、抖音、微博等相应传播媒体已经被大学生普遍使用,“大思政”要回应时代之声,利用好新媒体创新思政课教学。

思想政治课教学向各高校大学生讲好时代大课,讲好中国故事,离不开信息技术、网络媒体等新兴技术的应用。例如抗疫历程,将会是载入中国史册的一场“思政大课”,特别是抗击新冠疫情取得的重大战略成果,是“大思政”的宝贵资源。各地高校在党中央统一领导部署下,运用网络平台,组织“全国大学生同上一堂疫情防控思政大课”、推送相关

抗疫事迹等方式,让各高校大学生学好用懂学深这堂“抗疫思政大课”,这是突破场域限制与时间限制的“大思政”育人模式。“大思政”能运用相应传播媒体做好时代素材的积累,及时把有关思想政治课教学的资源信息推送给学生,让学生能实时掌握。因此,高校要利用传播媒体创建自己的校园思想政治教育平台,向社会公开共享思想政治教育资源。

新时代信息技术也是搭建在高校“思政小课堂”和“社会大课堂”之间的关键桥梁,课堂教学过程可以使用信息技术手段,把现实社会中的生活语言转化为课堂理论话语。开设思政VR实验室,创新思政课课堂教学方式,利用信息技术,把虚拟仿真技术带入课堂教学中,让学生能破除时空的限制,通过VR技术真切体验思想政治课教学中生动的事例,实现各方面资源的共享。

(二)用好时代鲜活素材拓展理论资源

“大思政”不应该是教条的、死板的,也不是乏味的、枯燥的,应该“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既能发挥思想政治课教师的主导作用,又能呈现学生的主体地位;既能充分挖掘教学资源,拓展理论教学内容,又能让学生有参与度和获得感。理论是以真实的人物和实际的事件来呈现的,“大思政”应该用好时代鲜活生动的素材资源,以贴近学生现实生活的、亲切可感的教育资源提升思政课理论教学的吸引力和感召力,让学生能真学、真懂、真信、真用。

“大思政”需要整合全方位资源,将党带领人民进行的伟大实践作为最鲜活、最生动的时代素材,结合思政课的教学内容特点,有针对性地融入,展示中国故事,讲好思想政治课。同时,在教学中守正创新,不断总结历史发展经验和教训,将党的创新理论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历程及时地转化为思政课理论教学资源,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激发学生的情感共鸣,实现思政课以理服人、以情动人的教学效果。

“大思政”要求善于运用亿万中国人民已经书写和正在书写的时代篇章中所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制定与社会发展同频共振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编写相关教材,与时俱进、与时代同行。思想政治课教师首先要发挥其主动性、创造性和积极性,增强自身对时代发展大势的理解与认识,提升分析能力、紧跟时代步伐的综合能力。同时,不断更新教学内容、创新教学形式,做好时代素材的剖析和正确的引导,让学生在思考感悟中掌握理论真理,在接受理论真理的同时能够坚定理想信念、升华思想境界、强

化责任担当。在教育教学中,引导学生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展现“大思政”的“大用”所在。

(三)用好社会实践资源丰富课程体系

在新时代,“大思政”的根本目的是让当代大学生能将科学真理运用在今后的实际行动中,将“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有机融合,运用好社会资源,利用社会实践基地开展“大思政”实践教学活

动,增强当代大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把握。同时,要呈现“大思政”之大格局,就需要通过空间和资源的开发利用来延伸思政课教学的渠道和阵地,融入社会实践中,用真切的体验达到对理论的掌握与认识。挖掘社会实践基地的思想政治课教育资源是关键。例如,思想政治课课程体系中包含了红色教育内容,在我国就有许多现存的红色教育基地,西柏坡基地、红船精神基地、井冈山基地、韶山基地等。高校应该充分运用社会资源,推进思政课课堂的延伸,实现“在课堂上”讲和“在社会中”讲的紧密结合。引导学生参与丰富多彩的社会活动,通过社会实践基地体验感受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神力量。

引导学生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增强对所学内容的所感所悟,更重要的是树立大学生对中国发展事业的信念和信心。”^[5]不仅有助于加强学生对思想政治课理论内容的理解,更是通过切实体验,提升当代大学生对我们伟大事业的认同与自信。社会实践基地准确来说是展现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各个方面的“大思政”课堂。理论学习与实践体验的结合,引导当代大学生树立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积极投身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事业中。所以,在时代发展过程中要利用好这些资源,充分发挥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的作用,凝聚高校与社会的合力,实现从课上到课下的高效联动。高校应该抓住现实社会中地方特色资源丰富思政课课程体系,这也是“思政小课堂”延伸到“社会大课堂”的创新运用。

四、结语

“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形成了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我们党带领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锻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思政课建设提供了深厚力量。”^[6]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思政课改革创新提供了新方向,同时也是“大思政”的应有之义。努力把高校所在地相关的资源文化应用于

创新思想政治课程建设中,构建高校特色思想政治课、精品思想政治课,通过运用灵活多样的教学形式,凝聚各路师资力量协同育人。创新思想政治课程建设,将地方资源与高校思想政治课相结合,推陈出新,助力思想政治课程体系丰富拓展,用最贴近学生生活的地方特色资源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引导大学生树立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自觉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 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N]. 人民日报, 2016-12-09.
[2] 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的

医药卫生界教育界委员时的讲话:“‘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N]. 人民日报, 2021-03-07.

[3] 习近平在全国教育大会强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N]. 人民日报, 2018-09-11.
[4]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5] 王丽靖. 新媒体时代高校思政教育面临的挑战与机遇[J]. 新闻研究导刊, 2021(7): 253-254.
[6] 习近平. 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N]. 人民日报, 2019-03-19.

(责任编辑 许峻)

An Analysis of the Bi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ystem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in the New Era

HE Yanbing

(School of Marxism, Zhengzhou Tourism College, Zhengzhou, Henan 451464, China)

Abstract: The framework of the bi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ystem in various universities has been preliminarily improved. Mor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factors are integrated into different talent cultivation ways in universities. However, there are also issues such as the relatively fragmented nature of university education planning, the inadequate linkage between various entities within universities, and the failure to achieve the goal of complementary advantages in various subject education. Therefore, universities need to further utilize new technologies to achieve cross-origin resource sharing, expand theoretical resources with fresh materials of the times, enrich the curriculum system with social practice resources, and promote the further improvement of the bi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ystem in universities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bi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ystem

本刊声明

《中州大学学报》一贯提倡并引领对理论和现实问题的原创性学术研究,始终对追求深邃的理论思想、高端的学术品位、扎实的原创成果和严格的学术规范的广大科研工作者保持敬意。

本刊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注重学术性和理论性,服务于广大教育、科研工作者为办刊宗旨。

本刊已许可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在中国知网及其系列数据库产品中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的行为即视为同意学报编辑部上述声明,若无此意,请在来稿时注明。

本刊不以任何形式和名义收取任何费用。真诚欢迎视角新颖、观点独到的高质量学术稿件。篇幅不少于8000字为宜,学术规范参见《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本刊以质取文,秉持优稿优酬。

跨学科协同育人模式在课程设计中的应用研究

李丽华¹, 马媛²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1. 国际教育学院; 2. 文化遗产与艺术设计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44)

摘要:基于当前社会对创新创业型人才的迫切需求,设计艺术学科如何高质高效地进行课程设计成为一个日益重要的问题。从跨学科协同育人模式怎样在课程设计中体现、跨学科协同育人模式的教学方法与 OBE 教育理念的关联、当代跨学科的艺术设计作品实例的分析、跨学科协同育人模式下的评价与反馈、跨学科协同育人模式在课程设计中的成效分析和未来展望等几个方面进行研究探讨。

关键词:跨学科协同;育人模式;课程设计;设计学学科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5.01.019

中图分类号:G642;J5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5)01-0109-05

整合不同学科的知识和方法,旨在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本文以郑州工程技术学院文化遗产与艺术设计学院数字媒体艺术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为依托,从育人模式、教学大纲、师资协同、产学研融通等方面进行教育实践探索与尝试。课程设计作为数字媒体艺术专业建设的关键环节,对于实现跨学科协同育人的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媒体艺术,即创作者利用以计算机为核心的各类数字信息处理设备和数字摄录设备,通过构建在数字信息处理技术基础上的创作平台,实现自己的设计目的,最终完成基于数字技术的艺术作品。20世纪80年代,“多学科艺术教育模式”发端于美国,后来影响到了许多国家,使美术设计具有前所未有的广泛性。20世纪90年代,相关理念引入中国,同时翻译了基于多学科艺术教育的系列丛书,为中国艺术教育的深入开展提供了学术材料,也为美术教育师资的培养和课堂教学模式提供了理论指导。“多学科艺术教育模式”利用艺术创作、艺术史、艺术批评和美学、计算机软硬件等跨学科的互动互补联系,使数字媒体艺术成为一门交叉性的跨学科的

艺术专业。

本文研究跨学科协同育人模式的内容汲取了我国20世纪90年代“多学科艺术教育模式”的相关理论指导。跨学科协同育人模式是指在高等教育中,打破传统学科界限,通过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与融合,形成新的学科生长点和交叉学科,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新型的人才培养模式。这一模式的提出,旨在应对现代社会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以解决单一学科教育在知识体系、创新能力培养等方面的局限性。

一、跨学科协同育人模式的内涵及在课程设计中的体现

跨学科协同育人模式强调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与融合,通过打破学科壁垒,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该模式注重培养学生的跨学科思维、创新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以适应社会的多元化需求。国际新媒体艺术界的罗伊·阿斯科特(Roy Ascott)预言了艺术教育的发展趋势:“后数字化目标将越来越多地涉及技术智力与融合性。”^[1]数字化艺术设计的产生和发展,一个重要的方面是依赖现代科学技

收稿日期:2024-09-30

基金项目:2024年度河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跨学科协同育人模式在课程设计中的应用研究”(ZGJG202445B)

作者简介:李丽华(1981—),女,河南濮阳人,硕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国际教育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影视学。

术的新发明。

“多学科艺术教育模式”是以学科为基础的艺术教育。一般来讲,“以学科为基础”包含双重意思:其一是将艺术教育定位于人文学科领域中,作为人文学科的一种培养模式;其二,这样的艺术教育的基础是由四个方向整合成的,即艺术创作、艺术史、艺术批评和美学。1980年,在歌笛基金的资助和支持下,歌笛艺术教育对美国各地的艺术教育教学进行调研。这次调研一方面综合梳理了美国艺术教育近百年的流变;另一方面系统总结了美国艺术教育思想,最终发现其教学理念非常关注创造、批评、历史与哲学四个学科,这四个学科的相互关联,明显优于形式单一的艺术创作教学活动。在西方美学和艺术理论中,多学科艺术审美走向了日常化,多学科艺术教育需要在现实技术和传统美学中找到契合点,获得赓续与发展。

跨学科协同育人模式下的课程设计需要打破传统学科界限,将不同学科的知识和方法有机整合在一起。通过精选课程内容,构建跨学科的知识体系,使学生能够在学习过程中形成跨学科的思维方式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例如数字绘画设计课程是以数字化的方式绘制图像。数字绘画在操作过程中需要数位板、数位屏、压感笔等工具和 Photoshop、SAI、Painter、Artrage、Live2d、AE、Corel Painter、keyshot 9.1 等软件,需要学生在计算机软件、文学、绘画、英语等多学科全面发展,所以跨学科协同育人模式的研究迫在眉睫。再如审美分析、中国传统图案、传统艺术与现代设计这些专业课程应该首先学习国内外的传统图形和传统艺术——书法、剪纸、皮影、木版画等,然后将传统艺术的表现形式应用到现代设计的包装设计、海报设计、标识设计、书籍装帧设计上。这样既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又运用到 Photoshop、SAI 等多种软件,现代优秀的设计作品是综合跨学科的知识而完成的,这样的设计作品会使得“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理念更形象且更典型。

二、跨学科协同育人模式的教学方法与 OBE 理念的关联

1989年,在歌笛艺术研究中心的积极推动下,“多学科艺术教育模式”的理论架构基本确立,其主要成果在美国的拉尔夫·史密斯编写的《艺术感觉与美育》这本书中。^[2]历史地看,多学科艺术教育是美国艺术教育实践和革新的产物,是在不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教育理念。

近年来我国提倡文科和理科协同育人的“通识

教育”(也称为“博雅教育”)。为了有效实施跨学科协同育人模式,课程设计需要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如案例教学、项目驱动等,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and 主动性,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OBE(Outcome based education)教育理念,又称为成果导向教育、能力导向教育、目标导向教育或需求导向教育,是一种以成果为目标导向,以学生为本,采用逆向思维的方式进行的课程体系设计理念。

从教学大纲、教学目的上来看,跨学科艺术教育不再像过去一样只看重学生的艺术创造力,而是要把原创设计与艺术批评、计算机技术和审美理念有机地结合起来,更好地与国际的 OBE 理念契合。为了进一步提升专业素养,可以引导数字媒体艺术专业学生全面地理解和鉴赏艺术及文化背景。当然,青年人需要通过“动态”数字媒体艺术这一生动活泼的形式,使他们对专业的专业和传统文化与现代设计有充分的热爱。

从学科定位和教学方法上看,跨学科艺术教育不是把美术教育作为一门学科,而是将之看作一门综合课程。美术教育的课程设计涉及原创图形设计、艺术史、艺术批评与美学等几个领域,至此形成一门特殊的交叉学科。教师希望学生以轻松和理智敏锐的方式对艺术作品作出审美分析之外,多学科综合的艺术教育要求学生观察出作品的长处及短处、情感是否真切、是否合理以及蕴藏的人文价值。对大学生而言,良好的趣味与审美感觉很重要,这在他们体验艺术作品时,有助于丰富他们的情感与精神生活,有助于学生感受到富有人情味的社会氛围,也有助于学生赏析自然及传统文化。这样的学科定位及其目的追求体现了当代人文教育的影响力。

从学习内容上看,跨学科协同育人模式在美术教育的课程设计中虽然侧重视觉感官,但是我们可以研究一些诗歌和电影、音乐、杂技等艺术形式。除此之外,西方艺术作品、非洲的木雕、中国画、日本的“浮世绘”、土著民族的岩画都是我们需要加以研究的内容。

从理论方法上看,跨学科协同育人代表一种艺术教育的综合方法。这一方法不仅要应用到课程设计、教学方案和具体展示之中,而且要适合于艺术教育的核心要求。跨学科协同育人不仅仅是为了学习或研究艺术创作、艺术史、艺术批评与美学四个学科,而是综合其他学科进一步提升艺术教育的效果与水准。而“多学科艺术教育”主要是将四个学科有机结合起来,但是并不排斥其他学科的融入。跨

学科协同育人模式在课程设计中联系着一个综合的学科群,相互之间均有交叉贯通之处,同时还会与历史、哲学、心理学、计算机软件和硬件、自动化等学科产生联系,并且本文的跨学科协同育人模式与 OBE 教育理念有紧密的联系。

三、当代跨学科的艺术作品设计实例分析

随着科技的发展,特别是信息时代的来临,建筑外观出现了许多新的特征,如影视媒体化、虚拟化、智能化、非物质化和交互式等,薄薄的外观成为建筑本身的外在表现。一方面,这样没有深度、舞台背景样式的形式,还清晰地划分了室内或室外空间,从而满足了远离都市的喧闹希望找到安静封闭的室内环境需求。另一方面,与端正的现代主义建筑相比,当代建筑的装饰感外观为欣赏者提供了商品 logo 或传统纹样,让大众倍感亲切。当代建筑设计师们需要重视建筑物有魅力的外表,通过喜闻乐见的符号吸引大众。装饰化外观的建筑是希望从符号学的角度,化解现代主义和多样化需求之间的矛盾。(图一、图二是德国科特布斯市勃兰登堡工业大学图书馆)



图一 德国科特布斯市勃兰登堡工业大学图书馆(正面)



图二 德国科特布斯市勃兰登堡工业大学图书馆(侧面)

当代建筑外观装饰的重点是建筑外观数字媒体,通过新的媒体表现方式,建筑外观与信息符号实现了一体化融合。建筑外观装饰成为信息的载体,

传统建筑的柱体、窗户上的纹样在当代建筑外观上慢慢消失,逐渐被具有现代化数字媒体特征的外观代替。一些传统立面如体量、分隔等需要拓展,这必将突破建筑原有的外在装饰纹样。从视觉特征上来说,建筑外观可以反映出历史建筑在某个时期的建筑理念、科学技术及地域文化。城市中建筑外观的构成,逐渐成了城市的风貌展示,展示着各个时期的历史进程,蕴藏着人类文明的丰硕宝库。通过置换墙体表面材质或外部装饰的方式对建筑外观的构成在视觉和感官上进行重新安排,规划建筑的比例、肌理、质感等,可以调整建筑的视觉外观。当代的建筑基本上是以幕墙外观、网眼金属外观为主要的系统。因为是在原建筑外观之外增加纯粹为了表现人们视觉感受效果的外观,外部装饰设计和建筑主体结构的分离使得外观的设计更为自由。

虚拟现实意味着通过某种方式或手段将不存在的事物显现为虚拟的真实,虚拟现实不是为了模拟真实世界的那种真实,而是更适合用来创造纯粹的人造世界^[3]。虚拟现实是对影像、声音、周边场景等的模拟。它与传统的照相机、摄像机拍出的影像不一样,而是用数字技术来模拟现实中的事物甚至再创造现实情景,用符号来制作图像、声音,这样的设计称为数字化再现。目前景观设计在商业与科技方面的发展,使得建筑外观的虚拟化已经成为城市中建筑外表的重要设计。当代的城市环境中,常常不是某个建筑的某个结构吸引人们,而是建筑外表的电子灯光设计、广告牌、液晶显示器的数字媒体设计的信息吸引了人们的感官,这样的现象在夜晚尤为明显。建筑外观的数字化虚拟装饰为城市的夜景增添了新的光彩,美化了城市。

如今,设计产品被纳入社会学和哲学的范畴,如建筑的象征意义、服装的符号学等,许多著作都讨论设计价值的提升,经过设计的空间、图形和物品使我们的生活更合理化,设计在美学领域不只是造型和色彩,还有其给人们带来的环保、便利及形而上的意义等。

四、跨学科协同育人模式下的评价与反馈

跨学科协同育人模式下的课程设计需要建立科学的评价与反馈机制。教师定期评估和反馈学生的成果,及时调整教学策略,确保课程目标的实现。

跨学科协同育人模式的学科建构显然是一个系统工程。除了艺术的教育功能和其他互补性学科群来互助之外,还需要发展心理学的相关观点予以完善。菲尔德曼指出,跨学科艺术教育的学科发展,需

要关注发展心理学建立的认识原则。这些原则主要包括:认识是逐渐建构起来的,认识是在不同阶段予以掌握的,认识是在最大限度的差异做出反应的过程中取得的,完成认知的过渡是分阶段进行的,认知水平的发展是在或退或进的运动中发生^[4]。认知心理学的上述5项原则是教师与学生对课程设计进行评分与反馈的理论根据。教学团队的师生们将之应用到艺术教育课程设计里,要求课程设置具有系统性的全方位构思和阶段化的设置策略,这一要求对于跨学科艺术教育来讲同样适用。

五、跨学科协同育人模式在课程设计中的成效分析

(一)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

跨学科课程设计能够使学生在在学习过程中综合运用各种技术,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和应变能力。例如学生参加中国好创意比赛、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节比赛、青年人文国际出版社的“亚洲青年新秀奖赛事”,学生提交的有用 Photoshop、AE 等软件设计的海报、IP 形象设计、书籍装帧设计、化妆品包装盒设计、社会公益广告、文案策划、广告语等。这些比赛使学生能够锻炼设计能力、提升文学语言水平、促进团队合作。2022 级数字媒体艺术系学生分别获得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节河南赛区一等奖、中国好创意专项赛国家级二等奖的成绩。

(二)五种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兴趣和创新精神

1. 讨论归纳法

讨论是了解学生审美认知水平、培养学生艺术素养和提高学生学习兴趣的简便常用方法。讨论可以分组,也可以班级之间互相交流。可以根据具体艺术品列出讨论题目,以便于学生进行设计说明的描述。分组讨论要求每组选一个代表,把要点在全班阐述探讨,学生得到互相交流的机会。随后,教师做总结,根据讨论阐述的情况,进行总体性的归纳,以便引入现代设计的方案之中。

2. 访谈法

访谈法实际上包括两个侧面:采访和交谈。采访可以单独进行,也可以挑出6名左右的学生访谈,采访学生近期的学习计划和心得等。与学生进行交谈也是听取学生思路的重要途径。这要求计划好访谈方向和重要问题。例如“你提出这一观点的理由是什么?”“你能举个例子吗?”“你能用一句话概括一下你的整个观点吗?”

3. 互评辩论法

互评辩论法其实是讨论归纳法的延续。特别是

分组讨论发言之后,学生们可以对其他各组的想法发表评论。这一方法可以使学生明确设计的观点,也不盲目接受其他同学的设计方案,使学生的思维更加活跃。

4. 录音法

该方法主要用于学生的讨论和教师对学生的采访。录音的目的,一是用于教师的备课,二是让学生们根据录音来回顾自己的论述过程,纠正不足的表述。

5. 写作法

该方法与普通的作文方法有相似之处,这一方法是通过写作分析某些艺术品的审美特点、美学观点、美学流派等。教师在安排作业时,要向学生提出明确的要求,如学生要评价艺术作品的美学理念、历史地位等,然后教师批阅学生的写作,就可以从写作中了解学生们不同的认识或设计的观点。教师们可以与学生沟通和询问,课堂上解释和分析学生提出的种种论点和想法。

以上五种方法都是艺术课堂教学中常见的方法,既可以单独采用,也可以交替使用。围绕设计作品进行全面的案例分析,其最终目的是提高学生的审美趣味和审美鉴赏能力。

(三)培养学生计算和应用能力

新媒体,具有高速度、高水平的知识生产、流通和传播的特点,凡是应用于计算机知识与软件之上的学科,都可能得到快速发展。任何一门学科的深层开发和研究,都会对计算机学科有较大的需求,这就是计算机学科在 IT 时代成为最具市场需求的一门学科。^[5]显然在 IT 时代,跨学科团队大多数出现在计算机学科和其他学科之间。充分发挥计算机学科在深化与整合专业学科的作用,是 IT 时代跨学科的一个基本要求,无论文、理、医科,先进性(供给)与手段的应用,都有助于推动本学科的深度开发。不同专业与计算机学科结合是许多专业发展迅速的成功经验。

六、成效与展望

跨学科协同育人模式在课程设计中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通过优化课程设计,整合不同学科的知识和方法,可以有效提升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创新实践能力。未来,应进一步深入研究跨学科协同育人模式的实施策略,完善课程设计体系,以更好地适应人才培养的多元化需求。数字媒体艺术对中国传统艺术审美的文学理念发起挑战,以现代化的审美方式打破“儒释道美学”为审美特征的藩篱。数字

媒体技术(包括装置感应技术、录像技术、虚拟现实技术等)为我们的主观能动性提供技术支撑。今后艺术家通过数字化彰显自己对于世界的认知,并由此寻求非现实审美的虚拟情感体验。

我们的教学效果在社会上得以体现,学生的就业情况较好。从培养的过程上看,第一阶段培养学生对本专业基础知识的了解,具备基本的软件运用能力。第二阶段是深入学习阶段,培养学生掌握本专业的传统文化知识和软件,能够将个人设计理念融入所要设计的作业中去。第三阶段是培养学生的综合运用能力,将前两个阶段所学的知识融会贯通,与创意实践结合,为毕业设计做准备。第四阶段是实习阶段,学校为学生提供在企业实习的机会,为毕业生踏入社会奠定基础。毕业生的工作领域是通信与信息产业、广播电视行业、网络传媒、数字娱乐、游戏设计开发、广告营销、包装设计、动漫设计、美术设计培训等行业。学生在公司里面就业的最多,毕业

生可以担任网页设计师、多媒体设计师、游戏设计师、平面设计师、广告策划设计师、动画师等职业角色。

参考文献:

- [1] 罗伊·阿斯科特. 未来就是现在:艺术,技术和意识[M]. 周凌,任爱凡,译. 北京:金城出版社,2012.
- [2] 拉尔夫·史密斯. 艺术感觉与美育[M]. 腾守尧,译.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
- [3] 陈玲. 新媒体艺术史纲[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193.
- [4] 黄建军. 基于艺术创意空间的应用型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J]. 居舍,2018(34):177-178.
- [5] 刘兴元,沈禹颖. 创新实践教学模式与方法提高应用型专业综合教学水平[J]. 实验室科学,2019,22(4).

(责任编辑 许峻)

Research on the Application of Interdisciplinary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Model in Curriculum Design

LI Lihua¹, MA Yuan²

(1.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2. School of Cultural Heritage and Art Design,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Given the current society's urgent need for innovative and entrepreneurial talents, the design of high-quality and efficient courses in art and design discipline has become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issue. This article mainly studies the following key dimensions, including how the interdisciplinary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model is reflected in course desig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teaching methods of the interdisciplinary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model and the Outcome-Based Education (OBE) concept, the analysis of contemporary interdisciplinary art design case studies, the evaluation and feedback under the interdisciplinary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model, and the effectiveness analysis of the interdisciplinary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model in course design, conclusions and prospects.

Key words: inter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 educational model; course design; design discipline

三对角实对称矩阵与 Pascal 三角形的关联性及其谱性质分析

王励冰¹, 豆铨煜²

(1. 周口师范学院 数学与统计学院, 河南 周口 466001;
2. 郑州轻工业大学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2)

摘要: 主要研究一类特殊的三对角实对称矩阵 $\{A_n\}_{n=1}^{\infty}$ 。首先, 给出此类矩阵的特征多项式满足三项递推关系式的推导过程; 其次, 发现此类矩阵的特征多项式系数与 Pascal 三角形的对角线元素存在特定的关系, 并由此给出了特征多项式的表达式, 该表达式的系数由组合数构成, 然后从组合数学的角度证明其满足三项递推关系式; 最后探讨了此类型不同阶数矩阵特征值之间的关系, 并给出详细的证明过程。

关键词: 特征多项式; Pascal 三角形; 特征值; 谱集

DOI: 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5.01.020

中图分类号: O15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715(2025)01-0114-05

三对角矩阵出现在科学和工程中的许多领域, 比如并行计算、电信系统分析、使用有限差分求解微分方程^[1-2]等领域。从1962年起, Golub等^[3]学者开始对三对角对称矩阵的特征值进行广泛的研究。Gullerud等^[4]研究了一类主对角线元素为0, 两条次对角线元素均为1的三对角矩阵, 讨论了此类矩阵的特征值、特征多项式、谱集的包含关系和与Pascal三角形的联系。本文在此基础上, 研究如下类型矩阵的特征性质, 其中 b 是不等于1的正整数。这些矩阵, 作为路径图的邻接矩阵出现, 是谱图理论领域的基本研究对象。

$$A_n = \begin{bmatrix} 0 & b & & & \\ b & \ddots & \ddots & & \\ & \ddots & \ddots & \ddots & \\ & & \ddots & \ddots & b \\ & & & b & 0 \end{bmatrix}$$

1 A_n 的特征多项式

本节主要讨论矩阵族 $\{A_n\}$ 的特征多项式 $f_n(\lambda)$, 即对每个 $n \in N$, 特征多项式 $f_n(\lambda)$ 的系数(取绝对值)刚好是 Pascal 三角形的第 n 条对角线元素的 $b^{2(n-1)}$ 倍, 其中 b 是不等于1的正整数。通过这个发现, 给出了 $f_n(\lambda)$ 的表达式。在此基础上证明了这个表达式满足三项递推关系式。

1.1 $f_n(\lambda)$ 的递推关系式

考虑 $n \times n$ 的矩阵 $A_n - \lambda I_n$, 其特征多项式推导如下:

$$f_n(\lambda) = |A_n - \lambda I_n| =$$

收稿日期: 2024-05-17

基金项目: 周口师范学院教学教育改革项目(J2022020); 郑州轻工业大学博士科研基金(13501050020)

通信作者简介: 豆铨煜(1986—), 女, 河南周口人, 博士, 郑州轻工业大学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讲师, 主要从事应用数学相关研究。

$$-\lambda \cdot |A_{n-1} - \lambda I_{n-1}| - b \cdot \begin{vmatrix} b & b & 0 & \cdots & 0 \\ 0 & -\lambda & b & \ddots & 0 \\ 0 & b & -\lambda & \ddots & \vdots \\ \vdots & \ddots & \ddots & \ddots & b \\ 0 & 0 & \cdots & b & -\lambda \end{vmatrix} = -\lambda \cdot f_{n-1}(\lambda) - b \cdot \begin{vmatrix} b & b & 0 & \cdots & 0 \\ 0 & \cdots & \cdots & \cdots & \cdots \\ 0 & & A_{n-2} - \lambda I_{n-2} & & \\ \vdots & & & & \\ 0 & & & & \end{vmatrix} =$$

$$-\lambda \cdot f_{n-1}(\lambda) - b^2 f_{n-2}(\lambda).$$

1.2 $f_n(\lambda)$ 与 Pascal 三角形的联系及表达式

表 1 给出了 $n = 1, \dots, 12$ 时对应的特征多项式 $f_n(\lambda)$ 。仔细观察这十二个多项式的系数发现, $f_n(\lambda)$ 的系数与 Pascal 三角形对角线列中的二项式系数密切相关, 即 $f_n(\lambda)$ 的系数取绝对值后等于 Pascal 三角形第 n 条对角线列中二项式系数的 $b^{2(n-1)}$ 倍。

通过仔细分析多项式 $f_n(\lambda)$ 与 Pascal 三角形之间的联系, 可得

$$f_n(\lambda) = \sum_{i=0}^{\lfloor \frac{n}{2} \rfloor} (-1)^{n+1} b^{2i} \binom{n-i}{i} \lambda^{n-2i}. \quad (1)$$

在实际应用中, 考虑 n 是偶数或奇数的情况可能更有用。当 n 是偶数时,

$$f_{2k}(\lambda) = \sum_{i=0}^k (-1)^i b^{2i} \binom{2k-i}{i} \lambda^{2k-2i}. \quad (2)$$

当 n 是奇数时,

$$f_{2k+1}(\lambda) = \sum_{i=0}^k (-1)^{i+1} b^{2i} \binom{2k+1-i}{i} \lambda^{(2k+1)-2i}. \quad (3)$$

表 1 $f_n(\lambda)$ 的前 12 个特征多项式

n	$f_n(k)$							
1	-1λ							
2	$1\lambda^2$	$-1b^2$						
3	$-1\lambda^3$	$+2b^2\lambda$						
4	$1\lambda^4$	$-3b^2\lambda^2$	$+1b^4$					
5	$-1\lambda^5$	$+4b^2\lambda^3$	$-3b^4\lambda$					
6	$1\lambda^6$	$-5b^2\lambda^4$	$+6b^4\lambda^2$	$-1b^6$				
7	$-1\lambda^7$	$+6b^2\lambda^5$	$-10b^4\lambda^3$	$+4b^6\lambda$				
8	$1\lambda^8$	$-7b^2\lambda^6$	$+15b^4\lambda^4$	$-10b^6\lambda^2$	$+1b^8$			
9	$-1\lambda^9$	$+8b^2\lambda^7$	$-21b^4\lambda^5$	$+20b^6\lambda^3$	$-5b^8\lambda$			
10	$1\lambda^{10}$	$-9b^2\lambda^8$	$+28b^4\lambda^6$	$-35b^6\lambda^4$	$+15b^8\lambda^2$	$-1b^{10}$		
11	$-1\lambda^{11}$	$+10b^2\lambda^9$	$-36b^4\lambda^7$	$+56b^6\lambda^5$	$-35b^8\lambda^3$	$6b^{10}\lambda$		
12	$1\lambda^{12}$	$-11b^2\lambda^{10}$	$+45b^4\lambda^8$	$-84b^6\lambda^6$	$+70b^8\lambda^4$	$-21b^{10}\lambda^2$	$+1b^{12}$	

由 $f_n(\lambda)$ 的表达式, 可得下面的定理。

定理 1 当 n 是偶(奇)数时, $f_n(\lambda)$ 是偶(奇)函数。

证明 因为 $2k-2i$ 是偶数, 所以 $(-\lambda)^{2k-2i} = \lambda^{2k-2i}$ 。由方程(2), 得 $f_{2k}(-\lambda) = f_{2k}(\lambda)$ 。同理可得 $f_{2k+1}(-\lambda) = -f_{2k+1}(\lambda)$ 。

1.3 证明 $f_n(\lambda)$ 的表达式满足三项递推关系式

定理 2 方程(1) 满足递推关系式 $f_n(\lambda) = -\lambda f_{n-1}(\lambda) - b^2 f_{n-2}(\lambda)$, 且 $f_n(\lambda) = -\lambda f_2(\lambda) = \lambda^2 - b^2$ 。

证明 根据 n 的奇偶性分两种不同的情况证明。

情况 1: (n 是偶数时)

当 n 是偶数时, 设 $n = 2k, k \in \mathbb{N}$ 。根据每个指数的奇偶性, 适当选择(2) 和(3) 式, 要证明下面的方程成立:

$$f_{2k}(\lambda) = -\lambda f_{2k-1}(\lambda) - b^2 f_{2k-2}(\lambda). \quad (4)$$

从(4) 式的右端开始证明。

$$-\lambda f_{2k-1}(\lambda) - b^2 f_{2k-2}(\lambda) = -\lambda \sum_{i=0}^{k-1} (-1)^{i+1} b^{2i} \binom{2k-1-i}{i} \lambda^{(2k-1)-2i} -$$

$$\begin{aligned}
& b^2 \sum_{i=0}^{k-1} (-1)^i b^{2i} \binom{2k-2}{i} \lambda^{(2k-2)-2i} = \sum_{i=0}^{k-1} (-1)^i b^{2i} \binom{2k-1}{i} \lambda^{2k-2i} + \\
& b^2 \sum_{i=0}^{k-1} (-1)^{i+1} b^{2i} \binom{2k-2}{i} \lambda^{(2k-2)-2i} = \binom{2k-1}{i} \lambda^{2k} + \sum_{i=1}^{k-1} (-1)^i b^{2i} \binom{2k-1}{i} \lambda^{2k-2i} + \\
& b^2 \sum_{i=0}^{k-2} (-1)^{i+1} b^{2i} \binom{2k-2}{i} \lambda^{(2k-2)-2i} + (-1)^k b^{2k} \binom{k-1}{k-1} \lambda^0 = \binom{2k-1}{0} \lambda^{2k} + \\
& \sum_{j=0}^{k-2} (-1)^{j+1} b^{2(j+1)} \binom{2k-1}{j+1} \lambda^{2k-2(j+1)} + \sum_{j=0}^{k-2} (-1)^{j+1} b^{2(j+1)} \binom{2k-2}{j} \lambda^{(2k-2)-2j} + \\
& (-1)^k b^{2k} \binom{k-1}{k-1} \lambda^0 = \binom{2k-1}{0} \lambda^{2k} + \sum_{j=0}^{k-2} (-1)^{j+1} b^{2(j+1)} \left[\binom{2k-1}{j+1} + \binom{2k-2}{j} \right] \lambda^{2k-2(j+1)} + \\
& (-1)^k b^{2k} \binom{k-1}{k-1} \lambda^0 = \binom{2k-1}{0} \lambda^{2k} + \sum_{j=0}^{k-2} (-1)^{j+1} b^{2(j+1)} \binom{2k-2-j}{j+1} \lambda^{2k-2j+2} + (-1)^k b^{2k} \binom{k-1}{k-1} \lambda^0 = \\
& \binom{2k}{0} \lambda^{2k} + \sum_{i=1}^{k-1} (-1)^i b^{2i} \binom{2k-i}{i} \lambda^{2k-2i} + (-1)^k b^{2k} \binom{2k-k}{k} \lambda^{2k-2k} = \sum_{i=0}^{k-1} (-1)^i b^{2i} \binom{2k-i}{i} \lambda^{2k-2i} = f_{2k}(\lambda).
\end{aligned}$$

情况 2: (n 是奇数时)

当 n 是奇数时, 设 $n = 2k + 1, k \in N$. 根据每个指数的奇偶性, 适当选择(2) 和(3) 式, 要证明下面的方程成立:

$$f_{2k+1}(\lambda) = -\lambda f_{2k}(\lambda) - b^2 f_{2k-1}(\lambda). \quad (5)$$

从(5) 式的右端开始证明。

$$\begin{aligned}
-\lambda f_{2k}(\lambda) - b^2 f_{2k-1}(\lambda) &= -\lambda \sum_{i=0}^k (-1)^i b^{2i} \binom{2k-i}{i} \lambda^{2k-2i} - b^2 \sum_{i=0}^{k-1} (-1)^{i+1} b^{2i} \binom{2k-1}{i} \lambda^{(2k-1)-2i} = \\
& \sum_{i=0}^k (-1)^{i+1} b^{2i} \binom{2k-i}{i} \lambda^{2k-2i+1} + b^2 \sum_{i=0}^{k-1} (-1)^i b^{2i} \binom{2k-1}{i} \lambda^{(2k-1)-2i} = -\binom{2k}{0} \lambda^{2k+1} + \\
& \sum_{i=1}^k (-1)^{i+1} b^{2i} \binom{2k-i}{i} \lambda^{2k-2i+1} + \sum_{j=1}^k (-1)^{j-1} b^{2j} \binom{2k-1}{j-1} \lambda^{(2k-1)-2(j-1)} = -\binom{2k}{0} \lambda^{(2k+1)} + \\
& \sum_{j=1}^k (-1)^{j+1} b^{2j} \binom{2k-j}{j} \lambda^{2k-2j+1} + \sum_{j=1}^k (-1)^{j+1} b^{2j} \binom{2k-j}{j-1} \lambda^{2k-1-2j+1} = -\binom{2k}{0} \lambda^{(2k+1)} + \\
& \sum_{j=1}^k (-1)^{j+1} b^{2j} \left[\binom{2k-j}{j} + \binom{2k-j}{j-1} \right] \lambda^{2k-2j+1} = -\binom{2k+1}{0} \lambda^{2k+1} + \sum_{j=1}^k (-1)^{j+1} b^{2j} \binom{2k+1}{j} \lambda^{(2k+1)-2j} = \\
& \sum_{j=0}^k (-1)^{j+1} b^{2j} \binom{2k+1}{j} \lambda^{(2k+1)-2j} = f_{2k+1}(\lambda).
\end{aligned}$$

至此(5) 得证, 于是定理 1 得证。

2 A_n 谱集性质分析

本节主要考虑矩阵 A_n 的谱集性质, 包括特征值相关性质, $\text{spec}(A_n)$ 的上下界, 和与 $m, n \in N$ 数值有关的谱集包含关系 $\text{spec}(A_m) \subset \text{spec}(A_n)$ 成立的充分条件。下面先分析特征多项式 $f_n(\lambda)$ 的根(特征值) 的表达式。

2.1 特征值表达式及相关性质

命题 1 矩阵 A_n 的 n 个不同的特征值是

$$\lambda_s = 2b \cos\left(\frac{s\pi}{n+1}\right), s = 1, \dots, n.$$

证明 设 λ 是 A_n 的一个特征值, \vec{v} 是对应的特征向量。于是

$$(A_n - \lambda I_n) \vec{v} = \begin{bmatrix} -\lambda & b & & & \\ b & \ddots & \ddots & & \\ & \ddots & \ddots & b & \\ & & & b & -\lambda \end{bmatrix} \begin{bmatrix} v_1 \\ v_2 \\ \vdots \\ v_n \end{bmatrix} = \begin{bmatrix} 0 \\ 0 \\ \vdots \\ 0 \end{bmatrix}.$$

由此可得

$$bv_{j-1} - \lambda v_j + bv_{j+1} = 0, j = 1, \dots, n, \quad (6)$$

其中 $v_0 = 0, v_{n+1} = 0$ 。对任意的非零常数 A 和 m , 令 $v_j = Am^j$, 代入(6) 得

$$bm^2 - \lambda m + b = 0.$$

上面的方程关于 m 是一个一元二次方程, 由于本文中矩阵的特殊形式, 方程有两个根, 设为 m_1, m_2 由此方程(6) 的通解是

$$v_j = Bm_1^j + Cm_2^j,$$

其中 B, C 是非零常数。因为 $v_0 = 0, v_{n+1} = 0$, 得 $B + C = 0$ 和 $Bm_1^{n+1} + Cm_2^{n+1} = 0$ 。把前面的方程代到后面的方程中, 得

$$m_1 = m_2 \cdot e^{2\pi is/(n+1)} \Rightarrow m_1^2 = m_1 m_2 \cdot e^{2\pi is/(n+1)}.$$

由于 $m_1 m_2 = 1$, 得 $m_1^2 = e^{2\pi is/(n+1)} \Rightarrow m_1 = e^{\pi is/(n+1)}$ 。同理得 $m_2 = e^{-\pi is/(n+1)}$ 。根据 $m_1 + m_2 = \lambda/b$, 得

$$\lambda = b(m_1 + m_2) = b(e^{\pi is/(n+1)} + e^{-\pi is/(n+1)}) = 2b \cos\left(\frac{s\pi}{n+1}\right).$$

下面给出特征值的一些性质。

命题 2 设 A 是一个 $n \times n$ 的实矩阵, 当 $i = j$ 时, $a_{ij} = a_i$; 当 $|i - j| = 1$ 时, $a_{ij} = b_m$, 其中 $m = \min(i, j)$; 其他 $a_{ij} = 0$ 。那么区间 $[a_k - \sigma_k, a_k + \sigma_k]$ 包含至少一个特征值, 这里 $\sigma_k^2 = b_k^2 + b_{k-1}^2$ 。

推论 对每个矩阵 A_n , 存在一个特征值 λ 使得 $|\lambda| \leq b$ 。

证明 因文中矩阵 A_n 的特殊形式, 即对 $\forall i, a_i = 0$ 和 $b_i = b$ 。于是 σ_k 的数值如下:

$$\sigma_k = \begin{cases} b & \text{if } k = 1, \\ \sqrt{2b} & \text{if } 2 \leq k \leq n-1, \\ b & \text{if } k = n. \end{cases}$$

则由命题 2 知, 存在一个特征值 λ 使得 $|\lambda| \leq b$ 。由上面的推论, 可得矩阵特征值的上界。

定理 3 对每一个 $n \in N, A_n$ 的谱半径 $\rho(A_n)$ 的上界为 $2b$ 。

2.2 $\text{spec}(A_m) \subset \text{spec}(A_n)$ 的充分条件

先举例说明谱集的包含关系。比如当 $n = 7$ 时, $f_7(\lambda) = 0$ 有 7 个根

$$\lambda = 0 \quad \lambda = \pm b\sqrt{2} \quad \lambda = \pm b\sqrt{2 - \sqrt{2}} \quad \lambda = \pm b\sqrt{2 + \sqrt{2}}.$$

令人感兴趣的是这 7 个不同根也是更高次幂特征方程根的一部分。例如, 当 $n = 15$ 时, $f_{15}(\lambda) = 0$ 有 15 个根

$$\lambda = 0 \quad \lambda = \pm b\sqrt{2 - \sqrt{2 - \sqrt{2}}} \quad \lambda = \pm b\sqrt{2} \quad \lambda = \pm b\sqrt{2 + \sqrt{2 - \sqrt{2}}}$$

$$\lambda = \pm b\sqrt{2 - \sqrt{2}} \quad \lambda = \pm b\sqrt{2 - \sqrt{2 + \sqrt{2}}} \quad \lambda = \pm b\sqrt{2 + \sqrt{2}} \quad \lambda = \pm b\sqrt{2 + \sqrt{26\sqrt{2}}}.$$

这个现象不是巧合。下面的定理将给出详细的证明过程。

定理 4 设且 $m, n \in N$ 且 $m < n$, 如果 $n \equiv m \pmod{m+1}$, $\text{spec}(A_m) \subset \text{spec}(A_n)$ 。

证明 由已知条件可令 $n - m = (m+1)k, k \in N$, 则

$$n = m(k+1) + k. \quad (7)$$

由命题 1, $\text{spec}(A_m)$ 和 $\text{spec}(A_n)$ 定义如下:

$$\text{spec}(A_m) = \left\{ \lambda_r \mid \lambda_r = 2b \cos\left(\frac{r\pi}{m+1}\right) \right\}_{r=1}^m, \text{spec}(A_n) = \left\{ \lambda_s \mid \lambda_s = 2b \cos\left(\frac{s\pi}{n+1}\right) \right\}_{s=1}^n.$$

由方程(7), 可以用 m 和 k 表示 λ_s , 即, 当 $s = 1, 2, \dots, n$ 时,

$$\lambda_s = 2b \cos\left(\frac{s\pi}{n+1}\right) = 2b \cos\left(\frac{s\pi}{m(k+1) + k + 1}\right) = 2b \cos\left(\frac{s\pi}{(m+1)(k+1)}\right) = 2b \cos\left(\frac{\left(\frac{s}{k+1}\right)\pi}{m+1}\right).$$

而 $\lambda_4 = 2b \cos\left(\frac{r\pi}{m+1}\right)$, 因此当 $r = \frac{s}{k+1}$ 时, $\lambda_r = \lambda_s$ 。

因为 $s \in S = \{1, 2, \dots, m(k+1) + k\}$, 集合 $T = \{k+1, 2(k+1), \dots, m(k+1)\}$ 是集合 S 的一个子集。

注意到对每一个 $s \in T$, 存在唯一的 $r \in \{1, 2, \dots, m\}$ 使得等式 $r = \frac{s}{k+1}$ 成立。于是对所有的 $\lambda_r \in \text{spec}(A_m)$, 都存在 $\lambda_s \in \text{spec}(A_n)$ 使得 $\lambda_r = \lambda_s$ 。那么对所有的 $r \in \{1, 2, \dots, m\}, \lambda_r \in \text{spec}(A_n)$ 成立, 所以 $\text{spec}(A_m) \subset \text{spec}(A_n)$ 。

3 结论

本文推导了特征多项式满足的三项递推关系式, 揭示了特征多项式的系数与 Pascal 三角形的对角线元素之间的美妙联系, 给出了特征多项式的表达式, 并从组合数学的角度证明该表达式满足三项递推关系式, 最后讨论了矩阵 A_n 的特征值和谱集的相关性质。

参考文献:

- [1] BAR – ON I. Interlacing properties of tridiagonal symmetric matrices with applications to parallel computing [J]. SIAM J. Matrix Anal. Appl. , 1996(17) : 548 – 562.
- [2] CRYER C. The numerical solution of boundary value problems for second order functional differential equations by finite differences [J]. Numer. Math. , 1972(20) : 288 – 299.
- [3] GOLUB G. Bounds for eigenvalues of tridiagonal symmetric matrices computed by the LR method [J]. Math. Comp. , 1962(16) : 428 – 447.
- [4] GULLERUD E, MBIRIKA A, POST R. Tridiagonal real symmetric matrices with a connection to Pascal’s triangle and the Fibonacci sequence [J]. Math. Co. , 2023(8) : 1 – 23.

(责任编辑 李玉玲)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ridiagonal Real Symmetric Matrices and Pascal’s Triangle and Analysis on Spectral Properties of the Matrices

WANG Libing¹, DOU Quanyu²

- (1. School of Mathematics and Statistics, Zhoukou Normal University, Zhoukou, Henan 466001, China;
- 2. School of Mathematics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Light Industry, Zhengzhou, Henan 450002, China)

Abstract: A special family $\{A_n\}_{n=1}^{\infty}$ of tridiagonal real symmetric matrices is primarily explored in this paper. Firstly, the derivation process in which the characteristic polynomials of this type of matrix satisfy a three – term recurrence relation is derived. Secondly, a special relation between the coefficients of the characteristic polynomials of such matrices and the diagonal elements of Pascal’s Triangle is discovered, thereby providing an expression for the characteristic polynomials. The coefficients of this expression are composed of combinatorial numbers, and subsequently it is proved that which satisfies a three – term recursive relationship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binatorial mathematics. Finall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igenvalues of various members of the family is explored and a detailed proof is provided.

Key words: characteristic polynomial; pascal’s triangle; eigenvalue; spectrum

某桥梁病害检测与加固设计

祝红丹,王永伟,刘成才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土木工程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4)

摘要:通过对某公路大桥病害原因的调查与分析,结合实际工程,对原有结构采用5种不同的假设损伤情况进行分析,以全面评估其承载能力。在分析完结构的受力状况后,制定出有针对性的加固设计方案,并对加固后的结构进行综合分析和验算,对比加固前后结构的抗弯承载力、抗剪承载力、应力、挠度,确认其加固效果。研究表明,加固后主梁应力状况和挠度得到了较大改善,结构刚度有所提高,跨中裂缝的发展得到了有效抑制,该研究为类似工程设计提供了参考。

关键词:病害;检测;加固;设计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5.01.021

中图分类号:U44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5)01-0119-04

随着我国交通建设的快速发展,行车密度不断增加,车辆吨位不断增大,桥梁负荷日趋加重,不少桥梁损坏严重,影响了桥梁的正常使用,必须重建或加固,考虑到工程造价,多数采取在旧桥基础上进行加固,因而旧桥加固技术在桥梁加固中被广泛应用。

1 工程概况

该桥梁的上行线总长度为577.70 m,下行线为577.32 m。整个桥梁由14个跨段组成,其长度分布为(4×30+65+110+65+7×30) m。在上部构造方面,第1至第4跨以及第8至第14跨采用的是先简支后连续的预应力混凝土组合箱梁结构,而第5至第7跨则是现场浇筑的连续刚构箱型梁。对于桥梁的下部结构,引桥的桥墩使用的是柱式墩,而主桥则采用了高34米的空心薄壁墩。桥台方面,0号桥台采用的是桩柱结构,而14号桥台则采用了肋板结构,桥面覆盖了沥青混凝土,主桥区域安装了盆式支座,而引桥区域则配备了板式橡胶支座。工程主要病害表现为:

(1)主桥中跨梁底横向裂缝:位于第六跨跨中接缝处(上、下行各1条);上行裂缝宽度0.02 mm,裂缝长度2.85 m,裂缝深度3~7.5 cm;下行裂缝宽

度0.1~0.17 mm,横向通长开裂,延伸至两侧腹板以上55~70 cm,裂缝深度3~7.5 cm。

(2)跨中最大挠度:上行5.6 cm,下行6.4 cm。

(3)箱梁内部顶板纵向裂缝:上、下行主桥箱梁顶板纵向裂缝810余条,除墩顶附近较少,其余部位裂缝分布较为均匀,其中大于0.15 mm的有57条,最大裂缝宽度0.36 mm,最长裂缝为7.6 m,裂缝深度1~6 cm,大部分裂缝不跨节段。

(4)腹板斜向裂缝:全桥(上、下行)共计123条,大部分位于第六跨跨中至1/4跨附近位置,裂缝宽度0.02~0.11 mm,最大裂缝长度1.3 m。

(5)混凝土表面破损或锈胀露筋、蜂窝等病害。

2 加固设计理论

根据设计文件、竣工文件及检测评估报告,利用《桥梁博士V 3.3.0》软件对原有桥梁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校验。在进行结构计算时,采用了适用于平面杆系结构的计算软件。计算过程遵循了《公路桥涵设计通用规范》(JTJ 021-89)、《公路钢筋混凝土及预应力混凝土桥涵设计规范》(JTJ 023-85)、《公路桥涵设计通用规范》(JTG D60-2004)以及《公路钢筋混凝土及预应力混凝土桥涵设计规范》(JTG

收稿日期:2024-06-15

基金项目:河南省高等学校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202411068007)

作者简介:祝红丹(1993—),女,河南太康人,硕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土木工程学院助教,研究方向:工程结构分析。

D62 - 2004) 的相关标准。

2.1 纵向验算

在桥梁工程的计算分析中,必须全面评估各种参数的潜在变化。利用包络设计法来整合这些变量,可以确保结构在面对最坏情况时,例如预应力的损耗、结构尺寸的缩减、荷载的上升以及车辆超载等,桥梁依然能够维持在规定的安全界限内,满足设计标准。鉴于该桥梁已服役超过 10 年,出现了混凝土退化和预应力衰减现象,同时部分主梁也出现了裂缝,因此,本计算采用了六种不同的分析模型进行比较研究。模型一:基于原始设计条件,不考虑预应力的附加损失。模型二:超载系数为 1.2,竖向预应力损失 20%,不考虑纵向预应力的额外损失,中跨跨中底板截面减少 5%。模型三:超载系数为 1.2,竖向预应力损失 20%,纵向预应力有 10% 的额外损失,中跨跨中底板截面减少 5%。模型四:超载系数 1.2,竖向预应力损失 20%,纵向预应力额外损失 20%,中跨跨中底板截面减少 5%。模型五:超载系

数 1.2,竖向预应力损失 20%,纵向预应力额外损失 30%,中跨跨中底板截面减少 5%。模型六:不考虑超载系数,竖向预应力损失为 20%,纵向预应力有 20% 的附加损失,同时顶板和底板截面均折减 5%^[1-3]。5 种假定损伤验算结果见表 1、表 2、表 3。

表 1 结构抗弯承载力验算结果对比

损伤情况	分类	最大弯矩/(kN·m)			最小弯矩/(kN·m)	
		第 5 跨跨中	第 6 跨跨中	第 7 跨跨中	5#墩顶	6#墩顶
模型一	内力	24023	49451	24023	-605875	-605875
	抗力	70967	117053	70967	-652941	-652941
模型二	内力	27829	53427	27829	-624068	-624068
	抗力	70967	115805	70967	-652941	-652941
模型三	内力	31133	57636	39066	-625278	-625278
	抗力	70967	115805	70967	-652941	-652941
模型四	内力	34830	62258	34830	-640112	-640112
	抗力	70967	115805	70967	-652941	-652941
模型五	内力	37662	65172	45690	-658413	-640301
	抗力	70967	115805	70967	-652941	-652941
模型六	内力	34813	62326	34813	-663182	-663182
	抗力	70967	115805	70967	-652941	-652941

表 2 结构抗剪承载力验算结果对比

损伤情况	分类	L/4 ~ 3L/4 最不利位置/kN			墩顶剪力/kN			
		第 5 跨	第 6 跨	第 7 跨	4#墩顶	5#墩顶	6#墩顶	7#墩顶
模型一	内力	-9006	9426	9006	5502	26275	-26275	-5502
	抗力	-18732	19423	18732	14208	41982	-41982	-14208
模型二	内力	-9723	9951	9723	5919	27136	-27136	-5919
	抗力	-17854	17445	17854	13029	37549	-37549	-13029
模型三	内力	-9707	10068	9707	6113	27133	-27133	-6113
	抗力	-17854	17445	17854	13092	37549	-37549	-13092
模型四	内力	-9741	10166	9741	5764	25789	-25789	-5764
	抗力	-17854	17445	17854	13092	37549	-37549	-13092
模型五	内力	-9675	10296	9675	5790	27124	-27124	-5790
	抗力	-18056	16979	18056	13134	30532	-30532	-13134
模型六	内力	-9689	10203	9689	6330	27132	-27132	-6330
	抗力	-17854	17445	17854	13092	37549	-37549	-13092

表 3 结构应力验算结果对比

假定损伤情况	最大正应力	最小正应力	中跨跨中底板附近最小正应力	中跨 L/4 ~ L/2 最大主拉应力
	/MPa	/MPa	应力/MPa	应力/MPa
模型一	16.61	1.16	1.16	-2.32
模型二	16.48	0.30	0.30	-2.50
模型三	16.06	-1.23	-1.23	-2.66
模型四	15.12	-2.78	-2.78	-2.87
模型五	15.07	-4.60	-4.60	-3.66
模型六	15.63	-2.79	-2.79	-2.79
规范限制	17.5	-2.70	-2.70	-2.70

2.2 横向验算

鉴于箱梁顶板下缘出现了多条纵向裂缝,为了模拟桥梁在横向上的损伤情况进行了建模分析,在模型中,考虑了竖向预应力损失达到 20%,并且对截面进行了 5% 的削弱处理。计算结果见表 4。

2.3 验算结果分析

在对主桥进行纵向损伤的多种假设验算后,当超载系数增至 1.2 倍,竖向预应力损失和纵向预应力附加损失均为 20% 时,桥梁跨中的正应力会升高至 2.78 MPa,同时,在 1/4 至 1/2 跨径区域,主拉应力可达到 2.87 MPa,这超出了规定的 2.7 MPa 最大值。此外,桥梁计算模型出现了横向裂缝,位于第 5 跨的底板,其位置和形状与桥梁现有的裂缝大致一致。分析显示,主拉应力的分布与桥梁的实际损伤状况相匹配。

表 4 结构横向应力验算结果对比

假定损伤情况	顶板上缘/MPa		顶板下缘/MPa	
	最大压应力	最大拉应力	最大压应力	最大拉应力
模型一	8.09	-1.86	5.95	-2.19
截面削弱	8.35	-2.82	5.61	-3.35

检测报告显示了原桥存在的若干问题,包括桥梁跨中两个箱体连接处的底面出现横向裂缝,在1/4至1/2跨范围内,腹板区域出现了斜裂缝,数量达百条。此外,桥梁的挠度过大。分析计算结果显示,在工况模型四的荷载组合下,主梁的拉应力达到了规范允许的材料最大值,这会引起结构的开裂。进一步分析应力结果与检测中裂缝分布图,可以发现应力较高的区域与实际裂缝区域大致一致。

综上所述,桥梁的实际损伤情况与工况模型四下的理论分析结果较为一致。据此,我们认定工况模型四反映了桥梁的实际损伤情况,并基于此模型开展加固的验算与设计。

3 加固设计与对比分析

3.1 增设体外纵向预应力钢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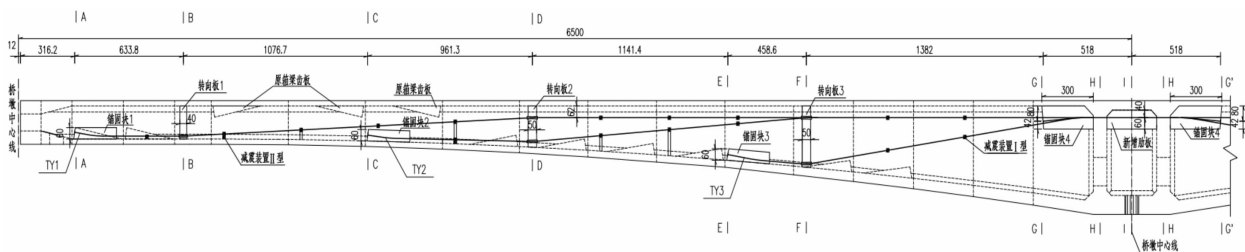


图1 边跨主梁体外预应力钢束立面布置图(图中尺寸除钢束规格以毫米计外,其余均以厘米为单位)

3.2 裂缝处理

针对桥梁的具体损伤情况,我们采取了以下修复措施:对于桥梁跨中底板下缘出现的横向和纵向裂缝,处理方式是采用灌浆封闭。针对顶板的纵向裂缝问题,先进行裂缝的封闭处理,接着在箱梁顶板的下边缘粘贴钢板,以此来增强其承载力。在主跨的腹板斜向裂缝密集区,即距离主墩81.5米至103.24米处,通过粘贴钢板来增强其结构强度^[5]。通过这些针对性的修复措施,能够有效提升桥梁的结构完整性和耐久性。

3.3 桥面铺装改造

针对桥面存在的不同问题采取了相应的修复措施:对桥面上的坑槽进行修补,对于车辙深度超过10 mm的区域,需进行深度处理,具体做法是铣刨掉4厘米厚的沥青混凝土铺装层,并重新铺设同等厚度的新沥青混凝土层^[6]。

3.4 加固前后结果对比分析

加固后,采用桥梁专用软件对加固后桥梁进行综合分析计算,并对桥梁承载能力、应力及张拉体外预应力钢束后进行验算^[7],结果如下:

对比加固前后结构的抗弯承载力、抗剪承载力、

通过增设纵向体外预应力束来增强主梁的应力储备,此方法不仅能够提升结构的耐久性,还能有效控制主梁的下挠现象^[4]。针对中跨和边跨的预应力束设置,采取了以下方案:中跨的预应力束将在0号块横隔板外侧进行两端锚固,总共布置6根TW15-12型号的成品索,每块腹板分配3束,这些预应力束将分阶段通过三个转向装置进行弯曲,以达到所需的锚固位置,锚固时的控制应力设定为1209 MPa。对于边跨,预应力束同样采用6束TW15-12型号成品索,每块腹板对应3束,分别在0号块横隔板内侧及新增的锚固块处进行两端锚固,这些束同样会经过三个转向装置和锚固块逐步弯曲到位,锚固时同样将控制应力设定为1209 MPa,如图1所示。通过这种布置,我们旨在确保预应力束的有效传递和结构的整体稳定性。

应力、挠度可知,加固措施显著提升了主梁的应力状态。具体来说,加固后跨中截面下缘的正应力和主拉应力均有所降低,较加固前正应力减少66.2%,拉应力减少17.8%。此外,加固还改善了主梁的跨中挠度,通过理论计算,加固后的主梁将向上位移约4.3 cm,这有助于防止跨中裂缝的进一步扩展。总的来说,加固措施有效地提升了桥梁的结构性能和耐久性。

表5 加固前后抗弯承载力验算结果

位置	加固前			加固后		
	截面内力/ (kN·m)	截面抗力/ (kN·m)	安全 系数	截面内力/ (kN·m)	截面抗力/ (kN·m)	安全 系数
第五跨跨中	34830	70967	2.04	37259	89075	2.39
第5#墩顶	-640112	-652941	1.02	-669363	-821367	1.23
第六跨跨中	62258	115805	1.86	65073	147998	2.27
第6#墩顶	-640112	-652941	1.02	-669363	-821367	1.23
第七跨跨中	34830	70967	2.04	37259	89075	2.39

4 结论

(1)结合桥梁病害,对原有结构进行5种假定损伤分析验算,在全面掌握结构的受力状况后,制定出通过增设箱梁纵向体外预应力束,抑制主梁下挠的加固方案,使主梁跨中挠度得到改善,有效提高了结构的刚度。

表6 加固前后抗剪承载力验算结果

位置	加固前			加固后		
	截面内 力/kN	截面抗 力/kN	安全 系数	截面内 力/kN	截面抗 力/kN	安全 系数
第4#墩顶	5764	13092	2.27	6115	14208	2.32
第五跨	-9741	-17854	1.83	-9675	-20023	2.07
第5#墩顶	25789	37549	1.46	27658	42919	1.55
第六跨	10166	17445	1.72	10148	19415	1.91
第6#墩顶	-25789	-37549	1.46	27658	-42919	1.55
第七跨	9741	17854	1.83	9675	20023	2.07
第7#墩顶	-5764	-13092	2.27	-6115	-14208	2.32

表7 加固前后应力验算结果

阶段	最大正应 力/MPa	最小正应 力/MPa	中跨跨中底板 附近最小正应	中跨 L/4 ~ L/2 最大主拉应
			力/MPa	力/MPa
加固前	15.22	-2.78	-2.78	-2.87
加固后	13.86	-0.94	-0.94	-2.36
差值	1.36	1.84	1.84	0.51

表8 加固前后挠度验算结果

位置	加固前最大下挠/mm	加固后最大下挠/mm
第五跨跨中	-64.7	-44.4
第六跨跨中	-136.0	-93.0
第七跨跨中	-64.7	-44.4

(2) 通过跨中及其附近增设横隔板作为转向板,增强了主梁整体刚度,改善了主梁下挠,有效增加了跨中的应力储备,在最不利荷载组合下,支点截面及跨中截面的极限承载能力安全储备都有所提高。

(3) 经过加固,桥梁跨中下缘的正应力较加固前减少 66.2%,而主梁的主拉应力则减少了约 17.8%。加固效果还体现在主梁产生了向上的 4.3 cm 位移,这有助于防止底板裂缝的产生和扩展,同时有利于主梁跨中底板的横向裂缝的闭合。加固措施使结构受力得到了明显改善,为类似工程加固设计提供了参考。

参考文献:

- [1] JTG/T J22-2008. 公路桥梁加固设计规范[S]. 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2008.
- [2] 湛润水,胡钊芳,帅长斌. 公路旧桥加固技术与实例[M]. 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2002.
- [3] 邹晓光,白青侠,雷自学. 公路桥梁加固设计规范应用计算示例[M]. 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2011.
- [4] 张树仁,王宗林. 桥梁病害诊断与加固改造设计[M]. 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2006.
- [5] 陈文. 某危桥加固设计研究[J]. 公路与汽运,2016(3):234-236.
- [6] 黄礼春,汪伟. 大地咀2号桥加固设计及施工技术[J]. 公路交通技术,2011(1):73-76.
- [7] 郭永江,胡松山. 云南省响水河大桥加固技术与力学验算[J]. 公路与汽运,2015(3):210-215.

(责任编辑 李玉玲)

Disease Detection and Reinforcement Design of a Certain Bridge

ZHU Hongdan, WANG Yongwei, LIU Chengcai

(School of Civil Engineering,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Five analyses of assumed damages and verification were carried out on the original structure through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causes of the disease of a certain highway bridge, combined with actual engineering. After comprehensively understanding the stress status of the structure, a targeted reinforcement design plan was formulated, and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and verification of the reinforced structure were carried out. The bending bearing capacity, shear bearing capacity, stress, deflection of the structure before and after reinforcement were compared to confirm the reinforcement effec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tress and deflection of the main beam were greatly improved after reinforcement, and the structural stiffness was improved, effectively suppressing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mid span cracks and providing reference for similar engineering designs.

Key words: disease; detection; reinforcement; design

地下水位上升对建筑安全使用的影响

——以郑州市区域为例

赵亮¹, 殷顺达², 孙广欣³

(1. 郑州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 河南 郑州 450003; 2. 郑州康桥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 郑州 450003; 3. 郑州共图建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河南 郑州 450001)

摘要: 地下水位的上升对城市建筑是有影响的, 作为城市管理和建设的参与者, 通过收集近年来郑州市地下水位的资料和一些工程案例, 从郑州地下水的类型出发, 分析了郑州市地下水位上升的原因和带来的影响。结果表明南水北调工程的实施、城区及周边部分水井的封停等条件是地下水位上升的主要原因, 这给房屋等部分建筑的安全使用造成了一些影响。建议对新建建筑和既有建筑都要增强抗浮、防渗、防潮、消除液化等措施。

关键词: 地基基础工程; 地下水; 调查; 房屋建筑; 浮托作用

DOI: 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5.01.022

中图分类号: P6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715(2025)01-0123-06

房屋等建筑的安全和地基基础息息相关, 起承载作用的地基基础工程对应的岩土工程和水文地质是工程领域研究和实践的重点。地下水位的变化, 会对岩土工程质量造成一定的影响^[1-2], 继而对建筑工程的安全使用产生了影响。例如: 地下水位下降会使软土地基产生固结沉降; 地下水位上升会对抗浮、地板结构变形、防渗、防潮等造成不利影响; 地下水位上升还会对地基增湿沉降变形产生影响^[3-5]; 地下水的流动也会诱发流砂、潜蚀。近年来, 郑州市因南水北调工程、水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治理地下水超采等综合因素影响, 部分地区地下水位不断上升, 自然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但在地下水位上升的同时, 出现诸如小区地下车库地面隆起、地库地下室涌水、渗水等现象。这个问题不仅仅出现在郑州市,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沿线城市普遍出现了此类问题, 本文以郑州为样本开展了一些调查分析。

1 郑州地下水概况

1.1 郑州区域浅层地下水赋存状态

郑州区域浅层地下水主要包括松散岩类孔隙潜水和微承压含水层, 在埋深 60 m 范围内, 郑州南部

含水层主要为第四系上更新统及中更新统的粉土、粉质黏土, 东部和北部含水层主要为第四系全新统的粉土、细砂。其潜水赋存地层属弱透水层, 主要为大气降水补给、河流下渗、地下水侧向径流以及侧渗补给, 排泄方式主要为人工开采和地表蒸发; 承压水层的富水性较好, 属强透水层, 具有微承压性, 与上部潜水有一定水力联系, 承压水的补给来源主要是潜水越流补给, 排泄主要为人工开采。

1.2 地下水类型

(1) 根据地下水的物理力学性质可将地下水分为气态水、结合水、毛细水、重力水、固态水以及结晶水和结构水。其中毛细水和重力水对地下水的工程特性有很大的作用。

当地下水位埋深变浅时, 由于毛细水上升, 可加剧地基土的冰冻现象; 使地下室潮湿; 危害房屋基础及公路路面; 促使土的沼泽化、盐渍化。而重力水水位的变化会直接影响建筑抗浮能力、承载力、地基压缩性、上部主体以及基础变形等。

(2) 地下水按埋藏条件分为上层滞水、潜水、承压水。

收稿日期: 2024-09-15

作者简介: 赵亮(1975—), 男, 郑州人, 硕士, 郑州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房屋安全管理处处长, 从事城市房屋安全管理工。

上层滞水位于包气带岩土中,处于潜水以上。上层滞水受气候控制,季节性变化明显,会造成地基的冻胀、翻浆等病害。

潜水平埋藏在地表以下第一隔水层以上,具有自由面的重力水。潜水受气候条件影响,季节变化明显,水质易受污染。

承压水是位于两个稳定隔水层之间的重力水。承压水具有一定压力,相对受气候影响较小,不易受污染。

(3)在各类地下水类型中,潜水上升对房屋建筑影响较大。

1.3 与水相关的岩土水理性质

(1)软化性:岩土被水浸过后,岩土本身强度降低的性质。

(2)崩解性:岩土体内部结构在水浸入后遭到破坏和削弱,内部胶结物发生溶解。

(3)透水性:通过抽水试验或渗透试验得到岩土的渗透系数,用此评价其透水性的大小。岩土透水性造成了地下水的渗透径流,同时产生水压力,影响建筑物的安全和稳定。

(4)胀缩性:岩土有吸水膨胀、失水收缩的性质,如果出现频繁的收缩和膨胀,会引起建筑结构开裂等状况。

2 郑州一建筑案例

2.1 建筑概况

该既有建筑建成于2010年,主要功能为地下车库,总建筑面积为15000 m²。地下三层,-1F层高5.6 m,-2F层高4.0 m,-3F层高5.4 m,底层地下室底板标高为-16.0 m。结构形式为框架结构,基础形式为钢筋混凝土柱下独立基础。结构安全等级为二级,设计使用年限50年,地基基础设计等级为乙级。

表1 岩土物理力学参数统计表

土层名称	埋深	土层状态	密度/(g/cm ³)	黏聚力 c/kPa	内摩擦角 Φ /度	压缩模量 Es/MPa
粉土	8.2	非饱和	1.95	13.7	22.0	11.5
	8.0	非饱和	1.94	14.5	17.3	12.1
粉质黏土	13.4	非饱和	1.95	13.4	19.2	13.3
	14.2	饱和	2.00	11	5.5	8.2
粉土	17.0	非饱和	1.97	14.6	21.4	12.4
	16.8	饱和	2.02	13	15.3	11.8

表2 地下水水质分析成果

评价分项 评价条件	水对混凝土结构的腐蚀性评价					水对钢筋混凝土中钢筋的腐蚀性评价	
	按环境类型: II类			按地层渗透性: B		长期浸水	干湿交替
分析项目	SO ₄ ²⁻ /(mg/L)	Mg ²⁺ /(mg/L)	总矿化度 /(mg/L)	pH	侵蚀性 CO ₂ /(mg/L)	HCO ₃ ⁻ /(mg/L)	Cl ⁻ /(mg/L)
水试样1	121.65	62.34	612.31	7.76	0.00	9.12	138.75
水试样2	97.49	68.36	572.62	7.90	0.00	8.27	145.14
结论	微				微		弱

2.2 安全性和使用性问题的凸显

该建筑于2018年开始,底板和外墙陆续出现渗水状况。2021年问题更为严重,原有的集水井的排水量已小于其汇水量,且经过专业检测鉴定,部分柱、梁柱节点、板等位置出现影响结构安全的裂缝,最大裂缝宽度4.3 mm,裂缝条数总计约230条。部分柱子的侧向位移、梁的挠度也已超限,其中柱最大侧向位移56 mm,梁最大挠度36 mm。鉴于以上问题,该建筑于检测鉴定后立即暂停使用。

2.3 建造时的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条件

原勘察和设计图纸显示,该建筑所在场地属于黄河冲积平原,地面以下45m范围内:地层为第四系全新统(Q₄)和上更新统(Q₃)的粉土、粉质黏土、细砂,以浅棕黄色、褐黄色为主;下部为第四系中更新统(Q₂)粉质黏土、细砂等,以浅棕红色为主。地下水稳定水位埋深较深,位于基底标高下12.0~15.0 m,属于第四纪松散岩类潜水,年变幅约1.0~3.0 m,因此,基坑开挖可不考虑地下水对地下室的影响。

2.4 补充勘察及试验结果

在鉴定和病害处理期间,邻近该建筑物位置分别布置了3个勘察孔,后期转做水位观测使用,钻进深度为地面下35.0 m。经测量,地下水稳定水位埋深13.6~17.4 m,结合年变幅,水位明显会出现高于底板的状况。

按照规范要求提取了岩土样品和水样,分别进行试验。结合原勘察资料和最新补充勘察的试验数据,底板附近的岩土物理参数如表1。地下水对混凝土结构具有微腐蚀性,对钢筋混凝土结构中的钢筋在长期浸水条件下具有微腐蚀性,干湿交替条件下具有弱腐蚀性,详见表2。

2.5 分析和延伸

(1)该建筑结构部分构件变形超限、裂缝的出现和发育,反映出基础及上部主体结构受到了力的作用。

(2)将最新的补充勘察和原有建设期间的勘察、设计资料对比后,结合地下底板不断地渗水、涌水等现象,证明了地下稳定水位上升了约 15.0 m,而水位年度变幅在 1.0~3.0 m,直接证明地下水位不是年度变幅引起,而是区域性地下水位上升。

(3)岩土物理力学试验数据显示出,地下水位交界处的地层岩土抗剪强度指标和压缩模量相对减小,而该建筑为独立基础,其影响程度显而易见。

(4)地下水水质分析成果显示,地下水对混凝土结构具微腐蚀性,对钢筋混凝土结构中的钢筋在长期浸水条件下具微腐蚀性、干湿交替条件下具弱腐蚀性。但裂缝处水的渗漏和钢筋的局部裸露会造成钢筋的锈蚀,如果不做密封和防水处理,会影响建筑的安全性和使用性。

(5)地下室出现大面积积水,严重影响了该建筑的使用功能。

(6)该项目后期的加固设计和施工也是围绕地下水位上升进行的,在此不做赘述。

(7)以该建筑出现的问题为例证,后文就郑州地下水位变化原因、不利影响以及措施建议等进一步进行阐述。

3 郑州地下水位及影响的基本情况

2012年郑州市全面开始城中村改造,大量水井废弃停用,2014年12月,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正式通水,丹江水成为郑州市主要供水水源,郑州市地下水开采量大幅下降,地下水位逐年上升。根据水利部对2020年全国地下水超采区水位变化情况进行通报,第二季度郑州深层地下水位与上年同比上升4.25 m,第三季度同比上升4.61 m,均名列全国第一。与此同时,郑州市浅层地下水位也逐年上升。

地下水位持续上涨,对地下建筑、地下管线、地下人防工程带来隐患和影响。郑州市二七区政通路人和路附近的某商业广场地下室、勤劳街汝河路某商业小区地下室、中原区百花路棉纺路某小区地下室、金水区南阳路宋寨路某广场地下室、兴隆嘉园地下室等都有地下车库地面隆起,冒水渗水等现象。

根据郑州市区轨道交通岩土报告、河南省建勘测院勘测报告等资料,2012年以来市区多点位浅层地下水位有不同程度的持续上升,部分统计结果见表3。

表3 郑州市部分地下水位观测点数据表

观测地点	观测期	原水位标高	水位上升
桐柏路建设路	2008~2016.08	80.5 m	4.0 m
京广南路长江中路	2010.08~2016.06	85.0 m	2.5 m
航海路工人路	2014.05~2017.02	84.9 m	12.7 m
大学路航海路	2014.04~2017.01	88.8 m	5.8 m
淮河路桐柏路	2014.04~2018	84.5 m	11.5 m
连云路万泉路	2010.10~2016.05	86.9 m	4.5 m

从分区来看,郑州市市域陇海西路以南,航海西路以北,伏牛路以东、大学南路以西,2013年至近年,地下水位上升8~12 m。中原西路以南,丹青路以北,南水北调干渠以东,京广铁路以西,2006年至近年,地下水位上升2~4 m。碧沙岗公园附近,2006年至近年,地下水位上升15 m。棉纺西路以南,岗坡街以北,天山路以东,工人路以西,2010年至2016年地下水位上升5~10 m。化工路以南,郑上路以北,腊梅路以东,雪松路以西,2013年至近年地下水位上升超过20 m。

由于近年水温数据资料涉密,在此不予以详细列举。郑州市区域特别是原有老城区地下水位总体呈现上升状态^[6-7]。

4 市区地下水位上升的原因分析

郑州地区位于丘陵岗地与泛滥平原相交接地带,为华北平原一部分,由于郑州市的地形西南高,东北低,郑州西南部东林寺高程约168 m,东北部龙子湖高程约84 m,两者高差约84 m,在势能的作用下地下水由西南向东北径流。2013年前,因地下水超采,且70%以上是深层地下水,在郑州市区浅层水形成多个降落漏斗,其中地下水漏斗中心一个位于大学路航海路附近。地下水从漏斗四周向中心径流。2013年以后,地下水开采数量减少,深层地下水和浅层地下水位逐年回升,特别是在降落漏斗中心周围,浅层地下水位上升速度更快。以二七区汝河路勤劳街区域为例,由图1可知,2019年地下水位高程97.1 m,埋深9.7 m,比2010年高了整整13.1 m,平均每年升高1.45 m。郑州日报^[8]依据有关专家的分析,地下水开采数量减少,水位回升的原因有多方面,其中最重要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4.1 城市供水结构的变化促使郑州地下水水位回升

南水北调中线自2014年12月开始通水,至2021年11月30日,郑州市调取的总供水量为36.26亿立方米。以生活供水为主,总计31亿立方米,生态补水为5亿立方米。目前,丹江水已经成为郑州市主要供水水源,由于城市供水结构发生了很

大变化,地下水的开采量减少程度显著,是地下水水位回升主要原因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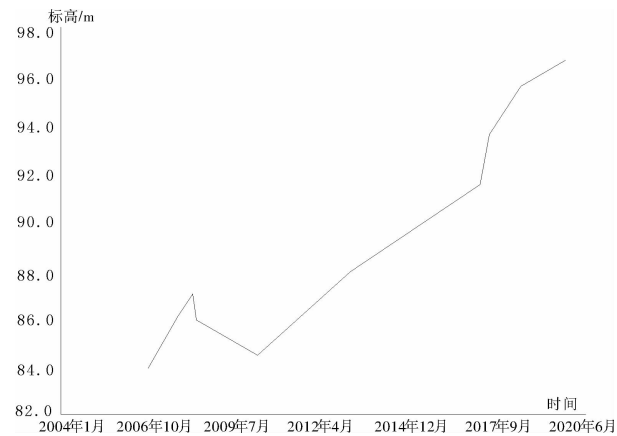


图1 二七区汝河路勤劳街区域地下水位趋势图

4.2 市区内部分水井的封停

为了遏制超采郑州市区域内的地下水,对地下水的开采量一直采取逐年压采的措施。“十三五”期间,整个市区范围内共陆续封停约3200眼水井。

4.3 城市郊区村庄改造影响

陆续对郑州近郊600多个村庄进行改造,约1.1万眼水井停用或报废,每年减少地下水开采量约5000万吨,也是地下水水位回升主要原因之一。

4.4 生态环境的变化

随着生态郑州、美丽郑州建设的不断推进,郑州市生态水系建设规模不断扩大,生态地表水面积的扩大使地表水持续入渗补给地下水的补给量越来越大,是地下水水位持续回升的主要原因之一。

4.5 部分企业外迁的影响

随着郑州市区部分企业的外迁,地下水的开采量也随之降低,促使郑州市区地下水水位回升。例如五大棉纺企业,外迁后几十眼水井报废,停止了对地下水的开采。

5 地下水持续上升的影响

地下水水位下降到平均水位以下,再继续开采,容易形成大面积地下水下降漏斗,导致地面塌陷、沉降、地裂等地质灾害。但地下水水位过高,同样也会给房屋等建筑带来不利影响^[9]。

5.1 地下水的浮托作用

当建筑物基础底面位于地下水水位以下时,地下水对基础底面产生静水压力,即产生浮托力。依据《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 50007—2011,建筑物基础存在浮力作用时,应按下式(1)进行抗浮稳定性验算,抗浮稳定安全系数 K_w 一般情况下取1.05。

$$\frac{G_k}{N_{w,k}} \geq K_w \quad (1)$$

式中, G_k 为建筑物自重及压重之和; $N_{w,k}$ 为浮力作用值。

郑州市自2000年以后,建设地下埋深7.0~15.0m的地下结构,因设计施工时,地下水水位较低,未考虑抗浮。随着近些年水位上升, $N_{w,k}$ 增大,部分建筑的抗浮稳定安全系数不断减小,建筑整体安全需重新进行评估。诸如肥槽回填不密实或砂土地基^[10],地下水位的上升会引起基底水压力的增加,浮力作用在底板上,通过柱、梁等构件传递到建筑结构的其他构件,整体产生了荷载效应。

板与梁、板与柱、板与剪力墙、剪力墙与梁、梁与柱这些位置的节点以及地下室底板、四周侧墙等构件受水位上升过程中浮力的影响,就有可能出现局部隆起、开裂、漏水、失效等问题,这些底层个别构件的功能减弱或失效对整幢建筑也会产生不利影响。

5.2 地下水水位上升使局部围岩参数弱化

郑州市区域50m深度范围的地基土以粉土、粉质黏土、粉细砂为主。土的类型、地下水水位与地基承载力密切相关,新近沉积的粉土,物理力学性质与土层含水率密切相关,粉土体湿度由稍湿($w < 20\%$)随地下水水位变为很湿(w 大于30%)后,力学性质降低约10%~30%。

对浅基础,建筑地基承载力的计算公式(2)和(3)计算结果都与基础底面以下土的重度、基础底面以上土的加权平均重度相关,受有无地下水的影响,该重度会形成与水重度(10 kN/m^3)相关性差异值。当地下水位上升到基础底面以上时,相应土层需按有效重度计算,从而地基承载力降低。另外,修正系数、抗剪强度^[11]也与基础深度范围内有无地下水密切相关。

$$f_a = f_{ak} + \eta_b \gamma (b - 3) + \eta_d \gamma_m (d - 0.5) \quad (2)$$

$$f_a = M_b \gamma b + M_d \gamma_m d + M_c c_k \quad (3)$$

式中, f_a 为修正后地基承载力特征值; f_{ak} 为地基承载力特征值; γ 为基础底面以下土重度; γ_m 为基础底面以上土的加权平均重度; M_b 、 M_d 、 M_c 为与土内摩擦角标准值相关的承载力系数。

对桩基础,根据单桩竖向极限承载力标准值计算公式(4),粉质黏土地层的桩侧极限阻力和桩极限端阻力标准值取值由土的状态取值,流塑、软塑、可塑、硬塑等土的状态不同,其对应的桩阻力标准值不同。当地下水位上升时,土的含水率增大,土的状态会从坚硬或硬塑状态变为可塑、软塑甚至流塑状

态,相应的,桩侧极限阻力和桩极限端阻力标准值取值将会降低,桩基承载力将会明显降低。

$$Q_{uk} = Q_{sk} + Q_{pk} = u \sum q_{sik} l_i + q_{pk} A_p \quad (4)$$

式中, q_{sik} 为桩侧第 i 层土的极限侧阻力标准值; q_{pk} 为极限端阻力标准值; l_i 为第 i 层土中的桩长; A_p 为桩端面积。

水位上升使桩间土体饱和度增大,发生沉降或其强度降低,桩承担的荷载相对增加,桩土应力比增大,桩土相对位移也增大。

此外,对于复合地基也会造成影响,特别是水位出现循环升降时,由于受到桩周土体有效应力周期变化、桩与桩间土体相对位移、桩侧摩阻力、桩身轴力的变化等影响,复合地基会出现累积沉降^[12],甚至产生较大的附加沉降。

通过以上分析,地下水位上升,部分类型岩土的地基承载力相对会有所降低。另外,地下水位上升后的高程相对于建筑基地标高也与建筑整体稳定性相关,在此不再展开赘述。

5.3 砂土液化

地下水位的上升,相对增加了饱和土层的厚度范围,地震时,产生的孔隙水压力更容易发育至地面。根据郑州地区的抗震设防烈度,地面下存在饱和砂土和黏粒(粒径小于 0.005mm 的颗粒)含量小于 10% 的粉土地层时,要进行液化判别。

对新建建筑,目前岩土勘察时砂土液化判别要注意未来水位的上升的影响。部分既有建筑在设计之初,由于地下水位较深,依据上覆非液化土层厚度、基础埋深、液化土特征深度、地下水位埋深、原位测试数据、黏粒含量等计算的初判和复判结果,原有地基液化等级较低的地基持力层,其液化等级受近年来地下水位上升影响而提高。对应要采取消除地基液化沉陷的措施。

5.4 对建筑结构耐久性的影响

环境类别与建筑结构的耐久性密切相关,例如:混凝土结构的环境类别从一类、二 a、二 b 至五类的划分,与环境是否干燥、有无侵蚀性水、地下水位在地下结构深度范围内是否频繁变动即干湿交替等有关。

前期设计施工时,地下水位埋深远低于底板,按照水头高度 H 和地下室墙体厚度 h 计算比值, P6 满足抗渗要求。而由于目前地下水位的上升,部分建筑地下水位上升至地下结构底面或以上, P6 已不满足使用要求。较低防渗、防腐的工程质量,会造成地下结构的腐蚀、剥离、钢筋锈蚀,进而缩短地下结构

的使用寿命^[13]。如果伴随着地下结构渗漏水,其使用寿命锐减,并危及上部结构安全。

6 针对地下水位持续上升问题的措施和建议

基于以上分析,建议根据郑州市实际情况,对全市地下水位进行动态监测和积极调控,使之维持在一个合理范围内。

(1) 要重视水文地质问题。由政府牵头组织水务、气象、自规、城建、城管、住房保障等相关部门以及有关专家,收集各方面数据,对未来郑州市分片区、多点位的地下水位做出更准确的预测、预判,查明全市地下水位变化规律,及其对城市房屋建筑、基础设施造成的影响。

(2) 建立全市多点位地下水动态监测体系,加强深层地下水和浅层地下水水情监测和预报,特别是在水位上涨趋势较大和密集老旧小区等区域,结合建筑工程的重要程度,设置地下水位变化重点监视区和监测点,及时准确掌握地下水位变化情况,及时提供预警预报,为勘察设计单位提供科学的抗浮设防水位依据。

(3) 根据地下水位发展趋势,采取多种措施,控制地下水位标高,适当开采合理利用地下水资源,将地下水位维持在科学合理的水平,减少地下水位显著上升区域内已建成房屋建筑地下室出现的渗漏、抗浮风险,确保城乡生产生活及财产安全。例如:可在二七区地下水位显著上升的区域(漏斗中心周边区域),中原路以南,航海以北,嵩山路以东,大学路以西,利用市政绿地均匀打井抽水(或开启之前封闭的水井),定期抽取地下水,将此区域浅层地下水位稳定在地面 10 m 以下,减少此区域已建成住宅小区地下车库出现渗漏、抗浮风险。

(4) 针对地下水位上升已经带来的房屋建筑安全问题,分类施策,消除隐患。对于既有建筑物地下空间,可设置排水沟排水降压,打井抽水泄压、地下室底板增加压重,增强底板抗浮能力;对于已经影响主体结构的,应进行安全鉴定和加固处理。在资金筹措上主要依靠地下空间产权人筹集,政府可以给予适当补贴。对于新建项目,设计施工时应充分考虑地下水位变化情况,提升抗浮设计和防渗^[14-15]防水标准,增强抗浮、防水能力,从源头进行预防。

(5) 支持高校和相关企业机构,加强区域内的岩土水理性^[16]的专项研究和工程实践。建议前期勘察阶段对地下水对岩土的作用以及可能发生的危害进行分析和预测,进而在地基处理、基础和上部主体设计时进行考虑。同时,针对既有建筑受地下水

位的变化对地下岩土水理性进行研究,可以预设风险等级,并制定对应的处置措施。

参考文献:

[1] 兰自亭. 地下水变化引起的岩土工程问题探究[J]. 中国金属通报, 2020(11): 293 - 294.

[2] 任孝刚, 豆敬峰. 地下水危害及工程地质勘察水文地质评价与分析[J]. 中华建设, 2018(7): 128 - 129.

[3] 吴向峰. 银川市城区地下水位上升对建筑物地基沉降变形的影响研究[D]. 银川: 宁夏大学, 2023: 1 - 70.

[4] 池秋慧, 董金玉. 不同饱和度下黏粒含量对土体强度特性的影响[J]. 土工基础, 2020, 34(2): 190 - 193.

[5] 周涛, 木林隆, 王乐, 等. 水位抬升下黄土高填方地基增湿变形试验研究[J]. 地基处理, 2022, 4(S1): 128 - 133.

[6] 史恒, 翟勇, 张利滨. 郑州市中原区水源保护区地下水动态变化特征浅析[J]. 治淮, 2023(9): 16 - 18.

[7] 张语格, 梁东丽. 西安市 33 年间地下水动态特征分析[J]. 地下水, 2019(6): 66 - 67.

[8] 武建玲. 对地下水开采持续严格管理效果明显 一季度郑州地下水水位上升幅度居全国第三[N]. 郑州日报, 2021 - 07 - 08.

[9] 闫春楠. 地下水位变动对周边建筑物沉降影响分析[J]. 地下水, 2016, 38(6): 67 - 69.

[10] 唐逸凡, 焦艳梅, 刘新原, 等. 地下水位升降过程中的黏土地基孔压变化试验研究[J]. 南京工业大学学报, 2024(1): 103 - 111.

[11] 张民新. 地下水位上升对浅基础地基承载力的影响[J]. 路桥工程, 2015, 5(18): 2136 - 2137.

[12] 雷雪. 水位升降对黄泛区刚性桩复合地基承载性状的影响研究[D]. 郑州: 郑州大学, 2021.

[13] 徐光黎, 马勋, 张杰青, 等. 东京地下水位上升对地下工程的危害警示[J]. 岩土工程学报, 2014, 36(S2): 269 - 273.

[14] 郭旺强. 高层住宅地下室渗漏的原因及防治措施[J]. 百科论坛电子杂志, 2023(18): 345 - 347.

[15] 卢志强. 高层住宅地下室渗漏的原因及防治措施[J]. 河南建材, 2019(4): 316 - 317.

[16] 唐锐敏, 徐国平. 岩土工程中的水文地质问题研究[J]. 工程勘测, 2014(12): 378 - 382.

(责任编辑 李玉玲)

The Impact of Rising Groundwater Level on the Safe Use of Building Construction

—Taking Zhengzhou City as an Example

ZHAO Liang¹, YIN Shunda², SUN Guangxin³

1. Zhengzhou Housing Security and Real Estate Administration Bureau, Zhengzhou, Henan 450003, China;
2. Zhengzhou Cambridge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Co., Ltd., Zhengzhou, Henan 450003, China;
3. Zhengzhou Gongtu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Testing Co., Ltd., Zhengzhou, Henan 45001, China)

Abstract: The rise of groundwater level has an impact on urban building construction. As a participant in urban management and construction, we collected information and some engineering cases on groundwater level in Zhengzhou City in recent years. This article describes the concept of groundwater, the causes, hazards, measures and recommendations of the rising of the groundwater level in Zhengzhou.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outh - to - North Water Diversion Project, the sealing and shutdown of some wells in the urban area and its surroundings are the main reasons for the rise of the groundwater level, and the rise of groundwater level has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safety of buildings. It is recommended that measures such as anti - floating, anti - seepage, moisture - proof and eliminating liquefaction of new buildings and existing buildings should be taken.

Key words: foundation engineering; groundwater; investigation; building construction; floating effect